

#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 马克思与第三世界

[意] 翁贝托·梅洛蒂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 024 9575 4

# 马克思与第三世界

[意] 翁贝托·梅洛蒂著

高 钰 徐壮飞 涂光楠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1年·北京

#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Umberto Melotti*

Marx e il Terzo Mondo

Il Saggiatore, Milano, 1972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Patricia Ransford

Edited with a foreword by Malcolm Caldwell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7

根据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 1977 年版英译本译出

26 05/29

## 内 部 发 行

### 马克思与第三世界

[意] 翁贝托·梅洛蒂 著

高 钰 徐壮飞 涂光楠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8<sup>1</sup>/<sub>2</sub>。印张 200 千字

1981 年 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600 册

统一书号: 4017·229 定价: 1.10 元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

## —— 为《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译本 所写的前言

吴 大 琨

意大利翁贝托·梅洛蒂教授所著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1972年在意大利出版，英译本于1977年出版）是一本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专著，现在已经由高钰、徐壮飞和涂光楠三位同志根据英译本译成中文。这是近年来我国介绍的各种外国学术著作中比较重要的一本著作。由于长期以来，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之一，而这本书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又提出了不少新颖的看法，所以我相信，中译本的出版，一定会在我国学术界引起很大的注意与兴趣，从而展开各种有关学术问题的热烈讨论。这就是说，这个译本的出版，在我国当前情况下，将有利于党在学术界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有助于我们“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在学术界认真推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因此，我愿意趁本书中译本出版的机会，首先谈一下我个人对书中所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以就正于我国学术界的其他同志。但我在提出我的看法以前，还得先简单谈一下这个译本的由来。

1978年4月份当我在北京图书馆新书展出中读到本书时，立刻被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几个带有“爆炸性”的问题的论点吸引住了。后来，我把本书内容向一位我最敬佩的学术界前辈作了汇报。他立刻判断出了本书的重要性，要我尽快组织力量翻译。这是本

书中译本能较快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由来。那么，在我最初阅读本书的英译本时，究竟是被哪几个问题——即我认为是带有“爆炸性”的问题的论点——吸引住的呢？我认为，这样的问题一共有四个。

第一个问题是，历史上所有的生产方式，究竟是五种、还是六种？也就是说，马克思论述过、研究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还是仅仅象当代某些苏联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东方的“不发达的奴隶制”<sup>1</sup>，或者是象国内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原始公社制”的别名<sup>2</sup>？这是一个首先值得我们详加研究的问题。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很明确的，论证也很详细。我个人在五十年代初期研究历史上的地租形态时也得到过同样的结论<sup>3</sup>。当时我曾注意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3卷第37章中讨论地租问题时所列举的一些不同的土地所有者的情况。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土地所有者可以是代表公社的个人，如在亚洲、埃及等地那样；这种土地所有权也可以只是某些人对直接生产者人格的所有权的附属品，如在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下那样。”<sup>4</sup>

在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马克思除提出奴隶制及农奴制以外，还提出了一个以“代表公社的个人”来作为一种存在在亚洲及埃及的土地所有者的形式。后来，马克思在同书第47章中，又说了这样的话：

1 详细情况可参看 B. И. 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中译本“引论”三联书店1956年。

2 见《世界历史》（双月刊）1979年第2期所载《怎样理解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文。

3 详见我当时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上的两篇论文：《论前资本主义社会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论地租与中国历史分期及封建社会的长期阻滞性问题》。

4 《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4页。

“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sup>1</sup>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这一特殊的土地所有形态，从而也是特殊的地租形态，就是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所著而未在他生前发表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sup>2</sup>一书中所论述的三种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中的一种。马克思在该书中明确地提出了 1) 东方的或者亚细亚的，2) 希腊、罗马的或者古典的，3) 日耳曼的或者欧洲中世纪的三种生产形态。在希腊、罗马社会里，统治的土地所有者是奴隶主，主要生产者是奴隶；在欧洲中世纪社会里，统治的土地所有者是封建领主，而主要生产者则是农奴；但在东方的或亚细亚的社会里 统治的土地所有者却是“国君”而主要耕作者则是居住在村社里的“农民”。

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应当是一种和希腊、罗马的或者古典的，以及日耳曼的或者欧洲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相并列的独立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看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可能不可能就是“原始公社制”的生产方式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已经存在征收“地租”和“课税”合而为一的剥削者——“国君”，它早就不是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原始公社制了。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

1 《资本论》第 3 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 第 891 页。

2 译文载《文史哲》1953 年第 1 期。

的主要生产方式和主要生产关系，应当是六种而不是五种。人们通常认为是五种，主要原因可以说是因为斯大林在 1938 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 4 章第 2 节中肯定人类历史上的基本生产关系仅有五种，即：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五种生产关系的。我在五十年代初期研究这个问题时，思想也是束缚在斯大林的框框里，没有敢突破。后来经过继续研究发现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论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关于这一点，本书作者已有详尽的论证，我个人除对这些论证表示同意外，还认为应当加上我在前边说到的关于地租形态的这一论证。

第二个问题是，本书作者所谈到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究竟是象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是“单线的”还是实际上是“多线的”对于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是应当看一下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历史上，除了西欧的一些国家曾经在奴隶社会的废墟上兴起了封建社会，再由封建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外，其余五大洲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没有在历史上自动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上来说，难道可以认为是偶然的吗？当然，这个问题牵涉到世界史方面许多错综复杂的课题，我们还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才能对此作出最后的结论。但我们在从事这一研究工作时，首先要摆脱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发展图式的框框，我看是十分必要的。其次我们还应当认识到，主张“多线论”并不等于否定了一元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哲学上的“一元”还是“多元”是指的“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和这里所说历史发展道路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是两回事。而且我们所说的“单线”还是“多线”研究的对象都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开展“多线论”的研究，只会更加丰富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的认识，而决不会起到相反



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是，我国自己的历史发展问题。本书作者是把中国作为最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看待的。是不是这样？很值得我们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加以深入研究。在我国的历史学家中，就我所知，只有侯外庐同志真正结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情况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作了认真的研究，并写出了专著。<sup>1</sup> 其他的历史学家们，绝大多数都和我一样，在思想上受到了斯大林所说“五种生产方式”的严重束缚，没有能把中国的历史看作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而加以全面而具体的研究。其实，以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况来说，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概括出来的“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sup>2</sup> 正好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点。因此，尽管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使用了“封建”这个词，就其实质而言，我们却不能把它理解为和西欧的封建社会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封建社会”。如果把具有这些特点的“中国封建社会”译成英语 **Feudalism** 的话，西方和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很难理解的。这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在国外讲授中国经济问题这一课程时的亲身经历。这也是后来我在山东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中国古史分期问题<sup>3</sup> 所遇到的困难。这使我理解到，把一个明明不是和西欧社会走同样发展道路的中国社会，硬要用和西欧社会同样的分期名称来分期，这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敢于突破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框框，敢于直接根据马克思的原著精神，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事研究，那么，我相信，不但中国的古史分期问题可以较快地得

1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香港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2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94 页，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

3 吴大琨：《中国的奴隶制经济与封建制经济论纲》，三联书店 1963 年版。

到解决，而且有关整个世界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历史的研究，也将会有很大的进展。

第四個问题是，关于当代的俄国和中国社会能不能称作“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问题。当代的俄国社会的性质，现在在各国的研究工作者之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与争论，我对此毫无研究，不敢乱说。但俄国社会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又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列宁早在《论粮食税》这篇重要文章中指出过的一种存在在苏维埃制度内部的“祸害”。列宁当时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的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sup>1</sup>问题是这种官僚主义的‘祸害’后来并没有能在俄国得到真正的克服和根除，以致马林科夫在 1952 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中，仍不得不用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来揭露主要由于官僚主义而造成的各种“祸害”。我们中国的情况，当然和俄国不一样。但中国和俄国比，有更广阔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历史背景，这种专制主义的余毒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到林彪和‘四人帮’横行时期发展到了顶点。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民亲身经历的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本书原文出版于 1972 年，所以本书作者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反映的是林彪和“四人帮”横行时期的情况，他在书中提出的对中国的看法是与此有关的。他对于我国党中央在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推行的一系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政策措施，在当时还不可能预见到，这是我们在阅读本书时应当注意到的。

1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525 页。

以上就是我认为本书中最值得我们重视和加以研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点我认为应当向读者指出，就是本书作者的治学态度，即研究问题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提出的每一论点都有充分的根据。这一点，我们从本书的大量注释中就可以看出来。就我所知，本书译者们所花的大量劳动，有一半以上是花在翻译和核对这些注释上的。这不是一本容易翻译的书，也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但读者在认真阅读之后，就可以体会到它确实是一本在思想上和理论问题上对我们大有启发的书。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使长期成为‘禁区’的关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又能在我国引起注意和讨论，这三位译者的贡献是不小的。我要代表所有的读者对他们表示感谢。

1979年9月11日于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 英译本编者前言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整体中那个难以处理的一个附件，显然是整体中相当非正式的部分，可是，却比它的主体更加频繁地被人送去安息。最近的葬礼是由佩里·安德森举行的，他要求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进行应有的适当埋葬”。<sup>1</sup>可是，翁贝托·梅洛蒂在用了重药以后，在这本精采的书里已经成功地使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整个思想又起死回生了。这个思想所具有的执拗而顽强的复活力，充分说明它确实包含某些重要的原理；它过去的明显脆弱性，可能更多地是由于我们在应用时缺乏理解力和适应性，而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任何天生的缺陷。本书作者清晰而简明地阐述和澄清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对此，我无法望其项背，因此我不在这里进行多余的概括，而只限于发表几点评论和看法。

总的说来，无数自命为马克思信徒的人对马克思的效劳是很糟糕的。马克思很谨慎地不把自己在西欧发现并记录下来的历史模式和进程宣称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他不断地、明确地强调这一点。可是，尽管他作了否认，他的信徒中有许多人——甚至也许是大多数人——却把那个公式机械地搬到所有的五大洲去，用一种可与中世纪学者们媲美的诡辩术来力求使格格不入的事情适应于教条的要求。正如梅洛蒂所表明的，这些在学术上使用的花招，产生了毫无开导性或启发性的结果。

但是，马克思当然不能把他的视野限于欧洲。如果对于资本主义未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发展的原因不加以重要的补充说明的话，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就不可能阐述得完全和令人满意。

马克思曾经试图弄清到底为什么只有西欧能自发地——或者说主动地，依靠其自身的物质资源和组织机构——从一个显然是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成功地过渡到自主的工业资本主义。种族优越感的种族主义论点显然从几个方面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而归之于仅仅是历史的变幻莫测，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但是，如果把封建主义看成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就是说：那是从以前奴隶经济废墟中终于到处出现的一种生产方式的话，那么，要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只在欧洲发生？”的问题，就更加困难和复杂了。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显然在于假定存在着各种可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这正是马克思所采取的途径。在这些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除了封建主义以外，以潜在的广泛应用范围而言，有一种经济形态后来取得了几乎独一无二的突出地位，那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什么特殊和独特的特点使它同资本主义的种子不相容呢？（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使这一点成为一个特别有刺激性的问题。这在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令人感兴趣的难题，它经常重新引起辩论，并使这个概念获得新生。

梅洛蒂教授详细阐述了这种思想的历史变迁 他提醒我们 俄国和中国革命后的紧急局势，和非共产党世界中的学术风尚一样，都起了它们的作用。我只想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辩论“不发达”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的背景下，这种思想又大大抬头，那是不可避免的。我并不是说这种情况只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他们对这个思想从来没有长期忽视过，它也没有远离他们论战的前沿；我是说，在近年来，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其原因是不难找到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对于所谓“不发达”所引起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是极少关注的；“发展经济学”实际上主要是战后的一种创新。甚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虽

然总的说来他们对于‘不发达’的有关现象和改变这种现象的必要性要关注得多。现在看来却具有严重的欧洲中心主义，而且骄傲自大。毫不奇怪，那些关于克服不发达状态的早期主张是十分天真和简单的。只要看一眼五十年代的一些一度受到重视的教科书，就能很快地、明确地发现这一点。然而，必须指出，西方那些真正制订和实施‘发展’政策的人却是从一开始就比他们当代的学者们要现实和冷漠得多。<sup>2</sup> 早期那种热情、有力的发展主义，实际上把必要的解决方案缩小为资本加计划。大量的西方经济学家都和新独立国家的政府有联系，都是毛遂自荐的，有时是自发提出，有时由一个援助国安排，向它们提供发展的意见，并协助制订国家经济计划。还有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从他们四面八方的大学里自动地提出各种建议和主张。

不发达国家未能从这种帮助和意见中得益，这必然使它们对于简单地说明和解决不发达的问题失去兴趣。其结果是，到处出现一些更加精细的分析，每个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都力求形成他自己的一套新的全面理论。现在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注意：气候、自然资源、宗教、遗传特点、心理、文化、语言等等。但很少有人预见地注意到殖民主义作为‘不发达’的先决条件的意义，也很少注意到在中国的方式下革命作为摆脱‘不发达’的重要先决条件的意义。至于那些注意到这一点的人们，则很少有人能一开始就超过殖民主义这一范围来说明当代的贫困问题，认为那是相当充分的了；他们含蓄地提出或明白地认为殖民时期以前存在着平等的发展。但是，确实对这个问题探讨得比较深的某些人却又重新发现了经常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马克思之伟大，显然在于他的著作始终与众不同地联系到对国际不平等现象寻求一个满意的解释。他探讨和说明问题的系统、彻底和全面，是独一无二的，很有教益的。必须指出，恩格斯

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说明这一点是不公平的；确实，在这个活动中，实际上不可能把他们各自的贡献分开来。）梅洛蒂教授很成功地努力为寻根究底的我们这一代勾画出最有关系的一些方面，并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路标。他已经同时写出了对当前马克思主义的最好、最清楚的介绍，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作了相当新颖和独创的转义——这肯定是不小的成就。

但同时还要提出一句警告：甚至马克思也保有一丝可能主要并不自觉的欧洲中心主义，正如梅洛蒂教授所表明的，他提出了若干著名的、然而现在确已有点令人生腻的引文。在自命为马克思信徒的那些西方人中间这一特殊思潮指欧洲中心主义——中译者注）表现出相当大的力量，最为显著的是在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分子中间，他们托庇于衰落中的帝国主义，顽固不化地声称：甚至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也必须等待早就预告的富国中（白种）产业工人的起义。梅洛蒂教授毕竟也不能免于这一可想而知的影 响，正如他对中国革命的评论中所表现的。西方人很难摆脱这种世代代根深蒂固的幻想：认为世界是以白种人的富国——它们的行动、倡议、决定和方向——为中心而运转的。梅洛蒂和安德森（见注1）表露出这种不自觉的见解，虽然以不同的方式、并且自然是间接的——安德森推崇实际可以说是吹捧古典希腊—罗马为人类成就的顶峰梅洛蒂颂扬西方技术是未来“真正的”革命的最终保证。当西方世代代地盛行这种不费力气的、深信不疑的优越感的时候，亚洲的革命者们也许现在大可对这种不可救药的思想废渣取笑一番。显然，当历史的钟摆无情地摆离西方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即：到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哪些特点使得亚洲社会特别为新形式的社会所接受呢？这种新形式的社会正在把过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迅速地扔进历史垃圾箱。

可是，虽然这样说了，我还要竭力推荐梅洛蒂的书。提请所有关心现代不发达问题和国际不平等现象的人们注意。这本书肯定能增进认识。

我们祝贺本书英译者帕特·兰斯福德出色的英译文，它具体帮助了这本书发挥影响。

马尔科姆·考德威尔





## 导 言

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概念 按照流行的形象 仍然被描述为遵循一条单一的狭窄道路。这种看法，据认为是来自马克思最著名和最广为阅读的作品《共产党宣言》。如所周知，那篇著作是为了教育人民这一实际目的而写的。但是那些自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忠诚分子却继续和他们的对手竞相糟蹋马克思的观点（这股热情满可以用到别的地方去），把它降为一些光秃秃的骨头，降为五种不同类型社会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单线发展图式，认为这五种社会不但在时间上而且在逻辑上逐个连贯，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循序渐进的”阶段。这五种社会就是 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以奴隶为基础的古代社会、以农奴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最后是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这被看成是一切世界历史前进的目标，特别是从苏联到中国那样的社会，据认为是已经处在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状况中了。

这种单线发展的观点，无疑是马克思思想中一种吸引人的东西，在恩格斯的思想中更加如此，事实上，十九世纪所有历史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体系中都有这一点。然而，马克思不是一位单线发展论者，虽然，只是到了最近才有几位学者开始对此表示怀疑。即使是这些作家们，虽然他们对于斯大林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奉为神圣的强求一致的简单化图式日益厌烦，他们也只能做到在这方面偶而放放炮而已；其中确有若干显著的例外人物，以后我们将会谈到。即使是极少数更加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也没

有合乎逻辑地进而提出一种多线发展型的明确的替代图式，使之能合理地对待在马克思思想中可以找到痕迹的远为复杂的历史发展观点。

学者们对这一题目表现出来的缺乏兴趣，主要是出于误解。当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满足于纠缠在一整套无批判的传统之中的单线发展图式的时候，观点不那么固定的那些人们却被引导到把孩子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他们找到一段马克思著名的话作为论据，就不但把不正确的图式扔掉，而且扔掉了所有的图式。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并非反对图式的实际用途，而只是反对笼统地应用它们，或者换句话说，反对把一种图式用作思想禁锢或一套教条主义的先验原则。当然，使用错误的图式或者错误地、教条主义地使用正确的图式，还不如没有任何图式。这并没有改变以下的事实：由于马克思的思想中贯穿着一种历史发展的图式，人们就必须设法尽可能准确地把它复原，即使只是肯定马克思自己提出的所有谨防之点都是有关正确的图式而不是另外一个任意安在马克思名下的图式。这就是本书现在所试图要做的，要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那些最直接有关非欧洲国家的问题和前景的著作。

历史发展的含义是什么？

马克思所谓的历史发展，其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向自己简要地提醒一下是有益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要来源是众所周知的：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原始社会主义。每一个来源都以其自己的方式强烈地充满着进步的思想，那种从启蒙时期继承下来的十九世纪的伟大思想。

特别是黑格尔，他深刻地改变了启蒙时期那种坚定不移的、没有局限的进步的典型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sup>8</sup> 黑格尔之有别于当

时所有哲学家的地方，是他强烈的历史感，这是他的思想的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和抽象的。在黑格尔的眼中，历史代表着世界精神的发展。虽然他从中也看到“自由意识的进步，一种应视为必需的进步”，他强调的是意识。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仍然颠倒着。

马克思接过了黑格尔关于历史是走向人类解放的一种进步的思想。但是他向唯心主义妥协：“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14</sup>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一切历史的首要前提是人类必须能够活下去。因此人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繁衍生命：通过劳动繁衍他自己的生命，通过生殖繁衍另一些生命。历史首先是“人的生产”。这从一开始就是处于一种双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力就是人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如土地肥力、水力、蒸气、石油和现在的核动力加上科学与技术知识以及那些应用它们的社会组织。生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上构成的关系，他们参加社会生产过程，就必然形成这种关系，例如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农奴与领主之间、或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生产关系表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或者财产关系，例如，希腊和罗马的土地和奴隶的私有制、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土地私有制和对劳动者的各种非财产性权利、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名义上自由的工人没有人身支配权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以，生产关系是社会划分为具有利害冲突的若干阶级的基础，诸如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奴、或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根据列宁的著名定义，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

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sup>75</sup>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总体就构成生产方式 例如 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其他生产方式。这就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要概念。一种生产方式就是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殊形式 或者换句话说 就是物质产品 特别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得以进行生产的过程的特殊形式。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别，在于生产力的组织方法和生产关系之不同。每种生产方式，除了有两种例外 都有其特殊的剥削形式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是所谓‘普遍奴隶制’ 在古代生产方式中是奴隶制 在封建生产方式中是农奴制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雇佣劳动 等等 与此相应的是 占用他人劳动的种种具体形式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 通过纳贡制和集体徭役来占用村社的劳动；在古代生产方式中，占有奴隶的人身 从而占用他的劳动 在封建生产方式中 私人占有农奴的剩余产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私人占有剩余价值 唯一的两种不进行剥削的生产方式，是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就是马克思解释摩尔根的话的意思 他说‘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sup>76</sup>当然，马克思对于原始共产主义和未来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很清楚的，以后我们将会看到。

生产关系形成了社会的结构 这是真正的基础 上面建立起法律、政治、宗教、哲学、艺术等等的上层建筑 以及社会意识的具体形式。结构和上层建筑一起组成社会-经济形态 这是一种有历史界限的结构 例如亚细亚、古代、封建或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我们看到，对它们的剖析是以该社会的特定（或者不如说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为模式的 因此 连马克思也时常使用‘生产方式’一词来

比喻社会-经济形态。在实际的社会-经济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以外，时常总还有一些其他的生产方式存在，不论那是过去的残余还是未来的先驱。

对马克思来说，历史进程的特点就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即不同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相继出现。它们所以有一种特殊的暂时的历史性，因为它们的存在包含着既是组成部分又是必要条件的社会生产力的特定水平及其发展形式。

历史变化最终来自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每一代人已经掌握了他们先辈获得的生产力并能转而利用来作为发展其自身生产力的基础。然而，随之而来的社会进程是辩证的（即革命的）而不仅仅是累积的（或演进的）。当生产力发展起来后，它们就会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它们的桎梏，那时一个社会革命的新时代就来到了。<sup>7</sup> 矛盾是在现存的主要阶级中发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客观公式是：社会的历史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历史，是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历史，这种矛盾是在它们发展过程中产生和解决的。这只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主观公式的另一面。这一斗争（如果不是以敌对着的阶级共同毁灭而告终，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从长远来说，就会导致被压迫阶级的胜利。如马克思所说，那个阶级本身就是“最伟大的生产力”，因为它的利益符合于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现有生产关系的更换。

当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改变时，社会本身也在各个方面改变了。换句话说，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产生了。它在客观上比它的前身优越，它是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上建立的，这种生产关系允许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并代表社会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对大自然的控制增多了，对人的剥削减少了。<sup>8</sup> 这种进程影响到世界上的

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社会。这并不是说它在各处以同样的方式同时地和完全地发生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进步 意味着不同的社会逐渐接近达到了比较密切的相互接触和较大的单位，这预示着一个未来的完全的世界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各国间普遍的相互依赖”只是这种社会的前提。

因此 对于人类 对于世界各地的所有人来说 通向真正的、不仅仅是理想的解放的道路打开了，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将实现这一点。在那里，阶级分野已经最终消除，一切进一步的发展就有可能实现而不受内部分裂的社会的矛盾所阻碍。因此，当前社会的“史前时期”即将结束，而摆脱了异化和剥削的人类终于要开始其作为充分发展的人的“历史”了。

什么是历史发展图式？

历史发展的图式或模式，简要地代表了作为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特点的结构及其基本动力。它的目的是便于了解真正在过去发生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以及可以从现有倾向中合理地假设将来可能发生的历史发展的真正进程。这样一种图式，自然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模式，它不能完全地代表历史。但是它是一种重要的启发手段，因为它剔除了使历史发展轮廓发生模糊的偶然附加物，从而有助于揭示出历史发展所包含的“逻辑”。

马克思总是坚持这种方法。他研究的主题——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任何具体国家 甚至是英国 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他的时代 如同他自己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 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典型地点。它更是反映每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特点的有意识的抽象。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

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sup>8</sup>

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时 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方法论 他说：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着它 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 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 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 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这时 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 它需要历史的例证 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举出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 有的指出经济文献 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sup>9</sup>

可以看到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历史发展的‘图式’看成是一种启发性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并不违反历史现实，虽然它不能充分反映丰富得多的历史 相反 它却抓住了历史的基本意义。所以它只能由真实的历史来加以证明，而不是由历史的哲学概念来证明，除了它在本质上是‘超乎历史的。’<sup>10</sup>

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



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sup>10</sup>

所以 马克思没有进行目的论的推测 他也没有把历史看成是一种具体的人格化：“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 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 不是‘历史’ 而正是人 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sup>11</sup>由于历史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它就不会是、也不可能是一种最终决定了进程的单线发展 相反地 它是具有多种进程而并非没有‘意义’的多线发展和含义转折的事物。

## 当前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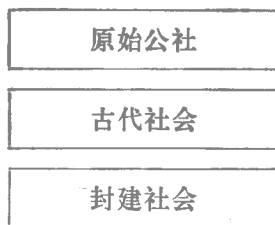
### 历史发展的模式

在提出我们的探讨结果以前，我们应当对于近年来首先对传统的单线图式提出疑问的那些学者给以应有的赞扬。虽然有些人那样做是出于非常含糊的角度。他们鼓舞了我们去承担这项任务。荣誉应归于过分受到诽谤的威特福格尔和过分受到赞扬的霍布斯鲍姆。随后是戈德里埃、罗丹松、谢诺、曼德尔、絮勒·卡纳尔、加罗迪、施密特、特凯、多夸。他们是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汉学家、非洲学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代表着新的、非单线式马克思主义的最有生气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加上休伯曼和斯威齐的名字。他们虽然对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兴趣，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公开抨击了“荒谬地把《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图式看作是一种普遍的公式”。<sup>12</sup>

因此，做一个简要的情况报告是合适的。

### 传统的单线图式

根据这一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模式图解应该是这样的：



资产阶级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这不是纯属随意的解释，因为它根据了马克思的整个一系列著作，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但是那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模式。它忽略了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马克思的思想，至少从1853年起的时期内，他在若干年间（特别在1853年和1857至1860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所写的论述亚洲的文章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一书中在《资本论》的许多章节中，以及在他晚年的书信和著作中，都有发展。当马克思被要求澄清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他坚定地回答说，“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 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 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 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sup>13</sup>

自从第二国际时期以来（不说更早的话）当时仍在流行的那种解释一直是欧洲各种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历来坚持的。它们利用它作为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出发点，从而在实际上使它们能传播帝国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思想，甚至把它们装扮成正统马克思主义而在工人阶级范围内加以传播。<sup>14</sup> 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的模式也倾向于重新提出那种解释。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试图一下子取消马克思本人提出的亚细亚方式的概念。<sup>15</sup> 由此而出现的空白，主要靠任意延长其他几个前资本主义形式——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以及特别是封建主义——来加以掩盖。<sup>16</sup>

1931年列宁格勒辩论的结果，是抛弃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方式的概念，确立了一种把东方社会看成是封建主义的亚细亚变种的倾向。1934年，学者科瓦列夫建议不如把它们解释为奴隶制的

变种。后来 又一位学者司徒卢威提出一种观点 说东方社会曾经是古代的奴隶社会，而在从奴隶制进化出来的最初一些阶段上停下来了。<sup>17</sup> 他的文章被欢呼为“最终结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的一大贡献。苏联东方学家中的流行观点赞成这样的看法：认为东方社会经过了古代的奴隶阶段，然后在中世纪时代经历了封建主义。在这两个时期中存在的原始社会痕迹，要比在西方存在的范围大得多。<sup>18</sup>

在中国，1949年以来直到最近文化革命的倾向，始终是遵循毛泽东把中国的历史阶段和欧洲的历史阶段——先是奴隶制，然后是封建主义——完全等同起来的看法。例如，1959年在北京用范文出版的翦伯赞、邵循正和胡华合著的《中国通史》中，一开始就宣称：“如同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历史也经过了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各个阶段。”甚至连封建或奴隶社会的特殊的东方变种也不再提了，而那种提法是苏联在列宁格勒辩论会的结论中以及由历史学家科瓦列夫和司徒卢威所分别承认了的。在中国，对于象旧朝廷官僚部门那样的基本体制，没有作过一次认真的历史研究。但是，中国学者们在本国历史应如何分期以纳入上述划分的阶段这个问题上，有很大分歧，这本身就足以表明：要把意识形态方面得到批准的模式应用于中国，是多么困难。但是这样令人可叹地把某些名称不加区分地使用，在西方也是广泛流行的。因此，人们可以漫不经心地把没有进行过资产阶级革命的任何社会，从1788年的法国到尼日利亚酋长国，从沙皇俄国到十九世纪的中国或印度，都列为“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然而，这似乎更多地是由于历史或语言方面的牵强附会，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虽然，那也不能说明其有理。例如在中国。<sup>19</sup> 事实上，中国的学者们甚至更加过分，他们断言：在最初引起争论的1859年著名表列中，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指的

原始社会。<sup>20</sup>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对马克思以及所有严肃的人类学家来说，原始社会只能指一种自然生存经济（采集和渔猎）和一般的畜牧和游牧文化，至多是指刀耕火种式的农业，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却意味着定居垦殖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1966年至1969年的文化革命，引起了对中国历史某些特点的重新注意——或者说，当本书作者于1971年10月间访问中国时同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老师们讨论中似乎感到这一点。然而，那并没有导致对单线模式提出任何疑问，可能那是可以预料的，因为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大动荡中，新、老特权阶级的官僚主义性质是受到广泛而深切的注意的。

再者越南人在维护本国文化遗产方面比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集团走得更远，他们的历史著作特别强调原先种植粮食的村社如何依靠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这从最久远以来就是在作用上无法取代的一种国家表现形式，同样也是一种阶级统治的手段。但是，即使是他们也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甚至设法在越南发现一个奴隶社会，作为当初走向阶级分野社会的第一步。<sup>21</sup>

毕竟，传统的单线图式还是在西方最为流行的，不论是那些急于处处表明自己对莫斯科或北京路线给以“正统”支持的“正式”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我们只需每类举一个例子：第一类人是英国人夏庇若，第二类人是美国人施莱辛格。在《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主办的一次对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有意思的辩论中，夏庇若发表了一篇引起争论的文章，他毫不犹豫地主张最狭窄的单线观点。他甚至拒绝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把它贬为“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说马克思只提到过一次，然后在摩尔根和恩格斯的伟大科学研究论文发表以后马克思就不提了。<sup>22</sup>自然，那是使人完全不能接受的解释。马克思并不只是偶然一次提到亚细亚方式，而是确实很详尽地讨论的，我们将在本书中说明

这点情况。甚至所谓马克思读了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著作后就放弃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论调也是站不住脚的。这不但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摩尔根的发现是对他们关于历史发展思想的一种肯定而不是否定，而是因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许多段落内仍然把这种历史发展思想作为必要的参考内容。而且恩格斯自己在准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一文时所写的若干信件中，都明白地使用了这一思想。<sup>23</sup>人所共知，这一著作是得到摩尔根一书的启发，而且是摩尔根一书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施莱辛格的批评就更粗鲁了。他甚至断言：“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自然对未来都主张一种宿命论的观点。按它看来，……人类正在沿着一条预定的道路，经过预定的阶段，到达一个预定的结局。”他认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一个中心命题的话，那就是：认为现代化、工业化和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将必然使每个国家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sup>24</sup>

这使人怀疑施莱辛格是否真的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他也许是读过的，即使是通过过多的马克思赞美者们抱有意识形态偏见的颂词的有色眼镜。事实上，即使是通常对马克思主义象阿伦那样敌视的学者（他总是想把马克思主义贬为一种机械的讽刺）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西方以外的一种文明的话（他相信是这样的，因为它似乎并不构成西方历史的一个阶段）”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容许不同的人类集团具有相应的不同历史进化路线的”。<sup>25</sup>

传统的单线图式一旦联系实际，同马克思的真正思想就相距很远。如果联系具体事件，就完全不合理了。而且，它甚至相当不恰当地把西欧的历史发展提高到“普遍性”模式的地位。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的一个明显例证。所以，看到古巴、中国、越南、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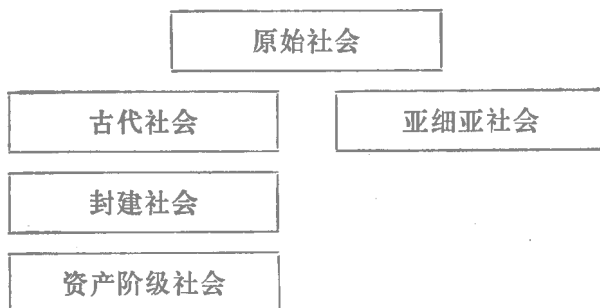
鲜以及甚至黑非洲(例如坦桑尼亚)的学校里也在教这个内容,是令人惊异的。这种历史观的传播,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突出例子。关于这一点,应当主要归罪于共产党的教条主义态度。

### 普列汉诺夫和威特福格尔的双线发展模式

普列汉诺夫的一些看法,明显地预示了中国和苏联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是它们多年的先驱。他认为:“不但是‘俄国象西欧那样经过了封建阶段’而且‘同样的阶段发生于埃及、迦勒底、亚述、波斯、日本和中国——简言之,发生于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东方文明之邦’”<sup>26</sup>。

但是普列汉诺夫在他最享盛名的作品中保留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指出它不能被看成是先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他把亚细亚方式和奴隶制方式看成是“两个并存的经济类型”两者有显著不同,其主要的不同特点在不同环境的影响下发展演变。<sup>27</sup>

他的论点的中心是:原始社会解体的结果,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然而类似的发展线路。在西方,逐一发展了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在东方,出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



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著作,在描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方面是相当紧跟马克思的。象马克思那样,普列汉诺夫断言亚细亚社会的静

止性以及它没有殖民征服或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外力推动是不能发展的。他把这种思想应用于俄国历史，是特别有意思的：在1861年农奴解放以前，俄国有点象一个欧洲的中国，一个“东方的”或“半东方的”国家。但是，虽然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都是俄国社会的特点，俄国却比亚洲各国有一个巨大的有利之点——它同西方接壤。

人们在托洛茨基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非常相似的主题时常一再发生。事实上，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对俄国社会的解释都动摇于封建和亚细亚之间，同时对东、西方之间经历的不同发展分得很清。托洛茨基采取很坚定的立场反对“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后来斯大林接受了)认为把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历史阶段和进化规律断言为具有同一的性质，这就退化为庸俗的教条。<sup>28</sup>

威特福格尔也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清楚地得到灵感；他也强调地理因素和环境因素对东、西方不同历史道路的影响。他过去一度曾经是第三国际的密切同情者，后来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他的功绩是：首先出来抨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的”单线正统，当时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他的抨击很强有力。他的局限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著作中最为明显，特别是在他最著名的书中。他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大胆活动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非常机械地解释为他的永恒亚细亚社会的理论基础（这种永恒亚细亚社会也无分别地一概称为“水力的”、“东方的”、“农业官僚主义的”、“农业管理的”社会等等）他说那种社会是“在苏联和中国再度出现的专制社会”的典型和先驱。<sup>29</sup>因此威特福格尔对单线发展理论的改进也时常表现为可以在马克思及其十八、十九世纪渊源中找到蛛丝马迹的那种排外思想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推动而夸大的产物（马克思的十八、十九世纪渊源，指的是：第一批去亚洲的欧洲旅行家、孟德斯鸠、黑格



尔、英国的经济学家 等等 )这种观点不可避免地、并且可以理解地对于取代旧的单线理论的任何企图 产生过多的怀疑 而旧的单线理论 似乎自相矛盾 但比较起来还是一种较为开放和较少种族主义的理论。因为，虽然它把非欧洲的各民族——特别是各个亚细亚种族——降到了早于西方的一个发展阶段，但它并没有把它们放在不同质的道路上，这种看法似乎确是威特福格尔后来著作中的摩尼教观点所提示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后果是，它使顽固的批评者得到一个不花气力的借口来埋葬他受到大量侮辱时提出的那些令人不快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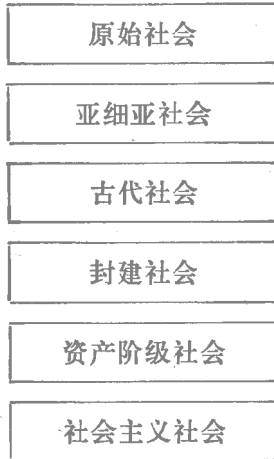
#### 一些新近作家们的新单线观点

但是 毫无疑问 这是从普列汉诺夫和威特福格尔的观点后退到某些新近作家们的复杂的新单线主义，这些新作家是近年来复活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的主要人物。

这些作家中 我们至少应该提到本国说法语的那些学者 他们是巴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以及《思想》杂志和《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杂志的知名人士，诸如结构主义者莫里斯·戈德里埃、东方学家让·谢诺和非洲学家让·絮勒-卡纳尔 还有匈牙利汉学家费伦克·特凯，这些法国作家们（特别是戈德里埃）都直接受到特凯的好处，可是常常不承认这一点；还有匈牙利裔的俄国经济学家叶甫根尼·瓦尔加，他在列宁格勒辩论以前，在二十年代就已使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名称 以及美国的印度学学家丹尼尔·索纳。

这些作家们知道 马克思在论述“大体说来……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时，并不是只谈到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而且也谈到亚细亚方式。<sup>80</sup> 他们不愿意放弃通常的单线图式，因此提出对旧的教义进行很有限的修改，只

是在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之间插入了一个“亚细亚阶段”：



然而 那个修改完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而且有严重错误。

这些作家们显然把马克思在前述引文中罗列各个生产方式的次序误以为是时间顺序，而事实上那是根据各个特定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达到的发展水平的逻辑顺序。他们那样做，就忽视了马克思始终强调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和地理特点，而任意地把它提高到仍然被视为唯一道路的历史发展模型的普遍“阶段”。他们把亚细亚社会降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或者甚至只是一种“生产方法”——它在各种情况下都标志着从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向最初的阶级社会的过渡。<sup>31</sup>

这种惊人的结论把整个问题推向遥远的过去，对那些作家来说无疑是最不妥协的，他们实际在政治上仍然主要同正式的共产党保持关系。但是 为了达到这个结论 他们就被迫回避或实际上删掉马克思所描绘的亚细亚社会的某些基本特点，特别是国家所承担的治河等巨大公共工程所发挥的基本作用。

这显然是例如谢诺所表明的倾向。他说 前提是“一种生产方

式的基本作用，既不能在生产技术和地理需要（由气候条件所决定的灌溉的水平上显示，也不能在社会-政治的组织形式（部落贵族制、官僚统治）上显示，而只能在生产本身的水平上显示”，他得出了过于简单化的结论，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似乎是村社生产活动和国家政权的经济干预（国家剥削它们，同时监督它们）相结合”。<sup>82</sup> 然后他就可以问他自己，是否“这种‘经济最高司令部’的思想不包括保养堤堰和运河以外的其他职能，例如管理作物轮作和保护并监督耕地安全（只要村落自给不能包罗万象，就有这个需要），以军事手段保护村民抵御游牧民族或入侵的外国军队的袭击，国家直接承担农民无力从事的某些工业生产部门——例如采矿和冶金”。<sup>83</sup>

与此相类似，和絮勒-卡纳尔持同样观点的戈德里埃说：“部落贵族在贵重产品的交换方面控制部落间或地区间的贸易，例如黑非洲与白非洲之间的黄金、象牙、兽皮等交易，可能促使象加纳、马里、和松该非洲中世纪的一个王国，位于现代苏丹的中西部——中译者注 筹王国的兴起”。<sup>84</sup>

十分清楚的是，他们这样扩大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畴以后——如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扩大并正在扩大“封建主义”的范畴，其结果就是剥夺了它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的特殊意义，这恰恰同那些复活这一思想的好意作家们抱有的期望背道而驰——他们认为：“它能以充分的科学准确性解释亚洲、非洲或美洲社会的进化，以及甚至西方的某些史前阶段”。人们必定会向这些法国人和说法语的人重复塔莱朗的格言：“先生们，尤其是切勿热情过份！”

因此，毫不奇怪，由于运用了那个概念，戈德里埃不但在亚洲和哥伦布以前的美洲，而且在黑非洲和地中海欧洲（在伊特拉斯坎人中以及在克里岛和迈森尼文明中）就发现了一个“亚细亚”生产

方式；或者谢诺不但同意了他的发现，而且甚至在单子上增加了一些名字。<sup>85</sup> 这些作家们已经用一种新教义来取代名声不佳的老教义（那种新教义主张亚细亚方式的普遍性和必要性）因此得出了单线模式的同样结果。<sup>86</sup> 事实上，这些作家们都多少无意地把亚细亚方式的特点吸收进那些预示统治集团——因此也是指国家——在一个主要以村社为基础的社会内的兴起。正如曼德尔所说，他们似乎不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不仅指湮没在过去迷雾中的某些‘原始的’印度或中国社会而且指欧洲资本在征服印度）或大规模渗入（中国）前夕的十八世纪所接触的印度和中国社会”。<sup>8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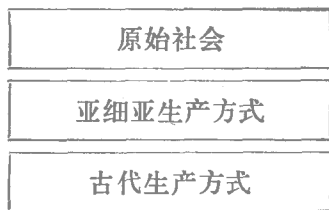
但是这些并不是使那些作家们感到糊涂的唯一例证。我们只需再提另外一个，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们来说特别严重的一个例证。从最遥远的古代，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上的一些社会——即使那些作家也一定把它们归在这一生产方式之内——推动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某些最出色的文明的兴起。只有心胸最狭隘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才敢于忽视它们，或认为它们低于西方古代和封建时代的文明。社会人类学和其他新的社会科学与之斗争并设法揭露的，正是这种态度。因为那些作家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们并不否认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著名的相互关系。如果那种生产方式真的是“低于”（或者至少并不大大低于而不仅仅是“不同于”）古代或封建生产方式，那就很难理解在印度、中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阿拉伯等地的亚细亚结构中，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怎么会如此之繁荣。马克思谈到艺术时说过，“一定的艺术全盛时期决不是同一般的社会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类似社会组织底骨骼的物质基础成比例的。”<sup>88</sup> 然而很清楚这种断言不能扩大到包括上层建筑的其他一切方面。也不能否认说它们发展的客观水平——正如马克思谈到

它们的艺术时所说‘同‘它对我们所产生的魔力’相比——同所谓它们是在低下的、完全不发达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说法是全然相反的。至少‘它不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完全排除，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些作家们的‘泛亚细亚’观点，真正是明显地以种族优越感的思想为基础的。通常的家长制式老生常谈“亚洲是人类的母亲”，在有些地方模糊了这种观点，但是，在谈到欧洲同所谓的亚细亚模式决裂时，问题就揭开了。现在诸如‘希腊奇迹’的名称仍在使用。而且，据说西方的发展路线虽然是一条少数派的、而不是普遍性的路线，但却是‘典型的，因为只有它能保证生产力最大限度的发展，从而保证了人类的最终解放。’<sup>39</sup>

“泛亚细亚”新单线理论把亚洲的发展路线列为同欧洲一样，但认为亚洲没有能力自力发展，因此就不合理地，把‘发展’只同西方在发展中采取的单独道路联系起来。照这样，它根本不是象多夸也声称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垮台’<sup>40</sup>，而是新瓶装陈酒，思想上多半还是旧的五阶段单线发展观点。

在结束这一章节以前，还有另一个图式似乎值得顺便提一下。这还是单线的形式，但更为复杂，那是戈德里埃提出来企图解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历史发展的轮廓的。它同过去图式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它把‘古代的’和‘以奴隶为基础的’视为两个分开的生产方式，并在奴隶制和封建主义之间插入了一个日耳曼方式（见下面的图解）。



以奴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

日耳曼生产方式

封建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因此 照戈德里埃的意思 有七种生产方式 那是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调查过的人类已经全部经历过的土地占用的形式相对应的。<sup>41</sup> 但是这一图式还是完全不合理的。在现实中 他的“古代的（以有别于以奴隶为基础的）和日耳曼的形式 只是一些特殊类型的社会 要是愿意的话 也可称为一些特殊的生产方法。马克思肯定从来没有想象过把它们和“时代”放在同等地位，马克思特别把“时代”作为社会 经济结构前进的广泛标志。把日耳曼方式插入一个单线模式，是完全违反戈德里埃承认的“由恩格斯所描绘 和马克思所同意的日耳曼民族进化的显著特点的”。<sup>42</sup>

#### 戈德里埃和加罗迪著作中的反单线主义迹象和多线主张

然而 在上述大多数作家的著作中 可以找到许多反单线主义迹象，尽管时常以减弱的或矛盾的形式出现。

例如，戈德里埃的最新著作，一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章选集 他毫不犹豫地攻击那种“多年来教条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情况”。这种假马克思主义“主要包含的是把人类历史降为一种固定不变的连续五个阶段 它分为‘五种基本的生产关系’原始共产主义 奴隶制 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评论说，“降低到了这个样子 马克思主义就失去

了它的科学价值 成了只是一种历史的哲学 是‘人们可以用来排列历史时代的一种方法和设计’。<sup>43</sup>

戈德里埃在另一部专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概要的理论进行批判性总结的著作中 公开地提出有必要‘建立一个多线图式’。<sup>44</sup> 他自己只是一般地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贡献在这方面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被法国共产党开除出党的著名哲学家罗歇·加罗迪的著作中，也能找到反单线的观点。加罗迪是巴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并担任该中心的主任达十年之久。该中心领导了最近重新兴起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斯大林主义准则 已经把马克思主义降为一种装扮成辩证法的、教条主义的和假科学的实证主义。学究式地编出来的唯物主义三大原则、辩证法四大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五大阶段 产生了“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 普是希腊神话中开黑店的强盗 他劫人后强使身高者睡短床 然后砍去身体的伸出部分——中译者注）科学和创造性都要在上面被肢解”<sup>45</sup> 他认为“如果我们把建立在西方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五阶段历史发展图式 作为绝对的、完全的真理 如果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地设法把例如非洲和亚洲社会的发展都包罗在这一图式之内，那么我们就扔掉了科学方法而回到了推测性的、教条主义的历史哲学 而且 我们肢解了马克思的思想 马克思曾经联系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这个问题”<sup>46</sup>

加罗迪并不停留在<sup>47</sup>一些理论思考上。他没有企图制订一个不同于五阶段的、更加全面的另一种图式 他在实践中确实用多线概念来分析现代中国的问题。他说“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经典说明来看，社会主义看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解决。如果是这样的话，象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是否真的会出现前资

本主义阶段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情况呢？因为资本主义只是边缘活动，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在一个封建类型的政权统治之下，存在着亚细亚方式的生存迹象。如果有可能的话，那么，具备了这套全新的变化因素以后，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会有何种特殊性质呢？<sup>2347</sup>

加罗迪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强调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他忘记了：一个相当类似的问题——似乎还有一个相当类似的结果——已经在俄国出现过。在那个事例中，也是想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所有主要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那种社会确定为“半亚细亚”社会。但是，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论，只需提请大家注意：加罗迪所表明的中国类型是首先来之于中国的历史及其经济和社会结构。在结论中，他提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辩论。这里，他含蓄地批驳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许多同事，并强调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概念中插入一个“第六阶段”来扩大这个概念，把整个概念视为一种方法或行动设想，是不成问题的。

### 罗丹松著作中的多线含义

一位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穆斯林社会学家马克西姆·罗丹松，在一本非常鼓舞人的新书中提出了内容深刻得多和理论上更为先进的论点。他不但公开抨击“经典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恩格斯下的定义，但是被社会民主党的教育机构以及后来被斯大林主义机器降低到学究式的一套公式”，而且抨击戈德里埃的新单线主义的观点。他把戈德里埃视为一个典型，以及一些类似的作家的观点，那些作家把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到了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或接近普遍性的地位。<sup>48</sup>



罗丹松试图根除任何狭隘单线理论的基本设想，对这种观点肯定接受的内容提出疑问。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严格区分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他们认为自己在欧洲中世纪看到了一种可以与资本主义相比拟的基础。他们清楚地感觉到下面的生产关系 即农奴和地主之间的关系 但是只同他们所熟知的唯一另一个前资本主义方式（奴隶制）相区分。他们在描述这种生产方式时 经常把它和西欧同时出现的上层建筑特点 或者更确切地说，政治特点 混同起来 这在他们用以描述这种生产方式的名称上看得尤为明显 那个名称严格说来并不是他们自己的 而是借来的当时流行术语‘封建主义’。”罗丹松认为（本书作者并不赞同）使用这样的名称是很不幸的。“因为它主要同政治上层建筑有关 它同生产方式的联系则难以证明。”<sup>49</sup>

然而 他说 它的意义在于 那是马克思设法细致调查并规定前资本主义形态定义的唯一材料，而且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有关章节。马克思并没有讨论封建主义 而且几乎没有提到过这个字眼。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设想是一套条件，他把它的形态解释得相当含糊，它们是从不同形式的原始社会发展而来的进化过程的结果。在分解过程中 有各种因素 最先的一个就是私人财产 它在某些情况下同公社财产并存 在贸易和战争的共同影响下渐渐独立于社会。它使人们本身进入到可以被他人占有的商品领域 如农奴或奴隶。这两种人被别人所占有 处于同样的地位上；<sup>50</sup> 那种被占有的义务消失以后，就产生了自由劳工，那是资本主义的前提之一。罗丹松在结束时说：“一个农奴制占特殊优势的阶段继承一个奴隶制占支配地位的阶段，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看到的是本身不相同的类型中发展而来的多种形式的演变。封建主义这个名称只是偶然出现的 是为了比较的目的 而用以说明有

诸侯采地联系的欧洲中世纪政治制度或中世纪历史时期。<sup>2781</sup>

最后这句话不是十分准确的，将在后面有关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一章中含蓄地加以批判——霍布斯鲍姆对此忽略了，而罗丹松的许多思想则来之于霍布斯鲍姆。但是按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论，前面句子中的第一部分是最为重要的。我们提出的不同观点多线发展图式是从同样的前提出发的。

# 我们的不同观点：多线发展图式

## 第一章 我们的图式的主要特点

我们提出的发展图式，根本不同于上述所有的单线发展图式——不论它们有五阶段、六阶段或七阶段，也不同于普列汉诺夫和威特福格尔的双线模式，他们具有模糊的种族优越感的倾向。我们认为，我们的这种发展图式的复杂性和它的组织形式很接近于马克思的真正想法，并有别于向多线图式发展的那些犹豫胆怯的初步行动，例如本书已经提到的那些。

我们的发展图式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叙述的原始社会的各种形式以及它们的各种发展方式或分解方式。它考虑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没有把它降为奴隶制或封建主义的一种二流变种，没有让它湮没在遥远过去的原始迷雾之中，也没有不合理地把它提高到普遍性的地步。它对历史实际进程中的某些特殊方面给予了适当的重视，马克思在分析时虽然没有忽视这些方面，但仍然没有把它们足够地强调为理论要点。这些特殊方面包括：结束以奴隶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和产生欧洲封建主义前提条件的那些蛮族入侵，以及其征服或经济渗透造成亚细亚社会危机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我们的理论指明了俄国的半亚细亚性质，那是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和主要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始终强调的。它也不忽视日本的特殊例子，马克思正确地认为日本的例子更接近于欧洲型的发展而不是其他亚洲国家的类型。它还保持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但时常被忘却的重要警告：阶级斗争的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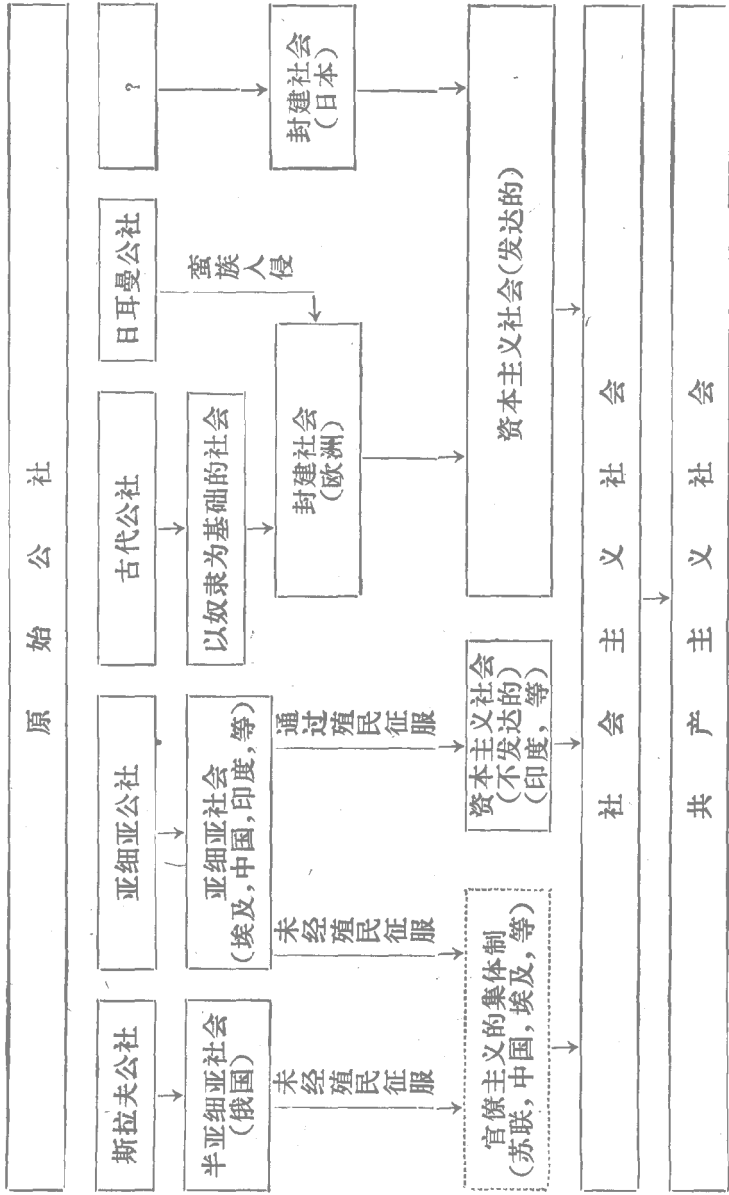
局，可能不但使社会受到革命改造，而且使“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sup>52</sup>

我们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纲要 加进了一个新的成分 (在下列流程图中以虚线框标出) 这样我们就用“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名称而列入一些较新的发展，这个名称是从一位当代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借用来的，<sup>53</sup> 指的是俄国和中国的当前现实 我们感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它们并不能称为是社会主义的。

可以看到，我们的发展图式根本不同于我们上文提到的所有那些单线的说明 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已经普遍并列、而不是前后排列各个社会-经济形态。唯一的局部例外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在欧洲的某些地方同奴隶制相重叠，部分地通过奴隶制的自我改造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 奴隶制能够自主发展) 部分地是蛮族入侵的结果，这种入侵带来了日耳曼文化的特殊传统。在殖民大征服时期又感到了很类似的一种外来影响 当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强加给自主发展潜力较小的至少某些“亚细亚”社会。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模式同马克思的思想是非常紧密一致的。同通常的看法相反 虽然马克思关心仔细地区分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社会以便进行具体分析，他不断把它们放在同等的地位上 至少在某些方面。他这样做的理由是 作为土地所有制各种特定形式的相应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异，同封建生产方式本身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异相比 要小得多——在他分析的所有形式中 资本主义是唯一真正比其余形式“优越”的。马克思认为 只有资本主义才冲破了自然的束缚，成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真正的质的飞跃：“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 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 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sup>254</sup>

本书作者对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概念的复原



## 第二章 原始公社及其分解 的各种形式

我们应当通过图解的方式 象马克思那样 从“原始公社”开始 那是建立在“共同的血统、语言、风俗习惯等等”的基础之上的原始的自然群居生活；<sup>56</sup> 家族和在部落里面扩大起来的家族 或通过各家族间的通婚 或由各个部落相结合”。<sup>56</sup>这种社会的经济是以流动性的追索为基础的，诸如打猎、捕鱼、以及其他收集大自然的恩赐，一般的放牧和游牧 以及最早期形式的刀耕火种。<sup>57</sup>它不是暂时共同占有土地的结果，而是它的前提：

我们可以认为畜牧 或者一般说游牧 乃是人类最初的生存形态 部落不是定居在一定地点 而是逐水草放牧的——人类并非天生就是土著的 只有在特别肥沃的自然环境里 人才能象猿猴那样栖息在树木上 否则就要象野兽一样漫游了——所以 部落社会 那种天然的社会 不是 暂时 共同占有土地和共同利用土地底结果，而是它的前提。<sup>58</sup>

这种自然形成的部落或畜牧社会“，乃是人类占有他们的客观生活条件和再生产这些生活条件以及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最基本的前提。”土地是人类伟大的实验场所，是提供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的仓库，是社会底住处和基础。人类天真烂漫地把土地看成是在活劳动中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自身的社会底财产。每一个单独的人，只有在他作为这个社会底一个成员，他才能成为财产所有人或占有人。<sup>59</sup>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本来就是一种合群动物，部落动物，群居动物，人所以能孤立起来是经过一段历史过程的。<sup>60</sup>一个孤立的个人不会有土地所有权，正如这样的人不会说话一样。当然他可以象动物那样单靠地上的东西来生活。但要把土地当作

财产来处理，“那总得通过部落、通过那或多或少自然发生的或在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某种形态的社会对土地的占领，不论是和平地或暴力地占领”。<sup>61</sup>

随着过渡到定居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公社产生了新的形式。这种过程引起的变化的程度，决定于各种社会的和自然的考虑：

既然人类终于定居下来了，那他们就要受到气候、地理、物质等等各种不同的外部条件以及他们特殊的自然特性（他们的部落特征）底影响，于是这些原始社会便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sup>62</sup>

社会成员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部落所栖息的地方）的关系所以采取这几种不同的形态，一部分取决于部落底天然性质，一部分取决于经济条件；在这些经济条件下，他才能真正成为土地所有人，也就是说他才能通过劳动而占有土地果实；而这些经济条件又取决于天气、土地底物理性能，由自然所制约的土地开垦方式，跟敌对部落或邻接部落的关系以及那些引起迁徙和其它历史事件的重大变动。<sup>63</sup>

我们的非单线模式，适当地重视了这种社会的各种类型，以及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现有生产力新发展的鼓舞而分解或归纳为结果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时常重申的：“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sup>64</sup>

马克思提到了几种类型的社会：亚细亚公社、希腊和罗马世界的城邦、日耳曼社会、斯拉夫公社，等等。这些公社到时候就成为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或者至少是出发点。

所以，应当分清马克思提到的各种公社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超过一定水平时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私有财产的性质：“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sup>65</sup>

另一方面以生产力发展最小为标志的亚细亚公社的类型其突出之处正在于它坚持土地公有制：“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态里面，根本没有个人财产而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谓财产只有公有的土地财产。”<sup>66</sup>

个别成员只能是其中一部分的占有者，或是世袭的或不是世袭的，因为任何一部分财产都不属任何成员自己所有，反之，个人则系公社底直接肢体，即直接同公社形成一体，不能跟公社分开。<sup>67</sup>如果我们想用图解来说明这个社会个人（I）、公社（C）和土地（L）之间的关系，它的形式是这样的：

$$I \longrightarrow C \longrightarrow L$$

如马克思所说在亚细亚形态中个人在一个社会里面只是偶然出现的。<sup>68</sup>物种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着的東西。个人还没有割断把他同公社联结起来的脐带，<sup>69</sup>而且，在历史过程中还需经过不少路程，才能使他成为个人。

马克思并没有特别分析斯拉夫公社，但是从零星提到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测到他可能认为它同东方的形态非常相似，甚至有一段话可以证明认为它是源出于东方形态的。<sup>70</sup>如果马克思确实强调任何突出特点的话，那就是斯拉夫公社具有更大活力，这提供了一个向半是亚细亚、半是封建的混合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最初的领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例如在斯拉夫人的公社、在罗马尼亚人的公社里那样的情形，这样就开始了向封建徭役制的过渡。”<sup>71</sup>



马克思是按照那些思路考虑的，这方面的间接证明就是他更多地谈到当时存在在俄国的农业公社，虽然它只是斯拉夫形态派生而来的，而且是很先进的一种形态。<sup>72</sup>事实上，马克思也透露了这种公社近似于亚细亚形态之处。<sup>73</sup>

恩格斯对斯拉夫公社描绘得更为充分，包括谈到“南方斯拉夫人家家庭公社（扎德鲁加）”可能是俄国公社的始祖。<sup>74</sup>但是他主要关心于描写它的家庭结构，特别提到说，它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 共同占有剩余产品”。<sup>75</sup>

古代的或古典的公社同亚细亚公社是有很大不同的。马克思主要以罗马的或最典型的形态来对它进行分析，但认为希腊的、甚至在一段话中认为希伯来的形态是同类型的。公社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同时存在，但两者之间截然不同。

在亚细亚公社中，个人财产是公有财产不可分割的部分，应当明确地称为个人占有而不是私人财产。然而，在古代公社中，情况就不是这样。在这里，私人财产肯定已经建立，个人已经割断了他和公社之间的某些联系。这一发展是由特殊的历史和环境因素所促成的：

个人底财产在事实上越来越少专门依靠集体劳动来利用（例如，象东方的水利工程那样依靠集体劳动的情形），纯粹自然形成的部落性质越来越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及迁徙所破坏，部落越来越远离它的发祥地而占领它处的土地、因而进入全新的劳动环境而使个人底才能更加发展起来——部落底共同性质主要地表现在一致对外这种消极方面，而且也不得不表现在这一方面——那么，个人变成土地（分成小块的土地）私有者的条件便越来越具备，这些私有土地便归个人及其家属分别耕种了。<sup>76</sup>

作为一个更为活跃的历史生活的产物，公社已不再象亚细亚形态中那样，个人在其中只是不起作用的物体了。公社是那些自由和平等的私有者之间形成的关系，使他们有别于世界其余部分，并作为他们的保护者的结合体。它的自然基地已经不再是农村，而是城镇，是作为拥有土地的农业经营者的地盘。

不象在亚洲，地理环境对农业不成为特殊的障碍。困难只能来自别的部落，它们侵犯公社而占领土地，或将要占领土地。因此战争乃是一种艰巨的共同任务 不论是为去占据客观的生存条件或为防卫及永久保持这同一客观条件底占据。所以，公社便要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这是它以财产所有者资格而生存的一个前提。居住地点集中于城市是这种军事组织底基础。<sup>77</sup>财产是罗马公民的财产 只有罗马人才能成为这样的土地私有者 但是作为罗马人，他一定成为土地私有者。<sup>78</sup>我们使用前面同样的代号，可以把这种情况表述如下：

C → I → L

日耳曼人的公社同亚细亚形态和希腊-罗马形态有显著的不同。它的公社成员并不象亚细亚形态中那样分享公社财产，也不象罗马形态中那样既是共同财产的私有者又是获利者。公社只有在公社成员集会时才存在 就是说 依靠作为自立的土地所有人的各个个人之间的协议而存在：

就日耳曼人来说 虽然他们在血统、语言、共同的过去和历史等方面已经是个自在地存在着的统一体，但各个家长定居在森林里面 为遥远的路程所隔离 单从外表上来观察 已经可以看出 所谓公社 只有在公社成员们每次集会[Vereinigung]时才存在。因此 在这里 公社只表现在集会[Vereinigung]上面 它不是一种团体[Verein] 是联合而不是统一体。联合的独立主体是土地所有人。<sup>79</sup>

个人财产不是以公社为媒介而出现的 相反地 公社和公社财产却是间接地、即作为独立的主体彼此间的社会关系而出现的。<sup>80</sup> 因此：

I—→L—→C

马克思观察到 在这种形势背后 每个家庭基本上就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单位 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在亚洲 城乡之间无区别地结合。在古代世界里，城市及其郊区构成一个经济整体。在日耳曼人世界里 整体就是个人住处 远在归它所有的土地上仅仅是一个点。农民不是国家公民 换言之 不是古代形态上的城市居民 其基础是孤立的农家 这些家宅通过与本部落其他同样家宅的联合以及它们为战争、宗教、诉讼等等事项的临时集会 [Zusammenkommen]而得到保证。公社只存在于各个土地所有人底相互关系中。虽然，它在语言、血统和历史方面的联系先于个人所有者而存在，它的唯一具体表现却只存在于他们为共同目的而举行的实际集会中。<sup>81</sup> 另一方面，在希腊和罗马，社会也存在于这些集会之外，存在于城市本身，而在亚洲，则是包罗所有土地的直接所有制。

我们已经见到 这些原始公社的不同发展 是如何由不同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所形成的。这些社会将延续多久，有赖于同样的因素。为了使公社继续以同样形式存在下来，它的成员必须继续在规定的客观条件内繁衍。但是生产过程本身，以及人口的增加 逐步影响这些条件 最后毁灭他们 而不是使他们繁衍。因此，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 这些社会就发生了变化 产生了其他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些——特别在早期阶段，当它们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太低而不足以解放它们时——也按照环境的条件而发展。无论如何“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 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sup>82</sup>

### 第三章 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出现

讨论了原始公社以及组成“原始”或“古代”社会的亚细亚、斯拉夫、古代和日耳曼形态以后，我们现在开始讨论“第二类形态”。这包括以“东方普遍奴隶制”为基础的亚细亚社会（关于它，我们有许多话要说）私法条件下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社会，以及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

这种过渡的标志是出现了明显的剥削关系、社会阶级和国家。生产力的广泛发展，为艺术和科学、宗教和哲学、法律和社会组织方面的重要进展打开了通道。总起来说，还为越来越多样化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性上层建筑，打开了取得重要进展的通道。简言之，所谓“文明社会”的诞生，“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sup>83</sup>

自然，那些发展在最强有力的社会中影响最大。那里，在社会所有制和社会成员的私人所有制之间，在传统上有着一种基本矛盾。那种矛盾本身从内部对它们进行破坏，使它们改造成为建立在奴隶制和农奴制基础上的社会。

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在马克思所说的典型古代的早期公社中找到。社会续存底前提在于“保持自由的自谋生活的农民中间的平等地位”。但这种社会是以部落制为基础的，这本身导致高等和低等血统的区分和其他差异，又通过与征服的部落相混合而进一步发展。如前所述，战争是占领土地或保卫占领的伟大的集体任务。由于受到那种需要所驱使，加上人口增加的作用，那些“好战的狭小集体”<sup>84</sup>（例如罗马、希腊和希伯来公社）最终产生了使自己转化的必要条件：

所有这些社会共同的目的都在于维持生存；也就是说，把构成

社会的个人作为财产所有人而再生产出来；……单是人口底增长就是个障碍。要想消除这种障碍 就得移民 于是就有必要从事侵略战争。所以就有奴隶等等。例如公有地底扩大就会扩大那代表社会的贵族底权力等等。可见维持旧社会就意味着破坏旧社会所依据的种种条件，变成与它性质相反的东西。……在社会成员作为财产所有者已经和那作为市自治团体和市区领土所有者的本人分开的地方，在那里便可能出现个人丧失其财产的条件，也就是说失去那既使他成为平等公民和社会成员又使他成为财产所有人的双重关系。在东方形态之下，这种丧失，除非通过外来的影响，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各个社会成员跟社会根本不发生自由的关系，所以他也不可能失去他的联系 他对社会的客观经济联系 )<sup>85</sup>

马克思以更加一般化的提法，把奴隶制和农奴制描述为对土地实行军事征服的结果：

不论是为着保持旧有财产或为取得新财产，战争对每一个这样自然形成的公社来说都是一种最基本的工作。……要是人类自身是作为土地底有机附属物跟土地一起被占领的，那么他就当作一种生产条件一同被夺取，于是就产生了奴隶制和农奴制；这样的制度很快就破坏和改变了一切原始社会形态，自己变成了社会基础。这样一来，那种单纯的社会结构便被否定了。<sup>86</sup>

取代公社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建立在奴隶制或农奴制基础之上作为生产方式的。没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这些发展，因为它们是相当熟悉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对目前的研究都是比较次要的。我们只是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 马克思也没有采取象自称的马克思追随者或马克思的批评者那样的单线观点。例如，罗丹松在批评中说：

虽然奴隶制可以相当明确地说清其定义，农奴制却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它包括地主对农民进行范围不限的许多不同程度和不同内容的剥削，农民特别对他所耕种的土地享有各种合法权利，而地主对这个农民和他的土地也享有各种并非绝对的权利。

有可能不知不觉地从一个奴隶或自由契约者（农民、分成农、等等）的地位移向农奴制。而且地主和贵族的剥削在许多情况下是很难同国家剥削相区分的。

他进一步说：

把私有财产作为一种可以使用或滥用的绝对权利，如罗马法所规定的那样，这整个概念在那个领域以外是极少遇到的。对土地及其果实到处有一个统治集团有各种社团、家族、血统、宗教和政治权力等等的多种多样的权利。<sup>87</sup>

我们对这些话中的大多数内容是同意的，它们毕竟没有谈多少新东西，但是我们应当说明两点。第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被他们自己称之为“法律上的虚构”所引入歧途，而总是把财产关系看成只是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虽然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表现。<sup>88</sup>第二点，不是马克思自己，而是那些第三流旗手中的几个人在散布狭隘的单线观点，认为奴隶制总是在农奴制以前，农奴制必定在奴隶制以后；这在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很高兴，关于农奴制的历史，照实业界人士的说法，我们“达成协议”了。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在古代土耳其半封建制度的全盛时期，土耳其基督徒的地位也有某些与此相似之处。<sup>89</sup>

当马克思以奴隶制同农奴制作对比、以农奴同自由劳工作对比、或者以“亚洲的普遍奴隶制”同古典的私法奴隶制作对比时，他只是象通常一样分析广义的一般类别，而具体的历史事例可能是大有不同的。然而，在那些广义名称之下，农奴制或者其他类似形式的人身奴役同奴隶制之间的差别，却具有确切的历史、经济和社会学的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白地提出了这一点。无论农奴受其主人权力的控制有多大，他总是不象奴隶那样，还是经济上的一个独立生产者。“它和奴隶经济或种植园经济的区别在于，奴隶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来劳动，并且不是独立的。”<sup>90</sup>

特别是农奴不象奴隶，他是为自己也为主人生产的，那就成为一股极为突出有力的历史力量：

他所知道的新的需要，他的产品的市场的扩大，他对他这一部分劳动力的支配越来越有保证，都会刺激他去提高自己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在这里，不要忘记，这种劳动力的使用决不限于农业，也包括农村家庭工业。因此，这里已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sup>91</sup>

马克思也分析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如何能建立在那个特殊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我们引述下列段落，部分地是作为马克思分析方法的一个例子，因为我们不准备这样详细地提出其他的前资本主义方式：

很清楚，在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所借以建立的自然形成的不发达的状态中，传统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很清楚，在这里，并且到处都一样，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撇开其他一切情况不说，只要现状的基础即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

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 这种情况就会自然产生 并且 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这种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停滞状态中，一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取得这个形式 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生产。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 那末 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sup>92</sup>

## 第四章 封建主义的起源

奴隶制和农奴制不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了。但是对封建主义的起源值得更加深入地探讨一下，因为传统的单线解释通常把这个形态说成是从古代社会里演化出来的，而没有更详尽地加以说明。

封建主义兴起的条件，公认是由于古代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特别是奴隶制的经济局限性，它激发了采取某些更加灵活的生产方式的需要。但是我们不应当忽视导向封建主义的真正历史过程 象那些固执的“单线主义者”想要做的那样。奴隶制并不是由于历史进化或社会革命的结果而从内部被“取代”的。它是同罗马帝国一起垮台的 那不是由于它的内部矛盾的结果 虽然这些已经破坏了它 而是由于所谓蛮族入侵者 大部分是日耳曼种族和文化 打击的结果。无论如何 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古代生产方式必定会在逻辑上以封建主义而告终，即使没有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外部势力。事实上 他相当明白地说 阶级斗争（例如那些无疑对破坏古代生产方式起作用的）不但可以导致“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



造”而且可以导致“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sup>93</sup>

这里也可以看到，马克思远不是采取一种简单化的单线观点。然而，他对于封建主义的兴起没有加以详尽的分析。作为一位学者和革命者，他主要对资本主义感兴趣；他在对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研究中，对古代生产方式所花的时间要比对封建生产方式的多得多。封建生产方式在恩格斯那里得到了更大的注意，因此我们要参考恩格斯，而且确信：尽管现在有倾向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真正的或所谓的分歧，但他们从来没有在重要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如果两位严肃的学者如此密切地合作了整整四十年之久，那是不可能有其他情况的。

然而，我们至少能引用马克思的几句话来表明我们并非仅仅在任意解释他对封建主义起源的看法。在这段话里，他明白地指出蛮族入侵是产生封建主义的决定性因素——加上已有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

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地盘上开始的，而这个地盘是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与此有关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了，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sup>94</sup>

另一方面 马克思小心地避免犯相反的错误 不把封建主义的发展简单地解释为完全是蛮族入侵的结果：

再没有比认为迄今历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于占领这一观念更普通的了。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 这一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无论什么地方，占

领很快就面临结束之日 那时已经没有东西可供占领了 需要转向生产。从这种很快到来的生产的必要性中可以做出如下结论 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 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 那么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见到的一件事情，即奴隶成了主人 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 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sup>95</sup>

的确，马克思认为那个过程应被视为一种相互作用。他曾在一段话里使用了这样的话。在讨论到因军事征服的结果而出现的关系的性质时，他提到说：某些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 如罗马人和土耳其人）；或者，他说，作为事情的另一种情况，“发生一种相互作用 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至少“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sup>96</sup>

至于恩格斯 我们的解释可以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有关章节中找到充分的肯定，这部著作对多线分析的重大贡献至今尚未给以恰当评价。<sup>97</sup>

在恩格斯的研究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大决定性的主题，它们分别描述，但在逻辑上互为补充：古代社会的没落，以及恢复封建社会起源的企图。前者的说明，肯定集中在古代社会某一特定时期里变得明显的固有弱点，但它也强调该社会没有能力对它的境况产生自主的反应。第二个主题非常清楚地估计了蛮族作用的

适当价值，并准确地详细说明它是怎么来的。但让我们逐步听听恩格斯的话吧：

罗马的世界霸权的创子，创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罗马的行政和罗马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赐予的罗马公民权并未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缺乏的表现。新民族的要素到处都已具备，各行省的拉丁方言日益分歧，一度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觉得到。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的力量，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显示出发展能力或抵抗力的痕迹，更不用说创造力了。……各行省摧毁了罗马，罗马本身变成了行省的城市，象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已经不再是统治的了，已经不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sup>98</sup>

恩格斯在这段开场白以后，其中主要值得注意的是完全否认古代社会内部有任何创造性地应付其环境的能力，接着他对那种社会的全面腐败描绘了一幅同样令人注目的图画：

社会状况也同样是绝望的。从共和制的末期起，罗马的统治已经建立在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的基础上；……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为唯一有利的耕作形式了。由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

世袭佃农 或者租给分成制农民 这种分成制农民只能获得他们一年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 或者仅仅九分之一 他们与其说是佃农，勿宁说是田产看管人。但是这种小块土地主要地是租给隶农 他们每年缴纳一定的款项 依附于土地 并且可以跟那块土地一起出售 这种隶农虽不是奴隶 但也不被认为是自由人，……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足以补偿所耗劳动的收益，因为销售它的产品的市场已经消失了。……基督教对于古代奴隶制的逐渐灭亡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它在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和睦相处了好几世纪，以后也从来没有阻碍过基督徒买卖奴隶，——既没有阻碍过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买卖奴隶，也没有阻碍过后世买卖黑奴。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sup>99</sup>

但是 如果古代社会由于缺乏‘创造能力’而不能自己产生这种‘革命’那么它从哪里来呢 恩格斯对这问题作了清楚的答案，人们只要不带着种族优越感偏见或单线理论的眼镜去读他的话，就可以了解到。它来自“野蛮人的生命力”，不是指他们种族的具体特征 而是指他们的‘氏族制度’就是他们的社会结构和他们的生产方式。再引恩格斯的话：

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出来，为此他们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来自己分配。这

一分配是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 由于征服者的人数比较少 广大的土地未被分配，一部分归全体人民所有，一部分归各个部落和氏族所有。在每个氏族内，则用抽签方法把耕地和草地平均分给各户 后来是否进行过重新分配 我们不得而知 但无论如何 这样的做法在罗马各行省不久就取消了 单块的份地变为可以转让的私有财产即自主地。……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愈久 德意志人和罗马人愈是逐渐融合 亲属性质的联系就愈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这样 至少在马尔克公社保存下来了的各个国家——在法国北部 在英国 在德国 在斯堪的那维亚——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组织，因而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 甚至在它后来被迫蜕变的时候 也还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断 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 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sup>100</sup>

恩格斯描绘德意志氏族组织蜕变的话，使人不由得想起已经摘引过的马克思关于古代希腊-罗马公社蜕变的描绘：

这样 如果说氏族中的血缘关系很快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 那末，这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在部落和整个民族内由于征服而蜕变的结果。我们知道 对被征服者的统治 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规模地看到这一点。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加以组织。但是 它们既不能把大量的罗马人吸收到氏族团体里来 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统治他们。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以领导起初大部分还继续存在的罗马地方行政机关，而这只有另一种国家才能胜任。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 并且为时势所迫 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

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sup>101</sup>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国家并不是专制主义的同义语 恩格斯明白地谈了这一点，他把这种情况同亚细亚国家作了比较，后者的国家是建立在极为不同类型的社会之上的。不同之处在于存在着私人财产，在被征服的罗马土地上和日耳曼社会里情况已经是这样了：

在有的地方 如在亚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罗斯人那里 当国家政权出现的时候 公社的耕地还是共同耕种的 或者只是在一定时间内交给各个家庭使用 因而还没有产生土地私有制 在这样的地方 国家政权便以专制政体而出现。相反地 在日耳曼人侵占的罗马领土上 我们看到 耕地和草地的各个份地 已成为自主地 成为占有者的自由财产 即只对马尔克负担一定赋役的财产了。<sup>102</sup>

这两类公社之间同样的基本不同之处，使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的若干段落里也带有一点种族优越感地把亚细亚公社描绘为压制子人的发展，<sup>103</sup>他谈到传入被征服土地的那种日耳曼公社时，则说“由于它承袭了原型的特征，所以，在整个中世纪内是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sup>104</sup>

作为导致封建主义开始的随后发展的例子，恩格斯引用了法兰克王国的情况，在那里，胜利的撒利法兰克人不容置疑地不但继承了广大的罗马国有领地，而且继承了一切不曾分配给大大小小的区域公社和马尔克公社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巨大的森林地区：

从一个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的法兰克国王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的财产，从人民

方面把它盗窃过来而以礼物或恩赐的方式分给他的扈从队。……这样 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族的基础。不仅如此。由于国家幅员广阔，就不能利用旧的氏族制度的工具来管理了 氏族首长议事会即使没有老早消失 也已经不能召集了 它很快就被国王的固定亲信所代替 旧的人民大会还继续存在着做做样子，但是也愈来愈变成纯粹是下级军事首长和新贵人的会议。……法兰克的人民大众，即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也由于连年内战和征服战争……而弄得疲惫不堪和彻底破产了。……自由的法兰克农民陷入了与他们的前辈即罗马的隶农一样的处境。他们被战争和掠夺弄得破产，不得不去乞求新贵人或教会的保护，因为国王的权力太弱了，已不能保护他们；不过这种保护使他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象以前高卢农民那样，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交给保护人，再以各种不同的和经常变化的租佃形式——不过总不外是力役和代役租——从他那里把这块土地作为租地而租回来。一经陷入这种依附形式，他们就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经过几代之后，他们大多数都变成了农奴。<sup>105</sup>

恩格斯结束这一典型的历史分析，突出地说明蛮族对形成新的封建社会的决定性贡献：

但在这四百年间，毕竟是前进了一步。即使我们在这一时期末所看到的主要阶级差不多跟初期一样，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毕竟已经不同了。古代的奴隶制已经消失了 破产的、贫穷的、视劳动为奴隶贱事的自由人也已经消失。介于罗马隶农和新的农奴之间的是自由的法兰克农民。正在灭亡中的罗马国粹 它的‘无益的回忆与徒然的斗争’已经死亡并且被埋葬了。九世纪的社会阶级 不是在垂死的文明的衰亡中 而是在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中形成的。新的世代，无论是主人还是仆

从跟他们的罗马前辈比较起来 已经是成年人的世代了。有权势的地主和服劳役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对罗马人来说曾经是古代世界毫无出路的没落形式，现在对新的世代来说成了新的发展的起点。其次，不论这四百年看起来多么象白白度过 可是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 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 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现的新的形成和新的组合。德意志人确实重新使欧洲有了生气 因此 日耳曼时期的国家破坏过程才不是以诺曼-萨拉秦人的征服而告终，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护关系（依附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为封建制度而告终 而人口也有了这样巨大的增长 以致能够完好无恙地经受了不到二百年后的十字军远征的大流血。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象我们的沙文主义的历史著作所虚构的那样，德意志种族天生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呢？决不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 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sup>106</sup>

## 第五章 亚细亚社会的起源

从原始公社中发展出来的各种形态的社会中，“最坚韧的和延续得时间最长久的必然是那种亚洲形态。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它那种前提：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生产只是在自给自足的圆圈里打转，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等等。”<sup>107</sup>

马克思说 由于原来的亚洲公社中没有私人财产 因此它的内部矛盾比其他地方少，而且并未大大地改变为屈从于一个“更高的联合”——即国家，在那种环境下，国家主要是由于要满足当地地理和气候所必需的排灌系统和堤堰等其他水利工程的基本要求而



产生的 但很快就或多或少地带上传横的形式 从原来的职能性权力变成了政治统制和剥削。<sup>108</sup>这个过程毕竟是相当常见的：

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 他们还是半动物性的、野蛮的 ;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意识不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象动物一样贫乏,而且在生产上也未必比动物高明。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 对于家长 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 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平等在开化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 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 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 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 如解决争端 制止个别人越权 监督用水 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 最后 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 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 甚至在今天的印度 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 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密的人口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新的机构来保护共同利益和反对相抵触的利益。这些机构 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 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 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 这种情况的造成 部分地是由于社会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而使得建立这种机构的必要性增加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社会

公仆怎样在顺利的条件下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 成为希腊的氏族首领 成为克尔特人的族长等等 在这种转变中 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终究也使用了暴力 最后 各个统治人物怎样集结成为一个统治阶级。在这里 问题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 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 在那里 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sup>10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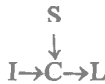
在这些广阔的土地上 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上，一些单独的分散和孤立的村社，或者甚至是一些公社或省的合作社，也会是不可能承担起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修的。也不能想象沿河的土地（水是人们所需要的）可以被允许隶属于若干主人，因为一旦他们中的一个疏忽了必要工作的话，就可能破坏整个社会的用水。所以在各种村社之上发展起一个级别高得多的机构，而且最终体现为专制君主“多数公社之父”<sup>110</sup> 这个整体执行必要的职能 并转而取得它们的剩余劳动，因此在这方面就带来了剥削现象：“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上级的集体，这种上级集体最后由一个人来代表，这种剩余劳动，可以采取贡赋的形式，也可以采取集体劳动的形式，其目的在于供养整体；这所谓整体，一部分指实际的专制君主，一部分指想象之中的部落制度 也就是神。”<sup>111</sup>

即使它采取这样一种隐蔽的形式——这发生于一切前资本主义方式，在欧洲的潮流里则特别发生于封建方式——那种剥削却是一点也不假。毕竟，只有资本主义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无情地斩断了”过去社会中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

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sup>112</sup>

那也毫无疑问，除了真正的专制君主以外，还有一个剥削阶级，使职能和君主的地位不断发生模糊而使之更加难以分清。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开始断言只有它是土地的“实际的所有者”，<sup>113</sup>而更加注意这种制度内部阶级剥削的特殊机制其中地租逐渐和税收等同起来。

我们可以把上述情况加上国家的代号（S）表述如下：



这个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正是国家驾凌于生产性社会之上它们虽然不再完全为自己生产、而是被一个更高的单位所剥削但是却继续存在着。

这就是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述——他在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材料中谈到的无数有关亚细亚社会的内容，给了一个全新的结构并将它们“提高起来”。他也是从那些材料中提出了“东方专制主义”<sup>114</sup>的名称来指明那个制度的政治特点，正如他使用黑格尔的“东方的普遍奴隶制”<sup>115</sup>的说法来描述它的生产关系，以有别于古代的私法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

有过一些论点，谈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究竟占什么地位。我们已经提到过夏庇若，还有其他一些象他那样的人认为能够解决整个争论，他们错误地断定马克思只有一度提到“一个假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且后来从未再谈到这个题目。另一方面，有一些人持匈牙利汉学家特凯所主张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是他整个著作的重要部分，没有了它们——如果以他主张的具有重要关系的科学严谨态度来看的话——就无法想象《资本论》会写得出来”。特凯还说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畴是马克思的发现中不可分割的、有根

本重要性的部分 如果批驳了它 就会对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极为有害。”他还说：“没有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畴 那么 不论我们谈及的是亚洲还是人类的一般发展 历史的真正进程就无法了解。”<sup>116</sup>

很难同意说 没有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的整个著作就会化为乌有 但是特凯说 如果象某些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把它不公地束之高阁，那么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整个概念就会大受损害 就会沦为一种经过美化的单线论的歪曲。这样说是很对的——即使马克思并非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而把亚洲用来作为他分析一种根本上不同于西欧的那种发展路线的。所以，我们把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特别仔细地还其本来面目，这肯定是值得我们做的。

## 第六章 马克思关于亚细亚 社会的思想来源

马克思关于亚洲在历史范畴中占有独特地位的想法，来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 特别是来自孟德斯鸠 他对马克思和同时代的法学界文化人士都是声名卓著的，马克思在最早期的著作中就时常引述他的话。虽然黑格尔无疑地提供了最初的主要启发，马克思自己也知道并承认黑格尔本身的来源是法国和英国的启蒙运动。最后的影响来自英国的经济学家们，当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亡在伦敦的时候曾经以很大的热情专心研究过他们的著作 在那个时期里，一些有关的政治事件——特别是由于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权行将满期而触发了对英国殖民政策的讨论——引导马克思更加透彻地去研究亚细亚社会。他也从国会记录和英国官员报告中，从欧洲旅行家的原始著作中或者从其他作家作品中提到

的关于他们的经历，以及从有关中东和远东的地理学和人种学的著作中，收集重要的资料。

孟德斯鸠在《法意》（1748年）一书中把“专制政府”作为他作品中分析的三大基本类型之一，其他两种是共和制形态和君主制形态。虽然他的理论是对当代法国专制主义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宣传性攻击，他确实说明专制政府对东方国家是最为合适的——特别是那些炎热的沙漠大国，那里维持秩序很有必要，但很困难，国家承担了特殊任务，特别在有关水利管理方面。他强调这类国家的某些共同特点。尽管有各种侵略和朝代的变迁，它们的宗教、法律和风俗并没有改变，他说：“如果它们最终改变，那就会为一次真正的革命扫清道路。那里没有私人拥有土地，相反，土地的权利在国家或统治者手里，留给臣民的只是不稳定的土地使用权。那种情况的恶果是，剥夺了个人的任何所有权感，而增加了气候所造成的天然惰性。奴隶制的一般状况使所有的人都成了被统治的臣民而不是公民，而且在专制政府和国内奴隶制之间有着一种联系。最后，这类政府是孤立的，在国内由于缺乏社会的融合，在国外由于地理状况和有限制的贸易。他确定这种类型的政府的特征在于“统治者的极大权力”和“人民群众出奇地虚弱”，诸如土耳其、波斯、中国、日本、印度、鞑靼、俄国和蒙古帝国。但是，虽然他多次提到地理和气候意味着缺乏绝对标准，并使他在“修正索引”中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分析却主要是说教式的。因此，虽然在一方面他看到东方的条件使得专制政府成为必要，他也把万事决定于一个人狂想的那种“既不光荣、又无品德的专制国家”视为最坏形式的政府。<sup>117</sup> 又是马克思把这些观察中的大部分“提高起来”，象兰盖那样指出：“法的精神即所有权”。<sup>118</sup>

反过来，黑格尔——他的《历史哲学讲演集》（1830—1831）对于已经相当广泛流传的各种思想加以系统化——把亚洲看成是实

现“世界精神”的一个特殊的“契机”或有力的要素。他强调亚洲“固定和静止的天性”，认为它的大部分是孤立于历史的伟大趋势之外的，或者甚至认为它纯粹是“非历史的”，说它是“自然的、呆板的存在体”。亚洲是专制主义合宜的老家：就中国的例子而言，他准备服从伏尔泰的神牛并承认“那个伟大国家的政府过去是组织良好、公正、宽和和明智的，它的工作有效率，能达到它的官僚政治的最遥远部门”，但是在谈到印度时，他说，“尚能称之为政治生活的，只是一种没有原则、没有道德或宗教标准的专制主义”。中国是“绝对平等的地域”。然而，“由于到处是平等而没有任何自由，专制主义就必然是治理的形式”。他指出，“这个政府需要在每个问题上受到监督”，说这个“官僚政府”的“整套完善的机构”都掌握在皇帝一个人和他的官员们手中。简言之，中国和欧洲社会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中国，没有象英国那样的世袭贵族制、封建国家、甚至任何对财富的依附；最高权力习惯上就是由君主行使的”。同样，在印度，“最随心所欲的不光采的专制主义”也可以被认为是“正常的”，因为“没有个人的觉悟来阻挡独裁和鼓舞造反精神；什么都一无所有，有的只是肉体上的困苦和最低需要和乐趣都受到剥夺，因此留下的只是一种消极感”。他认为，那种缺乏自豪感和社会关系一成不变的情况，例如在中国，是由社会结构本身造成的。“没有独立的个人、等级或阶级去照料自己的利益；每件事都是从上面加以管理、指导和监督的。因此，他们全都象受保护的儿童似的。”他也强调印度的政治和社会分崩离析的程度、它的村落结构的永久性，不受动荡的政治世界的不断叛乱、谋杀、革命和内战的影响，普遍对政治不感兴趣或不愿参与，该国对外部关系抱极为被动的态度，正如它受到蒙古、阿富汗和英国的一连串侵略和征服时俯首屈从所表明的那样。他总结说，那是“亚细亚帝国屈从于欧洲人的无法逃脱的命运”。<sup>119</sup>

英国经济学家们也已经指明亚细亚方式主要特点中的若干点。亚当·斯密曾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是静止的而非渐进的事实：国家财富主要来自农业和制造业，而忽视了对外贸易。他也曾指出中国和“许多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水利控制系统的类似之处，并强调它们各国都注意公共工程的基本重要性，特别是道路和运河保养。他也停下来考虑印度、中国和古代埃及君主岁入的性质。他发现多数是来自“一种土地税，或地租”。他也注意到那些官老爷和收税官们要把这个制度永久化，是同他们自己利害攸关的，因为它允许他们靠农民和中央政府供养。<sup>120</sup>詹姆斯·穆勒曾经把“亚细亚形式的政府”作为一种不同的立宪形式，并指出在这种形式下，君主是最大的地主，坚决认为这种形式的不同点太多，不能同封建主义混为一谈。<sup>121</sup>马尔萨斯在海利伯里的东印度学院政治经济学职务的继任者里查·琼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了一种广泛的描绘。马克思逐字摘录了琼斯的一段话，作为简单协作取得“巨大作用”的说明，<sup>122</sup>他特别强调“宏伟纪念物”、“华丽的或实用的建筑”，那是靠“劳动者的人数和他们努力的集中”而由君主和祭司建立起来的，这些君主和祭司掌握着剩余农产品的唯一支配权。他还看到“在亚洲，特别在印度，能够取得任何重要的收入来源的，除了农民以外，就是国家及其官员”。而且“在亚洲，城市的发展——或者不如说是存在——完全有赖于政府在当地的开支”。<sup>123</sup>最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亚细亚社会的兴趣形成了他的比较研究中广大范围的一部分，他特别强调东方专制主义的官僚主义性质。<sup>124</sup>

已经提到，马克思在历史、游记以及其他各种题材的著作中发现了其他的重要材料。曾被认为是孟德斯鸠渊源之一、并曾被亚当·斯密引述过的贝尔尼埃说过：“土耳其、波斯和印度斯坦的人民是不分你我的，蒙古帝国的所有土地都属于君王。他认为，没有私

人土地所有制是“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并说亚洲没有真正的城市而只有王公贵族的营地。<sup>125</sup> 威尔克斯和坎贝尔留下了有关各种形式的印度村社的宝贵材料。<sup>126</sup> 马克思在创作他的理论的过程中也熟悉了其他许多不同程度地谈到亚洲的著作。<sup>127</sup>

同样重要的是马克思从英国国会记录或蓝皮书等官方文件中得来的材料，它们详细谈到有关印度的土地所有制、孟加拉灾荒的原因、以及英国殖民化的后果等情况。马克思特别提到英国占领爪哇时期（1811—1816）的巴塔维亚总督托马斯·拉弗尔斯爵士的一个报告，其中拉弗尔斯说：“君主是绝对的、唯一的土地所有者，人们可以从土地得到大量收入。”马克思还引用了其他两段话。一段话描述了村社简单的社会-经济结构，它多少世纪以来尽管经历了战争、灾荒、疫病、以及王朝兴衰等等而仍然延续不变的倾向。另一段话肯定荷属东印度公司曾经原封不动地利用专制政府的一套已有机构来作为达到其剥削目的的工具。<sup>128</sup>

## 第七章 亚细亚社会的基本特点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认为有几种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sup>129</sup>在前面的材料中，马克思概括了以上述特定生产方式之一为基础的社会“一般范畴”的各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概念，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即使退一万步，至少土地也是属于国家所有。第二，亚细亚社会的基础是村社制，每一个村社通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达到自给自足。第三，中央集权起着支配作用。这种权力是在历史过程中确立的，这是由于要使农业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而必须举办水利工程和其它公共工程的那种环境造成



的结果。<sup>180</sup>

马克思是在不同章节里谈到这些特点的，提一下这些可能有所裨益。例如，早在 1853 年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热情地进行研究和收集资料，他引用了贝尔尼埃的一段话：“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sup>181</sup>

恩格斯回信中同意所作的解释，但钻研得更深，并且要探索为什么私有制形式在亚细亚各民族当中没有发展起来：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sup>182</sup>

恩格斯接着论述了中央政府建立的灌溉体系，而马克思以后把这段论述几乎逐字逐句地用到了一篇论英属印度的文章中去。这篇文章可能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最系统的阐述。但是，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删去了地理的内在影响，而加上了一个新的社会因素——“文明程度太低”——这一点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就是指生产力水平低：

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

在东方 由于文明程度太低 幅员太大 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sup>183</sup>

正是这种形势，久而久之终于导致了“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sup>184</sup>

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甚至更加强烈地坚持这种看法，他说：

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在这里 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 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在印度〕……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sup>185</sup>

马克思当然并不把这种情况说成是理想的，尽管根本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他所发现的是，象古典奴隶制一样的压制和违反人类发展的情况，在某些方面甚至更糟。<sup>186</sup>

马克思在评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主义影响时，他感到有责任宣布，如果用一种过分的种族优越感观点看问题的话，是错误的：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 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 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 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 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 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

民的被屠杀，就象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 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 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 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 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 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 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 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 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他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糟践人了。<sup>137</sup>

马克思从撰写最早的几篇关于印度的文章时起，他所研究的问题中 村社就占据突出的位置 他十分强调村社的特殊性质：

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 印度人民也象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 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 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 即所谓村社制度 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sup>138</sup>

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分散在广大乡间的各个村庄的互不联系和孤立状态。<sup>139</sup> 前面讲到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保证了它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sup>140</sup> 以及每个结构简单的单位中出现的、仿佛受到自然规律支配的那种固定的、有限制的劳动分工。<sup>141</sup> 这些特点使它的存在得到了保证 不管政治领域中可能发生任何变化 而它几乎从未受到任何变化的侵袭：

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 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 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 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 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sup>142</sup>

在著作的各个不同部分 马克思强调的重点 从一种因素变换到另一种因素。他在这一个地方说东方结构的钥匙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在另一个地方他把这种土地私有制的不存在归因于前面说到的特殊的地理或气候因素。有时，他把国家的突出作用归因于那种必然导致举办大规模工程的生态因素；有时又把它归因于村庄的分散和孤立状态。另一方面，他说这种孤立状态是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在家庭内部的结合保证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的缘故。在另外一些章节里，他似乎认为这些村庄的简单结构和简单分工是东方制度停滞不前的原因。但他却又强调诸如“文明程度太低”或生产力水平低 要不就是特殊结构等等其它因素 而这些他则认为 是原始的分工造成的。

指出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自相矛盾之处 是轻而易举的 但这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上述的所有因素 都在一定程度上同建立起东方制度有关，而且它们是在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条件下搀和在一起并互相影响的。想把辩证的过程降低到老式的因果论语言的任何尝试，只能导致象巴雷尔所说的那种“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必然要使人受折磨：“陷入交互作用的困境 遭到可怕的惩罚 因为各种现象普遍地互相关联而处于难办的境地 它们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叙述到，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sup>143</sup>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看法，远比过分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通常让我们了解的条件要

更加错综复杂得多。现在应当更清楚地看到，经济因素只是在最后的分析中才是决定性的：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sup>144</sup>

这类问题“源出于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传统”<sup>2145</sup>，例如，佐姆巴特的一个学生鲍吉乌斯曾向恩格斯提问——“经济关系对于发展在因果上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是充分的原因、偶然的动力、永久性的条件还是别的什么？”——这对于第一代的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以及对第二代即俄国人这一代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引起了激烈的反应：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

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sup>146</sup>

在另一段话里，再一次阐述了这种思想，讲得更加清楚，它坚持辩证法观点，驳斥了“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的两级”指出：

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能够对周围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sup>147</sup>

## 第八章 亚细亚社会的阶级结构

因此，马克思的话并没有任何自相矛盾之处，只有肤浅的旁观者才这样看。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之后，我们就能来分析亚细亚的阶级结构。

马克思并没有十分详细地谈这个具体问题，因此却使得“新单线发展论者”和其他一些解释者感到可以不受约束地说，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的阶级社会，而是介于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和最初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有人甚至说那是唯一的过渡形式。如果确实是这样，那就奇怪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每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都可以用阶级关系来加以说明。《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开始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sup>1888</sup>年，即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人开始对亚细亚社会发生兴趣的将近四十年以后，尽管恩格斯感到有必要对《共产党宣言》加以补充，也只是为了说明把这句话适用

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sup>148</sup> 并没有加上其它的限制条件。

我们也看到，马克思在说明亚细亚社会时一直是怎么样强调国家所起的作用的。当然，对于马克思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国家

……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国家是表示 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sup>149</sup>

……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 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sup>150</sup>

但是 还不能真正说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 亚细亚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阐述得十分透彻。村社的全体居民几乎都是被剥削者，他们沦为上级权力机关的“普遍的奴隶”。这一点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但仍然相当含糊不清的是，构成剥削阶级的究竟是哪些人。

使问题复杂化的是由于下述的事实：在亚细亚社会里的剥削有两级：一是在村社内部，一是在村社和管辖它的上级机关之间。在第一级，《资本论》以及论述印度的文章内有关村社的一些章节中 马克思谈到了行使特殊社会职能并由村社供养的一小批人 居民首领 他一身兼任法官、警官和税吏 管历法的婆罗门或占星家；教员 诗人 各种工匠。<sup>151</sup>但这显然更在于说明为数有限的分工 这是《资本论》中这一章的主题 )而并非真正意在阐明村社制度的阶级结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也是在讲到分工时 马克思谈到了等级制度，他实际上把这种等级制度归因于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原始形态”。<sup>152</sup>亚细亚公社包含着消极地发展到种姓制度的种子，<sup>153</sup>正如希腊—罗马公社包含着奴隶制的种子和日耳曼公社包含着农奴制的种子一样。正是通过这样的道路 小小的印度公

社在内部受到了从分工转变为种姓的影响以及受到了奴隶制的影响。<sup>154</sup>这些等级是否构成真正的社会各阶级，是可以争论的。我们认为它们就是社会各阶级，尽管剥削方式在等级制度中被掩盖起来了。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毕竟都可以这样说，因为其剥削通常都是被“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sup>155</sup>但是 仅仅说有剥削阶级，并没有解决哪些人是剥削阶级的问题。等级制度只是在亚细亚世界的某些开化地区存在着。中国从未有过，而中国却无疑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中最典型的例子。<sup>156</sup>

亚细亚阶级结构有别于其它结构的真正特点，可以在村社和上级当局之间的关系上看出来。马克思认为后者上升到顶点就是专制君主或者总督。但是 在同各种其它的阶级社会类比时 如果以为可能由单独的个人（即使他是唯一的、正式的地主）构成亚洲的剥削阶级 那就可笑了。在《资本论》的一个脚注中 马克思谈到了埃及的祭司由于承担了灌溉农业所需要的社会职能，而使自己成为统治的等级。<sup>157</sup>在 1859 年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所写的导言中，马克思说到税吏是由法律具体规定靠一份社会产品生活的一种特殊的社会集团。他把他们同那些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地租生活的地主、靠什一税和施舍生活的僧侣和教士们划为同一类阶级。<sup>158</sup>在别的一些章节里，他把文职人员和军人——以及其它各种职业的人——划为“一大批所谓‘高级’劳动者，……他们……不仅不是生产的 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 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 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因此 他们“在经济学上……被说成靠真正的生产者 更确切地说 靠生产当事人 养活的食客、寄生者”。<sup>159</sup>但是，上述引文可以说没有哪一段足以说明亚细亚制度中最突出的剥削阶级的性质：其管理者兼官僚的两位一体的性质，这已经为英国经济学家和马克思其它的原始资料所察觉到。<sup>160</sup>



国家官员、官吏、官僚、军人——这些人构成了亚细亚制度的真正特权阶级，在生产公社之外的这一群人占有了来自土地的地租，即相当于对土地所课的税。如果说上述这一群人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职能的话，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从来不否认剥削阶级和特权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担负着社会职能。但是，当然不能因此而抹杀他们的阶级特点：

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sup>161</sup>

马克思通常总是非常注意官僚机构的问题的<sup>162</sup>，因此，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要公开承认一个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里官僚的阶级属性，对他来说是可能有些阻力的——至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由于他自己的某种“判断的盲目”<sup>163</sup>所致。<sup>163</sup>但是，绝没有理由象威特福格尔那样不怀好意地揣测马克思是害怕这样的承认会给那些攻击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过渡社会的蒲鲁东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提供炮弹<sup>164</sup>，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的概念里是不会有官僚之类的东西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即关于这样一种官僚阶级是否会在最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产生，对于那种现实可能性，马克思还不曾有过第一手的历史经验。对我们来说，认识到这一点显然要容易得多，只是因为这正象马克

思曾经说过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sup>166</sup>

他自己对这句格言作了如下的解释：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sup>166</sup>

同样，有了俄国和中国的官僚集体（其主要基础是古代亚细亚社会的残余）的历史经验及其自我批判的开始，<sup>167</sup>我们今天才有可能更清楚地理解古代亚细亚社会的特点，并且，通过同样的途径，从而领会它的具体特点。

## 第九章 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的区别

持各式各样主张的‘单线发展论者’企图贬低或否认亚细亚社会的特殊性质，有些人有时企图把它同古代社会或封建社会混为一谈。因此，仔细观察这几种社会之间的区别是有价值的，马克思自己就曾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些区别。在这些区别中，首要的一条是基本生产关系，因此就是指每个社会中主要的阶级对立的情况：“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物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sup>168</sup>

马克思认为，对地租进行分析时可能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就是“把适应于社会生产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租形式混同起来”，尽管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即不同的人借以独占一部分土地的法律虚构在经济上的实现”，同时他谈到下述这些社会作为例子：“土地所有者可以是代表公社的个人，如在亚洲、埃及等地那样；这种土地所有权也可以只是某些人对直接生产者人格的所有权的附属品，如在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下那样”。<sup>169</sup>把上述的区别加以概括可以说以奴隶为基础在古代社会中的特权阶级，由于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因此就能向生产者索取地租，而在封建社会他们则只是作为土地所有者而索取地租，但是人则由于人身的依附关系和由于缺乏人身自由而隶属于土地“作为土地的附属物”。<sup>170</sup>在东方专制制度下特权阶级并不占有土地或人而是掌握一种公共职能即作为国家——唯一的土地所有者——的代表而索取地租：

〔在亚洲〕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 那末 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 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 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 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sup>171</sup>

从上面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把它描述为一种“普遍奴隶制度”状态而与真正的奴隶制以及封建制作为对比：“在奴隶制、农奴制之下，劳动者本人成为他人或社会底自然生产条件（这在东方普遍奴隶制度之下是不会有，只有欧洲才会有这种情形”。<sup>172</sup>

换句话说，“东方普遍奴隶制度”的先决条件是，它的从事生产的阶级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独立自主的关系，虽然决不是什么田园诗式的条件。其中存在着一条同奴隶制不同的重大区别：“它和奴隶经济或种植园经济的区别在于，奴隶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来劳动，并且不是独立的”。<sup>173</sup>

另一方面 亚细亚生产方式同封建生产方式的区别在于 它并不是以人身依附的关系为基础的。存在于亚洲的奴隶制和人身依附只是很有限的，例如家奴或在诸如金属提炼等某些重劳动方面。但它们从来没有成为基本的生产关系。<sup>174</sup>没有必要发展成为这样的生产关系 因为剥削阶级随时都能够向村社抽调大量劳动力 甚至用于非农业生产。此外 这种发展的基础 即私有财产 并不存在。因此在亚洲，象那种以奴隶起义直到中世纪扎克雷农民起义为标志的西方历史上的直接对抗 不是被消灭了 也至少是被大大削弱了。确实 甚至在中国 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农民起义 但只是在中央政权软弱无能 允许尚未成熟的封建阶级暂时出现 没有力量管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体系以及缺乏那种能起缓和作用的、训练有素的官僚阶级时，上述的农民起义才会爆发。

马克思还嘲笑了当时撰写有关印度情况的一些英国学者想把英国强制推行的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所产生的新“地主”同英国的土地贵族和法国的小土地所有者阶级加以类比的企图。他指出：

说这些柴明达尔同英国的大地主相似是十分可笑的，他们只能得到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都要交给政府。而印度的莱特又是一种多么笨拙可笑的对法国农民的摹仿啊 他们被剥夺了任何对土地的永久性权利 他们必须根据收成情况每年缴纳不同数量的捐税。<sup>175</sup>

这三种前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第二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在于城乡关系的不同：

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历史，不过那些城市是建立在地产和农业上面的 亚洲的历史是城乡浑然一体的历史；……中世纪（日耳曼时代）底历史是以乡村作舞台而开演的 它以后的发展是在城乡对立之中进行的 现代历史是乡村底城市化 而不

是象古代那样的城市底乡村化。<sup>176</sup>

希腊的城邦或罗马时代的城市是土地所有者的指挥中枢，<sup>177</sup>因此在古代社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古代社会却基本上仍然保持了农村的特点。中世纪社会是在乡村中开始的，但它却在城乡之间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现代生产方式是在城市诞生的，产生了阶级 称之为‘资产阶级’并非偶然 这个阶级终于使乡村从属于城市。<sup>178</sup>但在亚洲甚至连名副其实的城市都没有：“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 只能认为是帝王的军营 那是真正经济结构上的赘疣。”<sup>179</sup>

马克思预见到城市〔civitas〕和城堡〔castrum〕之间的区别，它们以后成立了城市社会学的一条原则。换句话说，他把亚细亚的“城市”看作是一种恶性发展，是一个集结地。虽然它可能很大，但既缺乏真正的城市特性又缺乏真正的生产基础；它是专制君主宫廷的挥霍浪费和社会实际生产能力之间一种病态差距的反映：“真正的城市只有在对外贸易特别有利的地点才能与这些村落并列而形成起来，或者出现在国家元首及其总督拿他们的收入（剩余产品 与劳动交换 作为劳动基金而支出的地方。”<sup>180</sup>

简言之 在那些有“供人享受的财富 对于这些财富 商人会设下圈套”的地方，<sup>181</sup>亚细亚城市建立起来，并且成为这些财富流通的媒介。马克思认为，就这一点而言也正如其它方面一样，这种城市，在专制政权的庇护下，过着一种完全寄生的生活。它充其量也不过象亚洲的大商业城市那样，还是一种半寄生体。直到最近，在这种商业城市里，正如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社会时所说的那样，只有买办阶级才会兴旺<sup>182</sup>——不是欧洲式的真正的资产阶级，而是在殖民地经济利益的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一个阶级。

这样一种城市和乡村的‘冷淡的结合’自然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后果产生重大影响。关于这一点，最好是回顾一下马克思是怎样叙述关于城乡之间的分工和对立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后果的：

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sup>188</sup>

如果亚洲对这种情况完全陌生，那么其根源仍在于不存在私有制：“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sup>2184</sup>

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同样突出的区别。在亚洲的孤立的发展格局中确实存在庞大的官僚集权国家的早期形态，但这种形态却只是到现代时期开始时才在欧洲出现。对比之下，欧洲在中世纪时，直到封建末期，却是典型的分散管理的格局。在欧洲历史上的其它各个时期中甚至是更小的政治实体 诸如希腊的城邦或罗马的城市 或者是“现代史”初期的公社之类。即使在古代或封建时期中象凯撒帝国或查理大帝帝国那样的最大的一统天下，至多也不过是短暂、动荡的军事管理机构，缺乏真正的内聚力，甚至连统一的语言都没有。而中国这个最典型的亚细亚社会，多少世纪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拥有大量至少大体上同种的居民，具有一种到处通用的文字——尽管讲话有些区别，而且，存在着几千年公认的统一的历史，因此还有共同文化传统。

我们如何来概括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封建生产方式之间的主要区别呢？

首先，在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上是完全不同的。亚细亚

生产方式是典型的贫瘠地区的生产方式，在这些地区，总的说来，人们靠一块块相当小的土地过活。例如，在尼罗河流域，直到今天全体居民仍然集中在全国百分之三的土地上。这些土地靠灌溉工程而肥沃起来，而这些工程需要不断维修。所以，土地很珍贵，而劳动力却很充裕。中国通用的土地单位是“亩”，每一亩还不到六分之一英亩大小，在中国，土地登记制度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另一方面，典型的封建制度则存在于拥有大量土地而且毋需大规模公共工程来改土造田的地方。所缺的倒是种地的劳动力。没有土地登记；土地被分为大片，通常是十分粗略地以不太精确的自然标志如河流、森林或山脉等等来划界的。但却保存着关于“人头”或农奴的十分详尽的人口统计册，其中还载有专业的匠人如铁匠、木匠或箍桶匠等情况的全部细节。<sup>185</sup>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区别。归根到底，这即使不是对人类生命本身轻视的话，至少也是对于个人的轻视，而这一点正是亚洲的许多文化和主张相当典型的特点，然而这却同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那种对个人的概念是矛盾和相冲突的。

第二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在亚细亚社会里 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是国家所有的。另一方面，在封建制度下，根据‘土地无不属于领主’<sup>27186</sup> 这一条封建制度的基本格言，土地属于贵族所有并由长子继承。因此，在亚细亚方式里，只有国家享有向生产者征收赋税而索取剩余产品的直接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赋税同地租是一回事。主要剥削阶级的成员们只需通过国家而取得他们的一份。而另一方面，在封建制度下，封建地主是直接的剥削者 不受国家限制 以实物和劳役形式占有地租。

最后 亚细亚国家还履行一种对居民极端重要的职能 即兴建并维修治水工程。其结果是，国家形成了强大集中的政权，任用了定期任免和理论上可以经常更迭的官员。从而出现了走向专制制

度的趋势。此外，国家还储粮备荒——埃及流传关于约瑟的故事，在任何别的环境中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庞大的治水计划并不是国家使用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唯一的公共工程。除此以外还有别的巨大的国防工程：诸如中国的起自黄海之滨直到戈壁滩的长城，或萨法维迪的统治者们为保卫波斯的绿洲防止土库曼牧民入侵而兴建的东自里海岸边西至科佩特山脉的“亚历山大长堤”。或者，为了显示君主的荣耀而建立的巨大无比的建筑物，如埃及金字塔、哈利卡纳苏斯陵墓、泰姬陵、明陵，或者用以举行宗教仪式的建筑，如埃及和印度的大寺庙，或者墨西哥的金字塔。<sup>187</sup>借用芒福德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创造了人类的“巨型机器”这是未来所有机器的原型 它将逐渐用机械的部件来代替人的组成。<sup>188</sup>马克思在谈到简单的协作所产生的“令人吃惊”的结果时，指的就是这种创造。把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并运用权力指挥群众使这种巨大的劳动力行动起来，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才使一个人或少数人手中集中了这些剩余产品。马克思列举了亚洲人、埃及人和伊特刺斯坎人兴建的巨大工程作为例子。<sup>189</sup>

在封建制度下情况完全不同。国家并不担负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的职能。权力是分散的，所有各种相应的任务都由封建领主承担了。是他——而不是君主——提供防务 征收赋税 在各级法庭审判执法，甚至操有生杀大权。每一个封建领主就是自己那片领地上的统治者；没有在他之上的专制君主。国王只是矮子里面拔将军，有时甚至就是从大的封建领主中推选出来的——如德国、波兰和匈牙利在各个时期都有过——而他的权力并不超出他自己的领地。在任何情况下，封建制度的“国家”并不行使主要的生产职能。甚至向君主专制的发展也较晚而且在程度上还受到限制。这标志着这个制度的结束而不是发展。在法国只有路易十四能够说“朕即国家”。处境困难的路易十五接踵而至，讲了一句完全不同



的话：“死后管它洪水滔天”洪水果然来到 以大革命的形式出现，宣判了封建制度的死刑。

与此相反，亚细亚的君主从一开始就在一切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力——不仅在政治方面 而且在经济、宗教和军事各方面都是如此。他站在官僚等级的顶峰 监督着国家机器的运转 正如恩格斯所说 他是贫瘠和半贫瘠地方泛滥的河谷和灌溉土地的“总的经营者”——那些地方要不是最早文化的诞生地，那就是最早国家的诞生地。或者象马克思所说 他是“家长制的权力，……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sup>190</sup>

“太阳之王”一词概括了欧洲政治专制主义思想，而这种专制主义则标志了欧洲封建时期的结束。在天平的另一端我们可以放上安德里亚纳马波伊尼梅蒂纳国王（1787—1810年）的话 这位国王是现代马达加斯加的创始人 马达加斯加就其体制、传统和实际的种族渊源来说 都是属于典型的亚细亚社会的 他说：<sup>191</sup>

我提醒你 梅里纳 这个国家的土地是属于我的 就象一切权力都属于我一样。……所以我将把土地分配给你们……你们可以居住在我分给你们的地块上 但是土地仍然是我的 就象所有权威都是我的一样。我将把土地按“海特拉”来划分 每一个人一“海特拉”。因此 我的每一个臣民都有用来喂饱自己肚子的相同的资源供他自己处置，不论他的地位微贱或者有权有势都是一样。他必须为我服务，因为我将保证他取得同他的邻人完全相等的生存的手段。……因此，我领你来到所有必需的资源的面前，来到灌溉的土地上——我是这些土地唯一的所有者——以便你能从中找到办法养活自己并找到为我服务的力量。……这些土地是我的，没有人能够说他自己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因为你们本身就是属于我的。<sup>192</sup>

## 第十章 亚细亚社会独有的文化特点

纯粹文化方面的区别也是相当突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这个制度整套意识形态的形成，应归因于位于政治金字塔顶峰的人物在亚细亚社会中所起的突出作用。他有责任使土地肥沃，他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也是所结果实的主要受益者。专制君主“缔造了‘用于耕种的土地，他使耕地得到‘灌溉’和‘肥沃’”他创建了耕地、保护它和滋养它，而且密切关注它的重大季节变化周期。象古代埃及的碑文上所记载的那样：“他拥有比尼罗河还要丰富的水源，使大地绿化。”<sup>193</sup>

当农民居住在分散孤立的村庄而世界的范围等于他们自己社会的边界时，上述这一切就很容易地表现为神话式的和广大无边的领域。毕竟，在自然的社会还存在时，“个人……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sup>194</sup>，而宗教往往还是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并且能够本能地使自己适应于专制制度。<sup>195</sup>因此，政治生活神化了，专制君主个人更是被神化了。他往往以高级祭司、天子或上帝之子、以人与神之间的联络人的身份出现，甚至自称即是上帝，因为他操生杀大权，能保证“天下”五谷丰登。与此相应，已经人格化和主张万物有灵的宗教也就政治化了。在一首苏美尔的颂词中，国王也成了上帝，他自己可以说：“我是贮存五谷的农人，我是育养牛群赐给它们乳汁的牧人……是我保证了清水灌满沟渠。”<sup>196</sup>

把经济的和政治的、宗教的和道德的、民政的和军事的这许许多多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的一种最明确无误的文化特点。安努阿尔·阿布德尔-马利克

在论述埃及这个水利化最‘密集的’亚细亚社会时是这样说的：

在一切领域中都有统一、中央集权、集中形成金字塔式等级的倾向。政府既是水的主人也是土地的主人……中央集权的国家不知地方主义、封建主义为何物……甚至连天堂也不能避免这种统一化的倾向早在古王国时期两个埃及所有的神都被合而为一，成为阿蒙-赖神（爱西丝（生育之神）哈索（爱神）和奥西里斯（冥王）的三位一体为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开了先例。从而使埃及本身从地上的农田直到天空的最高点从母牛直到永生，从农民直到上帝都统一起来——一种共生多于结合的统一。正是这种使埃及合为一体并存在于埃及人内心深处 的统一 是一种基本的、主要的因素。每一件事物都从这一点出发并与此相联系；凡是会使与自然凝成一体 的这种关系遭到瓦解的事物都是不正确的。国家是政权的主人，国家的首脑就是神的化身或代表 国家直接掌握经济生活 并且是唯一的所有者，直到七十五年前资本主义侵入时为止。<sup>197</sup>

事实上“神或‘天’”与统治国家的专制君主合而为一就是亚细亚的传统 行使权力 不论是经济的行政的以及制订规范性的和镇压性的权力 都同宇宙有条不紊的运行相一致的。这两者之间的和谐一致是土地肥沃的条件和保证 因此 也是人类生活的条件和保证。人们不仅承认绝对的权力，而且把它作为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保护者而加以神化，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能继续工作和表达上帝的意志。丰收表明君权与神权之间和谐一致，而使权力最后合法化。在西方 土地肥力是引起科学研究的一个主题 但在亚洲 它却引起了对社会状况的探讨 因为这是实行灌溉的农业制度下政治当局所特有的职能。马克思曾指出：“……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 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 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

象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sup>198</sup>

亚细亚的统治者认为使国家繁荣远比军事出征更能为他们赢得威望。埃及在每一次社会大变动时期以后，凡恢复了秩序的那些法老们都是名垂千古的。如拉美西斯四世即因曾使“尼罗河泛滥滋润田地，如同使妇女能生育”而闻名。中国自孟子的时代起就认为荒年是引起叛乱的正当理由。意大利人的感叹语：“下雨了，该死的政府！”始终是一句不合逻辑的话。但在亚洲，当干旱的时候，诅咒政府倒往往是有道理的。

但是，东方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主要区别还没有谈到。在西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形成了与日俱增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从希腊和罗马、基督教、人道主义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自由主义等智慧的大厦中终于产生了“个人”和“市民”的概念，尽管常常遇到过否定和矛盾——诸如奴隶制和农奴制、种族主义和奴隶买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直到“文明的”资本主义大城市里装配线上的日常单调劳役——以致要彻底实行上述这些概念，仍有一段漫长的道路。

在集体财产制盛行而仍残存着原始公社结构的东方，有两个典型的特征：有组织的集团比个人更具有普遍性，以及普遍具有天然的集体思想——在这个集体里每个人都有它特定的地位和职能。<sup>199</sup>特尼斯曾直截了当地发展了某些为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用他的话来说，西方一开始就有成为一种“社会”〔Gesellschaft〕的趋势，而东方直到现在还主要是一种“共同体”〔Gemeinschaft〕。

关于这个问题真可以写一部书，但不拟再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只能把罗马尼亚学者伊翁·巴努的结论抄录于后，供参考。他曾就古代东方哲学问题专门研究了亚洲社会形态，他说：

长期以来，研究古代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包括作者在

内 在假设希腊-罗马世界和东方世界都以奴隶制作为其共同的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讨论了这两个世界的哲学思想状况和社会职能以及它们的总的精神。因此 讨论的前提是 这两种社会制度中大部分都是可比较的。但这个假设却不能为事实所证明，因此，就我们而言，我们决定重新检查原来的假设。即使以全世界人类共同性的理由为基础，在历史资料和哲学资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也已大大超过相似点，而这些差异使作者考虑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样一个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 这些差异得到了解释 我们非常满意地接受这概念，这是一名研究者象掌握了深入钻研历史和哲学状况的工具那样所获得的一项概念。<sup>200</sup>

## 第十一章 亚细亚社会的种种类型

在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个社会之间可以找到重大区别。不同的作者为了说明问题都对此作了分类。

威特福格尔把亚细亚社会划分为中心地区、边缘地区和次边缘地区，并把这些主要的等级扩大，成为各种更具体的小类别，最后成为以下的体系。

第一，中心的亚细亚社会(a)水利设施密集 水利化农业占主导地位 如埃及；(b)水利设施稀疏，水利化农业不占主要地位，但达到了足以使控制水利设施的那些人获得政治和组织上的统治权，例如对农业实行管理的大帝国。威特福格尔说，密集式的结构不是普遍现象而是例外。

在“密集式”这一类里他又分为持续型 (C1) 和非持续型 (C2)，这两者都可分为具有绝对统治权 a) 或相对统治权 r 两种

形式。因此就产生四种密集式类型，按密集程度依次排列为：C1a、C1r、C2a 和 C2r。

在“稀疏”类里，他在亚细亚社会中又区分为拥有大型水利设施并至少建立了地区性统治权的（L1）和没有这类条件的（L2）。这两者的水利化密集程度都可以因拥有河堤或拦水坝等防护工程而提高，这以“十防护”的记号表示之。因此就产生四种稀疏式类型也按密集程度依次排列即：L1+防护、L1、L2+防护和 L2。

第二，边缘的亚细亚社会（a）具有大量水利特点（M1）如辽帝国或玛雅文化；（b）没有或极少水利基础（M2）如拜占庭帝国或莫斯科公国时期的俄罗斯。

最后，次边缘的亚细亚社会：具有不成套的、分散的水利特点如史前时期的希腊、米诺斯克里特、伊特刺斯坎社会、在蒙古入侵前的俄国、基辅罗斯 和日本。<sup>201</sup>

戈德利埃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分为具有或不具有大型公共工程两种。两者都有建筑在对生产社会进行剥削的基础之上的、掌握法定权力的贵族统治，但只是具有大型公共工程特点的那一种才有官僚制度和高度的中央集权。他显然不重视威特福格尔精心设计的分类法并抨击说：“为了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必到处去寻找那种以水利化为主的、官僚制度的和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庞大结构。”他还说：“理论家的任务更应该是对这种生产方式的各种型式——不论有没有大型的和有没有农业——进行分类。”<sup>202</sup>我们已经批评过戈德利埃的解释所产生的新单线论的结果，因为这种解释最后会失去马克思始终强调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实际上正如赖特-米尔斯所说的，如果忘记了马克思主要贡献之一的“历史特定条件的原则”就不可能了解任何社会。<sup>203</sup>

多夸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区分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内 国家通常通过兴建大型水利工程而对生产力进行直接干预；在次平

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家只在生产关系领域中进行直接干预，控制所有的交换方式并占有多得与不相称的剩余产品；而准亚细亚生产方式则是以军事民主制的亚细亚方式进行微弱的、人为的模仿。

真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由于国家相应的巨大作用而具有基本的统一性。在某些方面这一点是有益的，例如，生产力水平往往要比其它的传统社会高得多。在另一些方面却又是有害的，因为它阻碍了这种结构转变为另一种生产方式或走上其它道路。

准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的亚细亚形式是外来的，换句话说，是强加的，它的特点是缺乏统一性，因此它过渡到其它社会形态会简单得多；次亚细亚方式则介乎两者之间。

各种亚细亚方式的典型如下：中国和埃及是亚细亚方式，俄国和波斯是次亚细亚方式，而七世纪时在中国盛唐时期影响下的日本则是准亚细亚方式。多夸还谈到欧洲历史上的一种伪亚细亚方式，以说明亚细亚模式的强大文化影响，它并不具有什么真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只是在欧洲某些危机时期才出现过，如古希腊时期或晚期的罗马或拜占庭帝国。

然后他对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作出了分类：首先是灌溉设施大量集中的社会，如埃及；接着是局部灌溉设施已达到某种主要的程度，如中国，或甚至具有普遍性，如印度和锡兰；最后则是局部灌溉设施占主导地位，达到了可以称为次亚细亚式的社会，如波斯。然而他的这种分类过于机械，因为他忽视了其重要性不亚于灌溉的别的条件的差异，例如领土面积大小、气候类型等；这些条件如果包括在内，他对波斯和锡兰的判断就必须颠倒过来。

多夸还从另一个角度加以区分：河流国家，例如确实是建立在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宫殿国家或寺庙国家，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显而易见；以及国家城市，例如在印度和柬埔寨建立的；这同希腊的城邦不同，因为在亚洲，是国家产生了城市，而不是城市产

生了国家。

多夸的另一种分类更令人感兴趣。他在埃米尔·德尔克海姆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分类法的基础上作了一些适当修改，他把亚洲的社会作了对比：机械的神权社会（如印度和柬埔寨）；有机的官僚社会（如中国和越南。前者与其面积相应，具有普遍的局部灌溉设施，特点是永久的封建性，勿与封建制度相混淆）。后者则有普遍的集中灌溉设施，但仅仅断断续续地带有封建性——换句话说，即不时出现的封建性。机械的神权社会是自然经济并以世袭集团的分工为主，完全是神权政治和种姓制的倾向。<sup>204</sup>这种分类法尽管引人入胜，但也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它不能适用于埃及，埃及无疑是历史上有名的以神权政治和种姓制为基础并在最集中的灌溉体系下建立起来的社会，同时又具有一个有机的官僚结构和仅仅是不时出现的封建性。柬埔寨的情况也是这样，柬埔寨在从印度教到佛教的转变过程中，寺庙的经济活动减少了，更直接的国家的剥削代替了印度式的间接剥削方式。<sup>205</sup>所有这些都要求有一种比上述的分类法更复杂的说明。

就我们来说，虽然有时利用上述分类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但我们只准备区分亚细亚方式中的强变体和弱变体：前者是有机的官僚社会，其灌溉设施至少带有集中化的倾向，如埃及、中国和越南；后者是机械的神权社会，具有相当规模的地方性农业。此外，我们应注意到亚细亚方式的强变体具有强大的内聚力，而且这种倾向定期地坚持反对封建领主的倾向或至少反对地方割据。从这些分类法的角度来看，印度和中国的不同命运具有明确的重要意义。



## 第十二章 哪些社会是马克思 认为的‘亚细亚’社会？

按照马克思的用法 我们有时也用‘亚洲’这个词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亚细亚体制的人为的同义词，用词的局部来反映整体。但这完全不是以偏盖全的用法，应该十分明确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概念尽管与环境因素有关，但主要是一种分析的模式，它并不一定同亚洲的地理状态完全吻合。按马克思的看法，有一些以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他称之为“亚细亚的”国家是在这个地域之外的 同样 有一些在‘亚洲’地理范围之内的国家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sup>206</sup>

马克思在谈论亚细亚方式时具体提到的那些国家中，可以首先引印度<sup>207</sup>和中国，<sup>208</sup>然后是中东的一些国家——埃及<sup>209</sup>、美索不达米亚<sup>210</sup>、波斯<sup>211</sup>、阿拉伯<sup>212</sup>和土耳其<sup>213</sup> 别的中亚国家 如鞑靼<sup>214</sup> 以及远东国家，如爪哇和荷属东印度群岛，<sup>215</sup>再就是俄国，为了准确起见 马克思给它下的定义是“半亚细亚的”国家<sup>216</sup>——本书即将会谈到的；甚至还谈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的一些特定的国家，如阿兹台克时期的墨西哥和印加时期的秘鲁。<sup>217</sup>在谈到伊斯特列斯坎人<sup>218</sup> 和摩尔时期的西班牙<sup>219</sup>时 马克思也用了“亚细亚的”这个词。

上述所有的国家显然并不是都在同等程度上近似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的总模式。就此而言，可以说印度与这个模式的主要不同点是在政治方面，在于它相对地缺乏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政府，中国的不同则在经济和法律方面，它至少在某些时期已经存在了一些私有财产，而俄国的不同则在于它缺乏水利的特点，它的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化是其它因素造成的。

然而，具有不同结构的其它亚洲国家则不在此例。如果在谈亚细亚方式时援用马克思从未提到过的国家的历史来攻击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概念的话，那是绝大的错误。那个批评倒可以特别针对那种草率的结论，说什么许多人坚持把利奇的研究应用于锡兰<sup>220</sup>，因为锡兰显然不是——再重复一次马克思的原文——一个 78 贫瘠干旱和必须具备大量水利工程的大国。

### 第十三章 日本

把日本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则是更大的错误。马克思非但没有把它包括在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家当中，而且相反地，还证实了它的封建性，甚至认为它与中世纪的欧洲特别相似：“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 同我们的大部分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一切历史著作相比，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副更真实得多的图画。”<sup>221</sup>

这是马克思的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不领会这一点就容易陷入错误的解释。研究亚细亚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点而企图论述以此为前提的理论问题，则陷入了极大的盲目性。

例如，霍布斯鲍姆把对日本的封建性的那种犹豫不决的承认，说成仿佛只是他个人“对马克思思想的创造性的精心阐述 而不是马克思的具体的主张”。他于是毫无道理地作出结论说“马克思的著作“含蓄地肯定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独特性””。<sup>222</sup>因此也就暗示了资本主义只能在欧洲自动地发展起来。

曼德尔则认为 在马克思的特殊意义上说 日本理所当然地是“亚细亚的”并且从而强调 亚细亚的不发达完全是外来的原因造成的：

亚洲国家今天的不发达并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欧洲的入侵所造成的这些国家的依附状况使它们停滞和倒退的结果。日本这个成功地保持了真正独立的亚洲国家，也很成功地避免了“不发达”。<sup>223</sup>

不发达的外部因素当然不应该缩小。但是唯一正确的似乎是：作为一位经济理论性论文的作者，而且本身还冠以“马克思主义者”头衔的人，起码应该更广泛地看一看真正的历史和政治的事实，问一问究竟日本是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使它有别于其它亚洲国家，能够首先捍卫它的独立，然后开始主要在自主的基础上发展它的资本主义的。总之，当人们要想把不发达解释为殖民主义造成的恶果——许多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往往把这一点看成仿佛是一条充分的、万能的解释似的——时就忽视了这些国家之所以会沦为殖民地，只是因为它们在当时它们和西方之间存在着一段确实不小的差距。它们还不曾出现那种西方式工业化的趋势。而这种主张，正如洛温撒尔所说的，“显然是属于神话的领域而不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sup>224</sup>——更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了。

戈德利埃企图把亚细亚方式和封建方式更紧地拉在一起，他说前者转变为后者是“最常走的进化途径”可以在中国、越南、印度、西藏和日本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中找到这样的例子。然后他不得不对自己提出问题：“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瓦解而逐渐形成类似的‘封建’形态和‘西方封建制度’却从奴隶制崩溃中诞生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他认为，“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限制了商业性生产的发展，从而阻碍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奇怪的是戈德利埃作为一位结构主义者，却并不指出两种形态之间结构上的区别，而仅仅说出了它们的不同后果。）但他在日本和上述其它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的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失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是另一种情况”，却又未说明任何理由。然而他想缩

小这些差异 断定日本的‘工业基础、现代生产力和组织方法都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因为在日本的封建社会条件下上述这些并没有得到发展，而顶多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商业资本主义’。<sup>225</sup>

同样，特凯（尽管是他首先发现了日本早期的封建性<sup>226</sup>）最近说他感到必须和那些也包括许多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主张用‘亚细亚的’这个词来解释日本历史的学者们站在一起。他之所以得出这新见解，是因为日本现代化所及的范围的局限性已经显而易见。<sup>227</sup>但是，他企图把对日本后来的发展的解释作为基础，倒过来由果溯因地来解释日本的古代结构的做法，是完全走错了路，特别是由于现代和传统特征混合的情况并不仅限于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家 而是在其它许多地方都出现过的情况 例如德国的工业化就是由一个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封建结构之上的正在兴起的政治结构自上而下地推动起来的。如果非要作类比不可 那么 大名和武士的国家封建制度 幕府时代将军的统治 同容克统治下的普鲁士官僚封建制度 要比其它国家相似得多 正如日本明治维新 1886 年 和鼓励工业化 会使人想到差不多同时期的俾斯麦德国经过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取得政治统一后所开始的工业化一样。同法国、英国和美国相比 这两个国家都是工业化的后起者 其工业化的过程都是由国家主持的 而且带有普遍的军事气质——这就足以说明其现代化程度之不完善。<sup>228</sup> 如达伦多夫在他对德国的研究著述中所说的 事实上“与许多人所相信的相反，工业革命并不是现代世界的原动力”<sup>229</sup> 因为它在一项‘为时过晚的、过于急速而又过于全面的’政治推动下出现的时候 甚至无力给予市民社会以足够的力量与国家相抗衡。<sup>229</sup>更重要的是 我们决不能因为这种‘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化’的特殊性 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只有有限现代化的工业化，而看不见问题有关的另一面，

那是我们在这种背景下更加关心的：这两个国家所显示的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能力，是直接溯源于它们的非亚细亚的封建结构。

最后，阿维内里对马克思专门针对以亚细亚方式为基础的国家所提出的一些意见作了任意概括，他坚持说，〔马克思〕“没有根本否定非欧洲社会自主地进行现代化的能力”<sup>230</sup>，并向自己提问说，“他〔马克思〕对于日本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由于当时舆论界对日本关心的程度不如对印度和中国，他的著作中很少提到日本”。他没有把握地回答说，“他一定会充分注意到日本现代化的局限性以及传统的行为准则和技术上对西方标准的高度适应性两者的并存。”<sup>230</sup>这段话本身倒无可非议，但应该说是文不对题。

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日本的生产方式与亚细亚方式很不相同，他已经为既有坚实理论又符合事实的解释奠定了基础。为此，他解释了曾经使日本得以逃脱欧洲控制的一些因素，而不久——即我们前面引文的资料来源《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仅仅一年以后——正是这些因素在明治维新时使日本开始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使它得以成为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sup>231</sup>

## 第十四章 半亚细亚式的俄国社会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把俄国视为半亚细亚国家，从而在他的分析中往往把俄国同真正的亚细亚国家分开。其主要区别在于俄国在政治上形成中央集权的原因，并非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而不得不动用水平很低的生产力来完成基本水利工程体系，而是出于保护定居居民抵御邻近游牧部落不断入侵的缘故。然而，俄国也有一个专制政权，也是以剥削分散的、自给自足的村社为基础的，在这种村社中农业和家庭工业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完全或几乎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则意味着剥削阶级主要是官僚阶层。因此马克思把它定为“半亚细亚”国家是正确的，并不是单纯就其地理意义而言的，而是具有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意义，与我们刚谈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有直接的联系。

我们认为，这个定义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年4月19日刊载的恩格斯撰写的但由马克思署名的一篇文章上第一次出现的。在同年8月5日的另一篇由马克思亲自撰写的文章上又强调这个定义。文章把俄国的“半东方的”性质同中国的“完全东方的”状况作了比较。<sup>282</sup>这两篇文章的日期——那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竭尽全力研究并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那些年——及其背景说明这个词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新闻用语。事实上马克思从此就明确地谈到这个“具有半亚细亚的条件、风俗、传统和机构的国家”。<sup>283</sup>

我们对那些方面加以扼要的说明也许是有用的，特别是因为马克思曾不厌其烦地强调过那些方面。这块从中亚伸展到东欧的欧亚大平原作为俄国历史的舞台已达十个世纪之久。尽管按照惯例乌拉尔山脉是两块大陆的分界线，但欧洲和亚洲之间却没有真正的屏障。然而俄国处于同世界其它国家长期隔绝的状态，社会和经济状况相对落后。按照苏俄作家里昂尼德·里昂涅夫的说法，这片“被亚洲的烈日晒得灼热同时却又被北极的寒风吹得冰冷彻骨”的辽阔的土地，自然资源比其它大部分地区都丰富得多，而且也有大量可通航的河流纵横交错。但冬季严寒而又漫长，当然起了阻碍发展和限制农业生产的作用。莫斯科这块后来成为俄罗斯国家主要核心的孤立的腹地所独具的特点，形成了一条对贸易和文化的障碍，同时有助于那种孤立倾向精神的发展。

从根源上讲，俄国是突出的欧亚型的。东欧斯拉夫人六世纪时定居在这块平原上，瓦兰吉亚斯堪的纳维亚人（斯拉夫人称他们

为罗斯人)九世纪时征服了斯拉夫人。在此以前,游牧的或半游牧的西西安人、萨尔马提亚人、哥特人、匈奴人、阿瓦尔人和哈萨尔人曾袭击和侵占这里达一千年之久。甚至从九世纪起基辅罗斯时代的中央集权和巩固的过程初步形成以后,该国在历史上仍有几百年的期间不断地同大平原上的鞑靼人、土库曼人、突厥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游牧民族发生冲突。确实,在十三世纪和十六世纪期间,俄国的大部分地区还被蒙古人征服过。所有这些接触都在该国的结构和社会精神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蒙古人的统治尤其加强了该国的半亚细亚性质,使它孤立于欧洲其余部分以外。特别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后,典型的东方专制结构和体制传入以后更是如此。<sup>284</sup>

在西方正处于文艺复兴前或文艺复兴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本性变化的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两个多世纪时期中,俄国却变成了首都设在基辅三千英里以东的蒙古平原上的一个东方大帝国的行省。马克思对这个充满历史性后果的事实十分重视,他说:这种孤立“在最初显然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sup>285</sup>

事实上,后来在十五世纪出现的莫斯科公国的专制制度就是在蒙古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莫斯科公国在金帐汗国全盛时期以前和以后都曾反抗过蒙古人,但它实施蒙古人的法律并代他们征收贡赋达两个世纪之久。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生产力下降了,贸易和手工业衰微了,城市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体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莫斯科是在蒙古式奴隶制的恶毒和悲惨的学校中成长和受教育的。它只能通过成为精通奴役艺术的能手而获得力量。”<sup>286</sup>

蒙古帝国是建筑在为国家(它是可汗的代表)无限效劳的原则之上的,可汗的专制统治就是要求这种无条件服从的具体体现。

行使任何一种权力的人都只是由于可汗的恩赐，作为他的代表才能这样做，决不是因为他们本人有什么权利。伊凡大帝（1462—1505年）是莫斯科公国名副其实的第一个大公和俄罗斯国家的组织者。他沿用了蒙古式的、对居民的严格管辖体制和义务兵役制。他是莫斯科大公中第一个对全俄罗斯土地提出领土要求的人。他建立了长子继承的原则，亲自担任军队的统帅，并使教会和国家统一起來（这是欧洲其他国家闻所未闻的）而且这种状况在1917年革命用另一种同样无所不包的、具有相同合法作用的宗教代替了东正教以前，实质上一直保持不变。于是这个君主就成了一个真正的东方专制君王，他独揽了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大权。为了满足中央集权和军事行动的需要，伊凡设立了一种由文武官员组成的新等级，赐给他们土地，这种封地不是永久所有，而是终身占有，而且是有条件的。这种被称为领地制的制度是从蒙古人那里承袭来的，它出现在莫斯科公国的若干世纪之前蒙古人早已普遍推行了。

伊凡四世（1533—1584年）——把他称做“恐怖的伊凡”并不过分——通过对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这些商业城市的征服以及在1565年采用特辖区的措施终于彻底粉碎了特权贵族们的割据局面而完成了统一的使命。他直接统治了占该国一大半的辽阔领土，而且其中包括过去属于特权贵族们的一些最富有的城市、贸易通道和耕地。实际上，这是起始于1556年的整个过程的高潮，1556年他已采取了把特权贵族吸收为领地地主的措施，对特权贵族的地产加以特殊的限制条件，实际上制止他们任意占有土地。在1562年到1572年的期间他进一步缩小这两个等级的差别，使特权贵族几乎不可能用任何理由转让他们自己的土地，甚至连遗赠也不行，并且强制地主为国家服役。被制服的特权贵族和领地地主终于形成一个新的阶级，成为“恐怖的伊凡”的莫斯科公国的



支柱。至于他 这样一个相信自己“不是由人类难以驾驭的意志所决定而是由上帝恩赐给全俄罗斯的沙皇和大公”的绝顶残酷无情的人 并不以行使君权为满足 为了替自己担当的角色寻找理论根据 他说：“君主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加在上帝赐给他的奴隶身上 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批评他。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访问俄国回来的旅行者们会得到这样的印象 俄罗斯是一个专制国家 它那彻头彻尾暴虐的政府竭尽全力地为了沙皇个人利益而效劳，并且为了达此目的不惜采取最赤裸裸的野蛮手段。”<sup>237</sup>

总之 在十六世纪末时国家行政机关的性质已经确定下来 压在俄国臣民身上无比残酷的桎梏使俄国继续保持着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多难之邦’的称号。需要从那永远敌对着的臣民身上榨干每一滴血汗的千钧重担似的专制国家 已经成为一种体制 那种金字塔似的庞大的国家结构把它令人无法忍受的全部或几乎全部重担压在奴隶阶级身上。在农奴必须‘养活’他们的农奴主 而农奴主又必须为国效劳的那种残酷的社会契约控制下，这种状况是天经地义的。

除了对那些积极在军事上作出贡献的贵族以外，不再分封土地了。俄罗斯显然正在变成一个闭关的奴隶国家，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彻底摧毁了个人的积极性。没有任何集团或机构能够对专制权力进行限制。当然，在西欧当时也还没有出现那种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机构。但是，那些国家的君主，尽管也有专制主义的倾向，由于封建时代遗留的影响，如法国的行省和西班牙的市政法规 或某些机构 如英国的众议院等等 而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上述这些影响已经为未来的代议制要求播下了种子。

西欧的那种不同的状况产生于更加高度发展的社会结构，这表现在各个阶级、等级和势力——贵族阶层、教士、自治市镇、自耕

农、中间等级及其他——在数量上足以对最高权力的滥用有所抵制。然而在俄国，即使是拥有成千上万农奴的最有权威的特权贵族，也不过是沙皇的上等奴隶而已。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以及这个制度本身压制了各种敌对势力的产生和发展，使专制君主敢于公开宣称他要象对待奴隶一样地统治和管理所有的臣民。在西方已经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两个世纪期间，俄国的沙皇们还在设法统治和压服社会各个阶级。

彼得大帝 1689—1725 年 大力鼓励西方化 但不足以改变这种状况。确实，他想要改造俄国的企图暴露了典型的专制君主企图进行改革时出现的一切局限性和矛盾。马克思作了正确的评价，说他对中央集权和军事出征的顽强努力，还不能消灭专制主义，结果却是把专制主义推广和扩展到新的行省中去。<sup>288</sup>总之，他企图利用由国家直接控制并由农奴干活的制造业来进行的工业化，并不超出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畴。虽然他本人对当时西方的发展着了迷，但不可能也不会认识到那些进步几乎完全出自于相当程度的自由和个人积极性，而这一点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他连做梦也决不会允许的。如历史学家克留切夫斯基所指出的，这正是彼得大帝“缘木求鱼”的企图徒劳无益的原因所在：

他希望在一个沦为奴隶状态的社会中用他的权势的威力唤起积极性，把欧洲的科学和民众教育引进俄国却又保留农奴主贵族。那就是他希望奴隶一面处于奴隶的地位 而同时又自由和负责地行动。专制主义和自由相矛盾，教育和奴役相矛盾 这就是缘木求鱼徒劳无益的原因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这是自彼得大帝时起两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妄图解决的事。<sup>289</sup>

俄国的工业并不象西方那样，通过对一个已经发展成熟的手工业生产分支的逐步改造而自发和自然地成长起来的。它是沙皇为了自己的威信和军事目的自上而下地推行的。但是，在一个没

有资本、企业家或消费者的国度里，人为引进的工业如果没有人为的助力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上只是由于保护主义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工业才得到了发展。因此，甚至连‘制造商’都养成了一套混和着懦弱和谄媚的奴隶式思想方法。

彼得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还进行了城市的发展工作。通常从原来的‘哥罗迪’——这个斯拉夫词是指大公们为了保护他们的营地而修筑的防御工事——发展起来的俄国城市，并不是在丰富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上自发地或者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而是贵族和专制君主从上面来加以设计和兴建的。

许多西欧城市中，贵族和中间等级的住宅式样并非千篇一律，那里还有狭窄的街道，这和十八世纪后在俄国兴起的冰冷刻板地规划好的聚居点——与其说是真正的城市不如说‘官僚和军事中心’——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总之，俄国的这些城市没有取得西方城市在十一世纪后经过艰苦斗争所取得的处理自己事务的自由。俄国的城市，就象俄国的工厂一样，它的兴起并不是新兴中间等级的自由意志。这样一个等级并不存在，甚至在连庄园都已变成城镇以后，工匠们还继续在大公们的宫殿里干活。这些宫殿是根据专制君主的命令而兴建起来<sup>239</sup>，而专制君主甚至在搞‘现代化’时也得具体地对他的臣民们所表现的任何积极性明确地加以指导。这种‘现代性’必然是有局限性的、含糊的和表面的。<sup>240</sup>关于这个问题，彼得明确地表现出他并不希望通过改革来转变俄国的半亚细亚结构；实际上，他还更加加强了这种结构的一些特点。他采用了让国家官员自动晋爵的办法，为一个新的官僚贵族阶层奠定了基础，这个阶层与专制统治紧密结合，为他的战争和行政改革提供经费，使他能够毫无顾忌地加重对农民阶级原已十分残酷的剥削。

发生的事情丝毫没有改变原来的状况——不论是保罗三世1762年对贵族服公役的豁免也好，还是1861年解放农奴的文件也

好 甚至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 由国家保护而且大多由外国支持的、但仍然主要是寄生性的资本主义 的草创时期 都是如此。

马克思有几段著名的话 对“所谓农奴解放”的目的和结果作了尖锐的批判：

这种解放的目的只不过是消除障碍，从而使专制扩大到极限；这类障碍就是大专制君主迄今所遇到的俄国贵族中以农奴制为依靠的无数小专制君主和自治的农民公社，这种公社的物质基础 即公社所有制 是要被所谓解放消灭的。<sup>241</sup>

……俄国农奴的解放，只能说它使最高政权摆脱了贵族可能对其中央集权活动所起的反作用。它为招募自己的队伍创造了广泛的条件，它破坏了俄国农民的村社所有制，分离了农民，巩固了他们对沙皇爷爷的信仰。它没有清除掉他们的亚细亚的野蛮性，因为文明是要用好些世纪来建立的。任何提高他们道德水平的尝试都被当做罪行受到惩罚。<sup>242</sup>

就事实而论，公社还残存了好几十年。1881年 即“农奴解放”的二十年后，马克思仍然写到：“俄国公社……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sup>243</sup>

民粹派对这个与西方发展的不同点感到欣喜，恩格斯曾对他们所认为的“不是西欧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斗争给旧的经济世界带来新生 不 它的这一新生将来自俄国农民的最深处”的那种妄想进行了驳斥。<sup>244</sup>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与民粹派是完全不同的，从下面一段话里可以看得很清楚：

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 凡是这种社会形态占优势的地方 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

般的俄罗斯国家 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 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条件的必然和合乎逻辑的产物。<sup>245</sup>

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把那种‘原始共产主义’留下来的退化残渣加以理想化，正如他们使用比较一般的措词对专制国家里的‘公社财产’并不赞赏：“在这种条件下 由于各种捐税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种恩惠，而变成了一种桎梏。”<sup>246</sup>

另一方面，我们十分清楚，俄国农民在精神和物质上的贫困，是由于国家和贵族剥削的结果 不是由于公社财产造成的 它实际上还起了缓和的作用。

谢铎·费罗提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 他们宣称 当然是为了地主的利益 公社所有制是造成俄国农民悲惨境况的原因 这同以前有人把西欧农奴制的废除——而不是把农奴丧失自己的土地——说成产生赤贫现象的原因是一模一样的。……造成俄国农民贫困的原因也就是在路易十四等人统治下造成法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即国税和交给大地主的代役税。公社所有制并没有造成贫困 恰恰相反 只有它才减轻了贫困。<sup>247</sup>

这样他们就抨击了两类人。既抨击了那些歌颂“地产是文明的基础”<sup>248</sup>的庸俗的辩护士，而威特福格尔正好象是这一类人的后来者 同时也抨击了所有那些毫无批判地称赞‘国家社会主义’的人，他们即使在当时对于普通的社会主义者也是具有危险的吸引力的：

如果有人肯花点力气用爪哇（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极为盛行）的实例来说明猖獗一时的国家社会主义，那倒是一件好事……从这里可以看到，荷兰人怎样在古代公社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以国家的方式组织生产，……结果是：人民被保持在原始的愚昧状态中，而荷兰的国库却每年得到七千万马克的收入。

……这也附带证明了，那里的原始共产主义，象在印度和俄国一样 今天正在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只要现代共产主义的因素不去震动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并且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成为极其引人注目的（或者应当被克服或者应当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遗迹。<sup>249</sup>

从上面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象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 仅仅认为古代的俄国才是“亚细亚的”而是认为他们当时的俄国也是“亚细亚的”。就俄国的公社而言 马克思承认 它可能发展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 即 俄国爆发革命（不是任何一种革命 而是符合它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革命 这样才不会向国家专制主义妥协）而允许它自由发展：

要挽救俄国公社 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 那么 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sup>250</sup>

否则 俄国无疑将丧失“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的‘最好的机会，”<sup>251</sup>也不得不遭受这些灾难。然而就是这种命运也总比全人类发展的停滞要好一些，恩格斯早在 1875 年时就雄辩地描绘了这种停滞状况，有一段话是同马克思早期关于传统印度村社的论述相呼应的：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完全正确，因为在俄文里，мир 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 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весь мир, 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 <sup>252</sup>

恩格斯在该国所有的‘亚细亚’特点中并没有忽视过分庞大的官僚权力。他特别提到不可胜数的大量官吏，他们形成了一个掠夺俄国社会的独立的新生社会阶级。他正是这样猛烈驳斥了那些否认沙皇专制制度的阶级性的人，从而勾划了这种阶级性：

既然特卡乔夫先生不顾这一切，硬要我们相信，俄罗斯国家“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 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它是“悬在空中”的 那就不禁使我们开始觉得 悬在空中的与其说是俄罗斯国家，倒不如说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sup>253</sup>

恩格斯也非常清楚，在专制国家庇护下发展起来的令人窒息的寄生物把市民社会弄得萎缩不堪的状况：

简言之 没有一个别的国家象俄国这样 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 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压抑和缠绕。<sup>254</sup>

俄国所有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采纳了马克思关于解释俄国的‘半亚细亚’原则。而且 他们并不只是跟着马克思的倡导才这样做的 这也是一场长期辩论的继续 这场关于俄国在发展方面与西方不同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政治行动的辩论，至少自十九世纪上半叶以来就已经在俄国内部进行了。斯拉夫派和西方化派都一致认为这些差别是存在的，两派的分歧是对这些差别如何评价。斯拉夫派持反动的和沙文主义的倾向，把俄国的遗产看成积极的因素，而西方化派则不厌其烦地强调它的害处。民粹派同斯拉夫派一样，至少对俄国的结构和文化的某些特点是给予积极评价的 但在政治上却是从对立的、革命的观点来看待这些特点的 希望把它们作为该国所亟需的一种复兴的基础。承认这种特点到这样一种程度是否合适，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

了分歧，或者是因为它同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概念的严格程式化观点相抵触（虽然马克思曾经明确地告诫过他们，但这种观点已经是普遍持有的了）否则就是因为他们害怕斯拉夫派和民粹派会把这种承认用于意识形态的目的。但是在他们跟着马克思而公开承认这种特点的情况下，他们则同意把它视为一种不利条件。

持后一种观点的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孟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自己曾经历过民粹主义和亲西方主义的阶段。由于他对俄国社会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思想方面的研究都深有造诣，因而具有特殊的影响。甚至连他的老对手列宁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著作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sup>255</sup>而且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革命小组就是在他周围建立起来的。

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在农奴解放以前是“有几分象中国，但并非位于亚洲而是位于欧洲”<sup>256</sup>的一个东方或半东方国家，并强调俄国在结构和文化上的特点可以归之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

地理环境是我们比西欧落后的原因，这种落后状态使我国社会结构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是重要的，尽管不象斯拉夫派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得到了解释。我对我国历史环境的研究，同样也使我看到，它是如何加强了地理上的特点，把俄国从西方那边拉过来，使它更靠近东方。<sup>257</sup>

他在阐述该国历史发展时提到封建制度，但主要是“亚细亚的”解释：

俄国农民受到的奴役就象处于东方的大专制君主统治下的情况完全一样。布拉戈维钦斯基所说的“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或不可能有任何事情象俄国的情况一样”是错误的。农民受到国家支配这种完全类似的情况的事例到处都可以找到，如古代的埃及、迦勒底、中国、波斯、印度，尽管在俄国这种关系显然还没有象在埃及或中国发展得那么彻底。<sup>258</sup>



他特别在分析这个制度的阶级结构时应用了亚细亚的名词：俄国农民的状况逐渐变得同东方的大专制君主统治下的农民的状态差不多。从这个观点来看，俄国越过了许多国家，走得离欧洲越来越远而更靠近亚洲。因为，在一个农业的俄国，社会和政治的整个结构都落到了农民的宽阔的肩膀上，甚至连国家官吏的地位也变得带有突出的亚细亚性质……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时，军人阶层就完全受制于国家，而这种受支配的状态——甚至更胜于农民——使得莫斯科俄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接近于东方专制君主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sup>259</sup>

普列汉诺夫象马克思一样，也认为彼得大帝所做的只不过是主要还是亚细亚式的机体上加添一些新的欧洲式激烈措施罢了。但俄国既然与欧洲相毗连，就不会注定要在“奥勃洛摩夫式”的历史性“长眠中沉睡”——这就是指他所说的亚细亚国家而言的，对于俄国的进步人士来说，这是仿效冈察洛夫著名小说中奥勃洛摩夫的沉睡的村庄的说法，以它作为旧俄罗斯的象征。解放农奴则标志着“莫斯科公国的结束”。<sup>260</sup>

托洛茨基也有类似的论点，他同样认为俄国历史发展首要的和最经常的特点就是“该国发展的低速度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经济落后、社会形态的原始和文化水平的低下”。他象普列汉诺夫一样，也强调地理特点“注定了在这块向东方和亚细亚移民开放的、辽阔和朴素的平原上的居民处于长期落后状态”。彼得大帝同时代的唯心主义者维科归咎于莫斯科人的那种“精神的懒惰”。在托洛茨基看来是“经济发展低速度、阶级关系无定形和精神历史太贫乏的一种反映”。<sup>261</sup>因此，他在关于俄国历史发展过程的长期辩论中所持的见解，远胜于斯拉夫派的所有反动的幻想和民粹派不费力气的空想，他认为俄国特殊论的思想是有根深蒂固的、无可争辩的特点作为基础的。<sup>262</sup>

托洛茨基清楚地辩别出‘半亚细亚’俄国社会和西方之间的区别，尽管他也同样强调它与简单和纯粹的“亚细亚社会”是有区别的：

埃及、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明有充分的自给自足的性质 尽管生产力低 这些国家有充分的时间由自己作主 使它们的社会关系差不多达到与这些国家的工匠们制造本行产品所达到的那种完善的程度。俄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社会上和历史上都介乎欧洲和亚洲之间。它既同欧罗巴西方有区别，也同亚细亚东方有区别 在不同的时期 在不同的方面 有时接近这一边，有时接近另一边。<sup>262</sup>

根据托洛茨基的看法，俄国封建制度的存在虽然被历史学家所长期否认，却已无可辩驳地得到证实。但是在科学上经过了那么许多争论才证实了封建制度存在，这件事本身正说明早产的俄国封建制度并未定形而且文化贫乏。因此（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他强烈地反对那种认为一切历史阶段和发展规律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里都会出现 而落入教条主义俗套的“假马克思主义观点”。同这些单线发展论的解释相对立 他提出了“混合发展”的理论 认为在“一切第二流、第三流或者第十流文化的国家里”不同的阶段并存着，不同的时期重合在一起，古代和现代的形态混合在一起。俄国被视为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这块广阔的空间里 可以找到每一个时代的人类文化 从人们吃生鱼和膜拜木块的北部森林的原始野蛮状态，直到社会主义工作者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是世界政治的参加者的资本主义城市的现代社会关系。<sup>263</sup>

即使有这些特殊的条件（它们赋予往往过于严格而又具有黑格尔派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以灵活性和动力）托洛茨基解释俄国社会历史仍然主要是“半亚细亚的”：

在富裕的欧洲的压力下，俄罗斯国家吞没的人民财富在比例上远远超过了西方 因此它不仅造成了人民的加倍贫困 而且也削弱了占有者阶级的基础。然而俄罗斯国家同时又亟需后者的支持而竭力迫使和严密组织他们发展。其结果是，官僚化的特权阶级永远发展不到顶点，而俄罗斯国家却因此而更加接近于亚细亚的专制主义。<sup>264</sup>

托洛茨基在俄国的‘亚细亚’特征中 十分准确地描绘各个村庄里在村社的基础上建立的地方性的农业和家庭生产相结合以及城市聚居点的寄生性。就这方面来说 俄国这个幅员辽阔、居民稀少的国家 更接近于印度而不是欧洲 正如我们的中世纪城市更接近于亚细亚的而不是欧洲式的城市，而我们的贵族政治则介乎欧洲的独裁主义和亚细亚的专制主义之间，但在许多方面更接近于后者”。<sup>265</sup>

他对于俄国城市的评论，读起来简直就象马克思关于亚洲城市的文章复写本一样，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不象欧洲的工匠和行会的城市（这种城市在城墙内为了争取一切加工行业的集中化而生气勃勃地进行斗争，并常常取得成功）而是象亚洲专制制度的城市那样 俄国的旧城市实际上不起生产的作用 它们是军事和行政中心、战地要塞 或在某些情况下是商业中心 不论它们有什么特殊性 完全是依靠外界供应。它们的居民有由国库供养的官员们、商人们、以及最后还有那些在城墙内寻找一个安全庇护所的地主们。甚至连莫斯科这个最大的俄国古城，也不过是一个依附于沙皇私有土地的大村庄而已……。正因为俄国的工业从未经历过中世纪工匠技术的时代，所以俄国的城市也从来不知道第三等级在工场、行会、公社和自治城市中逐渐成长的状况。<sup>266</sup>

托洛茨基指出了缺乏特定的城市文化这一点，这种城市文化

正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本书将在后面谈到），托洛茨基说：

行会是中世纪文化（它也传播到乡村去）的基础。中世纪的科学、经院哲学、宗教改革都是从行会这块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而我們不曾有过这些东西。当然，萌芽状态的征兆、迹象是可以找到的，但是在西方，这些东西并不是征兆，而是以行会为基础的强大的文化和经济根底。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而且它在这个基础上成长，开始同教会和封建贵族相冲突，并且通过君主政体之手来反对贵族们。这种城市建立了以火器装备常备军的技术条件……。我们的行会城市——即便是多少有点象西方的那种行会城市——在哪里呢？它们同封建贵族的斗争又在哪里呢？……从我们的城市本身的性质来说，我们不曾有过这类斗争，正如我们不曾有过宗教改革一样。……我们的手工业还停留在家庭手工业的阶段——这就是说，还没有同农业相分离。我们的宗教改革还停留在农民教派的阶段，因为它在城市里找不到领导者。原始和落后在这里向苍天呼叫。……<sup>267</sup>

列宁也用“半亚细亚”这个词来解释俄国的历史和环境，并且在不少章节里都谈到过沙皇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显然并不仅仅是对俄国落后状态的一种比喻——这是今天某些人所持的见解<sup>268</sup>——因为他甚至公开批评过把封建术语应用到俄国的做法，认为用这类词来描写中世纪的俄国是很不合适的，<sup>269</sup>并且说他宁愿用“野蛮”〔azyatchina〕这个词，这又使我们回到了“亚细亚”那个解释。根据他的意见，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式、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sup>270</sup>

但是，列宁首先是一位政治活动家，而且是一位最坚强和一心一意的政治活动家。如果他同某个人直接进行辩论时，认识到他

自己关于该国长期体制的分析为政治行动所提供的办法可能同他正在提出的办法不相一致，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改变原来的主张。当谈论过去的情况时 如果不太为难的话 他会回到他曾经批评过的那种封建的解释上去 而谈到现在的情况时 他甚至会说 在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了绝对的优势’。<sup>271</sup>但是在列宁晚期的著作中，我们将会看到，他又回到了实事求是的想法和告诫。只有看到它们是以俄国‘半亚细亚’现实作为其出发点的论据的一部分，才能真正理解它们。

##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的起源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谈到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时，曾经问道，为什么它们似乎都具有在历史上不能发展的特征。西欧是按照《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经典路线的顺序有力地发展的——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兆）与此相对比 他强调指出了亚细亚社会的长期停滞状态 他认为这种‘静止的社会状态’<sup>272</sup>是那种没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发展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直接后果。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尽管他讨厌资本家和殖民者，却指望他们的征服使亚细亚生产方式遭到破坏 从而为摆脱这种巨大的历史绝境提供外力 对整个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 那末 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sup>273</sup>

这段典型的辩证的话 以及它在黑格尔所喜爱的那种“理性的狡诈”方面的持续反响 可以在今天很容易地招致责难 对此 马克思本人过去就常常严厉地予以抨击，我们无需多谈。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更重要的是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持这种态度。马克思并不是他的信徒和对手们有时都描绘的那种庸俗进化论者或致命的经济决定论者。他也不是僵硬地主张单线发展论，指望世界各国都按照同一个抽象的历史发展模式发展。我们一再强调指出过，对于任何从这方面对他的观点进行曲解的人，他总是竭尽全力地予以驳斥。

我们知道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 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是起源于原始公社的可能发展的路线之一，特殊的亚细亚型的公社使它形成一种中间阶段。至少在历史上，即使它不符合马克思所认为的导致人类“全面发展”<sup>274</sup>过程的内在逻辑，但他认为它同古典的和德国型的模式是处于同地位的，那些模式由于分裂和互相作用而产生了封建主义。总之，他并没有——象某些现代的追随者那样——妄想去寻求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什么没有进入奴隶制或封建主义的原因。马克思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只是封建主义而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产生资本主义？

要了解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答案（他虽没有用明确的词句回答这个问题，但答案仍然是清楚的），必须恢复他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概念。我们首先应清除这方面最严重的误解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用辩证法精心装扮起来的陈腐的技术决定论的翻版，马克思并没有说资本主义是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而是把它同一个复杂得多的社会变革的潮流联系在一起，这种潮流早已为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并且使它的发展有可能、有必要和具有社会意义。看来似乎矛盾的马克思著名的论点：“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sup>275</sup>，可能

会造成很大的误解。<sup>276</sup>

马克思只是把资本主义看做“现代化”的结果——这里用“现代化”这个新词，这是他本人快要使用的用语，<sup>277</sup>尽管还不是今天的含义。总之，他的概念新的惊人，而且仔细地反复阅读以后，就会从中不断找到当代最好的社会学著作的征兆。从马克斯·韦伯开始，当代的这些著作分析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取决于某种非经济的体制，占支配地位的是普遍的、具体的、以取得成就为目标的标准以及在一个至少是潜在的开放阶级结构中的高度的社会升迁性。<sup>278</sup>但是，马克思的分析更富于批判性和说服力，因为他没有忘记所谓“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特定生产方式的发展，所以他的分析从来都不会成为一种自我辩解。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著名的话里生动地阐述了从封建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但是，论述它发展原因的著作却是一批不太为人熟知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

我们要设法复原马克思的分析。<sup>279</sup>马克思看到会促进储蓄和投资的新的社会条件的建立，是产生市场经济的基本因素。这些社会条件在封建社会晚期由于私有财产逐渐从教会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而趋于成熟。

正是在私有财产已经有了新的自由和投资来源已经具备的条件下，马克思才来谈论中世纪后期产品需求的增长的。他说，西方早已出现了需求增长时期，但生产根本赶不上需求，因此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需求的重新分配。但是，在中世纪后期，一个逐渐得到解放的独立的社会领域则允许有不同的看法，在那里，赚钱被承认是合法的追求，不受压制性的宗教限制或制度监督的限制。在历史上，这种新建立的经济活动领域——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说法，把它称为“市民社会”，那是自治城市摆脱封建统治束缚而向世俗或

教会的贵族们（伯爵、主教及所有其他人等）进行斗争的一部分。这场在十二世纪发生的从基础上动摇了欧洲的斗争，树立起一种新的社会道德观，它与旧的封建准则以及那套基督教和骑士的戒律不同，允许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润。因此，社会上对于高利贷和商业的障碍和禁律完全瓦解了，而经济活动就有可能在不受道德影响的领域中自主地发展。马克思·韦伯要把它归因于新教道德观的东西，马克思把它归因于几个世纪以前的自治城市运动——本书作者认为这样是更为正确的。<sup>280</sup>

恩格斯本人曾强调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 得出这样一种见解 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 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 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sup>281</sup>

马克思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称：

……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sup>282</sup>

但是 必须指出 在这篇著作中对于‘市民社会’所下的定义是非常广义的：“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sup>283</sup> 同样 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也是沿用了黑格尔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和英国的理论家的用法，用这个词来指那种可以在政治经济学中找到其“骨骼”的“物质的生活关系”。<sup>284</sup> 但是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在更狭义的和更准确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多少象葛兰西的用法。<sup>285</sup> 我们这样做完全是有意意识的，因为我们只有在更准确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才能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的概念。在说明其论点的过程中，马克思强调围绕着共



共同体（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如 *conjuraciones*、*Universitates* 或 *comuniones*）兴起的一种特别是城市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它促使这些共同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统治它们的制度并表达它们自己的、要求新制度的思想体系。<sup>286</sup> 没有这样一种“市民社会”，现代化就不可能开始。马克思令人钦佩地举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葡萄牙为例，说明尽管该国掌握了大量资源，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却中断了。葡萄牙在中世纪末期没有经历过象欧洲各地都已发生的那样的变革。它的城市仍然隶属于封建主和教会，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理性活动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始终没有具备。马克思指出，事实证明，联合殖民地的“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是比新世界所有财富意义更大的因素：

毫无疑问，……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例如，我们可以拿荷兰同葡萄牙进行比较。<sup>287</sup>

同样，英国、荷兰、莱茵区、瑞士和意大利北部这些自治城市运动最强的地方，则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中心，而德国由于它的城市在“三十年战争”以后仍隶属于领主，因此其经济发展至少有一个时期落后了一步，仍处于席卷欧洲的巨大的投资过程的边缘。<sup>288</sup>

总之，马克思把城市看成是在封建社会中孕育资本主义的发源地。那里，在商人和工匠当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摆脱了公社的

基础，从而使劳动同生产的客观条件分离，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但是，它只有在象封建制度那样的、“以对抗为基础的”<sup>289</sup>、非常富有生气的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环境中才可能产生，并且——由于存在着私有财产——通过城乡之间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冲突而发展。

## 第十六章 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 的社会处于长期停滞的状况

关于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为什么长期停滞的原因现在应该比较容易弄明白了。土地私有制即使存在的话也是非常有限的。阶级差别以完全荒谬的方式存在着，而且有时更被种姓制度所进一步歪曲，种姓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要使不平等现象被人所接受。由于不存在私有奴隶制或人身束缚以及训练有素的统治官僚们善于制造假象，剥削的形式就不太严厉，因此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更善于取得生产力相当大的发展。城乡形成一体，没有什么差别。而最重要的是，国家具有无上的权威。

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堵塞了反对力量的增长，特别是在城市环境中。我们知道，马克思实际上并不把亚细亚式的聚居点看成是真正的城市，而只是生产上起不了作用的“帝王的军营”，“经济结构上的赘疣”，“国家元首及其总督拿他们的收入（剩余产品）与劳动交换，作为劳动基金而支出的地方”或者“对外贸易特别有利的地点”。<sup>290</sup>这种地方正如前一章所述的，甚至不可能为“市民社会”或为不受统治制度影响而独立存在的城市文化提供基础。马克思主义对于亚细亚城市的阐述，使人想到在形成这些城市的专制权力下过着寄生生活的扈从。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在特定时期有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些

因素，即使会找到几个，但决不能发挥作用，有时甚至会把事情弄得更糟。马克思在下述有关商业和高利贷的事例里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商业资本作为独立的经济形态和作为商业城市及商业民族基础，曾经存在于而且仍然存在于处于极其悬殊的经济发展阶段上面的各个民族之间 并且在商业城市本身以内 例如在古代亚洲的、希腊的和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里面 生产仍然可以在行会等等形态下继续存在下去。<sup>291</sup>

作为商业资本的货币——象它在极其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极其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上所表现的那样——不过是在它所不能支配的两极和并非它所创造的前提之间的媒介运动而已。……古代的商业民族，正象在世界空隙里面的伊壁鸠鲁之神，或者倒不如说，正象在波兰社会毛孔里面的犹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商业支配工业；在现代社会，恰好相反。活动于各个公社之间的商业，自然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对这些社会发生作用。它一步一步地使生产依从交换价值 它一步一步地把直接的使用价值推到幕后 因为它使生活依靠出卖多于依靠产品底直接利用。瓦解旧有的社会关系。因而促进货币流通。它最初只触及生产底剩余；以后逐渐把握到生产本身。但这种瓦解的作用大部分依存于它从中进行活动的那些从事生产的公社底性质。例如，商业并没有怎样动摇古代的印度公社和一般亚细亚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商业支配生产自身、商人成为生产者或生产者成为单纯商人的地方 才能形成资本。中世纪的行会制度、种姓制度等等 情形恰好相反。<sup>292</sup>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 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些所有制形式 而政治制度

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的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的。在亚洲的各种形式下，高利贷能够长期延续，这除了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以外，没有造成别的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sup>293</sup>

因此，无论如何并不需要假设一种证明不了的亚细亚社会的“原始状态”——如本书已经引用的那些法国作者所做的那样——以便为它的停滞和自主发展的相对能力提供马克思主义的说明。人们甚至可以比马克思走得更远，在亚细亚社会中找到相当发展的阶级结构而并不影响对这个形态的有效说明。可以承认——正如最近历史方面的发现所指出的——除了国家官吏和农民以外，还有有地的业主，在中央权力衰弱的时候非法占有了土地，而且有时还有巨富的银行家和商人，但承认这些与我们已阐述的形态并无根本矛盾。<sup>294</sup>这个形态中所包含的亚细亚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就在于：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国家权力的统治下，即使是这些阶级也从未在任何期间获得象西方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时所获得的那种程度的社会、政治权力或思想、文化自由。正如葛兰西所说的：“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是一批尚未成熟的混乱的群众。在西方，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有一个适当的平衡，透过国家模糊的轮廓，就立即可以看出市民社会粗壮的结构。”<sup>295</sup>

总之，在亚洲，国家是高于一切的，它完全控制了政治和经济生活，从而阻止了“市民社会”这样一个自主领域的出现。占统治地位的方式也把任何可能含有变革种子的“异常的”次要团体同化了。<sup>296</sup>用现代的语汇来说，有庞大的国家存在，使这个制度象一架自动调节的数控机一样稳定，在这个制度中，它的适应性和整体化的职能——这种职能来自极为辽阔的领土和分散的小村社，并由其对于水利的控制而得到加强——客观上转化为维护现秩序或

生存方式的职能。

因此 这个制度不但没有依靠自身的力量独立地发展 却倾向于靠一系列除了外表以外没有什么变化的形体来永远保持现秩序和应付它的危机。<sup>297</sup> 这种过程说明了为什么“政治风暴”频繁而又从未触动这个制度的根基，也产生不了任何变革的因素：

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的灾难，不管它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纪最初十年 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 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sup>298</sup>

显然 马克思决不是不知道亚细亚历史的复杂性 实际上他还强调了它的动乱的政治兴衰。因此，把他关于亚洲是静止的观点归结为普利布兰克批评威特福格尔时所说的那种对真实情况的误解 是错误的 那样的情况只会产生‘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 那时候除了古代聪明的国王之类的传说以外，对历史没有什么了解，而且唯一可靠的材料是传教士的记述和旅行家的故事’。<sup>299</sup> 事实上 马克思并没有否认亚细亚社会有变化 甚至有巨大的变化 他只是认为这些变化丝毫没有改变它的经济基础，从未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sup>300</sup> 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很难反驳的 即便从最新的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 也是如此。<sup>301</sup>

虽然对亚细亚历史的每一种传统提法本身——进化的、停滞的和循环的——对另两种提法来说，都是很不合适和很不令人满意的替代 只有一个办法能够使每一种提法恢复它的有效性 那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发展是有的 但只是生产力的发展 因为占优势的生产关系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解决出现的任何矛盾，推迟‘社会革命时期’的到来。这一点自然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按

今天的标准来看，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都是微不足道的——凯恩斯说，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四千年中的发展速度决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到一百，<sup>302</sup>而资本主义却在几十年内就达到了这个发展速度。因此，制度的结构保持不变而且甚至意识形态和体制结构也没有变化，有时甚至可以长达几千年之久，如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以及象中国那样。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才能称之为停滞。但这个制度的周期性更新、对国家管理不当的反抗、军阀主义的爆发、税源枯竭以及其它使它走向危机点的种种不利因素，使亚细亚社会的进程几乎是一种起伏波动的发展，并可以称之为循环式的发展。

## 第十七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亚细亚’社会的最典型例子

这一课题之所以值得探讨，完全不是因为它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据有关联。本章是联系中国历史来进行这一探讨的。许多世纪以来中国最恰当地体现了马克思所阐述的那种‘亚细亚’社会，即使他由于作为学者和革命者工作的原因而把历史上英帝国主义的对象印度作为他进行分析的主要来源。可以把中国称之为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中最典型和最重要的例子，因为在一切以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中，中国的社会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此外，中国是在不和外部世界进行任何联系、甚至在不具有象印度和中东至少在古希腊时代所经历过的那种同西方进行重要定期联系的情况下达到这一点的。

中央王国所处的环境，正是最有助于建立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典型亚细亚社会的那样一种环境。诚然，中国文明尽管具有相当大的扩张能力，但却总是限制在那个辽阔的领土之内。迥然不

同于中亚的大平原或更南边的丛林地带，河流遍布全境，居民比比皆是，由于在那种环境下进行了对生命攸关的巨大水利工程建设而使那里的土地肥沃和“适于居住”。周围领土明显不同的自然和气候特点，事实上对那个精耕细作的灌溉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农业的渗透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中央王国的逐步扩展奠定了基础。<sup>303</sup> 两个世界之间的北部边界——长城，正好沿着每年十二英寸雨量线，这不是偶然的，它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自然环境的一条天然分界线。<sup>304</sup>

中国文明的摇篮和发源地，当然是在黄河流域。如果加以适当灌溉，这块幅员辽阔的冲积地区就自然地富饶起来，而且具有发展内地交通的良好潜力。因此，控制诸大河流的流水并致力于种植谷类和从事其他耕种的农业居民就可以稠密地定居在这块土地上。这一地区要比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或恒河流域大得多，富饶得多，尤其是更加有利于灌溉网之不断发展。中国的周围不是沙漠而是荒芜地区。这些地区尽管多山，但是能够用以发展经济和进行大规模垦殖，如果通过大量劳工有计划地协调努力实行排水和灌溉计划来加以改进的话。另一方面，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不那么好，直到社会和经济组织到达更先进程度的较后时代才加以开垦。

正是古代贤明国王的传奇证实千年古国中国文明的“亚细亚”性质。禹帝这位伟大的设计师是那些古代贤王中的最后一个，也是传奇式夏代的创建者，当时他已经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典型农耕英雄。夏代是中国社会的形成时期（根据传统的说法，禹帝在位的时期是公元前 2205 至 1766 年〔应为公元前 2205 至 2148 年——中译者注〕）据说禹帝由于他的巨大水利工程而拯救了国家，使之避免洪水威胁，使沼泽变为良田，为健全的农业奠定基础。禹帝创建的王朝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和他以后的王朝一

样，直到后来因实行暴政而腐化堕落，遭到善良的农民和小贵族领导起义而丧失“天命”，该王朝乃告结束。<sup>305</sup>

无论如何，历史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两千年的殷商朝代，亚细亚专制主义就在形成之中。在河南省（原书误为“湖南”——译注）北部的一座城市，即殷商王朝的京都，考古发现表明，在村社之上已经存在一个“更高权力”，它接受定期的贡赋，具有典型的“亚细亚”特点。但是直到中国古代后期的周朝（公元前 1122 至 221 年）统治之后，这一制度才获得充分发展。原始的贵族统治转变为财务官僚统治，发展了一种机能性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下，完全建立在对群众实行无条件统治基础之上的，绝不是平均主义的那种社会秩序，就成了一种犹如自然法则那样的几乎天经地义的制度。秦始皇帝及其王朝（公元前 221 至 207 年）通过一些重大改革而完成了中央集权的过程，把贵族们重新置于控制之下，并着手建造长城，但不久秦始皇帝就被大规模农民起义所推翻。继任的汉朝（公元前 206 至公元 200 年）实行国家控制土地与奴隶，从而巩固了制度。

毋庸置疑，在中国，以及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的美洲各王国，亚细亚方式的早期阶段带来了超过以往的生活条件的巨大进步。人类从单单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经济中解放出来，进而把大自然置于人类控制之下。新的农业耕作方式的采用，以及包括天文、数学、文学、医学、建筑、商业、造币和法律等各种不同领域的许许多多的发现和发明创造，还有形形色色宗教和哲学的出现，这一切都最终证明上述的巨大进步。

但是在那个有生气的富有创造性的最初阶段之后，实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结果却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达两千年之久。这不是说那个时期在那里没有发生各种形式的社会变革，因为中国存在着动乱不定的王朝更迭、反叛、入侵、分裂和统一，乃至出现真正的



社会冲突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马克思称之为“浮在空中的”政治领域中发生的 对那个社会的实际权力基础从未有多大损害 也从未推翻欧洲人所谓的官僚阶级、大小官吏 并把他们从据有的权力地位、社会特权和对文化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垄断控制位置上赶走。如同使他们定型的生产方式一样，从中国第一次统一到十九世纪的数千年历史中，阶级关系大体上仍然保持不变。

因此，除了已经按原来面貌加以慎重地分析的那些表面性的动荡事件以外 那个制度的基本特点实际上仍然保持不变 以致使中国和西方历史学家们把它称为“循环的”历史而不是“演变的”历史。<sup>306</sup>这种生硬的论断的确把局势说得太过于简单化了。但事实仍然是 直到上一世纪为止 亚细亚社会的典型结构还多少原封未动地保持着 其基础是孤立的、从事自给自足生产的村社 在其顶峰是一种专制权力 它一面剥削村社 同时又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程度的效率发挥水利管理的重要职、。从理论上说，所有土地，或者说无论如何大部分土地 属于国家 而实际上国家的官僚们是受益者而且构成了真正的剥削阶级。

实际上 中国社会“与其说是稳定的 不如说是静止的”。<sup>307</sup>但是那些间发性的“革命”既是那个制度有力量的一面 同时实际上又有强烈的保守影响。万变不离其宗。甚至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起义 可以用马克思的这段话来加以描述：“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sup>308</sup>

产生这些革命的特殊力量是值得加以说明的。农民村社是孤立的、分散的 而且是比较相似的 没有什么内部分工。它们需要一名负责它们的“总管家”在一段长时间内能够大规模地计划、指导并协调它们的活动。但是满足它们需要的上级机构的成员，往往总是占有大部分剩余产品的剥削阶级。它远远不是田园诗式的关

系，而且，如果那个阶级证明不太贪婪，并且真正能够维持灌溉体系和组织农民劳动并使农民无论如何能感到可以从那些活动中多少获得一些好处，只有在那种情况下，农民才堪可忍受。不然的话，农民自然就开始表示不大愿意自发地纳贡或服劳役，于是，剥削阶级就必定诉诸暴力来勒索农民，从而使均势遭到破坏：必须通过高压手段来榨取劳力，水利被忽视或废弃，农业遭到彻底破坏，社会体制内部的紧张关系变得日益深刻和尖锐化，终于爆发公开的反叛。

简言之，朝代和统治集团的不断更迭，因此可以认为是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表明它需要定期地加以更新。专制剥削往往耗尽税收的基础，当这种剥削堕落为初期封建制和忽略公共工程、从而造成歉收和饥馑时，尤其如此。于是，统治王朝就在不可避免的造反冲击下倒台，然而，要一个中央政权来管理灌溉系统这一基本需要，却把一切“革命”都变成了单纯的改朝换代。新王朝由于实行改革和恢复水利系统的工作而形成了复兴的重要资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王朝也必将重蹈它前任的复辙。

长年的兴衰曲折，赋予中国历史以某种波浪式活动的结果。当中央权力最薄弱时（通常是在王朝初起和末了），可以看到土地被高级官员所掠夺，出现了一个半封建无政府状态的时期。当中央权力比较牢固地确立而且重占上风时，它就恢复对土地的控制，重新制服了贵族。国家由于深信单靠自己就可以实现巨大的灌溉职能，因此它最后总是战胜了各种“封建”暴动，即使不太牢固。<sup>309</sup>在亚细亚环境中，“革命”只是徒有其名，或从这个词的确切词源来说，它当然既包含更新又包括复旧的含意。<sup>310</sup>但它们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那些革命并不是起因于生产资源和经营制度之间不可解决的矛盾，那只有转为另一种生产方式而由另一个社会阶级来领导，才能加以克服。<sup>311</sup>

商业资本主义蒙受这些初期形式的‘封建主义’所遇到的同样

命运；经过一段相当兴旺时期之后，比如说在蒙古人的元朝（1280—1368年）特别是在明朝（1368—1644年）的统治下，商业资本主义的道路受到专制国家过度增长的（虽然是以有益的方式）权力的阻挡。在商业资本中，毕竟有一个基本矛盾：商业资本虽然可以促进商品生产，但往往寄生于现有经济的毛孔之中。要成为真正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的出发点，商业资本必须能够渗透进工业，使工业在这一过程中从属于商业资本。但是在中国，如同在其他“亚细亚”国家一样，却由于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村落生产可以达到自给自足而排除了上述发展。因此，中国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就局限于主要供特权阶级使用的消费品，顺便提一下，大部分这些产品是国营工厂生产的。

因此生活的严酷事实注定中国的“资产阶级”要继续作为他们无法超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小小寄生虫而存在下去。就个人来讲可能对他们有利可图，但他们仍然是寄生虫。由任何极少数人经营的企业，在当时流行的社会风气下得不到什么鼓励，那时的风气充满了官僚意识形态的特点，这种意识形态和它狭隘的合法主义、形式主义和传统主义，被奉为社会的道德准则的地位。根据当时社会风气的好恶而使人们在不同时期或者因中央权力的削弱而以任何形式取得土地权，或者进入公职部门当官。那些光彩的职业在理论上说是向一切来者开放的，但实际上只限于富家子女，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得到合适的准备来参加文官考试。这是社会、文化、经济上再吸收边缘阶层的主要方式中的另一种途径。

本书不可能对中国历史即使作极为简要的概述，因此我们只提出某些可以认为是最能有力地说明我们论据的事件。

一个看来特别重要的事件是王莽的革命，那是许多世纪中发生的一系列亚细亚生产方式“革命”中的一个典型。所有这些革命，不管愿意与否，结果都使那些因离心和多中心倾向而垮台的制

度复辟，这些倾向往往是马克思称之为“坏政府”的软弱的王朝所无法克服的饥荒、洪水或其他自然灾害所造成的。

公元一世纪第九年，宰相王莽在一次宫廷政变中夺取了王位，颁布了一系列改革。他重申所有土地均为国王财产的原则，禁止土地私人买卖，恢复把土地分给村民的古代公有经济，国家对经济进行严格控制，对商人和钱庄规定了明确的经济权限，废除私人奴隶制，但保存国家奴隶制。

在最近的政治讨论中，许多人将这些解释为社会主义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徒具外表，远远不是进步的措施。对初期的封建所有制或奴隶私有制的独裁限制，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鼓励产生一个把个人的自由发展视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社会，而只是为了充实金库和重建已经受到削弱的官僚统治霸权。无论如何，即使群众最初赞同过这些措施，但是，根据事态发展，王莽仅仅在位十四年就被赤眉军的一场伟大的农民起义所推翻——如果这是事实的话，看来群众远远不是满意的。

王莽下台后，汉朝复辟了。汉朝表示对商人阶级持比较宽和的态度。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古代第二个阶段主要特征之一的官僚与贵族新富之间的共生现象。但是农民经济不能支撑那种双重寄生阶级的重压，在经过一场由黄巾率领的甚至更加凶猛的农民造反之后，公元 184 年汉朝也遭到覆灭。

下一个时期往往被误称为中国的中世纪。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残酷的王朝斗争导致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北朝受到大平原游牧部族的入侵。直到公元六世纪后半叶，隋朝（公元 581—618 年）才设法重新统一了中国，但它也被不满的贵族和农民所推翻。隋朝之后是唐朝（公元 618—907 年）由于经常出现不满而造成的纷争和叛乱也使得唐朝动荡不安。后来导致长达半个世纪的真正的封建无政府状态（公元 906—960 年）唐朝的统治终于以宋朝（公

元 960—1279 年 的建立而告结束 这标志着‘近代’中国的开端。

正是在这个时期 中央官僚统治的政权得到了加强 皇帝的特权得以确立。宰相王安石变法革新明确指出了方向：分配土地给农民；实行强制劳役负担的标准化；加强国家对商业的控制；改革科举考试制度。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恢复和加强亚细亚制度，以对付由于土地私有制和封建势力的发展而造成的割据威胁。

甚至连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也颠覆不了现有制度，这次征服以成吉思汗于 1215 年攻下北京开始，最终吞并宋朝（1276—1279 年）而告完成。蒙古人的元朝（1280—1368 年）设法鼓励商业，确实也作了一些开端。但是，在当时技术上最先进和政治上最有组织的国家里，只有蒙古统治下的和平还不足以容许市民资产阶级发展起来，这个阶级在仍然分裂成数以百计的封建小王国的欧洲正在蓬勃发展。的确，中国当时的城市不论在面积和人口的集聚程度上都要高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但是由于蒙古人的统治而得到加强的传统中央官僚集权和专制统治对商人阶层压力重大，使商人无法独立自理并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在另一方面，蒙古人试图改变现行制度，但采取为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后退方式。蒙古人设法以畜牧经济代替水利灌溉的集约农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毫不犹豫地对被征服的各族人民进行大规模屠杀。蒙古王朝为一场庞大的农民造反、即红巾之乱所推翻，是不足为奇的。红巾早在这个绰号被创造之前很久就具有真正的“民族”特性。值得指出的是，蒙古人是中国历史上被撵走而不是被同化的唯一民族。

继蒙古统治之后是明朝（1368—1644 年）。明朝是中国达官贵人社会的顶点。明朝缔造者朱元璋吸收王安石变法的思想，他的伟业正确地被称为“复古”。但是光是复古已不够了，因为正是在明朝统治下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危机，例如表现为它跟不上同时

代欧洲的发展。明朝解决它所有问题的办法是闭关自守、与世隔绝和加强官僚机器，力图建立一个由无上权威的政府所控制、以普遍的正统影响为前所未有的条件，在文化上和种族上更为严密、统一的强大国家。当然，同当时的欧洲相比，明帝国看上去确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结构，它能够供养广大的人口，保持惊人的长久的秩序与和平。

然而这种稳定本身也是一种深刻而危险的停滞局面，最终表明它不愿意面对某些问题——而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象欧洲那样的‘现代国家’（那种国家当时正在开始从分裂的和战火纷争的欧洲苦难历史中兴起），那就必须解决那些问题。中国拥有许多世纪之久的统一局面和悠久的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构，这是它优于欧洲之处，但中国缺乏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所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这一经济基础是可以建立的，其条件是：至少使那些在传统体制以及与“亚细亚”农村格局有关联的官僚权力影响下加强起来的压力有所减少。在明朝统治下，多次试图改进赋税制度，补充新的官员，经营国家垄断的事业以及操纵政府的其他传统工具，使它们适应新的条件——但是丝毫没有作出改变国家性质的尝试。诚然，明朝国家是一个空前强大的堡垒，它能抵制比任何欧洲国家所能承受的强大得多的内部压力，而这证明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严重障碍。<sup>512</sup>

明朝也被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农民造反所推翻。继明朝的是满人的清朝（1644—1911年）它本是应封建贵族之召前来镇压由他们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广泛农民造反的。这一新的外来王朝避免了蒙古人的错误，而是在中国实行了亚细亚制度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定期大更新。但是这种行动已适应不了时代，已无法拯救国家了，尽管满清国家在早期至少证明要强于明朝。满清王朝的始末是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的一个概括说明。清

朝以降低税收并把土地重新分配给村民作为开端，但却以日益腐朽的官僚统治、少数逃税的特权分子积累巨富、贫困农民受尽敲诈勒索、以及在洋人面前完全无能为力的中国而告终。

即使如此，如果没有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矛头针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分裂活动和帝国主义严重打击而使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遭到破坏的话，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还有可能再继续存在许多世纪——那就是说，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设想和条件不会发生任何变化。1911年民国宣告成立，这标志了多少世纪以来古老的中央王国的结束，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终止。

但是本世纪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中国革命，在许多方面适应了亚细亚制度定期更新的古老格局，虽然地理和环境的影响使得部分由于帝国主义干预而达到的高水平生产力略有减弱。中国新建的宏伟水利工程克服了干旱和洪水，这要归功于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强大的中央权力收拾了帝国主义造成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半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局面罪恶地放弃了抗洪和灌溉，造成中国极其深重的灾难。<sup>313</sup>与此同时在金字塔底部，强大的中央权力发起建立农业公社，那就是新型的古老村社，建立新的生产力水平和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它还把权力赋予新的干部阶层，唯一反对这一干部阶层的是最近那场短命的文化革命。

撇开毛泽东主张的前景不谈，看来中国不大可能最终能打破“亚细亚”制度的局限而达到那种现代型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建立在承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基础上。<sup>314</sup>中国在理论上选择这一着，它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它的社会革命的口号。最后作为结尾（我们不希望引起争论）我们要说目前对毛的思想的强调以及对最高政治领袖的极端崇拜在许多方面来说是“东方”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偏离。

## 第十八章 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

因此 马克思不得不得出结论说 在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内部，没有自力发展的可能性。就象古典社会缺乏“创造能力”而不得不等待外部“野蛮活力”的推动一样 因此亚细亚社会也需要接受欧洲殖民主义的刺激。

马克思对此说得十分明白。只有英国殖民主义设法结束亚细亚社会这一长期停滞的状态。亚细亚社会有两大突出特征，一是该社会基础接近完全的稳定，在那里，各种村社好象是通过自然法则以不断变化的形式自行再生产；一是在它的政治领域的最上层定期地爆发出更新，这也最终有助于该制度长久存在：

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sup>815</sup>

英国在这方面获得成功 因为它有“伟大的文明”或者用不那么种族优越感的措词来说，因为它具有不同的、更为发达的生产方式，而以前对印度的所有征服者都失败了。英国激烈的破坏性使命是“全部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是建立在资本的万能统治上面的”，<sup>816</sup>这一使命并不仅仅只有消极作用，它也正“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具有独一无二抵抗能力的亚细亚制度，<sup>817</sup>本来大概还可以生存下去：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 即消灭旧的亚细亚式的社会 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 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 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



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 摧毁了本地的工业 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他们的建设性的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不过，这种建设性的工作总算已经开始做了。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统治下更加牢固和占地更广的政治统一，是使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英国人用宝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被电报巩固起来，永远地存在下去。不列颠的教练班长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 *sine qua non*〔必需条件〕。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虽然十分可恶，但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著居民中间，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蒸气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 把印度的主要海港同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起来 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 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sup>318</sup>

马克思在预测这些事态发展时，被过分的乐观主义情绪弄糊涂了，他不是没有种族优越感的。马克思本人在其晚年遇到了资本主义在殖民地所显示出来的巨大破坏力造成的大灾难，在殖民地“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

我们面前 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 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sup>319</sup>为此，马克思被迫对他的判断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比如说，在 1881 年，马克思一反他先前在这个问题上所阐明的态度，毫不犹豫地“把消灭印度的土地公共所有制叫做‘英国的野蛮行为’”；“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 而是使他们后退”。<sup>320</sup>

马克思毕竟从来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过黄金时代的人的意见”<sup>321</sup>，同样地，他也从未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加以理想化。诚然 他曾断言“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 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 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 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sup>322</sup>他指出“象东印度居民的所有的贫苦阶级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贸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sup>323</sup>他列举 由于英国人“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 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 [听之任之]原则——来发展的农业便衰落下来了”。<sup>324</sup>英国人的残酷剥削造成并扩大了匮乏 权利的被剥夺 饥饿和疾病。<sup>325</sup>

但是 尽管马克思觉察出这一切 由于英国破坏了亚细亚制度的基础 结果 就在亚洲造成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sup>326</sup>。“不列颠人已经把农村公社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情性打破” 必然也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sup>327</sup>也打开未来进步的道路，“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这一进步的果实。<sup>328</sup>这一点对马克思来说毕竟是十分清楚的，即人们对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期望不应比实际发展的物质前提条件更多：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sup>329</sup>

正如马克思所十分清楚阐述过的，实际情况仍然是：印度在英国殖民主义的影响下，正打破东方停滞的千年循环，而且身不由己地被迫进入西方历史发展的两重进程：

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sup>330</sup>

中国的情况也大体相似。马克思谴责鸦片战争背后的贪婪无厌，但是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资本主义渗透打开中国大门的“进步”性：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sup>331</sup>

鸦片打开了向资本主义通商的大门，而资本主义商业就象通常发生的那样造成了其他种种结果：

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痛苦，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sup>332</sup>

因此，鸦片就自相矛盾地逐步把中国从它的亚细亚长眠中唤醒：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sup>333</sup>

同样，恩格斯也毫不犹豫地，将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美国牺牲墨西哥而扩展版图，<sup>334</sup>以及俄国征服中亚，<sup>335</sup>都欢呼为“文明进步的一项重要和幸运的事件”。<sup>336</sup>

这种态度经常为人们所误解。有人甚至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抱有隐蔽的种族优越感，指责他们对欧洲殖民扩张持有一种不加批判的赞赏的观点。另外一些人，甚至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认为（至少最初是这样）他们未能认识到民族解放运动的进步性。<sup>337</sup>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无疑是有些文化上的种族优越感的色彩，比如他们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普罗米修斯似的”关系，而且经常强调个人的观念，但是事实上他们是特意从全球性的战略看问题，因此肯定不能说什么狭窄的种族优越感。因此，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些误解，还需要对他们思维的逻辑性加以澄清。

马克思由于借用了黑格尔的概念结构，才有可能区分历史事件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尤其是“适当”“树立”“理性的狡诈”的概念，使他能够从遭受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苦难的人们的观点去谴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时又从客观的历史运动这一观点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是重要的进步力量。这种善于同时抓住一个历史事件中两个并存而又矛盾的因素，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不管人们是否同意，它绝不会停留在单单一味谴责“资产阶级文明的极大野蛮性”上，这一点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相反 它超越了整个“人类史前历史”所充满的“可怕的兴衰变迁”，资产阶级社会以及所有的其他阶级社会，而是抓住了历史本身所产生、培育和发展到巨大规模的那些力量，即“历史的不自觉作用”。这样 马克思就赋予黑格尔的另一个概念“历史的嘲弄”以新的生命。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际上是建立在全盘接受矛盾这个基础上的 至少在人类史前历史（所谓 *Entstehungsgeschichte*）这一阶段内。在人类史前历史中，向成熟方向的发展同时就是阶级划分的现实。只有那一进程结束 阶级的消灭标志人类真正“历史”开始时 矛盾才不再存在。

马克思从写《贫困的哲学》一文起 就曾抨击任何非辩证的思想 和试图绕开矛盾而不是解决矛盾的乌托邦式的思想。他喜爱的“萨利姆”是蒲鲁东。蒲鲁东对辩证法的看法具有道义上的讽刺性：

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 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 他行了许多善 但是也作了许多恶。蒲鲁东先生认为 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作的是 保存好的方面 消除坏的方面。奴隶制是同其他任何经济范畴一样的一个经济范畴。因此，它也有两个方面。我们抛开奴隶制的坏的方面不谈，且来看看它的好的一面。

自然 这里谈的只是直接奴隶制 即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隶制。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 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 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 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可见 奴隶制

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制的国家。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列入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中。现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国内把奴隶制掩饰一下，而在新大陆却赤裸裸地公开推行奴隶制。

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任务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黑格尔没有需要提出任务。他只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作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的长处和短处。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任务并且保留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任务的权利，那末，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用辩证法引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激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sup>335</sup>

根据上述理论方面的考虑，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如何一方面对促使英国征服印度并用大炮迫使中国接受鸦片的“最卑鄙的利益”给以丑恶的名称，指出它强制推行这些利益的“愚蠢方式”，以及在殖民地赤裸裸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文明固有的野蛮性”，同时，还把对印度的征服和迫使中国开放，视为对世界历史产生必要的、进步的和有效的最重大的革命影响。

同时 马克思总是强调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作用“，毫无顾忌地 强迫人类去为生产而进行生产”这一社会-经济形态构成“ 暂时的 历史的 必然性”由于生产力取得喧嚷一时的胜利和建立了真正的世界市场 才能够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sup>389</sup>。

从那个意义上、以及从那个含义上来说 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对资产阶级“ 最终的革命作用”唱一首真正的赞歌：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 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 到处创业 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 这些工业所加工的 已

经不是本地的原料 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 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 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 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 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 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 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840</sup>

但是即使如此，一首赞歌的结尾也不能没有颤音 表明资产阶级通过这些行动如何为它本身的灭亡创造了条件：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但是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 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 即无产者。<sup>841</sup>他在评论殖民主义的影响时，也使用同样的讽刺性语言：但是 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 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



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sup>342</sup>

特别是，他中肯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影响正在中国孕育一场革命：

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sup>343</sup>

并非如有些人仍然难以理解地指责的那样，马克思远远不是在思想上僵化成狭隘的民族优越感，<sup>344</sup>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新时代的主要问题，将是在资本主义宗主国内工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同非欧洲民族分散的、但历史上已有先兆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之间建立联系。正如恩格斯在谈到中国的抗英斗争时所说，那是真正的人民战争：

最好承认这是 *pro aris et focis*〔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 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虽然你可以说 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sup>345</sup>

同样，恩格斯富有同情心地强调阿卜杜勒·卡德尔的大胆无畏和阿尔及利亚民族感情的产生，谴责法国殖民军队的残暴<sup>346</sup> 同样对 1879 年祖鲁人反抗英国和 1881—1884 年马赫迪领导的苏丹人民反英解放战争表示同情。<sup>347</sup> 很清楚，他们承认现代生产方式扩展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他们对于那些浪漫主义反应所吹捧的民粹主义价值观表示了应有的不信任，但这些并无碍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了解运动的重要意义。这些运动除了具有仍然不符合时代要求的目标以外，标志了过去属于历史对象的各民族新觉醒的开端。马克思甚至指出 在‘野蛮人’同‘所谓的文明’即资本主义的斗争

中 正义经常是在“野蛮人”一边：

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使合法贸易受到损失……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将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我们不想详细讲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 关于这一点 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可不是吗 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 奴隶贸易是仁慈的 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 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 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 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 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哥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哥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如果在十八世纪时期 东印度公司与天朝之间的斗争 同外国商人与中国海关之间的一般争执具有相同的性质 那末从十九世纪初叶起 这个斗争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 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 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和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在这场决斗中 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sup>348</sup>

爱尔兰问题给了马克思一个机会来更加明确地触及先进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殖民统治的领地居民之间的关系：

英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绝对的利益，是要它断绝现在同爱尔

兰的关系 完全不顾所谓替爱尔兰主持公道的各种‘国际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词句 因为替爱尔兰主持公道这一点在国际委员会里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的极深刻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 那就毫无办法……因此 爱尔兰问题才对整个社会运动有这样重大的意义。<sup>349</sup>

上述看法是合乎逻辑的，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相一致的 这一看法同 1848 年在欧洲的激昂经历 即‘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sup>350</sup>所产生的结论，是直接有关的。这一结论后来在极其不同的情况下——从意大利社会党反对对利比亚的征服战到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苏联占领军——成为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一个口号。

## 第十九章 印度与中国 的不同发展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马克思尽管对于反殖民主义和国际主义怀有深厚的情感，但他还是认为欧洲征服亚洲从历史眼光来看是进步的。这一结论出自对人类发展的特定看法，这将作为不同于任何形式的乌托邦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载入史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赞赏在亚细亚和半亚细亚式“农村公社”中发现的孕育着人类团结的价值观，但不同于民粹派和其他浪漫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公社所代表的社会状况从未加以理想化。他们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是某种迥然不同的东西，而且，想把历史进程停留在某一特定的原始主义阶段上，那是找不到社会主义的，如果将历史车轮往后拉，那就更加找不到了，哪怕这样做有人认为是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前进，这正是因为那些同样落后的条件所产生的矛盾破坏了所谓田园诗

般的状况，而且使这种状况被阶级社会的严酷现实所改造或归属于这种社会。恩格斯在猛烈抨击民粹派时，对此作了公正的阐述：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

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况。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况，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况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 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 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sup>351</sup>

这并不是说 马克思认为一旦印度、中国和俄国的持续停滞状态被资本主义的冲击所打破时，就都一定会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他预见到由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强国所直接进行殖民统治的印度，将会被卷入西方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但他决不是美化这个可能产生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他在晚年如何注意到英国废除土地的公共占有制对当地居民来说是一项倒退的措施。他早先曾经指出人民的福利严重衰落，诸如由资本主义所引起的匮乏、饥饿、贫困、失业和疾病等形式。他还强调英国的统治所造成的有害的结构性后果，诸如放弃水利管理，供出口的经济作物代替自给自足的农业经营，发展单一作物的倾向，以及依附已经变成一种体制的情况。此外，他认为殖民主义是所谓“原始积累”和随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首要手段之一。<sup>352</sup>总而言之，可以有充分把握地说，虽然马克思一向认为英国征服印度终究是进步的，但他反对资产阶级

社会民主主义的单线发展论者那种无批判的乐观主义潮流，而且他在许多方面预见到近年来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作为一种理论来加以阐述的这一概念，即：资本主义使宗主国得到发展而使殖民地国家陷于不发达。就全世界所有的殖民地和边缘地区而言，这可以概括称为“不发达的发展”。<sup>853</sup>正如休伯曼和斯威齐所指出的：

毫无疑问，马克思充分意识到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发达现象的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他掌握了资本主义作为全球体系这种理论的基本要素。遗憾的是，他的信徒们未曾及时地看到这一点，没有认识到发展和发挥他的思想的重要性。如果他们做到这一点，他们肯定不会认为资本主义帝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是处于“封建主义”状态，也不会认为它们那种残废的和依附性的经济除了产生残废的和依附性的资产阶级以外还能产生别的什么。<sup>854</sup>

马克思对中国的看法有着显然不同的思路。虽然这些看法不能说已充分得到证实。但是他确实强调：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具有更先进的社会结构，以及没有种姓差别和具有比较相同的种族、文化和宗教特点，更加有效的国家组织，特别是中国没有遭到直接的殖民统治，因此它就能更抵制外界的影响：

曾经在长期内阻挡了而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的，正是这种同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性质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至高无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庄变成了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以及其他原料去交换英国货的简单农场。在中国，英国人现在还没有这种势力；而将来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sup>855</sup>

在中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自豪的顽强的种族由于那种

“称之为鸦片的麻醉品”而有了醒悟，而且正在酝酿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只能有一个肯定的特点——即它对世界历史有巨大意义：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 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 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sup>356</sup>

那末是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呢？大概是的，因为没有资产阶级社会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生长的。可是马克思也容纳其他一些假设，诸如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甚至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 他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sup>357</sup>

另一个可能性是一场具有伟大外部意义的全面造反，虽然它同亚细亚生产方式特有的那种定期更新和再生会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因此，关于 1850—1864 年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这场起义设法建立了自己的政府 首都设在南京）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马克思评论道：“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 ..”<sup>358</sup>

如果太平天国起义者在组织他们的‘太平天国’时 真的又回到那部假的儒家古典《周礼》上去的话，那么马克思上述的判断就决不是毫无根据的。《周礼》曾鼓舞许多世代的中国造反者和改革者使亚细亚生产方式周期性地得到恢复和复兴（其中正有着近两千年前的王莽）。实际上，太平天国是一个神权国家：它的思想基础是基督教、道教和佛教的平等原则，是典型亚细亚式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诸原则的一应俱全的混合物。私人财产被废除了；土地用益权（即：在不损害产业的条件下使用他人产业并享受其收益的权利——中译者注）重新进行了分配；建立了公共储蓄

所和公共粮仓。如果那就是使欧洲人大为惊恐的中国社会主义怪影的话，<sup>351</sup> 那末它在本质上无疑是陈旧的方式，下述事实可以表明即：“‘亚洲社会’的理想民主形式”<sup>350</sup>迅速地沿着中国过去王朝的同样道路堕落下去 赋税变成了剥削 官员成为官僚阶级“亚洲”民主变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 第二十章 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 问题和前景的辩论

马克思虽然曾承认过：资本主义向生产方式力量较弱的地区扩展，最终说来是有进步作用的，但是他并没有匆匆作出结论说哪一种发展路线是必然的或可取的。要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考虑一下他对俄国问题和前景的探讨就行。

马克思只是在 1861 年 即所谓“农奴解放”年 才开始认真考虑俄国的局势。他强调理论与实践相互起作用，那是他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所具有的特点。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俄国是受农民起义和变革骚动震撼得最厉害的。由于无时间限制的和长期不变的“东方专制主义”所形成的魔力看来最后已被破除，明确的革命运动的发展表明：一旦第一个缺口形成，那么僵化了的的社会的所有矛盾很快就会以无法遏制的暴力爆发出来。此外，截至当时只是以“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sup>361</sup> 著称的这个国家，因为接近欧洲而提出了新的问题。将亚细亚革命同工业西方（那里的工人阶级正在努力建立它第一个国际组织）期待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联接起来的可能性，使人们产生了完全有根据的希望。

但是，俄国能不能从它特别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状况一举跃至社会主义，还是它必须通过资本主义“可怕的盛衰变迁”而长途跋涉地步入西方后尘呢？这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所辩论的中心主题。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个主题有两方面。民粹派深信，俄国在历史和结构方面的特殊性甚至可能有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被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中有关历史发展的论断所吓住而感到困惑，对这一问题往往采取悲观的看法，虽然他们并未放弃革命的实践，也未放弃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论在回答他们的俄国朋友的询问时，还是同他们的对手交锋时，都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批判精神来参加辩论。他们避开一切片面的或先验的解释，而是力图通过分析他们面临的事实来阐明问题。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启蒙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今天“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正面临几乎相同的问题，这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关系了。

马克思首先的任务是消除受他思想影响的早期革命者所面临的巨大错误，谴责对他自己的历史发展“规律”进行一揽子的（因而也是宿命论式的）应用。他特别说清楚：《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纲要，根据的只是西方历史，不应该武断地看成是普遍的。

以下是马克思如何回答理论民粹派的主要发言人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后者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我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sup>862</sup>

俄国当时“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sup>863</sup>但它也是一



个土地私有制兴起比较晚和作用比较有限、而且同大规模农民公有土地制同时并存的国家。因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怀疑农村公社可能成不了该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如民粹派所认为的那样）或者它注定要产生私有制 这就是过于仓促阅读《资本论》而使们得出的结论。

维拉·查苏利奇原先是民粹派，不久参加了第一个受到马克思影响的俄国革命基层组织。该组织两年之后产生了“劳工解放社”，是后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的核心。她向马克思提出了上述问题。她天真地要求马克思向她和她的同志们谈谈他对“我们农村公社可能面临的命运以及对关于根据必然的法则世界上一切国家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所有阶段”的理论意见。她解释说，有些人认为这就是马克思的理论，这一理论使俄国革命者进退两难：

有两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一种是这种村社 如果它能免于苛捐杂税 免缴给专横的地主和管理者的款项 就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那就是逐步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组织它的生产及其产品的分配 在这种情况下 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牺牲他的一切权力 致力于社会的解放和发展。相反 如果社会注定要灭亡的话 社会主义者别无他法 而只得专心作出多少有点根据不足的估算，以便查明俄国农民的国土需要几十年从他们手中转到资产阶级手中，俄国资本主义需要多少世纪才可能达到类似西欧所达到的水平。因此，他们不得不将其宣传局限于城市工人 后者将不断地被农民群众所淹没 由于村社的解体，农民群众将被赶到街上去寻求工资。<sup>364</sup>

这个问题当然陈述得很不得当，这种虚假的为难局面表明这批人的思想远远没有成熟。

马克思的答复首先明确说明他的“所谓理论”就算是一种理

论吧)并没有对有关农村公社的命运的任何结论提供根据,但是他说,在他对这一具体问题进行研究之后,他可以断言,公社可能成为该国‘社会新生的基石’虽然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上。

他举例说,在俄国有这样的可能性,但在印度则没有,这特别是因为俄国农村公社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类型’因为‘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象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而且,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sup>865</sup>但是那一可能性只有在俄国和西方发生社会革命时才能成为现实:“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sup>866</sup>

马克思主义者曾经经常猛烈抨击那些民粹派“不是西欧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斗争给旧的经济世界带来新生,不,它的这一新生将来自俄国农民的最深处”。<sup>867</sup>根据前述条件,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同意俄国农村公社可能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sup>868</sup>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清楚,这种可能性并非特别为神圣俄国的特选子民所命里在定的。如果西方的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将提供必要条件的话,至少有相当大一部分仍然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苦难历程:

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

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sup>369</sup>

这些话可能带有种族优越感但肯定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这些话应当作为恩格斯所断言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必将发生的情况它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时常被人误解的背景：

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sup>370</sup>

毕竟在这段话之前，恩格斯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态度进行了猛烈攻击：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sup>371</sup>

但是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话题转向俄国时，他们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曾一度断言，俄国从现有条件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他们倾向于强调那种直接过渡的机会正在日益减少，因为时间的流逝会削弱公社和加强资本主义，时间是不利于俄国的。当然，1881年马克思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已经强调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而且必须很快地有一场革命。<sup>372</sup>

但是俄国革命来得很迟，而且在1885年恩格斯仍然期待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sup>373</sup>与此同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sup>374</sup>俄国公社慢慢地衰落下去：

俄国农民原有的那些旧的共产主义的习惯和制度，一部分在1861年后被经济发展的进程破坏了，一部分被政府亲自系统地铲除了。旧的共产主义公社解体了，或者至少正在解体。<sup>375</sup>

这些情况促使恩格斯按最新情况修订他对公社的具体分析和对俄国社会的总的分析：

看来这样的时刻日益接近，——至少在某些地区是这样——那时俄国农民生活的全部陈旧社会结构象西欧以前出现过的情况那样对个体农民来说不但会丧失其价值而且会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sup>376</sup>

而在这同时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消失，我们只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转变能够尽快地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那些在这种新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一个伟大前途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sup>377</sup>

他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会使俄国付出昂贵的社会代价，但是那时他得出结论说，俄国大概也必须沿着和西方同样的路线发展：

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强烈得多。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 她不仅在战争中 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 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 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sup>378</sup>

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正在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请看它在西方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吧。象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让命运实现吧！<sup>379</sup>

但是恩格斯的这一预见并未兑现。在俄国，当需要进行社会革命来保证农村公社的继续存在时，社会革命却没有爆发。而且激发俄国由前资本主义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也未曾发生。恩格斯在其晚年似乎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伟大计划”的关键 同样 俄国也从来不懂得任何这种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了可以了解他们思路的足够线索，以便对他们时代以来的俄国社会发展作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回过头看看马克思对国家真正本质的分析 如上文所述 马克思和 恩格斯曾确认了沙皇专制主义的“半亚细亚”基础 剥削阶级的官僚主义性质 以及在专制制度重压下平民社会的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发展的“资本主义”

就采取依靠国家保护的贪得无厌的和寄生的中间商的形式：

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这样一些部门，它们丝毫不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力，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掠夺农产品。这样，国家就帮助了那些吮吸着“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涸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总之，国家对于最能促进和加速对农民（俄国的最雄厚的生产力）进行剥削、并最能使“社会新栋梁”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经济办法，是促使它们加速实施的。<sup>880</sup>

一切真正的发展都受到阻挠，这是因为亚细亚制度和国家的任意剥削被典型地体制化了。由于“社会的新支柱”的贪得无厌的劫掠而使这一景况更加恶化。因此，国家已濒临破产的边缘：

〔俄国〕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的重压已在失去作用，旧国债的利息用新公债来偿付，而每一次新公债都遇到愈来愈大的困难；只有借口建造铁路还能得到一些钱。行政机构早已腐败透顶，官吏们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和敲诈来维持生活，而不是靠薪俸。全部农业生产——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都被 1861 年的赎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主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遭到捐税压榨，受到高利贷者的洗劫；农产品一年比一年减少。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亚洲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种专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个开明阶级的见解，特别是同迅速发展的首都资产阶级的见解发生愈来愈剧烈的矛盾，而且连它现在的体现者也不知所措了。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因而自己愈益严重地破坏对自己的一切信任。<sup>881</sup>

那肯定不是“伟大计划”可予以信赖的“资本主义”。恩格斯的

晚期著述和在一定程度上列宁的早期著作中所出现的自相矛盾的观点，是由于他们对那一事实没有给予应有的考虑。

在当时的条件下，关于革命即将来临的预测激增。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停留在仅仅设想一场社会动荡的来临上，他们以非凡的预测才干，拟定了俄国革命在本世纪将要实际采取的形式，这一革命部分地由于那个时期复杂的战争而推迟了。那些因俄国革命发生在一个落后国家而继续断言俄国革命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们，或者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或者只不过是玩弄诡辩术。只要援引几段话就足以推翻那种众所周知的谬论了：

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同时，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间愈来愈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容忍 变革已经迫近了 但同时也产生一种幻想 以为可能把这个变革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 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 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继续扩展开来……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sup>832</sup>

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目前在经济上、道德上和智力上都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这一次，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sup>833</sup>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国家就象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 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几个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 换句话说 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 用普列汉诺夫的比喻来说 的整个制度倒塌 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 就能迸发出一种后来无法控制的爆炸力。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通过小小的密谋活动震撼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sup>834</sup>

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引言——即使用词有些过于自信——多么准确地预言有 2 月和 10 月两个阶段的苏维埃革命的真正力量。他们甚至预告托洛茨基策划的突然袭击，那发生在一个由于军事失败而造成的更为严重的衰落时期，对俄国革命的激化进程给予决定性的推动。

但是目前使我们感到担忧的是另一个问题，即那种如此不同于马克思本人预言在先进工业社会中发生的社会动荡，能不能真正被认为是一场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恩格斯虽然非常强调地断言，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向自己提出那个问题：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sup>985</sup>

恩格斯的省略必须归因于他的主观愿望，因为他深信革命一旦爆发，它会自行找到通向社会主义的适当途径。尽管他本人对俄国社会状况的分析也表明还缺乏必要的条件：

据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至于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发出信号，是在这面旗帜下还是那面旗帜下发生，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是一场宫廷阴谋，那它在第二天就会被一扫而光。<sup>986</sup>

历史告诉我们，恩格斯要是更加谨慎的话，就会完成得很出色。对这个问题进行更有批判性的说明，很可能有助于俄国革命运动决定在困难时期应当遵循什么路线。无论如何，有相当多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者正视这一问题。但是，没有任何章节可以成为他们能加以援引来支持他们所关切的问题的社会主义的圣经，因此这继续限于少数不掌握实际影响的人。最后，在苏联革命蜕变为



官僚制度和普遍倒退之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马克思主义概念实际上已被作为异端而加以禁止，从而破坏了为批判地分析这一问题所必需的理论观点。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发现，直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后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阐明他们所创造的假社会主义，是个太棘手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在事先谈到 1906 年俄国社会民主党斯德哥尔摩大会时（人们要求大会采取一项有关土地问题的政策），他把问题提得非常明确。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提出将土地收归国有作为该党革命纲领要点的决议草案，他回顾了俄国的特殊历史情况和固有的体制，建议或者分配土地，或者将土地置于市政管理之下，而不是收归国有。<sup>887</sup>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国家占有土地和农耕者这一旧的俄国制度，不过是“作为所有强大的东方专制制度基础的经济制度的莫斯科版而已”。他认识到当时的局势略有不同，这是由于十九世纪经济发生变化的结果，但是他仍然认为他有责任告诫社会主义者反对列宁的国有化建议，害怕这一建议可能形成“亚细亚方式复辟”的基础。<sup>888</sup>普列汉诺夫为了支持他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中国的王莽改革和十一世纪的王安石变法，这些改革由于恢复国家对土地的控制而不幸地产生了国家审判官的整个阶级。他写道，“中国的社会革命在于把土地从‘国王亲信’的手里夺回去，并且交还给国家，但是接着整个过程又重演了，产生了新的‘国王亲信’，引起了更多的革命，恢复了旧的中国制度”他最后说，“我们从俄国王安石的计划中只能预见到悲惨的后果。我们不需要中国的社会制度”。<sup>889</sup>

但是，列宁完全埋头于他的政治纲领，而且对这类论点充耳不闻，至少暂时是如此。他发现玩弄文字游戏太容易了，而且回答说“防止‘复辟’的唯一保证是西方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这个条

件 俄国革命就不可能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无论实行市有制也好 国有化也好 分配也好 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sup>890</sup>

另一方面，列宁强调指出俄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们就暂且假设，十七世纪彼得一世以前的莫斯科俄国已经真正实现了土地国有化。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逻辑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行国有化就意味着促进莫斯科俄国的复辟。但是 这种逻辑恰恰是诡辩 而不是什么逻辑，……因为莫斯科俄国实行过 或者说 既然莫斯科俄国实行过 土地国有化 所以说土地国有化的经济基础是亚洲生产方式。其实在俄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十九世纪后五十年代起就确立起来了，到了二十世纪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sup>891</sup>

但是列宁也使用诡辩术，或者至少是过于乐观了。在详尽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是否已经占统治地位。顺便提一下，列宁后来的著作提出完全相反的论断。而且他肯定应该了解到究竟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本质上的中间性和寄生性所作的一切保留，一定是很熟悉的了。他的确在别处曾谈到，<sup>892</sup> 随着时间的消逝，并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来改变它。

上面引述的两段语录，表明列宁对待这一问题是何等武断。在第一段语录中 他把资本主义简单化为一般的“反革命”在第二段语录中，他借助于普列汉诺夫感情冲动的措辞，将资本主义简单归结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实际复辟——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上，亚细亚生产方式显然是无法卷土重来的。真正的政治问题关系到国家官僚专制主义以新的伪装、但在大致相似的形式下再生，这种国家官僚专制主义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以十分

相似的条件，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但对这个问题，列宁完全忽视了。

十五年之后 当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时 列宁对那一进程第一阶段的体验促使他提出迥然不同的看法。列宁的晚期著述处处表明，他对亲眼看到的事情日益关注。

与此同时 他过去一度认为是防止“必然复辟”所绝对必需的西方革命 并未发生。西方尽管条件“成熟”和发生战争 却并未跃进到社会主义。而在俄国，革命所产生的效果，虽然表面上激进，却远远不如最初想象的那么激进。根据他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著述“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应该是“立刻打碎旧的官吏机器”仿效巴黎公社的榜样“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 逐步消灭一切官吏机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如果必要的话“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制’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sup>898</sup>

但是在俄国 旧的国家机器在革命之后还存在 基本上未受触动 只不过有了新的职能。正如列宁直言不讳所承认的“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sup>894</sup> 总之 官僚统治已经成了一个问题 其具体特征已是众所周知。其根源可追溯到俄国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俄国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根源 是“经济、政治、社会的特征和日常生活的复杂结合体”同马克思一样，列宁<sup>895</sup>也认为那是典型的亚细亚式的“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 他们的贫困 不开化 交通的闭塞 文盲现象的存在 工农业间的缺乏流转 缺乏联系和协助。”<sup>896</sup>

但是列宁在其公开演说中 至少在早期阶段 还是力图保持相当乐观，以显示他相信这些不过是暂时的困难，是因为战争和封锁

而造成的。然而，他几乎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都是根本困难，而不是偶然困难。另一方面，当他为实行粮食税进行辩护（他坦率承认粮食税将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带到苏维埃生活中去）时，他在谈话中毫不犹豫地嘲笑那些害怕实话实说的人，他说“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联系着的官僚主义（即残存的半亚细亚条件——本书作者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sup>397</sup>

列宁的分析逐步地越来越现实主义了，他公开承认俄国的一些问题有其深远的根源。同时，他在日益经常地提到俄国的文化遗产至今“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式的不文明状态”<sup>398</sup>的情况下，对‘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偏向’<sup>399</sup>进行日益猛烈的斥责。列宁确实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旧事物，旧事物虽被捣毁，但是还没有被消灭，还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sup>400</sup>同时，他也不断地要求人们注意“我们还要进行多少顽强繁重的工作，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他严厉地批评政府无力“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农奴制等等的文化”。<sup>401</sup>

从战后年代里实事求是的列宁来看，问题在于从“前资本主义”关系的状况向社会主义过渡：

看一下苏俄的地图吧。在沃洛果达以北、顿河岸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连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姆斯克以北这些漫无涯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在这些空旷地带笼罩着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和十足的野蛮性。那末在俄国所有其余那些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到处都是几十里几十里的羊肠小道，确切些说是几十里几十里的无路地区，这样就把乡村和铁道隔离了开来，即和那联结文

明、联结资本主义、联结大工业、联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隔离了开来。这些地方 难道不也是到处都为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性所统治吗？<sup>402</sup>

（\*奥勃洛摩夫精神是从俄国作家甘察洛夫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地主奥勃洛摩夫来的 即因循守旧 顽固迂腐 沉滞呆板的意思。——人民出版社中译本注）

即使从“这一俄国的主要事态”发展来看 要指出的是 列宁不再象他 1906 年答复普列汉诺夫时所说的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完全占主导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是可能实现的 但只是“到达一定程度”，而且工业化能迅速实现的话。这样就产生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个著名的口号。这一段话为斯大林后来玩弄诡计开了绿灯，但即使在当时，这句话也是很使人糊涂的，因为苏维埃当时要么是不再存在了，要么没有丝毫价值。但是 列宁并没有因为乐观而冲昏头脑 他充分意识到“实现这‘一个’条件 单是做到第一批工作 就至少要花十年工夫”而且他对那一段时间可能会发生的情况表示担忧。“至于缩短这一期限，也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sup>403</sup>

此外 列宁当然是非常提防斯大林的 他指出斯大林“权力过大”并着重指出斯大林的性格特点比较适合当东方专制君主，而不配担任一个口头上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的党的书记。总的来说，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推断，列宁那个时候已完全意识到他在二十年前曾嘲笑过的亚细亚方式的复辟危险：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 掌握了无限的权力 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 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 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 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 我建议

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 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 只是有一点强过他 就是更耐心 更忠顺 更和蔼 更关心同志 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sup>404</sup>

## 第二十一章 官僚主义的集体制

列宁对于他根据其最早症状而不断加以诊断的倒退进程，从来没有给以明确的称呼，除非我们愿意接受他一度讲过的一些提法——例如他经常地、但并非系统地对“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偏向”进行斥责。<sup>405</sup>

至于后来一些分析苏联现实而不想为之辩护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下的定义 则屡见不鲜——虽然这些定义不会使人满意，而且大部分是自相矛盾的。其中名气最大的一些人在一点上是共同一致的 那就是 不能把苏联称为社会主义 至少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本人所主张的那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在苏联，有过出自本能的社会主义者 但是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社会主义 至少没有马克思所提出的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为共产主义进行准备的那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由于存在非对抗性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规模至少要发展到象在先进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么大，而且资源将得到更加合理的利用，并且具有特意向平均分配发展的趋势 正在消亡中的国家 将实行民主治理 而且肯定会出现强大的工人运动。

马克思本人对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主要特征作了概括，按照巴黎公社的模式发挥了他的论据。为了说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 还有中国和古巴 不同于他的过渡社会模式 我们在这

里引述如下特征：

1. 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2.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 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 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
3. 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变为公社中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
4. 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
5. 社会公职应真正民主地产生，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 随时可以撤换 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sup>406</sup>

由于试图要了解苏联的社会性质，因此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和定义。亲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在一切证据面前仍然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就连他们也不得不降低他们的视线而接受斯大林式观察事物的方法，即社会主义不一定意味着所有不平等都会消失，消失的只是“根本性的”不平等——不平等的定义可能瞬息万变。但是为了要这样做，他们也不得不避免从这个仍然为众目所瞩目的长期实行专制统治和极权统治的上层建筑中引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来。有一伙人（其人数也许比西方所有左翼分子还要多）认为苏联是一个“趋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是指尽管有错误和过去的残迹，但是它已经代表一种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而且正在走向“未来社会”。技术官僚们对于人类解放的各种问题无动于衷 他们毫不犹豫地将苏联描绘成社会主义的 他们使用这个词 显然带有中立的含义 这同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相距再远也没有了 他们说现代经济不同于市场经济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同市场经济有矛盾。甚至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和保守派也毫不犹豫地称苏联为社会主义的，在这一点上至少他们和亲莫

斯科的共产党人是一致的。后者称其为社会主义是想赋予他们的头面人物以一种具有内在社会主义价值的救世光轮，而前者则只是想给社会主义抹黑而已。

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笔锋比较尖刻，批判性较强。威特福格尔讽刺性地恢复了马克思关于“普遍奴隶制”<sup>39</sup>的观念，确定苏联是“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国家普遍奴隶制”<sup>407</sup>（不是象许多过于草率的解释者认为威特福格尔所说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sup>408</sup>）托洛茨基说的是一个由官僚统治集团治理的“堕落的工人国家”，鲍蒂加则称之为特殊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毛主义者之流把它简单地称为已经建立或即将建立或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社会”。而里齐最近的分析竟然称之为“封建社会”<sup>409</sup>。

但是，如果苏联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它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甚至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也不是，封建主义形式或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更谈不上。在苏联，有一种新的对抗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那是不能被其他任何结构所同化的——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中国。

人们不能老老实实地称它们为社会主义的，因为那里的阶级差异很分明，而且还存在着剥削。也不能称其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因为那样的社会要求无产阶级掌权，并且有使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自觉目的（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十分有限的形式下，可能在文化革命时期的中国以及在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的古巴，可能存在过）。相反，如果当今明显地盛行的是一种同简单生产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完全格格不入的扩大的生产，那么，再谈什么封建社会或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就是荒谬的了。也不能说它是资本主义，甚至也不能说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为没有什么可供销售或生产的剩余价值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叫喊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偏向”或“退化”，也远远没有达到目标。列宁的分析可能



符合他那个时代的现实，当时的形势在许多方面还是动荡不定的，事态发展同实际情况很可能并不相同。但是如果将它应用于当今的情况，就几乎成为一种自相矛盾的借口了。就上层建筑而言，托洛茨基的辩解甚至略胜一筹，但是他未能考虑到苏联社会的结构特点。

托洛茨基承认苏联官僚统治的发展绝不是战争引起的“暂时结果”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其深刻原因在于社会具有各种不同成分的性质，在于居民中的各种集团的日常利益和根本利益之间的差别。由于广大群众缺乏文化而使得这一情况复杂化了”。<sup>410</sup>在这种情况下，职能的差别僵化成社会差异，官僚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子。权力与财富集中在官僚手中，国家专制制度维护其众多的特权。斯大林主义的热月党阻止十月革命的自由进展，它只是说明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战胜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后者的一部分被行政机关和权力行使所吞没和腐蚀，另一部分则被压垮和强行消灭。党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成了官僚集团的政治组织，官僚主义的和极权主义的国家，绝不能再称为无产阶级专政。<sup>411</sup>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话只不过是走人们熟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教科书的老路，托洛茨基在提到列宁这一著述时，提醒我们注意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剥夺了剥削者之后，就应该有可能废除警察和常备军以及其余的官僚统治机器。列宁在1917年写道，“所有的机会主义者一直在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但是他们忘记补充一句，即无产阶级只需要即将消亡的国家，即立即开始消亡、不得不消亡的国家”。托洛茨基说：“由于一阵幻想，很难设想有什么差异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制定的工人国家纲要和以斯大林为首的现有国家之间的差异更为悬殊的了。”<sup>412</sup>

托洛茨基认为产生这一局势的根本原因是俄国的十分落后状态。他说：“如果国家不消亡而是变得日益专制，如果工人阶级的

特命全权代表变得官僚化了，而且官僚统治凌驾于新社会之上，这并不是出于某种次要的原因（诸如旧时代心理的残余），而是由于产生并支持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那种严格需要，只要它无法保证实现真正的平等。”托洛茨基从马克思的一部早期著述中，援引了强调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产主义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的一段话，因为普遍化的匮乏必然使一切旧时的混乱死灰复燃。在托洛茨基眼里，这一进程已经在俄国出现了，因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苏维埃宪法不能产生社会主义，而只能产生一种“前途捉摸不定的过渡性政权”。<sup>413</sup>

就苏维埃国家强行维护社会不平等、即维护少数人的特权而言，托洛茨基认为苏维埃国家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象官方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那样是旧阶级“衰弱的残余”在阻碍它的消亡，而是物质匮乏与文化落后等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在阻止它的消亡；正是这些同样的因素甚至阻碍消灭寄生性的官僚，强使许多重要部门保持资产阶级法权。<sup>414</sup>

尽管爆发了十月革命 尽管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集体化和消灭了富农阶级，人与人的关系不但远远没有上升到社会主义水平，而且还未达到先进资本主义的水平。诚然，斯大林主义的热月党对没有教养的官僚取消了一切限制，强使群众接受默默顺从的著名准则，那是“退化到旧日俄国野蛮状态的无可否认的原因”。<sup>415</sup>托洛茨基强调俄国官僚统治具有持久的“东方”特色：“浓厚的利己主义，牢固的内部团结，害怕群众的不满，疯狂固执地压制一切批评意见，最后是对体现并维护这些新贵们的权力与特权的‘领导人’极尽虚伪地、宗教式地顶礼膜拜的程度”。<sup>416</sup>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 由这种“社会主义”官僚组成的“明目张胆的反对力量”，“是一种异常巨大的、并日益扩大的社会畸形发展，是社会恶性发展的根源”，它证明小资产阶级倾向在当时明显地占统治地位。由

此而建立的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是毫不相干的。从消费到生产领域充满了社会矛盾。收入的不平等不单单是由于个人工作效率的差异所造成 而是由于隐蔽的剥削他人劳动所造成。“新宪法宣布苏联废除了人对人的剥削……如果剥夺他人劳动就是剥夺其政治权利这一规则还生效的话 那么其结果是 统治集团的拔萃人物显然是不受苏联宪法管辖范围的约束的。”<sup>417</sup>

托洛茨基认为“苏联的官僚统治不单单是指官僚 这个字的完整意义是全部的发号施令和享有特权的阶层……。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所有 但国家则可以说是‘属于’官僚阶层所有。如果到目前为止，这些崭新的关系要进行巩固、成为规范和加以合法化的话 那么从长远来看 不论工人阶级是否进行抵制 这些关系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成果丧失殆尽。”<sup>418</sup>“存在决定意识。在最近十五年间，苏联政府十分严重地破坏了它的社会结构……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官僚已经最好地解决它自己的社会问题，它对现有局势十分满意，对苏联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再提出任何主观保证……。官僚作为一支自觉的政治力量，已经背叛了革命……如果资产阶级政党将要推翻苏联的统治阶级，那末它在现有的官僚、管理人员、经理人员、技术人员、党支部书记和一般的特权上层人士中，会发现为数不少的得心应手的奴仆。”<sup>419</sup>

总起来说 托洛茨基不认为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而是某种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社会，而在某些重大的方面它比资本主义还落后。根据这一定义 他对这一点说得毋庸置疑地明确)他不打算提出那种‘苏联现政权只有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错误想法’。他认为，苏联制度的未来取决于向资本主义推进的力量(诸如官僚)和向社会主义挺进的力量(诸如工人阶级)之间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因为他认为，被执政党所背叛了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靠工人的社会关系和觉悟程度而生存下

去的。<sup>420</sup>

托洛茨基的分析是很有力的。但是他没有深入探讨实际的生产关系（同所有的证据相反，他认为苏联的生产关系至少是在走向社会主义），虽然他也谈到工人和官僚之间的剥削和阶级斗争，他把官僚确定为一个社会阶层、特权等级、寄生集团，而不是确定为一个阶级，尽管他知道并无疑地同意人所熟知的列宁关于社会阶级的定义，<sup>421</sup> 这就根本不可能不把苏联官僚视为一个阶级了。但是，托洛茨基显然拒绝把他自己的分析引向其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这不是因为他对于自己曾在其中起过很大作用的革命还有牢不可破的感情联系的话，那也是出于错误的意识形态考虑。因为，承认了苏联官僚的阶级性，他就等于含蓄地承认苏联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退化形式，而且是一种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新的对抗性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他不大愿意采取这一步骤，就促使他的论据必然陷进明显的自相矛盾之中。后来在他的一些门徒的论据中，这些自相矛盾之处变得更为清楚了。他的门徒将苏联经济坦率地确定为“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上仍属于资产阶级分配方式的相互矛盾的结合体”。<sup>422</sup>但是即使将苏联确定为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见诸于托洛茨基本人的著述），以及他关于俄国官僚集团的小资产阶级性的论述和他强调俄国官僚所谓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这些也是相当使人误解的。

里齐对该论据的批判恰到好处：俄国官僚集团毋需复辟资本主义，因为在现有体制内，它已经是剥削阶级了，而且除了法律的捏造外，它实际上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sup>423</sup>所以，如果象托洛茨基那样，还谈论生产关系仍然是潜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那就荒谬可笑了。相反，里齐说，社会关系是奴役性的，因此现今局势甚至比资本主义本身还更加落后。<sup>424</sup>

换言之，<sup>425</sup> 托洛茨基提出的问题 里齐给予明确答复 如果说，

苏联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又不是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那末它究竟是什么类型的社会呢？里齐说，它是迄今所见到的一种新型对抗性社会的最完整的表现。在这种社会里，社会权力属于一个“新的‘剥削者’阶级”，这个阶级通过现有的集体财产，“已经在国家内部牢固地树立了它的地位”，控制着生产资料，占有剩余价值。虽然更准确些说是剩余产品。托洛茨基提到的“捉摸不定的命运”结果却是既非资产阶级复辟，也非无产阶级复兴。但是他还未曾预见第三种可能性：新的官僚集团联合成为一个阶级，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里齐称它为“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恰当地表述了这样一种社会：它由完全控制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阶级所统治。由于社会上没有私人财产，或者充其量说，私人财产极其微薄，因比这个阶级就能维持其至高无上的权力：

我们天真地告诉自己说，财产已经“国有化了”。对科学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并不严重。至少我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补充说，分配的安排是使得官僚集团可以获得最大的份额。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国有化”财产，它是由一个阶级所独占的，这个阶级和过去的资产阶级一样地公然占有其成果。实际上，俄国有着支配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它的所作所为正象它是占有这些生产资料的。虽然它没有分成个体占有者，但是它的成员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是所有“国有化”财产的实际占有者。<sup>425</sup>

里齐在进行分析时，强调在这一制度下国家所起的主要作用，强调缺乏甚至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自由劳工以及政治上层建筑的专制性质。由于他不熟悉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至少在本书初次写成时是如此），就往往将这一制度比作封建制度。他认为封建制度是“最终大倒退”。<sup>426</sup>那种解释毕竟比较符合他对单线发展模式的偏爱，这使他断言“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是一种“普遍现象”，而

不单单是俄国的”其他的表现形式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罗斯福的新政以及一般大型有限公司的垄断资本主义。<sup>427</sup>

里齐未能以充足的理由和恰当的批判精神来阐述他的直觉，尽管这些直觉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他的“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理论（这一理论事先就遭到正统共产党人以及托派的攻击）长久被人们所遗忘的一个理由，其他一些理由尽管不新颖而且十分庸俗，但却获得其短暂的声誉。<sup>428</sup>然而 安东尼奥·卡洛最近以更加时兴和更加精心透彻的形式复活了里齐的理论，对本章前半部分提到的其他理论进行了周密的驳斥。卡洛认为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主要特征是：

1. 财产为整个阶级所占有，而不是为阶级的个别成员所占有。
2. 经济实行计划管理 与市场相隔绝 没有对人人开放的竞争。
3. 统治地位由使用价值（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交换价值）扩大再生产的机构所占据。
4. 人剥削人是一种直接过程 是通过计划（不象获取资本主义利润那样通过个体生产者和市场）占有和分配部分的总剩余产品而实现的。
5. 政治权力与组织权力完全集中化。<sup>429</sup>

这些特征将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置于一种完全不同的范畴，完全不同于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它标志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它自己的法则，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为所有其他类型社会所确认的法则。

卡洛认为俄国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历史根源要追溯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在第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内战和帝国主义的包围造成工业生产的崩溃，工业生产下降到 1913 年的百分之十三。其次，革命阶级的精华已在战争中阵亡，或者由于被吸收到国家机器和从事官僚主义日常事务而割断了同他们根基的联系。简

言之 在那个时代 无产阶级流尽了鲜血 失去了他们的领袖 搞得四分五裂；农民被抛弃，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党感到疑虑，小资产阶级最初转向一方，后来又转向另一方。另一方面，国内外的局势迫使政府作出及时的和重大的决定。在此危急关头（而且我们可以补充说：在一场伟大革命或一场内战之后，这些情况总是容易出现的），权力势必从群众的手中夺走，而且集中到一小撮上层人物手中。这些上层人物硬说他们是代表群众行使这一权力的，然而在无产阶级根本无法监督的条件下行使这一权力的。<sup>480</sup>在俄国 由于需要依靠前沙皇的公务人员开动新国家的机器而使得这一现象更为严重了，因为苏维埃徒具虚名（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部分由于外界侵略的危险而作出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决定，才使二十年代后期的这一状况得以完成。总之，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产生和发展，是通过两个基本因素同时起作用来实现的。这两个因素是：（一）当文官社会破产时 国家机构日益独立；（二）需要强行加快经济发展道路上的步伐。<sup>481</sup>

卡洛也并不认为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是俄国仅有的现象。但是他很慎重，没有武断地把它列为一个普通的范畴 这点他比里齐的判断高明。相反 他声称“，只是在一定情况下和特定国家里 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才能发展和巩固”。<sup>482</sup>

但是卡洛对上述情况的叙述 乃是他分析中最薄弱的一环。与里齐相反 他说的对“，这类制度在富裕国家里不可能发展 那里的生产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复杂性，因此如果把它束缚于官僚主义的计划之中去就无法生存”。他以同样的理由指出，这种制度“可以从外界强加，如同一次军事入侵一样”，这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强加于东欧国家的、萨特称之为‘恩赐的社会主义’或‘现成给与的社会主义’<sup>483</sup>所出现的那种情况。通过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和军事的压力强加于这些东欧国家的苏联模式，从它周期性地引起

的反抗来看，表明是不适用的和行不通的。这些反抗经常被武力镇压下去（1953年在东柏林，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0年再次在波兰）。<sup>434</sup>但是后来卡洛作出如下概括：“只有在不发达国家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才会产生和发展。”<sup>435</sup>

这种解释同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只区分国家的贫、富或发达、不发达而不提它们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和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实上正如历史所表明的，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本质上并非生根于不发达国家（因为有些不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和前资本主义的，后者包括‘亚细亚的’、‘非洲的’和封建的类型<sup>436</sup>），而是出现在已经建立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国家。卡洛本人在寻找除苏联和中国以外的建立在官僚主义的集体制基础上的国家时，竟选择了马克思作为最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埃及为例，是颇有重要意义的。实际上，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官僚主义的集体制之间，在东方专制制度和假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之间，很难认为时间和空间的关联仅仅是一种巧合。

这并不是说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是‘亚细亚’国家唯一的发展路线。相反，我们已经看到，印度（马克思最周密地研究过的亚细亚方式的例子，经历了一种不同的革命（马克思的提法）印度推行土地私有制并被吸收进西方的发展路线，哪怕只是作为一个附属国和附属国。但是那只有在长期充当当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进一步集中说明我们的论点，我们可以断言，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是建立在亚细亚或半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那些国家的典型发展形式，它们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和深刻的外部影响（对于长期以来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结构和官僚体系著称的、或者以高度发展的灌溉体系著称的国家，这一论断特别适用），对这些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冲击足以打乱它们许多世纪



之久的停滞状态，但不足以把它们吸引到西方发展的潮流中去。在俄国、中国和蒙古，尤其是如此。这些国家从来不是直接的殖民地 而是至多变成了孙中山称为的“半殖民地”；北越曾受到并非第一流殖民国家的法国比较短时期的殖民统治；北朝鲜被资本主义仍然十分虚弱的日本所兼并。除了这些比较纯粹的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例子外，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国家，在那里，同样的制度采取更具有欺骗性的形式，因为那里存在某种程度的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诸如埃及，它不过是英国的一个保护国，而且为期很短。<sup>487</sup>伊朗只是一个“半殖民地”。<sup>488</sup>马达加斯加受到的法国殖民统治和越南一样长。

这一理论对卡洛的另一个意见也有充分的影响：“为了制定这一类的解决办法，官僚机器必须独立于组成文官社会的各个阶级的影响。”<sup>489</sup>这里 如同我们已看到的 亚细亚国家的文官社会要么实际上不存在，要么一贯从属于政权和官僚统治。那种同样的缺陷既妨碍资本主义在亚细亚社会内部的自由发展，又鼓励了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发展。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家所采取的比较自治的现代化的典型形式。在殖民主义影响较强的亚细亚社会（诸如印度）就被拉回到西方的历史发展路线上来，尽管是处于次等的和外围的地位，这使得它们经历了“不发达的发展”的状况。在殖民主义影响较小的亚细亚和半亚细亚社会（俄国、中国、越南、埃及、伊朗等国）则通过一系列类似西方那样的革命（如 1640 年和 1688 至 1689 年的英国革命，1789 年和 1830 年的法国革命，标志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发展到官僚主义的集体制。这两个进程，从不同的角度，都起了相同的基本作用，即确保从原始形式向扩大再生产形式的过渡，从而革新了相应的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 1905 年和 1917 年革命 中国的

1911年和1927至1949年的革命 越南的1954年和1964年之后的革命，埃及的1952年革命，伊朗的1906至1908年、1908至1909年、1921年和1965年的革命以及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具有一个明确的意义：这些革命作为亚细亚世界第一批真正的革命，是和过去的根本决裂，但是其过程在许多方面还是标志着一种必然的连续性。

## 第二十二章 官僚主义的 集体制的类型

将俄国和中国 埃及和伊朗这样一些不同的国家确定为“官僚主义的集体制”可能在不熟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读者中引起怀疑。但是说它们都是集体官僚统治，并不是把它们一古脑儿归并在同一个项目之下。按照其他生产方式建立起来的各类社会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古希腊和古罗马都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公元十世纪的法国和德川时期的日本都是封建国家；君主制的、自由主义的英国 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和纳粹德国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之上。因此，各种集体官僚统治之间也有根本的差异之处。为了不致产生误解，因此我们必须找出这类社会的一些基本典型特征。

首先区分什么是象俄国和中国那样存在着纯而又纯的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社会，什么是象埃及和伊朗那样搀杂着其他生产方式的社会。后者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私人和国家资本主义残余和定期地从传统的亚细亚形式回复到封建制的情况。

现在来看一看第二个差异。一方面是那些虽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至少是由“主观上的社会主义者”掌权的国家，例如紧接十月革命后的俄国 中国 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期间 和越

南。另一方面是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集团已失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切痕迹的国家，诸如斯大林时代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可能除了赫鲁晓夫年代，当然官僚们很快结束了那个时代）。

在上述例子的第一种情况中，官僚主义的集体制可以被认为是原型社会主义，或者如同青年马克思所说的，是“不成熟的共产主义”<sup>2440</sup> 虽然决不应当忘记这一制度的严重矛盾，它可以轻易地导致该制度的退化。在这方面，中国人在分析批判中显示出极大的敏锐性。毛在 1968 年说过，“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sup>2441</sup>

另一方面，在第二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团结一致必须有赖于生活在集体官僚制度下的那些力量把争取社会主义、反对执政的官僚阶级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

## 第二十三章 乌托邦的结束

甚至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以外的人也认为，“通过法令进行统治，对统治领土辽阔、居民成份众多的压迫性政权来说，有明显的长处”。这是因为“它的效率高超，因为它不顾颁布法令和执行法令之间的所有中间阶段，它不让人民进行政治说理。它可以轻易地克服各种各样的地方习俗，并且毋需依靠一般法的缓慢发展进程。它便于建立中央集权化的政府，因为它自动地压制地方自治的一切活动”<sup>442</sup>。

当然，根据马克思的先导而发现的两种官僚政权都是这样的

对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旧式“东方专制主义”和较新式的官僚主义的集体制，都同样适用。但是自然经济的界限一旦打破，仅仅根据上述理由，官僚统治就可以从相当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变成强大的发展动因。俄国最近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在那些国家里，确实是在一个远不是那么消极敌意的世界里，而且从十分落后的亚细亚或半亚细亚条件出发，在没有外界任何重大“援助”的情况下，开始了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进程，同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停滞或衰退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发展怎么可能呢？这纯粹是由于继承“普遍奴隶制”传统的政权的性质，有可能大规模动员群众参加不充分的就业的结果。<sup>443</sup>

从那个角度考虑，赞同里齐——步托洛茨基的后尘而且引起卡洛的部分共鸣——所认为的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比资本主义倒退的看法，是错误的。即使它在资本主义不曾存在、而且不可能存在过的地方得到了发展，那也不成其为理由。实际上，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是相似的社会-经济形态，这种形态在不同的环境下大致起相同的作用，即确保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绝对必要条件。正如在这一种或那一种形态的每个阶级社会里都可以发现的那样，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集体制两者都有着同样的历史局限性，包括暴力、剥削和倒退。然而，正如现代历史所表明的，它们的任务都完成得不错，在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一大批成就。社会主义更加临近了。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在西方和东方，“乌托邦的末日”接近了，<sup>444</sup>这不是突出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歧，甚至也不是突出所谓发达社会和不发达社会的分歧，<sup>445</sup>而是突出了未来的自由社会和目前尚未自由的社会之间重要得多的分歧。这使我们象马克思一样，认为西方和第三世界截至今日的一切历史发展都是人类实况的“史前时期”。

## 结 束 语

我们刚确立的这些论点，也使我们能够对某些当今的社会趋势获得比较准确的概念。

东方和西方，通过不同的道路，都到达了彼此差别依然很大、但肩负同样主要任务的社会：要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解决它们内部矛盾的唯一办法。在那种情况下，任何集团，不管是亚细亚为中心的民粹主义者或毛主义者，还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只集中关心它本身的种族或社会，都是同样不合理的。象列宁那样继续大肆宣扬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之间的对比，同威特福格尔那样继续颂扬西方资本主义、把它同自由全然等同起来、作为亚细亚奴隶制的摩尼教对偶，那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两种不同的、不等的发展路线这个想法，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来源于资产阶级古典思想家孟德斯鸠、黑格尔和英国的经济学家们。这一想法，如同所谓欧洲的发展路线必须为一切国家所遵循这个当前流行的想法一样（这来源于殖民主义猖獗时代的实证主义思想），也不值得给予重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多线发展的解释，不仅应能引导我们放弃一切种族优越感，而且还可以起批判工具的作用，使得我们避免具有同样危险的无判断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在这里，马克思能给我们极其重要的教益：他的分析在消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性方面，同它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一样，都是同样有效的。而且他的分析还告诫我们不要对非欧洲社会不适当地加以理想化——当前某些社会人类学家和唯心主义的心理学家，由于对殖民主义罪恶事业的可以理解的憎恨，而对

非欧洲社会时常加以理想化。<sup>44</sup>

实际上 西方和第三世界的传统都同样包含一些奴役它们、并需要通过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来加以消除的因素，也包含其他一些有价值的、应当作为社会主义未来组成部分而加以维护的因素。我们已经附带地看到，建立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西方社会结构，的确至少在理论上体现某些价值观：尊重个人与个性，如见诸于希腊、罗马、基督教、文艺复兴和人道主义 基督教改革运动大力强调批判性探索和良心的自由；以及启蒙运动的世俗权力观。这一切是不能加以否认的，尽管在实际上这些价值观仍然是比较有限的社会集团的特权 不时地陷入到野蛮行为 从“自由主义”英国的原始积累到美国的奴隶制和种族主义，从天主教最高权力的宗教法庭到西班牙征服者和殖民者普遍实行的种族灭绝，从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的毫无意义的大屠杀和蹂躏到歌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故乡土地上发生的纳粹主义罪行。

第三世界的不同结构产生了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价值观，诸如：公共道德观，人与自然界之间的适当平衡的观念，以及社会与自然世界的整体化；但是它从未对这些价值观从真正的解放意义上进行解释，而是经常从这些价值观引出压制性的结论。但是，今天我们比往日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生活在一个世界上，通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关系对这些价值观加以综合，最终必将废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镇压性的集体主义，而以马克思所说的“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的社会所取代。

最后 就政治斗争而言 多线发展模式使我们能防范一切关于“先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贯荒诞说法。中国和苏联在这条路上并没有走在西方的前面。它们只是走在不同的路上，而且正如在西方一样，政治事态发展的实际进程是：什么因素将决定它是否会走向社会主义——至少从短期来看 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探讨的 因为

“从长远来看 我们都已不在人世”。

在这一方面 很值得考虑一下所谓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sup>447</sup>那一运动被诽谤它和拥护它的人们所严重误解。确实，这一运动只能根据在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社会内建立社会主义这一阶级斗争的角度去加以理解。这一运动的规模相当可观，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它无疑将唤醒一大部分中国人民去认识目前仍然存在着的的问题。但是也不应当把这一运动吹得神乎其神。它由于带有社会色彩和政治色彩，因此它确实是一场“革命”，但它不是象官方宣传所说的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只能‘自下而上’而文化革命却是‘自上而下’地推行 因此符合其来源于亚洲的结构特性和文化特性这一长期传统，包括从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从土耳其的凯木尔·艾塔土尔克的革命到目前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白色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最高政治集团发动的，这就限制了现制度的反对派可以活动的界限，给了人们以“奉命革命”的离奇印象，只要命令一下，就能重组队伍（如果人们认为它曾破坏过队伍的话）。这些和其他许多相似之处，使得文化大革命同传统的中国皇帝们发动的“文化革命”相一致，虽然中国文化大革命在客观上也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前进了一大步。古代中国毕竟也是一个官僚主义社会，虽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不同的水年。我们尤其要记住秦始皇及其宰相李斯<sup>44</sup>的改革，在明朝和清朝曾经加以模仿 虽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无论如何 文化大革命最终发展到不加鉴别地奉承毛的思想这一气氛的地步，它显示了一种教条主义的简单的虔诚，不能不使人们想起这完全是孔夫子（中国现在说他是敌人）“天命思想”传统的对于统治者的盲从。我们指出这一点，只不过是反对任何把中国的经验加以神话化的企图，因为特别是青年人，他们显然倾向于将中国看成是争取社会主

义斗争中的新‘领袖’。

上述情况也适用于古巴的经验。古巴在紧接革命之后的几年里,无疑是最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但是,古巴不久也经历了严酷的退化过程,导致了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建立。在古巴,没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传统,但是古巴的经济极其脆弱,它依靠单一作物及其出口。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它实行经济封锁,同它断绝关系,并以入侵相威胁。古巴为了生存,就被迫转向俄国。古巴领导人终于从俄国那里照搬了某些基本的社会体制,误以为那些就是社会主义。苏联的计划工作者、技术员和专家完成了其余的任务。古巴缺乏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它的领导人很慷慨大方,但是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缺乏经验,或者至少是无法进行斗争。苏联顾问把古巴变成为在许多方面堪称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舶来品。<sup>449</sup>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总是困难的,而在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切断联系并受到抵制的、有着四百年西班牙殖民主义和几乎五十年的美国新殖民主义统治负担的不发达的小国,这就尤其成了一项超乎人力的任务了。<sup>450</sup>古巴不经过资本主义或官僚主义的集体制阶段而可以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办法,可能是在国际舞台上依靠工业发达社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支持——换言之,如果在西方或东欧爆发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上述情况也可以同样适用于其他所谓的不发达国家。在当今的世界上,如果在工业先进国家发生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话,这些国家无需经过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的集体制或对抗性社会的某些类似形式而建设社会主义。这对非洲尤为适用,因为非洲仍然有着重要的公有制结构,这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可以期待一个伟大的前景的。但是为了保护 and 改造这些体制,革命必须很快来临,否则的话,资本主义或官僚主义的集体制将会清除这些结构并迫使非



洲各国人民也走上充满悔恨的道路。这一论据，正如马克思在上一世纪关于俄国问题的提法一样，现在也适用于全世界。我们但愿它不致遭到同样的命运。

今日 如同在马克思的时代一样 如果我们想建设社会主义的话，就必须突破剥削锁链上最强大的一环——先进的工业国。<sup>451</sup>但是 正是基于这一理由，它提出的任务和挑战直接关系到我们 而且要求我们采取行动。我们认为 对于这部专致力于马克思历史发展思想的著作 没有比马克思的下列话语更好的结束语了 现在这句话是比任何时候更加中肯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9 页。——中译者注）

## 注 释

(以下所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选集》均系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

- 1 佩里·安德森：《专制主义国家的渊源》(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New Left Books, London, 1974, P. 548) 该书第 462—549 页专门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
- 2 见 G. 科尔科：《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G. 科尔科：《战争的政治》；L. 肖普：《战后世界的形成》载《造反的社会学家》杂志。(G. kolko, "The Roo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eacon Books, Boston, 1969；G. Kolko, "The Politics of War", Weidenfeld & Nicolson, London, 1969；L. Shoup, "Shaping the Postwar World", "The Insurgent Sociologist", Easter 1975.)
- 3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21 页。
-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 页。
- 5 列宁：《伟大的创举》载《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0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 6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32 页。
- 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83 页。
- 8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60 页。
- 9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22、124 页。
- 10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1—32 页。
- 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18—119 页。

- 12 里奥·休伯曼和保罗·斯威齐：《〈资本论〉一百周年札记》载《每月评论》(Leo Huberman and Paul Sweezy, "Notes on the Centenary of Das kapital", in "Monthly Review", New York, vol. XIX, no.7, P. 16.)
- 13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 14 这方面例如，荷兰社会民主党人范科尔在阿姆斯特丹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1904年8月14日至20日止用公开的种族主义语言提出一种奇特的单线发展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世界各国人民都必然要经过一个资本主义阶段“卡尔·马克思关于某些国家在它们的发展中将能至少部分地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假说，并未实现；各原始民族只有承受这一苦难，才能达到文明。因此我们的责任不是去阻碍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的发展。”(见埃莱娜·卡雷尔·德昂科斯和斯图尔特·R.施拉姆编《马克思主义与亚洲》。“Le Marxisme et l'Asie”, ed. 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 and Stuart R. Schram, Editions Colin, Paris, 1965, Eng. trans. "Marxism and Asia from 1853 to the Present Day",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London, 1969, pp. 125—126.) 伯恩斯坦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被统治民族反对其主子的斗争并非都是争取解放的斗争”所以“当气势汹汹的、不懂文明的民族起来造文明的反的时候他们没有权利取得我们的同情。”(卢西亚诺·阿莫迪奥引自卢森堡的《选集》一书导言。quoted by Luciano Amodio in the introduction to Rosa Luxemburg, "Scritti Scelti", published by Avanti!, Milan, 1963, p. 27 n.) 以及意大利本国的拉布里奥拉(关于他，见翁贝托·梅洛蒂所著“意大利文化中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感”载《第三世界》杂志, Umberto Melotti: "Razzismo ed etnocentrismo nella cultura italiana", in "Terzo Mondo", Milan, vol. I, no. 2, Oct. 1968, pp. 28—68)。
- 15 斯大林的观点肯定受到实用主义考虑的影响。在国内，关于亚洲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特点是：即使没有私人所有制，但有一个剥削性的官僚阶级，这同托洛茨基对苏联社会的分析似乎惊人地相似。在国外，有必要使苏联的模式合法有效，并强调俄国历史和俄国革命的榜样性和典范性以肯定这个“主导社会主义国家”对领导权的要求，强调他的对外政策在有关亚洲问题上的倾向，以及害怕这种主义会对亚、非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产生反效果。

毛对于那些看法中的某些内容有同感，但不得不更加防备那些主张这种思想的人或明或暗的种族优越感的解释，他们看来几乎要暗示亚洲同西方有着自然的、长期的联系条件。毛虽然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亚洲社会分析的一大部分（虽然并不接受它的语汇），他却始终强调中国文明的伟大传统、光辉的历史背景、以及它的长期革命传统，虽然这样强调同文化革命期间强调的是相反的。

- 16 斯大林自己使五阶段的单线发展理论成为神圣不可侵犯，而并不感到需要从逻辑上和历史上使之站得住脚。他简单地把这说成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他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 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载《斯大林文选》第199页 人民出版社，1962年。）即使在非斯大林化以后，这个教条仍然没有倒。已译成若干种文字的苏联马列主义的典范材料《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断言：“整个说来 人类经历了四种社会形态 原始公社 奴隶占有制 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现在人类正生活在向下一个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过渡的时代。这一形态的第一阶段叫做社会主义。”（三联书店 中译本第149页，1960年）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家接受这种教条的话 他就面临一项自相矛盾的任务 不是去“发现”历史，而是要根据已经一劳永逸地作为真理而接受的一种先验的模子来“重新发现”历史。这正是马克思所正确地加以反对的态度。
- 17 瓦西里·司徒卢威：《早期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定义》，载《苏联人类学》法译文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研究》（Vasili Struve, “Markovskovo opredelenie renneklassovogo obshchestva”, in “Sovietskaya Etnografia”, Moscow, no.3, 1940, p. 122; French trans. in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 Paris, no. 57—58, Jan.-Apr. 1967, pp. 79—97.）
- 18 但是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例如，我们注意到 M. A. 契科夫和 V. A. 梯乌林论述中世纪亚洲所流行的阶级结构的一篇著作。在那本书里，亚洲社会被定为一种“社会发展的自治类型”（其特点是 没有一个与国家分开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分化超过经济分化，君王与臣民之间的关系超过土地剥削；以及生产资料生产者的所有制。）“如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样，这种类型来自一个共同出发点：亚细亚型的原始阶级社会，它一条路走向奴隶制，另一条走向封建主义，第三条发展到具有自己独特基础的亚细亚社会。”（引自里奥尼德·塞道

夫至今尚未发表的文章‘安哥拉的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载巴黎《思想》杂志;Leonid Sédov, “La société angkorienne et le problème du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La Pensée”, Paris, no.138, Mar.-Apr.1968, pp.71—72也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书中,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Marxistes,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Editions Sociales, Paris,1969, pp.327—328。在本书第一版写成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段引文,它似乎是戈德里埃新单线发展论的“泛亚主义”同我们的多线发展图式之间的一种中间观点。(见以后的内容)

- 19 最近两位严肃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方向的历史学家所作的自我批评,似乎使我们在这方面特别感到兴趣;他们是:东方学家让·谢诺和非洲学家让·絮勒-卡纳尔。谢诺最近承认,他以前把越南历史解释为封建的现在看来‘应完全抛弃’。他写道:“为了把古代越南的社会结构同古典的封建制机械地联系起来,我们就不得不有计划地闭眼不看一系列事实,那些事实是可以很容易地适合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让·谢诺:《亚细亚生产方式若干研究观点》载于巴黎《思想》杂志,也载于《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书;Jean Chesneaux,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Quelques perspectives de recherche”, in “La Pensée”, Paris, no.114, Apr. 1964; also in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34, n.1.) 絮勒-卡纳尔说:“我们谈了非洲的‘封建社会’之后我们感到不得不抛弃这个提法。传统非洲的生产方式从来不是‘封建的’如果在一种纯政治意义上来使用这个字眼那是会造成混乱的。”(让·絮勒-卡纳尔:《赤道非洲的传统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载《思想》杂志也载于《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书;Jean Suret-Canale, “Les sociétés traditionnelles en Afrique tropicale et le concept d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La Pensée”, Paris, no.117, Oct.1964, p.34; also in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118.)
- 20 例如,那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所采取的立场。见特凯《论亚细亚生产方式》(Ferenc Tökei,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1966)。本书中所收录的论文,早已在1962—1964年的《现实》杂志上以匈牙利文发表过,并在1965年由考苏斯以书籍形式印刷出版。部分译文在1963年由巴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以及在1964年4月的第114期《思想》上发表过对法国

学者们有过相当大的影响。

- 21 见恩里卡·科洛蒂·比歇尔：《对越南的帝国主义编史法和革命的编史法》载都灵《现代史评论》(Enrica Collotti Pischel, "Storiografia imperialista e storiografia rivoluzionaria sul Vietnam", in "Rivista de Storia Contemporanea", Turin, vol. I, no. 1, Jan. 1972 年 pp.99—101.)
- 22 迈克尔·夏庇若：《社会发展各阶段》载伦敦《今日马克思主义》(Michael Shapiro, "Stag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Marxism Today", London, vol. VI, no.9, Sept. 1962, p.283.)
- 23 见例如恩格斯 1884 年 1 月 18 日致倍倍尔信, 1884 年 2 月 14 日致考茨基信; 1890 年 10 月 27 日致施密特信。戈德里埃一度曾支持过恩格斯在会见摩根以后放弃这种概念的理论——这种理论似乎是被普列汉诺夫的一句话所启发的, 并在不同的作者中不时出现——最近也在事实面前已经改变了主意。(见莫里斯·戈德里埃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前资本主义社会》所写的前言。Maurice Godelier, preface to Marx, Engels, Lenin, "Sur les sociétés précapitalistes",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70; Italian trans. Feltrinelli, Milan, 1970, p.94.)
- 24 小阿瑟·施莱辛格：《论历史的不可理解性》，载伦敦《遭遇》杂志。(Arthur Schlesinger, Jr, "On the Inscrutability of History", in "Encounter", London, Nov. 1966, p.11. )
- 25 雷蒙德·阿隆：《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Raymond Aron, "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67, p. 156.)
- 26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历史导言》(Georgy Plekhanov,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sociale de la Russie", 1914, Editions Bossard, Paris, 1926, p.4.)
- 27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Georgy Plekhanov,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 New York, 1969, pp.68—69, 63)。
- 28 列夫·托洛茨基：《答波克洛夫斯基》载《真理报》(Lev Trotsky, "Reply to Pokrovsky", "Pravda", 1—2 July 1922; Eng. trans. in Appendix to vol. I of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rans. Max Eastman, Gollancz, London, 1932, p.470)。
- 29 卡尔·A. 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关于绝对权力的比较研究》(Karl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 of Total Power”, Yale Univ. Press, New Haven, Conn.,1957)。
- 3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 31 特别见前引特凯文·莫里斯·戈德里埃：《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Maurice Godelier, “La notion d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Marxistes, Paris, 1963, also in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p.60) 前引谢诺文·前引絮勒-卡纳尔文；皮埃尔·布瓦图：《殖民地时期以前马尔加什社会的土地所有制》，载巴黎《思想》杂志 Pierre Boiteau, “Les droits sur la terre dans la société malgache précoloniale”, in “La Pensée”, Paris, no. 117, Oct.1964, pp. 43—69)；夏尔·帕兰：《地中海史前期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载巴黎《思想》杂志 Charles Parain, “Protohistoire méditerranéenne et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La Pensée”, Paris,no.127, June 1966, pp.24—43) 埃莱娜·安托尼亚尼亚-比比库：《拜占庭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载巴黎《思想》杂志 Hélène Antoniana-Bibicou, “Byzance et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La Pensée”, Paris, no. 129, Sept. -Oct. 1966, pp.47—72)；京特·莱文：《论中国社会发展中解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Günter Lewin, “Zu einigen Problemen der ‘asiatischen Produktionsweise’ i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Chinas”, in “Wissenschaftliche Zeitschrift der Karl Marx Universität Leipzig”, Gesellschaft-und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Reihe, vol. XIII, no.2, 1964, pp.251—256)；叶甫根尼·瓦尔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问题概论》(Evgenij Varga, “Otcherki po problemam politekonomii kapitalisma”, Moscow,1965)，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最重要段落法译文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研究》(“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 Paris, no.57—58, Jan. -Apr. 1967, pp.98—117) 丹尼尔·索纳：《马克思论印度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载伦敦《印度社会学文集》(Daniel Thorner, “Marx on India and the Asian Mode of Production”, in “Contribution to Indian Sociology”, London, vol. IX, Dec.1966)。若干日本学者也采取那个路线，例如修次畔川、袈裟美佐文、敬助赤松和春木配川(参看公雄·盐泽：《日本的历史学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载巴黎《思想》杂志。Kimio Shiozawa, “Les historiens japonais et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La Pensée”, Paris, no.122, Aug

1965, pp.63—78)。在意大利,通过戈德里埃的例子,这种观点被雷莫·圭迪埃里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专制主义》里接受了,载罗马《社会主义问题》(Remo Guidieri, “Modo di produzione asiatico e dispotismo orientale”, in “Problemi del Socialismo”, Rome, vol. IX, no. 16, Mar.1967, pp.326—339)。

- 32 前引谢诺文载《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第 24 页 英译文载欧内斯特·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之形成》(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trans. Brian Pearce,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71, p.124)。
- 33 前引谢诺文 第 25—27 页 英译文见前引曼德尔书第 125 页。
- 34 前引戈德里埃文 载《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第 87 页。
- 35 散见前引戈德里埃文;前引谢诺文第 31 页。事实上,戈德里埃区分两类亚细亚方式,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多数势力是否承担具有经济职能的大规模工程,例如在中国和黑非洲。然而,他说这两类方式的相同之点是:两者都具有群居关系矛盾地结合的共同结构,那是无阶级社会和孕育着阶级分野的社会的特点(第 88 页)。
- 36 因此,我们发现戈德里埃主张“这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具有地理和历史的普遍性,它出现于无阶级社会的必要条件正在发展的时候,不论是在公元前四千年初期的埃及——当时尼罗河流域的部落社会变成两个君主国,然后又成为一个统一的帝国——还是在十九世纪,当时喀麦隆产生了巴蒙王国(前引书第 86 页)他进一步重新说明其定义称亚细亚生产方式“似乎比马克思或恩格斯所预见可适用的时间和空间要广大得多(第 99 页)。同样地,谢诺没有觉察到他这番话本身所容易导致的反意,他说,他解释的亚细亚方式“已经达到未曾预见到的那种程度的普遍适用性(前引书第 38 页)。因此布瓦图认为亚细亚方式是全世界各国都经历过的一个普遍的和必要的阶段(前引书第 63 页)戈德里埃(前引书第 80、86、100 页和谢诺前引书第 39 页甚至主张在描述这个生产方式时不要提“亚细亚”假如抱那种态度的话我们就说不出他们为什么要用一套新公式来装扮这个老模式,例如说什么“他们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活,对于那些过时的、引起争论的理论僵尸以致命的一击,一下子就彻底摧毁,因为它们只是假装活着而已,例如奴隶制的普遍性、超越阶段的不可能性等等(前引戈德里埃书第 98 页)或者说“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性的新教义来替代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普遍性的教义,那是没有问题的”(前引谢诺文第 44 页)。他们研究



- 亚细亚方式的整个目的，实际上只是把老一套的单线发展模式精细地改头换面而已。有时候，这一点是很公开地说出来的。例如，谢诺感到他必须加以说明以便对上述断语作出限制，他说他的谨慎（如果能这样说的话）不是出于对任何单线图式抱根本上的不信任，而只是由于同亚细亚方式的普遍性相对立的理论“将会是证据不足的和有‘教条主义’结果的”（前引书第 44 页）。
- 37 前引曼德尔书第 127 页。
- 38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草稿》（1857—1858）第 1 分册第 36 页 人民出版社，1975 年。
- 39 参看前引戈德里埃文第 92—97 页。
- 40 居伊·多夸：《历史问题》（Guy Dhoquois, “Pour l’histoire”, Editions Anthropos, Paris, 1971, p. 124）他认为“欧洲中心论”被明显推翻，却相反地复活了“希腊奇迹”的意义，并把波斯战争恢复到作为几种文化之间的斗争的地位，正如艾希卢斯和希罗多德的看法那样。通常头脑很清楚并且颇具批判精神的一位作家竟得出这些结论，适足以证明在现代伪装下某些解释的变化，又引回到所谓“文明之战”的陈词滥调。
- 41 前引戈德里埃书第 40 页。特凯最近也已采取这个结论（见特凯书的 1969 年德文版最后一章第 137 页）。
- 42 前引戈德里埃书第 80 页。
- 43 戈德里埃对《论前资本主义社会》一书意大利文版所写的前言（“Sur les sociétés précapitalistes” pp.9—10）。又见前引圭迪埃里书第 330 页。
- 44 莫里斯·戈德里埃：《今天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和明天的研究》载巴黎《思想》杂志 Maurice Godelier, “La pensée de Marx et d’Engels aujourd’hui et les recherches de demain”, in “La Pensée”, Paris, no. 143, Feb. 1969, pp.92—120)。
- 45 罗歇·加罗迪：《社会主义的转折点》（Roger Garaudy, “Le grand tournant du socialisme”,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59; Eng. trans. “The Turning Point of Socialism”, Fontana Books, London, 1970, p.99)。
- 46 罗歇·加罗迪：《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Roger Garaudy, “Marxisme du XX siècle”, Editions Plon, Paris, 1966, pp.49—50; Eng. trans. “Marx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llins, London, 1970, pp.46—47)。

- 47 罗歇·加罗迪：《中国问题》(Roger Garaudy, "Le Problème chinois", Editions Seghers, Paris, 1967, p.43)。同样地 卢卡奇在他去世前不久发表的一篇访问记中说：“存在于中国的不是封建主义，而是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西。需要有熟悉古代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专家来分析已经发生的过渡 这非常肯定意味着一些新的特点。”(格奥尔格·卢卡奇：《对社会主义官僚政治的批判》 载巴黎《人与社会》杂志。György Lukács, "Critique de la bureaucratie socialiste", interview by Yvon Bourdet, 16 Apr. 1971, in "L'Homme et la Société", Paris, no. 20, Apr. —June, 1971, p.9)。
- 48 马克西姆·罗丹松《伊斯兰与资本主义》(Maxime Rodinson, "Islam et capitalisme",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6, Eng. trans. "Islam and Capitalism", trans. Brain Pearce, Allen Lane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1974, pp.58, 64)。意大利国内对这些题目的辩论继续处于落后状态。该书译本受到一个通常在文化问题上消息灵通的周刊的严厉批评 可以明显地反映这一点(参见《彩色信使报》。"L'Espresso colore", vol. 1, no.28, 14 July 1968, p.25)。直到最近 该杂志才有所修改 对该书作了很不同的评价 参见维托里奥·萨尔蒂尼：《资本在东方没有出现高涨》。Vittorio Saltini, "Il capitale non sorge in Oriente", in "L'Espresso", vol. XVII, no.35, 29 Aug. 1971, p.19)。
- 49 前引罗丹松书第 59 页。事实上那个上层建筑是封建王公们在没有一个照管他们特权的国家的情况下不得不相互组成的联盟网(这些联盟至少部分地是按照统治集团的路线组成的)。这些联盟是在明确的阶级分野的基础上组织的，鉴于农民可能再次造反来反对以非经济强制手段剥夺他们剩余产品的个人，从而脱离了封建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那种剥削类型 参看前引多夸书第 140 页)。
- 50 霍布斯鲍姆也强调这一方面：“在形式上，对农奴制的任何真正的讨论[从来没有](比奴隶制的讨论更多)事实上 这两种生产关系时常被放到一起 作为不同于自由劳工地位的‘主奴关系’。(埃里克·J. 霍布斯鲍姆对卡尔·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一书的前言。Eric J. Hobsbawm, preface to Karl 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Lawrence Wishart, London, 1964, p.41)。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 当然是他在 1857—1858 年间为起草《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写的长得多的笔记的一部分。那些笔记于 1939—1941 年在莫斯科出版 书名叫《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前只在 1903

年在《新时代》出版过简短的摘录)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并由于它出版于苏联,使得这部著作在 1953 年以前实际上一直不为人知, 1953 年时先前的摘录本在柏林出版了。其中关于前资本主义形态的一节也于上一年作为单行本在柏林出版了, 1956 年在意大利由团结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全书已有意大利文译本(1969年由弗罗伦萨“新意大利出版社”出版)我们也在使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记得以前的摘译本。

- 51 前引罗丹松书英译本第 60 页。
- 52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1 页。
- 53 布鲁诺·里齐:《世界的官僚主义化》 意大利文版《官僚主义的集体制》(Bruno Rizzi, “La Bureaucratisation du monde”, Paris,1939; Italian edition “Il collectivismo burocratico”, Galeati, Imola,1967)。

本书作者接受里齐使用的一些词汇,发现其准确而有用,但肯定不同意他谈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他关于官僚主义的集体制同资本主义相比是向后看的观点。这样的论点使里齐后来作出一些近乎荒谬的断言,例如说苏联现在是一个封建制的社会(见里齐上述书的最新意大利文版附录 第 171—177 页)当本书第一版准备付印时 我们高兴地看到另一位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一本富有洞察力的专著中对官僚主义的集体制的定义,作了一种好的说明(见安东尼奥·卡洛:《苏联社会—经济的性质》,载罗马《青年批判家》。Antonio Carlo, “La natura socio-economica dell’ URSS”, in “Giovane Critica”, Rome, no. 26, Spring 1971, pp.2—83)。

- 5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10 页。

一位能干的德国学者在评论这段话时写道:“各个前资本主义形态——好比黑格尔所谈自然的各个形态——是同时存在的,好象相互之间并不注意,并不觉察似的。只是从理论上考虑时 对一种形态的修改才显得是对这种形态的改善,即使不一定是由它所产生的。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如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几乎都是那么直线发展的。……马克思远远不仅是一位进化论者。”(艾尔夫雷德·施密特:《辩证唯物主义在自然史中的地位》 载《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意大利文译文载《马克思的自然观》。Alfred Schmidt, “Zum Verhältnis von Geschichte und Natur in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in “Ex-

istentialismus und Marxismus”,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1965, Italian trans. in “Il concetto di natura in Marx”, Laterza, Bari, 1969, p. 171)。但本书作者不能同意施密特说得那么过分：“对马克思来说，历史进程……并不符合于使之浑为一体和具有意义的任何思想”（第 171 页）或者断言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是没有历史记载的自然性质的”（第 166 页）因此认为在那个阶段里不可能谈到真正的“社会”（第 170 页）。事实上，马克思认为不可能把历史和自然对立起来，“好象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好象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9 页。历史包含了人的解放过程 这无可否认地构成了它的意义。

5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 3 分册第 91 页，人民出版社，1963 年（1977 年第二次印刷下同）

56 同注 55 第 91 页。

57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说这是“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的 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 或者最多是靠耕作生活的。”但加了一点附带条件说，“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前提的。”（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6 页）。

我们强调这个严格双重定义，以表明马克思所看到的上述段落中描写的原始公社同以农为主而缺乏耕地的亚细亚公社之间的差别有多大。这同主张这一点的许多人——特别是例如郭沫若那样的中国历史学家和索纳那样的西方新单线论者——把两者不加思索地放在一起的办法 很不一样。

58 同注 55 第 91 页。

59 同注 55 第 91 页。

60 同注 55 第 114 页。

61 同注 55 第 102 页。

62 同注 55 第 91 页。

63 同注 55 第 103 页。

64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48 页。

65 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78 页。

66 同注 55 第 100 页。

67 同注 55 第 96 页。

- 68 同注 55, 第 102 页。(Eng. trans.p. 484.)。
- 69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在人类文化初期 在狩猎民族中 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的农业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象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71 页）。
- 70 同注 55 第 116 页。
- 71 同注 55 第 92—93 页。
- 72 马克思特意强调俄国农业公社同更加古老的形态之间的主要差别，他写道：〔俄国的〕“农业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49 页、450 页）。
- 73 例如见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1868 年 11 月 7 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资本论》第 3 卷 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反杜林论》、《法兰克时代》。
- 74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01 页。
- 7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4 页。
- 76 同注 55 第 94 页。
- 77 同注 55 第 93—94 页。
- 78 同注 55 第 96 页。
- 79 同注 55 第 99 页。
- 80 同注 55, 第 100 页。
- 81 同注 55 第 100 页、101 页。
- 8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22 页脚注 1。
- 8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92 页。
- 84 同注 55 第 95 页。

- 85 同注 55 第 112—113 页。
- 86 同注 55, 第 109 页。
- 87 前引罗丹松书英译本第 64—65 页。
- 88 在他们最早的作品中,他们就急于强调那一点:“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180 页)。
- 至于把土地所有权定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虚构,可见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693 页。
- 89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82 年 12 月 22 日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31 页。
- 90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891 页。
- 91 同上 第 894 页。
- 92 同上 第 893—894 页。
- 93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1 页。
- 94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8 页。
- 95 同上 第 80—81 页。
- 9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00 页。
- 97 甚至霍布斯鲍姆也没有领会恩格斯在这个重要方面的分析。他对这个问题的评论,与其说是在说明问题,倒不如说是令人感到混乱。尽管有前面的那些主张,但他在特定的这一点上的见解仍然太接近于单线发展的模式。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企图把恩格斯的见解勉强地解释为:“在衰落中的古代方式和兴起中的封建方式之间建立起一种逻辑的联系,尽管一种方式实际上是由外国的蛮族入侵者在另一种方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然后,因为他显然无法在恩格斯著作中找到支持他错误理论的任何内容,他就从狭隘的经济主义观点来攻击恩格斯,指责恩格斯只作了“社会、政治和军事的而不是经济的”阐述。他还说“恩格斯的分析的普遍性水平低于马克思”,但是当然不可能指明章节出处,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在这些问题上花费许多时间。但霍布斯鲍姆一般并不

喜欢不恰当地把恩格斯同马克思作比较的那种老花招，实际上，在这同一页上，他就承认他们两人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从未有过任何严重分歧。（见前引霍布斯鲍姆书第 53—54 页。）

- 9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44—145 页。
- 99 同上 第 145—147 页。
- 100 同上 第 147—148 页。
- 101 同上 第 148 页。
- 102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541 页。
- 103 例如 见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关于俄国公社 见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关于亚洲和俄国的公社，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 104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49 页。
- 10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48—150 页。
- 106 同上 第 151—152 页。
- 107 同注 55，第 103 页。

恩格斯也以类似的意思写道：“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们内部产生财产上的差别从而开始解体以前，可以存在几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里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则相反，它存在还不到三百年，而且只是从大工业出现以来，即一百年以来，才占据统治地位，而在这个短短的时期内它已经造成了分配上的对立——一方面，资本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一无所有的群众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它必然要趋于灭亡。”（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88 页。）

- 108 关于亚细亚国家起源的这种看法，已经由于它的所谓“循环性”而受到批评，虽然，某些寻找方便目标的作家们则宁可攻击威特福格尔，而不去攻击马克思。因此，例如利奇就对威特福格尔展开争论，利奇认为象威特福格尔这类理论是完全循环性的，因为它把国家的兴起归因于大水利工程 那是国家存在的前题（参见 E. R. Leach：《锡兰的水利化社会》载伦敦《今昔》杂志。E. R. Leach, “Hydraulic Society in Ceylon”, in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no.15, Apr. 1959, p.5.）。同样地 其他人则说 明显的是“并非水利工程产生或稳定了专制政权”而

“正相反 是有了专制机关和军队 才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这是新近一位评论家维托利奥·萨尔蒂尼在《古代中国之公社》中的话 载罗马《信使》报 Vittorio Saltini, “Le comuni dell’ Antica Cina”, in “L’Espresso”, Rome, year XVII, no.34,22 Aug.1971, p.19), 这是一篇关于对亚细亚背景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各种研究的评述, 特别谈到雅克·热尔内的《古代中国》(Jacques Gernet’s “La Chine Ancienn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64, p.81; Italian trans., Il Saggiatore, Milan, 1971)。另一方面“亚细亚社会的理论”的最早批评者之一艾伯哈德说: 建造、维修和经营巨大灌溉体系的 需要, 不可能成为先是官僚集团后是专制国家兴起的原因, 因为艾伯哈德的意见认为(我们要强调这一点), 直到当代, 一切灌溉体系都是农民的合作社所建造、管理和维修的 或者至少是它们所管理和维修的”。(沃弗拉姆·艾伯哈德:《中国史》。Wolfram Eberhard, “Geschichte Chinas”, Berne, 1948; French trans., Payot, Paris, 1952, p.63)。

“亚细亚社会的理论”的名称本身就意味着目标针对的是威特福格尔, 因为那是他在两次大战之间所写的一部作品的名称(卡尔·A. 威特福格尔:《东方社会的理论》载《社会研究杂志》。Karl A. Wittfogel, “Die Theorie der Orientalischen Gessellschaft”,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vol. VII, 1938, pp.90—122)。

在不转向任何一个极端的情况下, 必须承认(只要无偏见地研究中国历史就能清楚地看到): 在互相促进的国家和大规模水利工程之间, 有着明白的辩证关系。这全是马克思所要说明的。

- 109 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219页。
- 110 同注55第92页。
- 111 同注55,第92页。
- 112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 113 同注55,第92页。
- 114 关于这一名称的历史, 以及由于它时常被误用而具有种族优越感的弦外之音问题, 见弗朗哥·万图里《东方专制主义》, 载《意大利历史评论》(Franco Venturi, “Dispotismo orientale”, in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vol. LXXII, no. 1, 1960, pp. 117—126) 又参见 R. 科尔布纳:《专制暴君和专制主义一个政治名词的变迁》载《沃伯格与考陶尔德研究会会刊》(R. Koelbner, “Despot and Despotism: Vicissitudes



of a Political Term”, i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XIV, 1951, pp. 275—302) 以及斯特林-米肖:《东方专制主义的神话》(S. Stelling-Michaud, “Le mythe du despotisme oriental”, in “Schweizer 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vol. XVIII-XIX 1960—1961, pp. 328—346)。

- 115 事实上,“普遍奴隶制”只不过是“专制主义”的另一种面貌而已。都是马克思使用的名词,而且是它的原意。“专制暴君”的名称来自希腊人,意为“主人”,尤指“奴隶主”。古代希腊人认为亚洲君王的臣民的地位是低下的,因此把那些君王称为“专制暴君”。自然,这种态度主要是由于希腊文化典型的以我为中心的特性,因此,希腊人传给我们的“野蛮人”一词,原意指的是“外国人”。大多数富裕的希腊人很容易忘记他们的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无论如何是通过黑格尔从希腊人那里抽取这两个概念的,正如他年青时的著作中所证明的。因此,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立法权理论时,他引用了黑格尔下列一段话:“在东方和埃及为进行巨大工程等等而尽的义务也有特殊的质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缺乏主观自由的原则。”(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8—319页。)同样地,马克思在论述出版自由的著作中使用了希罗多德所报导的斯巴达青年对总督希达尔奈斯的答复:“你知道做奴隶的滋味;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却一次也没有尝过,所以你就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为只要你尝过它的滋味,你就会劝我们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了。”(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5—96页。)一向乐于主张种族优越感的威特福格尔也突出地使用那同样的引文来总结他的意识形态巨著(参见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第449页)。然而,马克思后来设法抵制他的材料中的种族优越感和他自己的早期著作,强调说,从被剥削者观点看来,东方的“普遍奴隶制”并不比经典的古代真正奴隶制更加糟糕(见前书)。

- 116 这些是特凯三篇研究报告的结束语,现三篇收在一本集子里(见前引特凯书第19页、66页、88页)。

- 117 参见孟德斯鸠《法意》(1748)。

孟德斯鸠自己的材料来源有:《1740—1744年周游世界》(伦敦,1774年)一书的作者皇家海军军官乔治·安森(1697—1762);班丁克的《鞑靼人谱系史》(莱顿,1726年);法国医生和旅行家弗朗斯瓦·贝尔

尼墩(1620—1688)他是大汗国游记《旅程》(阿姆斯特丹,1699年)一书的作者,马克思也曾提到过他;去波斯、印度和高加索的一位法国旅行家让·夏尔丹(1643—1713),《波斯与东方印度旅行记》(阿姆斯特丹,1711年)一书的作者。法国航海家纪尧姆·当皮埃尔(1651—1715)他曾访问过北美和中美、北越斯巽他群岛,留下了《周游世界的新航程》(阿姆斯特丹,1711年)一书。法国旅行家克劳德·德·福尔班(1656—1733)他住在暹罗甚至在那里担任过军官职务,著有《回忆录》一书;法国耶稣会教士让-巴蒂斯特·德·阿尔德(1674—1743)他根据他的传教士们寄给他的材料汇编了一本《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民族的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情况说明》(巴黎,1735年);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的一位英国史学家和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著有《古代波斯宗教史》一书;为荷兰西印度公司服务的一名德国医生和旅行家恩格伯特·卡姆佛(1651—1716)他在阿拉伯、印度、爪哇、暹罗和日本旅行了四年,留下了一部《日本帝国民间与教会本地史》(海牙,1732年);驻暹罗特使西蒙·德拉·卢贝尔(1642—1729),《暹罗王国的关系》(阿姆斯特丹,1714年)一书的作者;为俄国服务的一名瑞典工程师洛朗·朗热,十八世纪时曾在北京住过多年,著有《中国之行通讯》载于《北行集——对贸易与航海极有用处的各种回忆录文集》(阿姆斯特丹,1715年);一名十七世纪的法国旅行家洛吉埃·德·塔西斯,《阿尔及利亚史》(阿姆斯特丹,1725年)一书的作者;一名法国旅行家让-雅克·道图斯·梅朗(1678—1771),《书信集》的作者;一名英国工程师和旅行家约翰·佩里(1670—1732),著有《当前沙皇治下的俄罗斯国家》(伦敦,1716年),法译本于1717年发表于海牙;一名十七世纪的法国旅行家弗朗索瓦·皮卡尔,著有《东印度、马尔代夫、摩洛哥、巴西航行记》一书(巴黎,1619年);法国历史学家保罗·李考特,《奥斯曼帝国》(1678)一书的作者;法国耶稣会教士加斯帕尔·罗德罗,《启发与好奇通信集》(1703—1741)一书的作者;一名法国旅行家让-巴蒂斯特·塔韦尼埃(1605—1689),《土耳其、波斯和印度六次航行记》(巴黎,1676年)一书的作者;还有《公元九世纪两名回教旅行者同印度与中国的古代交往》以及《为建立东印度公司而进行的多次航海文集》(阿姆斯特丹,1710年)中的“荷兰人去东印度的初次旅行”和其他文章。

孟德斯鸠和他的材料中提出的亚细亚社会形象,即使在他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反对的。伏尔泰对于他所描绘的“只关心自己幻想的一个狂暴疯子”进行“可怕的治理”的形象加以反对,但是却提出了一种同

- 样有偏见的看法：认为中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优于欧洲；他用中国人民了解真正的“自然法则”这一点来解释它的不变性（伏尔泰：《评〈法意〉一书中的若干主要定理》载《孟德斯鸠文集》第八卷附录。François-Marie Arouet de Voltaire, “Commentaire sur quelques principales maximes de l’Esprit des Lois”, in Appendix to “Œuvres de Montesquieu”, Lequien, Paris, 1819, vol. VIII, pp.199, 230)。从 1775 年至 1761 年曾经住在印度的一名法国东方学家昂克蒂尔-迪佩隆，在提到贝尔尼埃和孟德斯鸠时，也批评“旅行家们对亚洲所描绘的那幅有时出于幻想、有时出于自私或作为警告的图景”以及在那种基础上制造出来的“所谓专制政府的特殊类别”（亚伯拉罕-亚森特·昂克蒂尔-迪佩隆：《东方的立法》。Abraham-Hyacinthe Anquetil-Duperon, “Législation orientale”, Amsterdam, 1778)。
- 118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76 页。
- 119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集》（G. W.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1830—1831]；Eng. trans.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J. Sibree, Dover, New York, 1956)。
- 120 亚当·斯密：《国富论》（Adam Smith, “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1937, pp. 348, 360, 362, 645, 687, 789)。
- 121 詹姆斯·穆勒：《不列颠在印度的历史》（James Mill,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n India, 2nd ed., London, 1820, vol. I pp. 175 ff)。
- 122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70 页。
- 123 理查·琼斯：《财富分配与税收来源论文集》（Richard Jones,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on the Sources of Taxation”, London, 1833；《各国政治经济学讲座教科书》（“Textbook of Lectur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s”, Hertford, 1852, pp. 77—78)。马克思所引的段落是从第二本书中摘出的。我们的其他两段引文《教科书》第 75 页和《论文集》第 136 页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提到了（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 3 卷）。
- 124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 London, 1909, pp. 12 ff)。

- 125 前引贝尔尼埃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通信中直接提到了贝尔尼埃的理论。参见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1853年6月2日。
- 126 马克·威尔克斯：《印度南部的历史概要》（Mark Wilks, “Historical Sketches of the South of India”, London, 1810—1817）；乔治·坎贝尔：《现代印度文官政府制度概要》（George Campbell, “Modern India: 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185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曾提到）
- 127 其中包括托马斯·芒恩：《论印度对东印度群岛的贸易》（1621）；约翰·波莱克斯芬：《英国与东方贸易》（1697）；萨尔蒂科夫：《印度信札》（1848）（Thomas Mun, “A Discourse on Trade from India to the East Indies”, 1621; John Pollexfen, “England and Eastern Trade”, 1697; Saltykov, “Lettres sur l’Inde”, 1848）。马克思与恩格斯通信中还提到有福斯特神父写的《阿拉伯的历史地理》以及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的著作（Rev. C. Foster,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rabia”, and the works of the orientalist William Jones）在《资本论》第1卷中摘引的有休·默里与詹姆士·威尔逊合著的《英属印度的历史与风貌》（Hugh Murray and James Wilson,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British India”, Edinburgh, 1832）和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殖民化艺术之我见》（Edward Gibbon Wakefield, “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ization”, London, 1849）以及其他许多关于“亚细亚”的文本。
- 128 托马斯·拉弗尔斯：《爪哇及其属地史》（Thomas Raffles, “History of Java and its Dependencies”, London, 1817）1853年6月1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不列颠对印度的统治》和《资本论》第1卷中曾引用过。
- 12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 130 关于这一点，多夸说得好：“在亚细亚方式中……国家担负着经济和社会的职能，成为这种生产方式的一部分特点；但国家仍然是上层建筑这一点并不受到妨碍。（居伊·多夸：《早期的阶级社会亚细亚形态》，载巴黎《人类与社会》。Guy Dhoquois, “Les premières sociétés de class: Les formes asiatiques”, in “L’Homme et la Société” Paris, no. 12 April-June 1969, p. 152）。
- 131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2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

第 256 页。

- 132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6日。同上书，第260—263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肯定了这些思想：“在整个东方，公社或国家是上地的所有者，在那里的语言中甚至都没有地主这个名词。……只有土耳其人才在被他们所征服的东方国家推行了一种地主封建制度。”《反杜林论》第2编 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5—216页。
- 133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5页。有一位中国作者也指出过，佛兰德和意大利的灌溉设施可以由民办的社团来举办，只要这些国家里商业资本已经达到高度发展的水平（参阅：冀朝鼎：《从治水公共工程发展来看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地区》。Chi Chao-ting,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 Control.” Allen & Unwin, London 1936）。
- 134 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4页。
- 135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
- 136 恩格斯写道：“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编 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221页）
- 137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8—149页。（哈努曼是印度传说中的神猴，后来被奉为印度教的毗湿奴的化身。撒巴拉是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注。）
- 138 同上书 第147页。
- 139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9页。
- 14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6页。
- 14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6页。
- 142 同上书 第396—397页。
- 143 伊韦·巴雷尔：《马克思主义和发展》 载《〈资本论〉初学》文集（Yves Barel, “Marxisme et développement”, in the collection “En partant

- du 'Capital',” Editions Anthropos. Paris, 1968)。
- 144 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0—461页。
- 145 卡尔·科尔什：《卡尔·马克思》（Karl Korsch, “Karl Marx”, Russell & Russell, New York, 1963, p. 224）。
- 146 恩格斯：《致康德·施米特的信》，1890年10月27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91页。列宁也写过类似的话：“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列宁：《哲学笔记》中《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第3册第1篇《主观性》载《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1页）。
- 147 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的信》1893年7月14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96页。
- 148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
- 14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6页。
- 150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1章1载《列宁全集》第25卷第375页。他在以后的一次演讲中讲得更明确：“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关，只是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种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列宁：《论国家》载《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2页）。
- 15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7—148页。《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6页。
- 152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页。
- 15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第119页。
- 154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14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71—272页。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9页。
- 155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 156 虽然理论上中国社会具有开放性的阶级结构，但就连中国也有某种类似种姓制度的社会差别的迹象。儒家古典著作中把保有职衔的官员

( 绅士 ) 中过举而没有官职的学者( 士 ) 农民( 农 ) 工匠( 工 ) 和商人( 商 ) 加以区别。这几种人形成了按中文字面直译的所谓“体面人”的集团 除此以外 法律上还规定了第六种人 即出身低微的人( 贱民 ) 这就是中国的“不可接触者”。每一种人都有传统规定的适当生活方式, 衣、食、住、行、装饰、婚丧嫁娶礼仪以及祭祀都有严格规定。只有“游民”( 奴隶、妓女、戏子、杂耍等等 ) 不准应试科举。这种社会耻辱的烙印是代代相传的: 甚至当禁令正式放宽的时候( 1740 年 ), “游民”只有在成为普通的社会成员经过四代以上才推许应试科举。这种半种姓式的思想影响甚至在中国遗留到现在, 土地改革后二十年, 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革命, 过去的富农或富裕农民的子弟仍然被视为富农或富裕农民, 尽管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同贫农或中农的子弟相区别, 但是他们仍然被剥夺了诸如进大学之类的特定的社会权利。在回答我提出的具体问题时, 中国官员告诉我说, 只有经过几代人以后, 这种歧视才能消除。

- 157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62 页注(5)。
- 158 马克思:《导言》I.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 第 737 页。
- 159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 4 章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1 册第 167—168 页。继亚当·斯密以后, 他也把国家官吏、律师、警察、士兵、牧师、甚至医生划入“非生产费用”并且猛烈攻击“对这个〔资产阶级〕社会阿谀奉承的人, ……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 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 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同上书 第 168 页。
- 160 亚当·斯密、理查·琼斯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指明了亚细亚国家背后的、真正的社会集团和生产关系, 即全部土地税的收益人。斯密指出亚细亚官吏的阶级利益在于保持一个对他们有利的制度。琼斯( 马克思赞扬他对社会生产关系的这种关注 ) 的各个章节从专制君主本人或抽象的国家体制背后找出了主权的或者国家的“代理人”。穆勒认为亚细亚国家岁入的许多受益人中, 不但有“统治者的家庭”和“他所宠幸的那些人”而且还有“各种政府官员们”。贝尔尼埃也曾列举了靠国家过活的各式各样的权贵和官吏( 他的这段话马克思曾引用过 )。
- 161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 3 编 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1 页。
- 162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匈牙利哲学家安德拉斯·海格迪斯 Andras He-

gedüs 在《充满活力的马克思》选集中《马克思对于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的分析》一文所作的宝贵研究 (“Marx Vivo”, Mondadori, Milan, vol. II, pp. 220—241 . “L’analisi di Marx della burocrazia e la realtà socialista”)。海格迪斯正确地批评了那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他们把对官僚主义进行科学分析的问题一般都追溯到马克思·韦伯, 而对马克思有关这个问题的主要理论性结论置之不顾。他还谴责了长期流行而且至今仍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教条主义流派, 他们使马克思青年时代关于官僚主义问题的著述任其湮没 (另参阅什洛莫·阿维内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S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163 马克思曾坦率地承认他也可能受这种影响。他有一次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 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 到了一定的时候, 人们就惊奇地发现, 从前没有看到的東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我们大家被这种判断的盲目束缚得多么利害啊: ……(接着他就谈到了他自己过去经历过的一个事例)《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8年3月25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1—52页。
- 164 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pp 337—338)。
- 165 马克思:《导言》1.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6页。
- 166 同上书第755—757页。
- 167 关于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开始, 可以追溯到罗莎·卢森堡的著作特别是《俄国革命》。“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Berlin, 1922; Complete revised edition, Paris, 1936; Eng. tran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Univ.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1961);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如后)以及意大利本国的里齐的著作(见前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段时期, 我们可以挑选出几位见识最广和造诣最深的政治思想家 米洛万·德热拉斯:《新阶级》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和自由》赫伯特·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爱德华·卡德尔:《官僚主义和工人阶级》弗拉基索夫·宾科夫斯基:《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权力》叶甫根尼·瓦尔加:《瓦尔加遗言》前引安德拉斯·海格迪斯书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载巴黎《人类与社会》前引卢



卡奇文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Praeger,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London, 1957; Raya Dunayevskaya, "Marxism and Freedom", Bookman Associates, New York, 1958; Herbert Marcuse, "Soviet Marxism", Columbia Univ. Press, New York, 1958; Edvard Kardelj, "Burocrazia e Classe Operaia", Editori Riuniti, Rome, 1959; Wladysaw Bienkowski. "Burocrazia e Potere Socialista", Editori Laterza Bari, 1970; Evgenij Varga, "Il Testamento di Varga", Mondadori, Milan, 1970; Andras Hegedüs, op. cit., and "L'autocritique de la société socialiste", in "L'Homme et. La Société", Paris, no. 6, Oct. —Dec., 1967, pp. 17—27; Lukács, op. cit)。

德热拉斯是抵抗运动和革命造就出来的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之一。解放后到 1954 年曾任中央政府的副总统并一度担任国民议会的议长。他公开谴责苏联和其它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培植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这个官僚阶级就象“古代东方专制制度”一样（第 54 页），是以公社所有制（现在披上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伪装）和十分类似一般奴隶制的那种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第 67 页）他说：“象古代东方专制制度一样解释和制定教义的人就是最高权威的治理人”（第 70 页）。

宾科夫斯基是波兰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任职以前一直从事地下活动。他在斯大林时期被贬辱，1956 年在哥穆尔卡政府中重新任职担任教育部长，1959 年内部改组时期开始，被哥穆尔卡再次开除出党。他分析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标签下在他的国家建立的那种“稳定和长期的镇压机构体制”所特有的“官僚主义障碍和变相，它显然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动力”（第 11 页、第 20 页）他还把现在的体制同古代那些“完成了统一和维持某种社会团结作用而又停留在原始水平的生产力和非常缓慢的增长率”的专制制度作了比较（第 160 页）。他说，波兰“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刚躲开了专制时期，新的领主们却又不得不引进了镇压机关和警察国家”（第 168 页）。

卡德尔在上述的思想家中是最“温和的”，也许正是与他现在在南斯拉夫担任官职的地位有关（1972 年）。然而就连他也承认存在着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并且说国家现在还不是“工人阶级的公仆”尽管他否认存在着一个同工人阶级相对抗的、特定的、有组织的官僚阶级（第 81、87 页）。

瓦尔加是前人民委员，在拜洛·昆执政时曾任匈牙利经济委员会

主席。以后曾任苏联经济和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和科学院院士。他指出，苏联存在着“一个在思想和道德原则上导致官僚主义集中化的、……独裁主义性质的和以权力崇拜为基础的社会”。他认为这些都是源出于“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第 109 页)。苏联存在着真正的官僚贵族政治，它“向无产阶级掩盖了它在经济上残酷剥削工人、特别是剥削集体农庄工人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名义下干的”(第 96 页)。“党棍和党官太多了。他们居住的地方离莫斯科越远——特别是东南部地区——他们追求权力的欲望就越来越不受限制”(第 93 页)。“赫鲁晓夫企图限制(那怕是部分地限制)特权阶级的物质福利，但并未取得重大的效果。非常简单，因为那些人阻挠这样干”(第 12—13 页)。

1966 年至 1969 年的中国文化革命以及 1968 年春的布拉格事件，尽管背景大不相同，但都在群众中播下了这种激进的自我批判的种子。

- 168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364 页。
- 169 同上书 第 37 章)第 714—715 页。
- 170 同上书 第 47 章)第 890—891 页。
- 171 同上书 第 891 页。
- 17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 3 分册第 114 页。一位印度学者说得对：“中国的平民不是‘主体，而是‘客体，；然而他们并不是统治阶级‘主子们’可以任意摆布和施加无限权力的‘东西’”(恩里卡·科洛蒂·皮斯凯尔：《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人民和民族》 载《非欧洲文化的国家、人民和民族》文选。Enrica Collotti Pischel, “Stato, popolo e nazione nella storie della Cina”, in the anthology “Stato popolo e nazione nelle culture extra-europee”. Comunità, Milan, 1965, p. 154)。
- 173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891 页。
- 174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情况，即使在奴隶制达到全盛时代的后汉(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9 年)奴隶的总数也从未超过人口总数的 1.5%(参阅埃蒂安·巴拉兹：《官僚化的天朝：对传统的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研究》，Etienne Balazs, “La bureaucratie celesit: Recherches sur L’ économie et la société de le Chine traditionnelle”, Gallimard, Paris, 1968, p. 147)。另一方面，在雅典全盛时期，奴隶数目则达到人口的 35%(参阅刘易斯·芒福德：《历史上的城市》。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Harcourt Brace & World. New York, 1961 .

p. 189)。

- 175 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3页。
- 17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第99页。
- 177 同上。
- 178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 17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第99页。
- 180 同上书第93页。
- 18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0页。
- 182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巴拉兹写道：“谈到城市，也就是谈资产阶级——这是对十九世纪以来的城市发展问题研究的基本前提，由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谋生手段的差异，因此城乡之间具有明显区别。在广义上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特定城市阶级的出现，就成了典型的古代、有工匠和商人的中世纪城市、以及现代工业城市的特征。但在中国，城市里并没有可以与西方资产阶级相类比的城市阶级。……中国和西方城市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西方的城市开始是资产阶级的温床，后来是资产阶级的堡垒，而中国的城市主要是政府的所在地，对资产阶级长期怀有敌意的官员们的居住地因此总是在国家的统治之下。”（埃蒂安·巴拉兹：《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度：主题的变化》Etienne Balazs,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 Yale Univ. Press, New Haven, Conn., 1964 pp. 66, 44)。

- 183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 184 同上书第56页。
- 185 参阅注167前引瓦尔加书第110—112页。
- 186 马克思用这句法文来描述建筑在农奴制和领地制人身束缚基础上的土地所有权，这与他在另一条谚语中总结金钱的非人性权力：“金钱不认主人”是相对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和哲学手稿》英译本，Karl Marx,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in Werke, Ergänzungsband, part 1, p. 507; Eng. trans. by Martin Milliga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64, P. 107)。

- 187 马尔库塞最近提出关于修建庞大的纪念性建筑工程的镇压性的问题，尽管并未联系到亚洲，他说：“人们都应该想到长期以来大众对于无益的甚至有罪的艺术品的评价：巴台农神庙是不值得任何一个罗马奴隶为之付出血和泪的。认为盖起巴台农神庙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奴隶制存在有理的这种相反的意见，同样是愚蠢的。这两种评价哪一种是正确的呢？如果看一看现代的西方文化和社会，看一看大规模屠杀及其登峰造极的残暴性，我认为第一个评价要比第二个评价正确些。然而现在能把当代同未来的希望联系起来的唯一脆弱的一环，只有那些残存的艺术品了。”（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社会的艺术》载于纽约《艺术杂志》。Herbert Marcuse, “Art in the One-Dimensional Society”, in “Arts Magazine” New York. May 1967）。
- 188 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的神话》（Lewis Mumford,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Secker & Warburg, London, 1967）。
- 18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0—371页。
- 190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编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0页。
- 191 关于这个问题 见皮埃尔·布瓦图：《马尔加什民族在历史上的贡献》；罗萨尔巴·特拉诺瓦：《马尔加什社会的由来》载《第三世界》，A. 贝热雷和A. 孔巴-福凯尔：《马尔加什的乡村和发展》载《共同点国际合作和发展的成就》（Pierre Boiteau,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nation malagache”,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8; Rosalba Terranova. “1 Perché della società malagascia”, in “Terzo Mondo” Milan, Year 11, no. 3. Mar. 1969, pp. 68—72; A. Bergeret and A. Combas-Fauquel, “Villages malagaches et développement”, in “Communautés: 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e la Coopération et du Développement”, Paris, no. 27, Jan. — June 1970, pp. 103—188）。
- 192 转引自乔治·孔多米纳：《伊梅里纳的农村居民和公社》（George Condominas, “Fokonolona et collectivités rurales en Imérina”, Berger-Levrault, Paris, 1960, pp. 49—50）。
- 193 A. 埃尔曼：《埃及的文学》（A. Erman, “Die Literatur der Agypter”, I. C. Hinrich’sche Buchhandlung, Leipzig, 1923, p. 120）。
- 19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页。

- 195 黑格尔常说“把自然看作神的民族是不会自由的”(前引黑格尔书)
- 196 K. H. 贝尔纳德特:《古代东方的崇拜与领袖》载于《古代》(K. H. Bernhardt, "Kult und könig im Altertum des Vorderen Orients", in "Das Altertum", vol. V, no. 2, 1959, p. 77)。
- 197 安努阿尔·阿布杜勒-马利克:《埃及 军事社会》(Anouar Abdel-Malek, "Egypte, société militaire",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2; Eng. trans. "Egypt, Military Society", Viking Press, New York, 1968, pp. 354—355)。
- 198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6页。
- 199 参阅莉莉·阿贝格:《东亚思想的特点》(Lily Abegg, "Ostasien denkt anders", Atlantis Verlag, Zürich, 1949)。
- 200 伊翁·巴努:《论亚细亚社会形态》载《哲学评论》法译文载于《论亚细亚生产方式》(Ion Banu, 'Asupra formatiunii sociale asiatice, in "Revista de Filozofie", Bucharest, no. 2 & 3, 1966; French trans. in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 307)。
- 201 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第6章(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chap. 6)。
- 202 戈德利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载《亚细亚生产方式》(Godelier, "La notion du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p. 87—88)。
- 203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C. Wright-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Univ. Press, New York, 1959, p. 149)。
- 204 多夸:《早期的阶级社会》第152—159页。并参阅《历史问题》(Dhiquois, "Les premières sociétés de class", pp. 152—159; cf. also "Pour l'histoire")。这些分类中有一些已为其他学者概略地谈到过。马克思·韦伯给印度下的定义是:“典型的世袭的神授权能之乡”,中国则是“祖传的官僚体制”(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J. 温克尔曼:《经济与社会》[1956年] 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Mohr, Tübingen, 1922; critical edition by J. Winckelmann [1956], "Economy and Society", Bedminster Press, New York, 1968, vol. I. p. 253; vol. II, p. 315)。

利奇说:“过去2500年以来,在南亚占主要地位的政治模式不是中国而是印度,盛行的权力型式不是官僚体制而是神授权能的型式”(前

引利奇书第4页)

而巴拉兹在1952年提醒人们回顾中国断断续续地进入封建诸侯制的倾向 参阅巴拉兹:《官僚化的天朝》。Balazs, “La bureaucratie céleste, p. 19)。

- 205 前引塞多夫书 见注18),第84页;《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第343页 (Sédov, op.cit. p. 84;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 343)。
- 206 象迪维特奇洛格卢那样断言“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包括所有的亚细亚社会在内的经济体系”,是错误的 (Sencer Divitçoglu, “Asya Tipi Uretim Tarzi ve Az-Gelismus Ülkeler,” İstanbul, 1966; French trans. in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 Paris, vol. X, no. 57—58, p. 278)。
- 207 除了前面所引《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几篇文章外 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12章、第14章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4—95页、395—396页、562页。《资本论》第2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26页。《资本论》第3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页、886页、891页、992页。
- 208 《纽约每日论坛报》1859年12月3日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03—605页。《资本论》第2卷第4章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26页。《资本论》第3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页。
- 209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5—146页。《资本论》第1卷第14章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资本论》第3卷第37章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4页。
- 210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5—146页。
- 211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2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5—146页。恩格斯:《波斯和中国》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28—231页。《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
- 212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5—146页。

- 213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2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
- 214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5—146页。
- 215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14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71—272页。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0、111、115页。《资本论》第2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26页。
- 216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26—127页。恩格斯：《土耳其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页。
- 21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第93页。
- 21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0—371页。
- 219 同上书第562页。
- 220 利奇用僧伽罗王国历史事实作为例子，提出了非官僚体制的水利化社会的理论。僧伽罗王国位于锡兰最干旱的地区，自远古以来直到1860年前后“，保养蓄水池的事宜就是普通村庄的日常工作‘而’大修和新建的工作在传统上属于一种泰米尔种姓的劳工”〔库兰卡蒂〕（前引利奇书，第8页），即使僧伽罗社会确实如此（马克思没有提过这个社会），但不清楚的是这个论据如何能反驳马克思主义关于与此很不相同的其它亚细亚式社会的理论，古伊迪埃里在抨击威特福格尔时也正是这样说的（前引古伊迪埃里书第377—378页）。
- 22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5页注（192）。
- 222 前引霍布斯鲍姆书第42—43页。
- 223 前引曼德尔书第123—124页注。
- 224 理查德·洛温撒尔：《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的作用和形式》载《社会变化中的民主》选集（Richard Lowenthal, “Il governo nei Paesi in via di sviluppo: le sue funzioni e le sua forma”, in the anthology “Die Demokratie im Wandel der Gesellschaft”, Verlag Otto H. Hess, Berlin, 1963; Italian trans. Jaca Book, Milan, 1967, pp. 234—235）。
- 225 前引戈德利埃书第90—91页。
- 226 前引特凯书第85页。

- 227 同上书,1969年德文版附录。
- 228 关于德国和日本在发展方面异同的分析见莱因哈德·本迪克斯:《建国与公民权:对我国变化中的社会秩序的研究》;另见小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 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领主和农民》第228—313页有关部分(Reinhard Bendix,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 Order". Wiley, New York, 1964, chap. 6; and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eacon Press, Boston, 1967, pp. 228—313 passim.)。

关于日本另见鲁思·本尼迪克特:《菊花和剑》关于德国见拉尔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和民主》(Ruth Benedict, "Chrysanthemum and Sword",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1946; Ralf Dahrendorf,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Piper Verlag, Munich, 1965; Eng. trans.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Weidenfeld & Nicolson, London, 1968)。

- 229 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和民主》英译本(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pp. 46, 35—36)。
- 230 什洛莫·阿维内里:《马克思和现代化》载《政治学评论》(Shlomo Avineri, 'Marx and Modernization', in "Review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diana, vol. XXI, no. 2, Apr. 1969, p.186)。
- 231 法国历史学家布洛什在他的论封建制度的权威性著作中也只提到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型式。他对封建社会的定义是极为严格的,他认为:“封建制度并不〔象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是‘世界上一度发生的事件’。日本,也象欧洲那样,——尽管有永久不变和根深蒂固的差异——走过了这个阶段。其它社会是否也走过了这个阶段?这是未来的著作回答的问题。”(马尔克·布洛什:《封建社会》。Marc Bloch, "La Société féodale", Editions Albin Michel, Paris, 1939; Eng. trans. "Feudal Societ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1961, p. 447)。

同样 鲍特吕舍的‘封建制度’一词 虽仅限于西方中世纪 但也把日本作为唯一的例外而包括在内(罗贝尔·鲍特吕舍:《领地和封建制度》。Robert Boutruche, "Seigneurie et féodalité", Aubier, Paris, 1959)。保罗·贝奥尼奥-布罗基耶里也说:‘封建制度,一词特别是



在黑格尔学派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用法下是指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范畴出现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通常所指的那些现象与欧洲的模式很少有共同点。日本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这个词可以在严格的意义上适用于日本。（保罗·贝奥尼奥-布罗基耶里：《日本政治思想中“道教的传统”和民族的传统思想》载《非欧洲文化的国家、人民和民族》文选。Paolo Beonio-Brocchieri, “La ‘tradizione del Tao’ e l’idea della continuità nazionale nel pensiero politico giapponese”, in the anthology “Stato, popolo e nazione nelle culture extra-europee”, p. 55)。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补充指出，马克思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一致的。然而，从上述的这些说法不应该得出日本和西方的封建制度完全相同的结论。日本的许多思想和体制具有明显的亚洲特点，这是毋庸置疑的（参阅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多夸在强大的欧洲封建制度和微弱的日本封建制度之间作了正确的区别，他说（戈德利埃有同样的看法）：这种区别可以解释为主要是由于西欧的封建制度之前是奴隶制，它有助于一种交换经济和随之而来的合理化，从而促进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日本的封建主义则出之于一种准亚洲式的制度，具有一个长期的过渡性阶段。此外，虽然西欧面积大得多、人口也更多而且更加多样化，但这个阶段却湮没在这块充满敌意的大陆上。因此，封建制度的一些特点在日本表现得不太突出，城乡之间辩证的对比不太尖锐，依附关系更加等级森严而更少契约性，血缘联系却更具有重要性。（多夸：《早期的阶级社会》。Dhoquois, “Les premières sociétés de classe”, pp. 167—168）。

- 232 马克思：《俄国和西方列强》，载《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年8月5日。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爱德华·艾威林编，卡尔·马克思：《东方问题》（Karl Marx, “Russia and the Western Powers”. New York Daily Tribune, 5 Aug. 1853; in Karl Marx, “The Eastern Question”, ed. Eleanor Marx Aveling and Edward Aveling. Swan Sonnenschein, London, 1897, p. 75）。
- 233 恩格斯：《土耳其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页。
- 234 关于这方面主题的文章，参见加布里埃莱·克雷斯基·雷吉齐：《蒙古法律的传统》载《东方》（Gabriele Crespi Reghizzi, “L’eredità del diritto mongolo”, in “L’Est”, Milan, year VI. no. 1, Mar. 1970, pp. 95—117）。
- 235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载《马克思恩

- 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36 页(本书英译文引文与中文版有出入。“孤立”一词中文版中为“进化”。现按英译文引文译出——中译者注。)  
(Karl Marx, “Letter to Vera Zasulich.” 5 Mar. 1881, first draft, op. cit., p. 324; Eng. trans. in “Selected Works”, 1970, vol. III, p. 157)。
- 236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载伦敦)《自由新闻》1857年2月25日和4月1日。前引布莱克斯托克和霍泽利茨编的书,第254页(Karl Marx, “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 “The Free Press”, London, 25 Feb. and 1 Apr. 1857. Blackstock and Hoselitz eds., op. cit., p. 254)。
- 237 神圣罗马帝国的公使巴龙·冯·黑贝施泰因在1517年瓦西里三世时期到俄国旅行,对于该国统治者“对俗人和教士全都”拥有无限权力的特点,有深刻的印象。“他可以任意处置所有人的生命和一切财产。顾问当中,即使在细枝末节上也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公开说,他的意见就是上帝的意志。他们称他为上帝的使臣和总理,并相信他就是神的意志的执行者。”(Sigmund von Heberstein, “Rerum Moscoviticarum Commentarri,” St. Petersburg, 1866. p. 28)。同样,英国向伊凡的儿子(即继承人)派驻的大使弗莱彻说该国的政府形式是公开地模仿土耳其的模式。政府极端暴虐,它唯一的目的是用最野蛮和冷酷的方式为沙皇的利益效劳。弗莱彻强调说,不仅农民,而且贵族也处于受奴役状态,这两个阶级对于自己财产所享有的权利是毫无保障的,因为他们不过是沙皇赋税的卫士而已,他们挣得的一切财物迟早总要送进沙皇的国库里去。参见贾尔斯·弗莱彻:《俄国见闻》(Giles Fletcher “Of the Russian Commonwealth”, St. Petersburg, 1906, pp. 33—34)。
- 238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前引布莱克斯托克和霍泽利茨编的书第13页。
- 239 V. O. 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历史进程》(V. O. Klyuchevsky, “Kurs Russki Istorii”, Moscow, 1937, vol. IV, p. 382)。
- 240 达伦多夫曾写道:“就社会方面而言,现时代的革命可以用‘公民’这个词来概括。……取得了‘公民’这个牌子就有权参加各项活动。公民权就是拥有许多参加活动的机会。……它为个人参加政治活动以及参加无所不包的社会过程都提供了可能性。那就是,正象他把自己的货物送到经济市场上一样他把自己的利益送到政治市场上,而把他的性

格送到社会市场。在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的作用就是一种自由的因素；‘公民’可通过各种选择使他的个性得到发展，其方式和程度是过去整个历史中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达到的。‘公民’地位的革命意义在于，就其性质而言它不可能是排他性的。从原则上讲，公民权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享有公民权。（前引达伦多夫书 第 67—68 页）。他就是这样来说明德国现代化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的——缺乏‘美国和英国过去拥有的、法国在较小程度上也有过的、作为向更加现代和自由主义方向发展的动力的那种阶层’，在一个“仍然近似封建的”社会中，自上而下地推行工业化（第 52 页）。他评论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仅仅是联系在现行的社会结构上，因此尽管经济上层建筑（有人可能把马克思的术语用讽刺的反意来使用）被同化了，但社会和文化的内容仍然保持不变（第 44 页）。我们认为，对于所有那些自上而下地推行工业化的国家，可以说都是一样的，不论在日本这样的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或者俄国这样的半亚细亚国家，或者埃及或伊朗这样的亚细亚国家都是一样。这就是说，尽管工业化现代化的最后建立开辟了道路，但工业化本身并不产生现代化。比西方实现工业化晚的那些国家，它们的许多问题和政治动乱就是由于这种差异而引起的（例如：纳粹主义、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纳赛尔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内）。

- 241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535—536 页。
- 242 马克思：《1867 年 1 月 22 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228 页。
- 243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51 页。
- 244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497 页。
- 245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中的第五节《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618—619 页。
- 246 同上书 第 620 页。恩格斯象马克思一样，在著作中也详细谈到过“赋税重压下的俄罗斯和印度的农民”的状况。“此外，还有俄罗斯和印度的共产主义公社的土地，这些公社为了获得纳税的钱（这种税是暴虐的国家专制制度经常用酷刑逼迫它们交纳的），必须卖掉它们的一部分产品并且这部分产品日益增多。”（《资本论》第 3 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

- 全集》第 25 卷第 818 页 )。
- 24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 年 2 月 17 日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636—637 页。谢铎·费罗提是俄国贵族贾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弗尔克斯的笔名，他是《关于俄国前途的论文》的作者（马克思提到他的第十篇论文《人民的世袭财产》。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 年 11 月 7 日 同上书 第 184 页）。
- 同上书 第 636 页。
- 248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4 年 2 月 16 日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112 页。
- 249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41 页。
- 250 马克思：《给 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29 页。
- 251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中的第五节《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618 页。
- 252 同上书，614 页。
- 253 同上书，613 页。
- 254 列宁：《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 载《列宁全集》第 16 卷第 267 页。
- 255 《普列汉诺夫文集》(Georgy Plekhanov, “Sochineniya”, Moscow, 1923—1927, vol.III, p.74)。
- 256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史引论》(Plekhanov,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sociale de la Russie, pp.9—10)。
- 257 同上书 第 80—81 页。
- 258 同上书 第 87—88 页。
- 259 《普列汉诺夫文集》第 10 卷 第 154 页。
- 260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Lev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26; Eng. trans. by Max Eastman, Gollancz, London, 1932, p.26)。
- 261 同上书 第 23 页。
- 262 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Lev Trotsky, “1905” (1922); Eng. trans. by Anya Bostock,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London, 1972, p.36)。
- 263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 26 页 并见《一九〇五年》第 8 页。

- 265 托洛茨基：《对波克罗夫斯基的答复》（“Reply to Pokrovsky”）。见《俄国革命史》第472页。
- 266 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38—39页。
- 267 托洛茨基：《对波克罗夫斯基的答复》第473页。
- 268 例如这是姜尼·索弗里（Gianni Sofri）的观点《亚细亚生产方式：一部马克思主义争论问题的历史》。“Il modo di produzione asiatico: storia di una controversia marxista”, Einaudi, Turin, 1969, p.93)。也是莱奥内·特拉奇（Leone Traci）的观点1971年12月7日致翁贝托·梅洛蒂的信载《第三世界》。“Letter to Umberto Melotti”, 7 Dec. 1971, “Terzo Mondo”, Milan, year V, no.10, Sept.1972 . p. 85)。
- 269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载《列宁全集》第6卷第28页。
- 270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载《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2页。
- 271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载《列宁全集》第10卷第299页。
- 27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7页。
- 273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9页。
- 274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2页。
- 275 同上书第144页。
- 276 帕兰对这句话评论如下：“这段话毫无疑问地强调机械对促进社会重大变革方面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它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个方面，如果仅仅限于这一个方面，那就会歪曲马克思的思想。把它放到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整体之中是绝对必要的。真正的过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同一个过程中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社会关系，但与此同时甚至可以证明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要对历史过程作出如实的说明，就不应把这两种因素孤立开来。（夏尔·帕兰：《关于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报告 水库的实例》载《思想》（Charles Parain, “Rapports de Production et développement des forces Productives: l'exemple du moulin à eau”, in la Pensée Paris, no.119, Feb.1965, p.55)。
- 277 列菲弗尔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一再地使用‘现代’这个词来阐述资产阶

级的产生、经济成长和资本主义的建立以及它们的政治表现；最后和首要的是，他用它来描述关于其历史事件后果的评论。”（亨利·列菲弗尔：《现代性引论》，Henri Lefebvre, “Introduction à la modernité”, Editions de Minuit, Paris, 1962, p.170）。

- 278 例如 参见塔利奥特·帕森斯：《现代社会结构》丹尼尔·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霍赛利茨：《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载于《美国经济评论》艾森施塔特：《现代化、抗议和变革》（Talcott Parsons, “Structure in Modern Societies”, Free Press of Glencoe, New York, 1959;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Free Press of Glencoe, New York, 1958; B. F. Hoselitz, “Noneconomic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57, pp. 28—71; S. N. Eisenstadt, “Modernization, Protest and Change”,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6）。
- 279 前面已经提到的什洛莫·阿维内里的那篇文章中可以找到近来在这方面的一个成就，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我们的引导（又见这位作者所著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第6章。“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英译者注）
- 280 特别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7月17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8卷第382—384页。英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5年版第105—1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未收入此信——中译者）马克思在信中指出“‘资本’这个词同公社联系在一起出现还是第一次”。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没有看到新教的道德观反过来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这通常却是归功于马克思·韦伯的发现：“货币崇拜有它的禁欲主义 它的清规戒律 它的自我牺牲——节俭和知足，蔑视世俗的、一时的和无常的享乐而去追求永恒的财宝。所以，英吉利的清教主义和荷兰的耶稣新教跟发财致富保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一分册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8页。马克思并不是唯一走在时代的前面用这种解释来代替通常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解释的。例如，皮朗内在描写典型的十一世纪商人的一段文字中写道：“追求利润支配了他的整个行动，从他的身上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那种著名的资本主义精神（spiritus capitalisticus）这种精神有些只是在文艺复兴以来才有的。”（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Henri Pirenne, “Les villes du moyen

age”, Lamartin, Brussels, 1927; Eng. trans. “Medieval Cities”, Anchor Books, New York, 1965, p. 83)。同样，芒福德提出这样的看法：“资本主义企业是在十一世纪末开始的十字军出征时期之后兴起的。”他还写道，“从相互保护的经济变成单方面资本主义剥削的经济，并没有象马克思·韦伯不幸地使许多人听信的那样等到十六世纪新教兴起之时，因为恰恰相反，新教本身是在十三世纪随着……基督徒抗议新的资本主义活动的……瓦尔登派出现时就已经开始草创了。当乔叟挥笔写下《过去的时代》中‘没有利欲 不图钱财’的那些渴望的颂词时，资本主义经济早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城市为资本主义布谷鸟提供了下蛋繁殖的安乐窝，可是不久，城市里聚集的汹涌而至的新来者就把它的子孙排挤出去了。”(刘易斯·芒福德：《历史上的城市》第 256—257 页)甚至斯威齐最近也写道：“……据我看 任何人都未必会不同意把封建主义的衰亡和资本主义的开始一直追溯到中世纪，即追溯到欧洲生产方式无疑还以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保罗·M. 斯威齐：《向社会主义过渡》载于纽约《每月评论》。Paul M. Sweezy,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Monthly Review” New York vol. XXIII, no.1 May 1971 p.2)。

- 281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09 页。
- 282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1 页。阿尔都塞根据上述内容所作的奇怪论断看来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他坚持说，‘市民社会’的概念——个人经济行为及其思想根源的领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消失了’(路易斯·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1969, p.110)。
- 283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41 页。
- 28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 页。
- 285 葛兰西对市民社会下的定义当然是“一切通常被称为‘私有’的那些组织(安东尼奥·葛兰西：《现代王子及其它》, Antonio Gramsci, “The Modern Prince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Lois Marks New World Paperbacks, New York, 1957, p. 124)。因此 初看时可能会感到马克思和葛兰西两人关于市民社会的见解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指的是结构的力量而葛兰西指的是上层建筑的力量。但事实上葛兰西不

断地强调了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而不是对马克思进行任何宿命论式的丑化，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两种单独的过程造成的“契机”(moment)\*，第一个过程是结构对上层建筑的作用，第二个过程并没有越过第一个过程，它是在上层建筑本身内部进行的过程(参阅：诺尔维托·博比奥：《葛兰西与市民社会的概念》 载皮埃特罗·罗西编《葛兰西与当代文化》文集。Norberto Bobbio, “Gramsci e la concezione della società civile” in a collection of writings “Gramsci e la cultura contemporanea”, ed. Pietro Rossi, Editori Riuniti, Rome, 1969, vol.I, pp.75—100)。在这一点上葛兰西与马克思非但没有矛盾，而且看来还阐明并强调了他关于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理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于结构和上层建筑在“历史实体”中的辩证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评价，而“历史实体”总是由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的。

\* 因为只有运动才是绝对的 马克思象黑格尔一样用‘契机’这个词来指在一种静止的体系中的可以被称为‘因素’或‘要素’的东西。在马克思那里，这个词既有‘时期’又有‘运动着的质量的力’的意思”(马丁·尼古拉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介绍。Martin Nicolaus, Introduction to Marx's “Grundrisse”, Penguin ed.)

——英译者注。

286 格申克龙写到“在路德或卡尔文开始改革教会的许多世纪以前，早就在西欧发展的那种理想的城市精神”时，就对人所熟知的马克斯·韦伯的见解公开提出争论，他说：“中世纪的城市和令人迷惑的地区性变化所显示出来的矛盾特点的多重性，是容易使人糊涂的。但是，所有的事都谈到做到以后，也不能低估它们（特别是行会）对现代工业发展的贡献。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是它们第一次采用了基本的分工，把工业活动从大量的、曾经把它们深深包围的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由于城市获得了权力和独立，它就第一次给予工业活动以高尚的气息，如果我们把乡村铁匠这种神秘人物加以抽象的话，行会通过它们的规章和实践向它们的会员逐渐灌输某种专业技巧的初步本能，并与此同时，树立某些商业道德的基本概念。……马克斯·韦伯不可能把行会的情况完全置之不顾 他提到了它 不过不是在他的《新教的道德观》里 而是在一年以后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结尾部分。……承认行会培养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和‘资产阶级理性主义’那就大大动摇了韦伯的论点而不是象那段话的字面意义。……‘资本主义精神’（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这个词的



话)的发展,是一段漫长的和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韦伯至少应该提出行会精神是如何被吸收到新教道德观里去的,以及如何大大加速了它的形成等问题。……当然,曾一度是先驱者和新事物的媒介的行会,在有的时候又成了工业进步的障碍,企图把现代企业置于那种旨在窒息其生长的规章和限制之下。但如果把后一个时期和前一个时期的现象和事件泾渭不分地混淆在一起是违反历史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种现象之间的一定的关系不仅会起变化,而且会变成其对立物。……行会在工业史中的作用就是这方面一个绝好的例子。”(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俄国镜子中的欧洲》。Alexander Gerschenkron, “Europe in the Russian Mirror”, Cambridge Univ. Press, London, 1970, pp.56—61)。

287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1—372页。

288 皮雷纳也注意到“贸易发展和城市复兴之间突出的一致性。意大利和荷兰是最先出现商业的地方,这两个国家正是首先出现城市并迅猛发展的地方。”(前引皮雷纳[Pirenne]书 第95页。然而,他似乎认为“;这些城市的发展正象因果关系那样是和〔中世纪晚期的〕商业复兴直接有关的”而不是顺序相反。在这点上皮雷纳受到芒福德的责难:“贸易的复兴往往被认为是十一世纪里发生的城市兴起和文明活动的直接原因,甚至象皮雷纳这样杰出的学者也这样看。但是在城市可能出现之前,必须有剩余农村产品和剩余人口来提供进行贸易的货物以及购买货物的顾客。……实际同皮雷纳的说法恰恰相反:正是保存下来的城市的复兴,帮助重新开辟了地区的和国际贸易道路,并导致剩余的货物在全欧洲流通。”(芒福德:《历史上的城市》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第253—255页)。我们知道,马克思主张真正的辩证方法,他完全同这种因果关系的逻辑学相决裂。但是本书作者认为马克思的解释总的说来更接近于芒福德的解释而不是接近皮雷纳的显然更“唯物主义的”观点 皮雷纳——正象一位批评家正确地说明的——据说采取了“缺乏一条马克思路线”的唯物主义历史观(J. 东特:《亨利·皮雷纳:城市体制史学家》,载《意大利历史编纂基金会年鉴》。J. Dhondt, “Henri Pirenne: historien des institutions urbaines” in “Annali della Fondazione Italiana per la Storia Amministriva”, vol. III, no.1, 1966, p.127)。

289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页。

- 29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第99、93页。
- 29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4分册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下同）。
- 292 同上书第145、147—148页。
- 29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5页。
- 294 参见卡尔·A. 威特福格尔：《中国的经济和社会》（Karl A. Wittfogel,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Verlag von C. L. Hirschfeld, Leipzig, 1931, pp.670—678）。在十九世纪50年代末期马克思本人也承认中国农民“大部分拥有一块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甚繁重的税金”（马克思：《对华贸易》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04页），从而并未改变“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页）。
- 295 安东尼奥·葛兰西：《关于马基亚弗里、政治和现代国家的评论》（Antonio Gramsci, “Note sul Machiavelli, sulla Politica e sullo stato moderno”, Einaudi Turin, 1949, p.68）。
- 296 关于在“异常”条件下企业家状况的分析 见安杰洛·帕加尼：《企业家的形成》（Angelo Pagani, “La formazione dell’imprenditorialità”, Comunità, Milan, 1964, pp.274—292）。
- 297 除了卡尔·A. 威特福格尔前面的参考以外（见《东方专制主义》，第171页），居伊·多夸是首先注意到这个事实的。见《亚细亚生产方式》载《国际社会学杂志》（*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Paris, vol. XVI, July—Dec. 1966, pp.89—92）。拉斯科特是另一个谈到这种周期性“更新”的人，他认为北非，特别是马格里布在中世纪时的情况是“一种没有大型水利工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他认为伊汶·堪敦（Ibn Khaldoun）提出他著名的关于发展的循环论见解，把国家看成象人一样有青年、壮年和老年各个阶段，这种看法“并没有陷入以某些预先选定的事实作为证据来得出先验的形而上学的结论，而是客观地描述了一个历史时期，它的客观标志是：帝王要搞中央集权的周期性企图以及他们在短暂稳定时期以后趋于衰落”（伊韦·拉科斯特：《伊汶·堪敦 历史的开端 第三世界的往昔》。Yves Lacoste, “Ibn Khaldoun: Naissance de l’histoire, Passé du Tiers-Monde”, Maspero, Paris, 1966, pp.37—40, 219）。

- 298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5—146页。
- 299 E. G. 普利布兰克(E. G. Pulleyblank)对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评论，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报》及《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XX, no.3, 1958, pp. 657—660, and in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I, part iii, 1957, pp. 351-353)。
- 300 马克思：《中国记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 301 一位著名的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历史学家对黑格尔有如下的评论，我们知道，黑格尔的著作是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主要资料来源：“黑格尔关于亚细亚社会性质的想法往往被人借口他对事实缺乏了解而加以摈弃。要驳倒关于中国从停滞进入静止状态的黑格尔派概念，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随着知识日益扩大，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历史是充满了动乱、突变以及渐变的。然而，黑格尔意识到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变特点，那是对的，在这方面，他是独一无二地同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国史的历史学家的意见相一致，不论他们的国籍或意识形态的阵营何属。”(巴位兹：《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度》。Balaz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p.15)。
- 302 约翰·M. 凯恩斯：《劝说集》(John M.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 Macmillan, London, 1931, p.360)。
- 303 参看姜皮耶罗·科蒂-科梅蒂：《第三世界的地理问题》(Giampiero Cotti-Cometti, “Problemi di geografia del Terzo Mondo”,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Naples, 1967, p.228)。
- 304 参看尤金尼奥·图里：《对游牧民族的人类学研究》，载《第三世界》(Eugenio Turri, “Antropologia dei popoli nomadi”, in “Terzo Mondo”, Milan, vol. IV, no.12, June 1971, p.42)。
- 305 参看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 Cambridge Univ. Press, London, 1954; reprinted 1961, p.87)。
- 306 有关这方面的最初探讨，见约翰·梅斯基尔编的论文集《中国历史的格局 循环、发展还是停滞》(John Meskill, “The Pattern of Chinese History: Cycles, Development or Stagnation?”, Heath & Co., Boston, 1965)。

- 307 恩里卡·科洛蒂·皮斯凯尔:《中国革命的思想根源》(Enrica Collotti Pischel, "Le origini ideologiche della rivoluzione cinese", Einaudi, Turin, 1958, p.19)。
- 308 马克思:《中国记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 309 关于这一课题 参看前引冀朝鼎书 第14—15页 王玉川(音):《中国历史上土地税的上涨与王朝的衰亡》载《太平洋事务》(Wang Yü-Chuan, "The Rise of Land Tax and the Fall of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 in "Pacific Affairs", New York, vol. IX, June 1936); 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小亚细亚边界》(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Capital Publishing Co., Irvington, N. Y., 1951, esp. pp.531—542)。

310 “革命”一词来源于拉丁字“*revolutio*”词意同动词 *revolvere* 既指回复到过去,又指复兴。希腊文 *epistrophe* 和 *anakuklesis* 也有同样意思。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回复,自行回复,反映人们所熟悉的东方思想——即从经常转变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变革——的影响,几乎是周而复始。

举波利比厄斯的理论为例 这一理论中的“再环流”描绘“体制的自然进程是运转、转变和复原”纯粹形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和反常形式(专制、寡头、蛊惑)交替出现。在这方面 见翁贝托·梅洛蒂的《革命与社会》一书 Umberto Melotti, "Rivoluzione e società", La Culturale, Milan, 1965, pp.19—20)。

中文“革命”一词 其字面意思是“改变授权”也有极为相似的含义;这个字决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意思(在中国和在西方一样,社会制度只是最近才成为文化特点的一部分),而只是指政府的更换,其目的是重建政府由于治理不当,无法行使职能而丧失的合法性。

很清楚 这一切出自孟子的学说。孟子首先系统提出“天命”和“天命转移”的理论,这同时也是从思想上论证合法政权和使政府更迭的周期性起义的正当性,由于人民的意志充分表达了天意(天,指的是自然秩序),成功地推翻王朝的反叛者并不是谋求推翻天意的衰读者,而是正常秩序的恢复者。在中国 君主并不对人民负责 而只是对“秩序”负责。它既是自然秩序又是社会秩序,或者是社会下达命令使它与自然秩序相合。庄稼歉收所表现的“天怒”反映出秩序遭到破坏 因此 君主的合法性就不再存在,而需要采取恢复秩序的行动。总之,中国人认为一个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总是比下一个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坏,如果他真是一个皇帝 而不是孟子所说的“一夫”。

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政治概念在日本从未获得多大认可，尽管“革命”这个词也用相同的方块字表达（但发音是 *Kakume*）。诚然，在《雨月物语》中所记载的某些传统指出，把孟子思想引进日本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上帝显示不满，毁掉了运载“恢复天命”的船只。总之，1868年 在日本发生的政治和宪法的根本变革（在西方被称之为明治维新），日文称之为 *ishin*，此字同该学说毫不相关。另一方面，在中国，即使本世纪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被称为“*geming*”。

（我们感谢埃多阿尔·马西提供一部分上述内容，另见皮斯凯尔：《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人民和民族》〔*Pischel, "Stato, popolo e nazione nella storia della Cina"*, pp.153—157〕和前引贝奥尼奥—布罗基耶里书 第39—47页。）

- 311 特别是见恩格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4—535页）。对马克思来说，从广义上讲毕竟也是如此，“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由英国人在印度加以实现了，引进了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参看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8页）。
- 312 皮斯凯尔：《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人民和民族》第194—195页。我们最近在北京同中国历史学家讨论了这一解释，发现我们的看法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 313 科蒂—科梅蒂写道：“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人和河流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两个分明不同的阶段，即1949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只是在为期短暂的最后一阶段，通过抗洪战斗的巨大努力，才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在中国，人们同河流战斗了数千年。大河流域的居民早在公元前十世纪就开始建造堤坝，但那些堤坝并没有随着年代的发展而始终得到维护。在上世纪，对此有严重疏忽，特别是在1949年前的三十年左右时间。总之，即使这些堤坝继续不断地得到维护，但是光有堤坝是决不足以使人们征服河流的。现代的研究表明，如果人类要治理河流，就必须把许多因素考虑进去。任何意欲真正控制河流的计划，目前必须包括防洪工程、灌溉、水力发电厂、航运、家用和工业用水——一句话，必须制定全面利用该流域水源的计划，而不致破坏自然法则。采纳这些现代准则，适足以说明中国近年来在征服河流方面取得的成就。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三十年停滞不前局面的结束……一个改善旧堤坝的巨大运动立即开始了。今日，中国人已经根本改进了他们同河流的关系。”（前引科蒂—科梅蒂书 第65—66页。）

- 314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 315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5页。
- 316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2页。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不是先有贸易后有现代化，而是贸易必须以“较高”的生产方式为基础。比如以中国为例，他强调英国贸易对生产方式的革命影响，而俄国贸易不同于英国贸易，并未触动亚细亚生产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

- 317 马克思在这一点上采纳了在英国占领期间（1811—1816年）爪哇总督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爵士的调查，“从远古以来国内居民就在这种简单形式下……生活。各个村庄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庄有时由于战争、饥荒和瘟疫而受到侵害，甚至被弄得荒无人烟，但是同一名称，同一边界，同一利益，甚至同一家族，会维持几百年之久。居民对于王国的崩溃或分裂毫不在意；只要村庄保持完整，他们就不问村庄隶属于什么权力，或受哪一个君主统治。村庄内部经济保持不变。”（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2章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7页注〔61〕）。而且马克思还援引莱佛尔斯的话在其他著述中指出，欧洲殖民主义可以强加于亚细亚制度而又不破坏这一制度，而且利用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比如说，依照总督莱佛尔斯的意见，荷属东印度公司“运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构压榨居民，使他们把最后一点东西都交纳出来，把最后一点劳力都贡献出来。这样，它就加重了任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因为它把政客的全部实际技巧同商人的全部垄断利己心肠结合在一起进行统治的”，而马克思则认为，为了说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只要把莱佛尔斯说过的一段话一字不改地引用过来就够了。对马克思来说，“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的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的狰狞的神像更为可怕”（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4—145页）。莱佛尔斯的一段话引自《爪哇史》。“The History of Java”, London, 1617, vol.I, pp. 285, 151)。关于“亚细亚”意义上的殖民剥削体制，参见恩里卡·科洛蒂·皮斯科尔：《在人口密度高的国家殖民与新殖民剥削的性质和特点》载《第三世界》（Enrica Collotti Pischel, “Natura e caratteri

dello sfruttamento coloniale e neocoloniale nei paesi ad alta intensità demografica”, in “Terzo Mondo” Milan, vol. I, no. 1 July—Sept. 1968, pp. 45—47)。

在马克思用“亚细亚”这个词提到的对美洲印第安人地区进行的最近调查研究中，类似的殖民剥削方法也揭露出来了。在那里也有一种“以集约农业和对庞大的农业劳动者阶级进行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西班牙人“通过下层官僚统治机构中的土著分子，使自己居于统治阶层的顶峰 统治着人民群众。”(R. 厄曼·塞维斯：《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的关系》载《美洲人类学家》(R. Erman Service, “Indian-European Relations in Colonial Latin America”,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o. 57, 1955, p. 416)。结果是殖民者仅仅压榨贡赋，而没有带来平原和沿海地区普遍实行的深刻改革。因此，在那些地区至今还保存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的社会组织形式(参看罗多尔福·斯塔文哈根：《农业社会的各社会阶级》(Rodolfo Stavenhagen, “Les classes soci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agraires”, Editions Anthropos, Paris 1969; Italian trans, Feltrinelli, Milan, 1971, p. 198)。但是，这些社会组织形式深受殖民统治的影响。

援引纪廉的一段话：“在拉丁美洲 解放了的西班牙人 农奴竟形成一个庞大的新官僚和行政官阶级。他们贪婪无度地象一大片蝗虫吃光了土地，使它在他们所夸耀的秘密陷阱下发抖。他们不是控制土地并享有公众权威的贵族，因为并没有这样一个阶级，它是一个新的自觉的官僚集团，他们完全是平民出身，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这种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不负责任的、使入室息的专制制度正在美洲形成。这一制度使社会团结变成无政府状态 破坏了一切经济效能。”(费尔南多·纪廉·马丁内斯：《革命的根源与前途》。Fernando Guillen Martínez, “Raiz y futuro de la revolucion”, Ediciones Tercer Mundo, Bogotá 1963, pp. 76—77)。

德桑蒂斯采用同样的路线：“征服者(总督、朝臣、士兵、神甫、冒险家和有产者)从未认真打算把封建生产制度引进拉丁美洲。他们想的是淘金热，因此几乎在整个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经济完全建立在被掠夺和采掘贵金属的基础之上，这不是偶然的。正如卡洛斯·博伏《对美洲史的回顾》载《美洲史研究》。Carlos Bosch, “Reflexiones sobre la historia de America”, in “Estudios Historicos Americanos”, Mexico, 1953)所说的，“印加人种田只是为他们的日常需要而生产，他

们饲养牲畜只是作为同一目的的一种副业。”由于这一制度具有这些特点，西班牙王室并未完全破坏旧的公社专制制度而以‘古典的’所有制形式来替代它 企图取代以前的‘亚细亚’权力。当时在西班牙，由一派最渊博的法学理论家 贝留戈、坎塞尔、洛佩斯、塞普尔维达、埃雷拉、塞瓦略斯 组成的学派日益占上风 这一学派对该制度尽了一臂之力。他们主张以‘至高无上的权力’来确立西班牙王室对其附属领地的权力；这相当于一种普遍化的统治，它可以轻易地取代印加人或阿兹蒂克人的统治。仅举智利为例 当它受到入侵的时候 阿劳卡诺 马普丘 族的社会-经济结构仍然完全建立在村社的基础上，西班牙征服者拿不出什么比他们字面上发明一种可以宣布自己为其继任者的贵族政府更好的东西。最典型的替代例证是秘鲁，西班牙王室在那里占用印加人的土地，而将太阳神的土地分配给教会……古老的村社没有被破坏，而是继续沿用传统方式集体占有并耕种土地……保持旧的公社专制结构的重要好处 是使村落居民处于他们过去的普遍奴隶制状态。（塞尔吉奥·德桑蒂斯：《印加族、阿兹蒂克族和马雅族人的村社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贡献》载《思想》。Sergio de Santis, “Les communautés de village chez les Incas, Les Aztèques et les Mayas: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La Pensée” Paris, no. 122, Aug. 1965, pp. 89—91）。

- 318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7—248页。
- 319 同上 第251页。
- 320 前引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8页。
- 32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4页。
- 322 同上 第144页。
- 323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4页。援引自1835年包林博士在英国众议院的演讲。
- 324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6页。
- 325 马克思写道：“在印度 供水的管理是国家权力对互不联系的小生产组织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之一。印度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比他们的后继者英国人更懂得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1866年的那次饥荒在孟加拉



省奥里萨地区饿死了一百多万印度人就够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注〔6〕)。

恩格斯也同样认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在那里，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现在，由于经常发生饥荒，他们最后才发现，他们忽视了唯一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那种行动。”（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而且再次援引包林博士下面一段话：“印度织工的苦难情景给我们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但是这些苦难的原因何在呢？在于英国产品在市场上的出现……大量的织工死于饥饿……不能改行的人则活该饿死。”（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4页。另一方面，英国的棉业机器，在东印度，却发生了急性病一样的作用。1834—1835年印度总督报告说：“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2页）

“1861年以来，由于棉花需要量大增，东印度某些人口稠密的地区，靠缩小稻米的生产来扩大棉花的生产。结果部分地区发生了饥荒，因为缺乏交通工具以及由此产生的缺乏物资交流，使一个地区稻米的不足不能由另一个地区的供应来弥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1页。）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再加上盐税，同印度的气候结合到一起，就为霍乱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的流行造成了适宜的环境，这种灾难正在由印度向西方世界猛扑。这真是人类的灾难和罪恶互相影响的惊人的可怕的事例！”（马克思：《战争问题。——议会动态。——印度》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5页）

- 326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8页。
- 327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9、250页。
- 328 同上 第250—251页。
- 329 同上 第250页。
- 330 同上 第252页。

- 331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1—112页。
- 332 同上第111页。
- 333 同上第109—110页。
- 334 “在美洲我们看到墨西哥已被征服，这使我们十分高兴。这个国家一向都仅仅埋头于处理内部事务，在长期的内战中弄得四分五裂，因而丧失了一切发展的可能性……可是现在它被迫卷入了历史运动，这也是一个进步。墨西哥将来受合众国的监护是符合其自身发展利益的。”（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载于1848年1月23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13页）。
- 335 “俄国的统治 不管怎样卑鄙无耻 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 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5月23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85页）。”
- 336 恩格斯的话 刊载于1848年1月22日《北极星报》。
- 337 这是《每月评论》杂志最近一篇文章中所采取的态度 文章认为 他们以前的态度——据说是反对欧洲殖民抵抗运动有明显的偏见——只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才有了修改，而且大概是在美国左翼的影响下修改的（见霍勒斯·B·戴维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载《每月评论》。Horace B. Davis,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Monthly Review” New York, vol. XIX, no.4, Sept.1967, pp.14—21）。
- 338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5—146页。
- 33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
- 340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255页。
- 341 同上第30页。
- 342 马克思：《国际述评》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
- 343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4页。
- 344 许多学者，其中包括一些通常十分谨慎和十分正确的学者，对这一问题采取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举卡尔为例反映这些学者的立场，他说，“马克思很少考虑殖民地问题，因为他并没有想到世界上殖民地和落后地区会被要求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起任何作用。”（爱德华·H·卡

- 尔：《苏俄历史 布尔什维克革命》。Edward H. Carr,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Macmillan, London, 1957, vol. III, p.229)。
- 345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32页。
- 346 恩格斯：《阿尔及利亚》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99—110页。
- 34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3页及532—533页注82。
- 348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84—587页。
- 349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12月10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98页。
- 350 马克思在1870年明确提出殖民地形势(又一次指爱尔兰)：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马克思：《机密通知》，1870年3月28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74页)参看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载《列宁全集》第22卷第335页。
- 351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中的第5节《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页。
- 352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剿灭、奴役和他们在矿坑中的活埋，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劫掠，把非洲变为一个商业性黑人掠夺场所的转化：这一切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牧歌式的过程，也就是原始积累的主要的要素。紧跟着起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舞台的商业战争。那种商业战争，以尼德兰对西班牙的叛乱作为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取得了广阔的范围，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等等中继续进行下去。(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8页 人民出版社1963年)。
- 353 这一理论特别是同以下三人有关联：即保罗·巴兰《经济成长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57)、保罗·斯威齐(与保罗·巴兰合著《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66)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Monthly Review” New York, vol. XVIII, no. 4, Sept. 1966, pp.17—31)。

冈德论述了巴兰的著述：“保罗·巴兰对不发达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把它作为在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一个反面，这就为了解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世界史打开了大门。”(《每月评论》为纪

念保罗·巴兰而发表的专刊，第16卷，1965年3月。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继续并深化了巴兰开始的著述，见他论述资本主义不发达问题的著作《不是封建主义是资本主义》。André Gunder Frank, “Not Feudalism,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vol.15, no.8, Dec. 1963);《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67);《流氓资产阶级 流氓式的发展》(“Lumpen-burguesia: Lumpen-desarrollo”, Ediciones de la Banda Oriental, Montevideo, 1970)。

冈德·弗兰克关于“不发达的发展”的想法，确实应给予很大程度的肯定，但是他不能说明世界上有些地区何以成为“中心地带”而另一些地区却成为“边缘地区”。他由于受到盛行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鼓励，全然忽视了当前各个不发达国家的内部结构，而倾向于将不发达的进程贬低为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一种仅仅机械性的现象。由于他几乎省去了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任何分析，因此他成为真正的平庸无能。举例说，他断言，在每一个国家内的中心地带都有“殖民的”资本主义，在它的边缘地区都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因此，看来有必要纠正和综合他的分析，应在历史的多线发展观点的范围内为这一分析提供更加严谨而辩证的结构，如本书中所概括的那一种。

有关对冈德·弗兰克提出的一些中肯的批评意见，见雷纳托·桑德里：《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载《政策与经济》(Renato Sandri, “Capitalismo e Sottosviluppo nell America Latina”, in “Politica ed Economia”, Rome, vol.I, no.2 Sept.-Oct. 1970, pp.150—157)和埃内斯托·拉克劳：《拉丁美洲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载《每月评论》(Ernesto Laclau, “Feudalism and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in “Monthly Review”, New York, no.67, May-June 1971)。

354 前引休伯曼和斯威齐书第8页。

355 马克思：《对华贸易》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04—605页。

356 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述评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页。

357 同上第265页。

358 马克思：《中国记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359 在1850年，即中国太平天国起义的一年，马克思富有风趣地写道：“最后，再谈一谈有名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第一个人将圣经译成中文）”

从中国回来后宣传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事情……当居茨拉夫先生离开二十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述评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页）。

- 360 前引特凯书第87页。
- 361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7年9月27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5页。
- 362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130页。
- 363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 364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致卡尔·马克思》，1881年2月16日，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第316—317页。
- 365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31页。
- 366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 367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7页。
- 368 《马克思致维·伊·查苏利奇》，1881年3月8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60页。
- 369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503页。秘鲁马克思主义者马里亚特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提出了类似的、但比较肤浅的观点。他通过玫瑰色彩的眼镜观察殖民时代以前的本土结构，断言由于这么多强有力的农民公社仍然存在至今，秘鲁可以直接过渡到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而“不需要经历其他国家人民所遭受的”漫长演变。他说，“我认为没有任何地方的其他‘落后’民族能提供这样有利于实现原始农业共产主义的条件，这一原始农业共产主义仍然存在于它的机构之中，在无产阶级统治下，它的深刻的集体主义精神将被改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最坚固的基础之一。”（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意识形态与政策》。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Ideología y política”,

Amauta, Lima, 1969, pp.65,68 )

- 370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2年9月12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此文英译文载德昂科斯和施拉姆合编的《从1853年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和亚洲》他们说恩格斯在这段引文中‘对非洲和亚洲的‘土人’继续采取傲慢的态度在亚洲和非洲人们甚至可以看到文明国家对‘不成熟民族’奉行‘保护’政策作辩解的雏形（1904年开始，范科尔、戴维和伯恩斯坦极力主张奉行这一政策）’。他们这样说，是一个大错误。
- 371 同上 第353页。
- 372 前引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1页。
- 373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
- 374 前引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二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6页。
- 375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02页。
- 376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2年3月15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06页。
- 377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3年2月24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9页。
- 378 同上 第39—40页。
- 379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3年10月17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8—149页。
- 380 前引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第439—440页。
- 381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中的第5节《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2—623页。
- 382 同上 第622—623页。
- 383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7年9月27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5页。
- 384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
- 385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中的第5节《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页。恩格斯写这一段话是用以反驳俄国布朗

基主义者彼得·特卡乔夫的。特卡乔夫的《致恩格斯的公开信》(苏黎世, 1874年)曾认为应当在俄国立即发动革命,因为每一个被压迫民族都自动地“随时准备要干革命”。特卡乔夫为支持自己的理论而提出的一个论据是:“如果我们没有城市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我们的工人只需要同政治当局作斗争:在我国,资本的力量仅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同前者的斗争要比同后者的斗争轻而易举得多。”在这些问题上,列宁以及布尔什维克一般的理论和实践,是在更加大得多的程度上赞同特卡乔夫而不是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列宁认为俄国落后的工业和它的萌芽性质的资本主义,构成了有利因素。别尔佳耶夫甚至认为列宁“在俄国是以马克思的名义进行革命,而不是以马克思的精神进行革命”(尼古拉斯·别尔佳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与意义》, Nicholas Berdyaev, “Les sources et le sens du communisme russe”, 1938, Gallimard, Paris, 1963, pp.208—10) 关于这一方面 见阿尔图罗·科隆博:《国家、人民和政党在苏联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地位》 载选集《在非欧洲文化中的国家、人民和民族》(Arturo Colombo, “Stato, popolo e partito nell’ ideologia politica sovietica”, in the anthology “Stato, popolo e nazione nelle culture extra-europee”, p.248)。同样,年轻的葛兰西热烈地欢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把它看作“反对资本的革命”(安东尼奥·葛兰西:《反对“资本”的革命 前进》 载《政治文献》。Antonio Gramsci, “La rivoluzione contro il ‘Capitale’,Avanti!”, Milan edition,24 Nov. 1918, in “Scritti Politici”, Editori Riuniti, Rome,1971, p.80)。虽然列宁真的认为在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要比在资本主义国家容易些,但贯彻到底却更困难。在这一点上,列宁要比别尔佳耶夫所想象的尖锐得多。

386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2页。

387. 因此令人震惊的是 索弗里能够断言对俄国的‘亚细亚’式的解释已促使普列汉诺夫得出“反动的政治结论”(姜尼·索弗里:《苏联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两部研究著述》 载《阶级与国家》。 Gianni Sofri, “Due scritti di studiosi sovietici sul modo asiatico di produzione”, in “Classe e Stato”, no. 2 Autumn 1966, p.54 ; 和《亚细亚生产方式》, “Il modo di produzione asiatico”, p.98)。很清楚,作者的列宁主义先人之见妨碍了对这一“马克思主义争论”的实际争执进行均衡的估价。

- 388 沃尔夫对这一预见评论道：“列宁告诫托洛茨基要注意非民主的革命和建立少数党政府所造成的后果，托洛茨基告诫列宁要注意在他的统治集团的、中央集权的、不民主的党的结构中所固有的危险，这是列宁的光辉预见，也是考茨基的光辉预见。但他们就象三个盲人摸象。马克思主义者争辩说，他们由于采取社会学分析的方法而使他们能够预见未来。如果可以把这三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言合到一起的话，这些预言确实会成为远见与预言的光辉范例。”（伯特伦·D. 沃尔夫：《三人干革命》。Bertram D. Wolfe,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Dial Press, New York, 1948;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1966, p.414）。
- 389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土地问题》（Georgy Plekhanov, “The Land Question”, in “Dnevnik Sotsial-Demokrata”, Geneva, no.5, Mar. 1906, pp.14, 16—17）。普列汉诺夫又回到他对《〈俄国社会史〉导言》中提到的主题 强调 “东方专制暴君的土地政策曾经同西欧社会主义有过某些血缘关系这一错误想法，对俄国社会理论史起了灾难性的作用”。但是上述这段话意义不明确，而且它的确包含有双重打击，即使它不表明观点的改变。在这部具体著述中，看来他主要关注的是把他的观点同埃利泽·雷克吕的观点分清，他站在自由意志论的观点上心怀叵测地将王安石变法说成是“中国社会主义者”想方设法疏远人民和贵族的一种尝试（参看埃利泽·雷克吕：《新世界地理》载《东亚》。E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Paris, 1882, vol. VII: “l’Asie Orientale”, p.577）。普列汉诺夫强调说，“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者控制生产资料，而在这方面使我们关切的是，生产者本人是国家所有的，是具有说话能力的生产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史〉导言》。Plekhanov,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sociale de la Russie”, p.82）。
- 390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上作的《关于土地问题的结论》的演说 载《列宁全集》第10卷第249页。
- 391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的第3节《土地问题》载《列宁全集》第10卷第299页。
- 392 列宁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在其他著述中曾提醒人们注意俄国资本主义的“亚细亚式的”发展：“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



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不能尽力去消灭沙皇制度。”对列宁来说，不但国家而且工厂（据说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心脏”）具有“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万恶的农奴制度、亚洲暴政和侮辱人的政策的余孽”尚有待于根除。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载《列宁全集》第9卷第40、41、44页。

- 393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2页。列宁的这一段话摘录自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
- 394 列宁：《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真理报”1923年1月25日第16期），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6页。参看列宁：《日记摘录》（“真理报”1923年1月4日第2期）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9页。
- 395 列宁在论及东方专制时写道：“大家知道，只要一个国家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还是宗法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特点，而商品经济和阶级分化又不很发展，那末上述的那种国家制度就具有极大的牢固性。”（列宁：《论民族自决权》载《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4页）。
- 396 列宁：《论粮食税》载《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3页。
- 397 同上 第342页。
- 398 列宁：《日记摘录》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8页。
- 399 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157页。
- 400 列宁：《宁肯少些 但要好些》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1页。
- 401 列宁：《日记摘录》载《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7页和《宁肯少些 但要好些》同书第441页。
- 402 前引列宁：《论粮食税》载《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1页。
- 403 同上 第341—342页。
- 404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和《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的补充》载《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7、618页。
- 405 列宁说，“我们的党纲……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我们不得不把这个不幸的——我应当怎么说呢？——帽子加在它的头上。”（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载《列宁全集》第32卷第7页）。
- 406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6页。
- 407 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p. 441）。
- 408 威特福格尔的理论几乎总是被人作出这种错误解释。最近作出这一错

- 误解释的是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卡洛 见前引卡洛书 第 12 页。
- 409 见前引里齐书 第 6 章“苏联的封建社会”第 171—177 页。
- 410 列夫·托洛茨基：《新方针》载《论革命》(Lev Trotsky, “Cours Nouveau”, 1923, in “De la révolution”, Editions de Minuit, Paris 1963, pp.32—34,54; Eng. trans. “The New Course”, trans. Max Schachtman, Univ.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1965, pp. 14—15,45)。
- 411 列夫·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Lev Trotsky, “La révolution trahie”,1936,ibid., pp 475, 511, 516, 532; Eng. Trans.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New Park Publications, London,1973, pp. 53; 104,111,135)。
- 412 同上 第 467 页 英译本第 54,56 页。
- 413 同上 第 480 页 英译本第 59 页。
- 414 同上 第 480—483 页 英译本第 58,60 页。
- 415 同上 第 510 页 英译本第 103 页。
- 416 同上 第 533 页 英译本第 135 页。
- 417 同上 第 594,579,515,599 页 英译本第 201—224 页。
- 418 同上 第 602 页 英译本第 236 页。
- 419 同上 第 604—605 页 英译本第 258—259 页。
- 420 同上 第 606 页 英译本第 241 页。
- 421 参见上注 第 3 页。
- 422 欧内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Ernest Mandel, “Traité d'économie marxiste”, Julliard, Paris, 1962; Eng. Trans.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trans. Brian Pearce, Merlin Press, London, 1962, vol. III, p.565)。对这一观点进行严厉批评的人们中，有“野蛮的社会主义”(Socialisme ou Barbarie 集团 它认为分配方式同生产方式相脱离是‘一种堪称蒲鲁东和杜林式的白痴 (, 见皮埃尔·肖莱：《论俄罗斯的生产》。Pierre Chaulie, “I rapporti di Produzione in Russia” Samonà e Savelli, Rome,1971,pp.30—31,35—36)。

实际上，马克思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而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同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一道消失。”(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 载《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25卷第997, 999页)。

从这一具体事例中作出的推论是，如果苏联的分配方式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么生产方式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曼德尔为支持他的理论，只引用了恩格斯的一些话，看来这些话是容许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之间在过渡的社会中有暂时的矛盾。

- 423 前引里齐书 第 69, 13 页。德热拉斯同样说：“新的阶级本能地认为全国的物品事实上都是它的财产 甚至‘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这些词都正确地表明总的法律上的虚构”(前引德热拉斯书, 第 65 页)。帕耶在最近一次分析中用同一风格写道：“如果认为技术官僚社会组织的方式使它能通过国家所有制解决生产资料的名义所有权问题，那就错了；实际上 只有通过那种‘集体化’技术官僚的集体性才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国家所有制形式不单单是对资本主义形式的否定。它正面地确认了新的统治阶级的权利和权力。”(马克·帕耶：《马克思对马克思技术官僚社会》。Marc Paillet, “Marx contre Marx: La société techno-bureaucratique”, Denoël, Paris, 1971, pp.62—63)。
- 424 前引里齐书 第 27, 82—84 页。
- 425 同上 第 67—68 页。
- 426 同上 第 123 页。帕耶同样地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者的实际情况所应类比的条件不是无产阶级的条件，而是主观的条件。就无产阶级而言，主要因素是经济的，但就我们而言，它是占压倒优势的多种多样的权力地位。人们应当从封建主义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去寻求历史的参考。更确切地说，官僚统治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和封建的阶级剥削形式的结合体，外加一些新的特点。其唯一有利之处是：工资和津贴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均等、充分就业、以及诸如保健、养老金和薪金照付的假日等免费福利……斯大林把人称为‘最宝贵的财富’……显然是技术官僚最宝贵的占有物 他说出了一个伟大的官僚主义的真理。(前引帕耶书 第 166, 170 页。)
- 427 前引里齐书 第 95, 70 页，另散见全书。伯纳姆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紧紧步他后尘。参见詹姆斯·伯纳姆：《管理革命》(James Burnham,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Putnam, London, 1942, p.192)。
- 428 我们尤其是指前引米洛万·德热拉斯和罗歇·加罗迪的著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折》[“Le grand tournant du socialisme”] 和《全部真理》[“Toute La vérité,” Grasset, Paris, 1970; Eng. Trans. “The

Turning Point of Socialism”, Fontana Books, London,1970, and “The Whole Truth”,trans. Peter and Betty Ross, Fontana Books, London,1971))。

429 前引卡洛书 第 44 页。

430 伊萨克·多伊彻写道：“马克思主义认为，充分发展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社会主义就是空中楼阁。对一种本质上不具有社会性的生产方式，试图强行社会控制，就如同对具有社会性的生产进程实行私人的或部门的控制一样，是自相矛盾的和带有时代错误的。在俄国，正如在任何不发达国家一样，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前提……此外，真正的起点是十足灾难性的。在世界大战、内战和外国干涉的年代之后，俄国曾经拥有的一点点工业也崩溃了。机器和库存已经耗尽。国家在经济上倒退了半个多世纪。城镇人民在家里焚烧家具来取暖。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受到饥荒的打击在全国流浪寻找食物。1917 年筑起街垒斗争的几百万工人已经四散，他们作为一支紧密团结的社会力量已经不复存在。最勇猛的人在肉体内战中阵亡了；许多人在新政府、军队和警察局担任职务；大批人逃离饥馑的城市；留在那里为数不多的人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做生意而不是劳动。他们变成了失去社会地位的人而且被黑市所吞没。这些就是二十年代早期布尔什维克试图建立和巩固他们政权的形成环境。他们这样做，不能依靠他们自认为是其先锋队的那个阶级，那个阶级应该是新国家的主人，新民主的主要支柱，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言人。那个阶级在肉体上和政治上已经消失。因此，国家尽管面临饥馑，资产阶级在现实的农村生活中幸存了下来，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象停在空中的幽灵。这些就是所谓政权官僚蜕化的真正起因。就当时所处的境况而言，‘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民主’、‘工人管理企业’，几乎是些空洞的口号没有人能赋予这些口号以任何内容。正如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所阐述过的，苏维埃民主思想的先决条件是存在一支活跃的、永远警醒的工人阶级它不仅反对‘古代政权’而且反对可能滥用或篡夺权力的任何新官僚势力。由于工人阶级并不具体存在，因此，布尔什维克决定充当工人阶级的临时代理人和信托人，直到情况逐渐正常而一个新工人阶级问世为止。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充当一个并不存在的、或者几乎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代表。这样就奠定了官僚独裁统治、不受约束的权力和权欲的腐蚀”（伊萨克·多伊彻：《未完成的革命》。Isaac Deutscher,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Oxford

Univ.Press, London,1967, chap.2, pp.29—30)。

- 431 前引卡洛书 第 42—44 页。关于这个题目 格施琴克朗说：“农业的集体化，把大多数俄国人民置于集体农庄的束缚之中，这不仅意味着俄国土地革命的结束和逆转，而且集体化起着彼得大帝时期农奴制所起的同样作用，就诚如在苏俄重建彼得大帝时期的‘勤务国家’一样。在俄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一方面设法使国家现代化，要在技术上和产量水平上接近西方，另一方面又使该国在有些方面脱离西方而趋向古代东方专制主义的模式。”前引格施琴克朗书 第 117 页 。
- 432 前引卡洛书 第 40 页。
- 433 让-保罗·萨特：《冷酷的社会主义》(Jean-Paul Sartre, “Le socialisme qui venait du froid”) 为安托宁·利安著《三代人》写的序言(Pre-face to Antonin Liehm, “Trois génération”, Gallimard, Paris, 1970, pp. III, VI)。
- 434 费日多在他写的所谓人民民主国家的历史著述中说，“把《共产党宣言》的著名论点意译一下，就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废墟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事实上，斯大林逝世后的人民民主国家史就是这些新的矛盾的历史。”(弗朗索瓦·费日多：《人民民主国家史》。François Fejtő,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Democracies”, Pall Mall Press, London, 1971, p.274)。但是，那么为什么还是错误地称它为“社会主义社会”呢？马克思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即使是防止有损于加罗迪称之为“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心目中所珍爱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形象”(加罗迪：《全部真理》英文版 第 183 页)。
- 435 前引卡洛书 第 60 页。
- 436 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发展模式提出新的解释，非洲生产方式不是该书讨论的范围 在这方面 见前引戈德里埃的书 絮勒-卡纳尔的书；凯瑟琳·科奎里-维德罗维奇：《对非洲生产方式的探索》(Catherine Coquery-Vidrovitch, “Recherches sur un mode de production africain”, in “La Pensée”, Paris, no.144, Apr.1968, pp. 61—78)。科奎里-维德罗维奇象戈德里埃和法国或其他讲法语的作家一样，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持有陈词滥调的同样看法，倾向于贬低水利工程的重要性，但她确实反对“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许多非洲社会里所发现的那种生产方式等同起来，认为“两种社会唯一共同之处就是存在着自给自足的村社”(第 64 页)她认为“非洲生产方式”不能降低

到西方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由于它“缺乏旨在直接剥削农民阶级的真正专制主义”而又有别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第77页)。

絮勒-卡纳尔原先认为“传统黑非洲一些比较先进的地区中最常见的生产方式可以同亚细亚方式相媲美”(让·絮勒-卡纳尔:《黑非洲》, Jean Suret-Canale, “Afrique Noire”,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8. p.94) 现在也倾向于强调其差异 断言西非国家是建立在迥然不同于东方专制结构的基础之上:即某种部族联邦,由一个首领为头头,他是土地和市场的太上皇。

他的观点同威廉最近发表的下列评论有关联,“也许除了津巴布韦帝国(该帝国的废墟显示出使人想起统治亚细亚社会的伟大建设者们所留下的巨大纪念物)以外,在非洲,从来没有出现过国家从事社会的重大工程或普遍奴役的这类事情”。威廉确认了两种广泛的生产方式:循环的和直系的。循环的生产方式 其他作者称之为“村舍部落制”(参见伊曼纽尔·特里:《原始社会以前的马克思主义》。Emmanuel Terray, “Le marxisme devant les sociétés ‘primitives’”, Maspero, Paris, 1969; Italian trans. Samonà e Savelli, Rome, 1969, p.116)。循环方式可以在狩猎社会中找到,其特点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实行平等分配。产品的流通是即时的,直接的和广泛的,没有集中收集产品,然后进行分配的再分配体制。结果是,亲属体系仍然是初级的,而“扩大了”的权力是偶然的和为期限短暂的。

在直系生产方式中,财产也是共有的,但一名或一名以上的保管人代表集体占有财产。分两个阶段实行再分配,小儿子向大儿子进贡,反过来接受大儿子的赠物。那种生产方式导致一种长久的职能权力的存在,这一权力因氏族思想而得到合法化。首领、家系头头和其他长子,垄断了该集体生存所必要的技巧,还独占了嫁妆、奴隶和其他说明地位的象征。威廉说,虽然年长者占有赢余,但是也不能说这种生产方式是剥削。而我们发现他在这一点上多少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让-克洛德·威廉:《对狩猎和氏族生产方式的研究》载于《人类与社会》。Jean-Claude Willame, “Recherches sur les modes de production cynégétique et lignager”, in “L’Homme et la Société”, Paris, no.19, Jan.-Mar.1971, pp. 100—104)。还参看克洛德·梅拉苏克斯:《确定狩猎社会水平的探索》。“Recherches d’un niveau de détermination dans la société cynégétique”, no.6, Oct.—Dec. 1967, pp.95—106)。

437 现代埃及问题作家们当今最佳的政治和社会著述中,一向强调现代埃

及的“官僚主义”特色。从安瓦尔·阿卜杜勒·马利克到哈桑·利雅德，从班诺·萨里尔到马哈茂德·哈桑，从马克西姆·罗丹松到萨米尔·阿明，所有这些作家在这方面都反复提到埃及特殊的“亚细亚”传统。

比如说，阿卜杜勒·马利克关于这个问题写道，“从忠诚的王朝到穆罕默德·阿里，甚至到英国占领时期，经济财富的主要基础——土地，是君主的财产。现代埃及只有百分之三的土地是肥沃的，而尼罗河流过的这一狭窄的绿色地带，其四周均为沙漠、干旱和烈日所包围。这些吝啬地施舍给农民的可耕地仍然需要进行正常的灌溉，因为雨量极稀少。因此发展了一整套贮水、配水和排水体系。只有一个强大的具有连续性的中央权力当局才能承担这一重担；在这里，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和土崩瓦解的同义语，因为大君主、省长都不能确保其臣民获得只有资本才能提供的东西：水，即生命之源泉。首先必须基于这一事实来探索埃及实现民族统一的深远原因。埃及的民族统一是世界上年代最悠久的统一，也只有这个统一（通过多次占领）依然持续达七千年之久。也正是这一事实赋予了中央权力当局以压倒的异常权力。国家真的是决定一切的，是生死大权的主宰，就象世世代代以前那样，是埃及的日常生活……在一个不变的地理结构范围内的七千年历史中，在我们的水平上形成了埃及三重个性：一是国家，它主宰着经济生活，经济生活的要素掌握在国家手中；二是军队，它是国家机器的支柱；三是军队的剑和盾，它是经济和社会结构与活动的组成部分，军队也是民族运动先锋队的组成部分。”

阿卜杜勒·马利克认为，当今埃及的政权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不是资本主义的，也有别于通常的国家资本主义。他强调“1961年开创的专制主义、家长式、中央集权性质的进程”在其后形成了“真正庞大的国家机器，不仅有军队，而且有各种警察部队，以及迅速发展的经济官僚”，而且表明后一阶级的贪得无厌和它享有当局的豁免权，对纳赛尔在1962年全国行动宪章中所提出的“中央集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大杂烩不啻是一大嘲弄。该宪章称，“从久远的古代起，埃及农业找到了对于它所面临的最复杂问题的真正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首先我们必须提到灌溉和排水。在今天的埃及，如同世世代代以来一样，灌溉和排水是作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而加以实施的”。因此，阿卜杜勒·马利克评论说，“那个构成东方专制主义基础的水利社会就被称为社会主义（前引阿卜杜勒·马利克书 第353—354, 360—368, 331页）”。

利雅德以同样的语词写道：“埃及社会的古老理想是官僚统治的理想……一个法老，埃及整个国土上至高无上的权力，一个由贵族组成的文官统率基本上没有差别的大量有地农民。在尼罗河流域悠久的历史，那一理想已经实现了若干次了……这一理想的最后一次兴旺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那是在现代埃及之父马哈茂德·阿里的领导下。”（哈桑·利雅德：《埃及社会的三个时代》载《党人》杂志。Hassan Riad, “Les trois âges de la société égyptienne”, in “Partisans” Paris, no.7, Nov.—Dec.1962, p.25)。

利雅德的分析指出了构成与刚才谈到的那个政权有联系的现政权的诸因素：“如果我们一定要给这个新社会下个定义，那么我们就应当称它为反动的法老式的中央集权主义。这看来可能是矛盾的，因为该政权有计划使国家工业化，而且已经可以吹嘘它获得毋庸置疑的成就，虽然它们对于需要的东西还是远远感到不足。但这只是自相矛盾，因为该政权打算在不触动固有结构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乡村合作社不是别的，不是现代社会主义影响下的产物，而是法老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复萌。埃及这个新的剥削阶级是‘资产阶级官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的中等阶层，是由早在 1953 年的官僚化进程所产生的。但是没有 1957 年的国有化，这一进程就不可能获得多大进展……国有化企业的经理人员具有上层中等阶层的色彩。通过那一官僚化进程，第二代资产阶级形成了。”从 1960 年起，由于原来的上流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财产，“传统资产阶级现在希望只是被接受并结合进新的国家官僚机构”（哈桑·利雅德：《纳赛尔主义》。Hassan Riad, “Le nassérisme”, *ibid.*, no.8, Jan.—Feb.1963, pp.43—47)。

萨米尔·阿明分析埃及的情况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马哈茂德·侯赛因则认为是“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对他们两人来说新的特权阶级是国家资产阶级 萨米尔·阿明：《纳赛尔的埃及》。Samir Amin, “L’Égypte nassérienne”, Paris, 1964 安瓦尔·阿卜杜勒-马利克援引；马哈茂德·侯赛因：《1945—1968 年埃及的阶级斗争》。Mahmoud Hussein, “La lutte de classe en Egypte de 1945 à 1968” Maspero, Paris, 1969)。侯赛因特别详尽谈到必须防止不适当地“把私人财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国有制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这是苏联修正主义者的蓄意策划”，侯赛因指出“生产关系和掌权阶级的关系这个根本性问题”，认为“在埃及，经济是按金字塔结构永世长存的方针进行管理的，而一切权力集中在金字塔塔顶即中央机构“公共”团体和董事会而



基础则沦为软弱无力的地位(“第 169—177 页)。

罗丹松这样提出问题：“如果这个政权迅速作出明显的贡献，取得了一些真正的成就，而与此同时，如同阿卜杜勒·马利克所说，具有令人反感的色彩和古怪的方面的话，那么这一政权又是什么性质的呢？”(马克西姆·罗丹松：《在马克思主义反射镜中的纳赛尔的埃及》载《现代》杂志。Maxime Rodinson, “L’Égypte nasserienne au miroir marxiste”, in “Les Temps Modernes”, Paris, vol. XVII, no.203, Apr. 1963, p.1882)。后来他确认埃及是一个由军人阶层统治的中央集权经济的国家(马克西姆·罗丹松：《以色列与阿拉伯的反抗》。Maxime Rodinson, “Israël et le refus arabe”,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8, Italian trans. Einaudi, Turin, 1969, p.103)。

我们再援引他写的《在马克思主义反射镜中的纳赛尔的埃及》(第 1882—1883 页)中的一段话：“要认真对待结构性最强、争论性最小的事实，我们面对的是统治和治理一个国家的人数很少的寡头集团，其基础是一伙乌七八糟的支持者，尽管他们大致是在社会的一定范围内。这伙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社会，完全控制这个社会的经济，为此目的，充分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但是过去和当今的许多国家(当今的国家中有些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从苏梅里亚(古代下巴比伦——中译者注)城邦到苏联，从中国到东德，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埃及早期政权，都具有那一特点。阿卜杜勒·马利克认为那一特点在埃及是永久性的，是由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经常得到军队支持的政治动力，往往会反映在更为集权化的经济之中。这说明有几个时期，即法老的埃及，拉吉廷的埃及、马穆鲁克的埃及都类似我们的“社会主义”。如果把社会主义看成就是国营经济的话，那么它是十分古老而不是特别民主或动人的条件。这同纳赛尔的埃及又有什么区别呢？它的开放性可同过去比美；它的限制性可同当前比美。

最后，我们谈一下萨里尔，他明确地使用“官僚集体主义”这个词，如在下述段落中他说，“埃及农村最近的历史可以被认为是集体主义和高度中央集权化水利社会悠久历史中的一章。但是与此同时，土地改革使埃及农村社会和现代世界之间的联系加强了。甚至在 1952 年之前，那些联系曾经导致了可以称为现代化的复杂情况。纳赛尔式的革命加速了那一进程；不过，考虑到需要以及进程中出现的不均衡，这一进程看来仍很缓慢，甚至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也是缓慢的。埃及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十分类似人民民主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即工业的国家所

有制，农村的集体化措施，建立一党计划官僚机构以推动该项政策之贯彻执行。全国的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体主义同时并存也并非罕见。人民民主国家在早期也出现过完全相同的情况。（本诺·斯顿伯格·萨里尔：《在埃及农村的重要革命》载《现代》杂志。Benno Sternberg Sarel, “Révolution par le haut dans les campagnes égyptiennes”, in “Les Temps Modernes”, Paris, vol. XXIV, no.274, Apr,1969, p. 1801)。另见姜帕洛·卡尔基·诺瓦蒂：《阿拉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载《第三世界》(Giampaolo Calchi Novati, “Il socialismo arabo come dottrina di sviluppo”, in “Terzo Mondo”, Milan, year III, no 9, Sept. 1970, pp.29—45)。

不过，还是需要强调俄国、中国的集体官僚统治同纳赛尔埃及的集体官僚统治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别部分是由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而造成的。埃及不同于俄国和中国，它是一个小国，或者说人们居住的那部分地区面积很小，埃及相对来说不是与世隔绝的国家，而是位于非洲、亚洲和东地中海三个世界战略的汇合点上。即使未曾受到直接的殖民开拓，它过去和现在也都不可能避开许许多多使埃及成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重要据点之一的压力。从1799年至1800年的拿破仑远征（它动摇了埃及的体制）到苏伊士运河的开放为通往印度道路的组成部分——仍然是国际帝国主义在埃及伟大纪元的征象，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到最近同以色列的冲突，埃及是在同帝国主义经常争执而又完全屈服于它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的，这归因于埃及拥有庞大的水利实体和它作为河岸国所具有的社会和文化个性的实力。

438 本世纪所有经历了“亚细亚式复兴”的国家中，伊朗无疑是最不知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这样的进程只是在过去几年才出现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不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共产党往往允许心甘情愿的辩护士欢呼它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伊朗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无疑是一种集体官僚制，尽管与此同时出现了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以及昔日专制制度的不仅仅一点残余。用一位十分了解中国的明智的法国记者的话来说，今天伊朗正进行极其新颖的务实的试验，并产生显著的结果。那种试验有时竟如此大胆，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以致使人联想到毛领导下的公社而不是苏俄后期的修正主义……除了毛的中国农业以外，伊朗的农业正成为世界上社会主义色彩最浓的。它同中国的农业很相似。”（马克斯·奥利维埃-拉

康：《伊朗，一个使中国注意的王国》载《费加罗》报。Max Olivier-Lacamp, "Iran, un royaume qui fait penser à la Chine", in "Le Figaro", Paris, 13 Mar.1972, p.5)。

很显然 那个试验并没有很大“社会主义”成分 但是伊朗的确是在农村推行先进形式的集体化。它采取合作社形式，如果同中国比较的话，大致处于中国最早期建立的初级模式和 1958年中国的高级模式之间。伊朗国王的改革无论如何已消灭了数年以前仍以全村私人所有制形式存在的“亚细亚封建”残余。这种古怪的“封建”所有制对不熟悉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西方观察家来说总是感到困惑。这一改革也促进了教育方面的重大进展，推动了扫盲运动。

439 前引卡洛书 第 60 页。

440 马克思年轻时就是这样确立社会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在此阶段，普遍废除了私有制，随之将社会所有成员改造成为领工资的工人。这仍然是原始的庸俗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通过“妒忌和平均化底欲望”使文明变得野蛮，依据强力的方式来把才能等等抽象掉。这种共产主义把非做不可的事装成出于好心才做的，鼓吹普遍的禁欲主义，把人的安逸降低到最低限度。“私有制底这种扬弃不是一个现实的占有，这恰恰是全部文化和文明世界底抽象的否定以及贫困的和丧失了欲望的没有超出过私有制而是从来没有一次接近过私有制的人类倒退到不自然的单纯性中去等可以证明这点。这种公共组织只不过是劳动底一个公共组织和公共资本，公共组织作为普遍的资本家所付出的薪金底平等性而已。这个关系底双方被提高到一个想象的普遍性中去，劳动作为每一个人都被放进去的规定，资本作为公共组织底被公认的普遍性和权力。这种“不成熟的共产主义”不过代表着“私有制底第一个积极的扬弃”，“只是想把自己当作积极的公共制度来设定的私有制底卑鄙底一个表现形式而已”，而不结束异化。“这种共产主义——因它到处否定人类的人格性——只不过恰恰是私有制底彻底的表现，而私有制就是这种否定。”(马克思：《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63 年 第 81、82 页。)

441 引文见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外文出版社 1969 年 第 62—63 页。

442 汉纳·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rcourt Brace & World, New York, 1966, p.244)。那部重要的但极度唯心主义著作的作者，正确地区别什么是

官僚主义政权，什么仅仅是对文官制的歪曲，这种情况在西方也是经常发生的，虽然西方对两者间的差别不能给予完满的解释，因为它不是从它们各自的生产方式这个角度来提出其论点的。“当然这两类官僚制之间在表面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如果过多地注意小官吏心理状态的极大相似之处的话。但是如果说法国人民已经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把他们的政府当作一种不可免的邪恶而接受的话，他们却从来没有犯过许可它统治法国这一致命的错误……法国的政府气氛已成为低效率和不安的气氛；但是它没有产生假神秘主义的先兆。当这一先兆成为一种政府的形式时，它就是官僚统治的标志。由于它所统治的人民实际上从来不知道局势发展，而且对法律没有合理的解释，因此只有一件事能起作用：即事态本身的残暴性质。一个人的遭遇如何，必须得到解释，而解释的种种可能性是无穷尽的，其推理是无限的，其知识是不受阻挡的。这一先兆具有一种危险的魅力（第 244—245 页）。

- 443 关于组织隐蔽的失业者作为发展动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地域辽阔的不发达地带，从南欧到东南亚，包括人口十分稠密的农业国家（那里的隐蔽失业者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五十），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见拉格纳·纳斯克的经典著作：《不发达国家中的资本形成问题》（Ragnar Nurske,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58）；又见克劳斯·比勒贝克：《亚洲与非洲人力潜力的动员》（Klaus Billerbeck, "Mobilisation of Manpower Potential in Asia and Africa", Archives of World Economy, Hamburg, 1961）；又见奥斯卡·加位韦略：《对落后国家隐蔽失业者的动员》（Oscar Garavello, "La mobilitazione della disoccupazione nascosta nei paesi arretrati", Vita e Pensiero, Milan, 1964）。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曾在较早期的著述中谈到（翁贝托·梅洛蒂：《饥饿社会学 从经济发展的新战略认识问题》。Umberto Melotti, "Sociologia della fame: Dalla Presa di coscienza del problema ad una nuova strategia per lo sviluppo economico", La Culturale, Milan, 1966; Spanish trans.,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Mexico, 1969），强调指出，为了有效动员就业不足或季节性失业的劳工，不仅需要大力广泛开展宣传运动——这一运动可以在已经重新分配土地的有力形势下进行——但至少在有些情况下也要采取强制措施（第 183—184 页）。根据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集体官僚制的进一步研究来看，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这一点甚至在

我们早期著作中也被作为动员失业劳工的典范。由于这一政权继续具有阶级性，我们现在也可以更好地说明开展宣传和实行强制的必要性。有些人还继续认为俄国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也指责这两个国家出现了一些‘偏向’和‘退化’并把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强制手段的原因解释为立即进行若干任务的缘故：诸如将现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积累和工业化的原始性，这在西方是由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之久才完成的，而且具有同样严酷的社会后果。采取那一路线的人，举加罗迪为例 参看他写的《中国问题》一书。Garaudy “Le problème chinois”，p.318），对欧洲种族优越感和对资产阶级的简短历史回忆给予了有益的震撼，但却看不见马克思正确处置中国和俄国现状的主要因素。

- 444 赫伯特·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结束》（Herbert Marcuse, “Das Ende der Utopie”, Maikowski, Berlin,1967）。另见他著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 Beacon Press, Boston, 1964）。但这本书不构成他的思想的最后发展。有关马尔库塞理论的发展演变情况，见蒂托·佩利尼的思考较深的著述：《马尔库塞与第三世界》载《第三世界》（Tito Perlini, “Marcuse e il Terzo Mondo”, in “Terzo Mondo”, Milan, vol. III, no.10, Dec.1970, pp.11—27）。
- 445 见翁贝托·梅洛蒂：《关于发达和不发达的非种族优越感概念》载《第三世界》（Umberto Melotti, “Per un concetto non etnocentrico dello sviluppo e del sottosviluppo”, in “Terzo Mondo”, Milan, vol. I, no.1, June 1968, pp.7—23）；法文版加上更富有启示性标题：《所谓“发达”也就是“不发达”》载《全球》杂志 “Les soi-disant ‘développés’ sont, eux aussi, ‘sous-développés’”, in “Terre Entière”, Paris, no. 36, July-Aug. 1969, pp.5—29）。
- 446 种族优越感和文化相对主义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而且那是一个伪币。毋需详述欧洲文化中种族优越感的昔日罪恶；它作为殖民征服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恐怕是输出“文明”和“真正的宗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文化相对主义并不是答案：放弃寻找答案的企图犹如种族优越感一样危险。卡洛·图略-阿尔坦关于这个问题有如下论述：“第一个打倒的‘偶像’是根深蒂固的老种族优越感的观点。这种观点将自己的文化置于人类宇宙的中心，并带来狂热、偏狭和压迫。……因此以文化相对主义著称的人类学思潮学派的创建人，美国学者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为首，对此作出了反应，是可以理解的。那一学派的理论原则

是简明的；由于我们的一切判断都受到我们自己文化精神气质的感染，因此我们绝不能判断一种有别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因为它的不同恰好在于它本身独特的精神气质，而精神气质是可以赖以判断它的唯一根据。文化相对主义具有作为反对一切形式种族压迫的论据的独特用途。文化相对主义最初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它正确地反对以种族优越感的名义犯下的种种罪行。但是，如果人们从这一立场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的话，那么他们显然处于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地位。……事实上，人们对所有其他民族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总是采取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此外，文化相对主义显然同它本身的前提自相矛盾。它使每一个人……以某种‘多中心的’种族优越感局限在他本民族文化的有限环境之内。”（卡洛·图略-阿尔坦：《实用人类学》。Carlo Tullio-Altan, “Antropologia funzionale”, Bompiani, Milan, 1968, pp.15—16）。持这一态度，就可以太轻易地导致不加批判地接受不仅仅别人的文化 而且还有别人现有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政策，不论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伊朗国王的专制主义，伊斯兰的蒙昧主义和阿拉伯诸国的性压抑，小小的石油酋长国或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统治，其理由是，这些是各该国文化的直接或间接体现。因此，为什么文化相对主义会成为帝国主义的一种新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经常需要这种体制来得到支撑）是可以理解的。

- 447 有关更加详尽的分析 见我们的文章：《所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载于《社会学杂志》（“La cosidetta ‘grande rivoluzione culturale proletaria’ in Cina”, in “Rivista di Sociologia”, Rome, vol. V, no. 13, May—Aug. 1967, pp.101—140）。
- 448 秦始皇帝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完成统一中国的皇帝，他声称受到哲学家墨子（公元前479—381年）和法家思想的启发，从上而下地发动了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目的是最终同传统的儒家思想决裂，建立以博爱思想为中心的新秩序。秦始皇的著述在许多方面是毛主席著述的先兆。墨家（墨子的信徒们）和法家希望超越私人利益的领域，并在所有人中实行他们作为“天民”而有权享有的平等理想。他们这样做，企图将私人利益纳入公社的、甚至‘共产主义的’热情之中，为达此目的而牺牲一切私人权利、文学、艺术、传统等等。红卫兵对文艺的过火行为是众所周知的。宰相李斯在公元前213年禁止私人占有大部分著作，违者处死，下令“焚书”，除了医药、农业和巫术等政治色彩不强的技术书籍以外，都付之一炬。他们这样做，就破坏了他们的制度成功的可能性，而他们

的批判态度也堕落为乔装打扮成辩证法的又一教条。不应当误解我们对墨家的文化革命和毛主义的文化革命所作的比较。我们完全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但是，重申一下马克思的一句话：解剖人类是解剖类人猿的关键。

449 在本书初次问世后，一位生活在美国、但公开支持古巴人民在革命者夺取政权后所进行的伟大而积极的社会变革的古巴作家，以他自己相当独立的见解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古巴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呢，还是官僚主义的集体制国家。那位有见地的评论家还说，由于革命后雄心勃勃的收入再分配的资金用尽，而且对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更加可靠的支援丧失希望，革命就自食其果了。在那个时期（1963—1964年）原始积累的问题变得尖锐起来了。古巴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把权力则集中到少数可信赖的革命者手中、以及建立一个仁慈的家长式独裁统治。传统的事物格局是，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他们则推翻这种看法，把社会主义作为发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但是，局势发展中的固有矛盾恰恰是在生产部门最戏剧性地表现出来。尽管搞了国有化，工人们并不感到生产资料是属于他们的，因此并不根据要求而作出响应。古巴领导人非常抱怨生产率低下、纪律松弛、以及旷工缺勤，但是这些都不是由于人们的不负责任，而是一个分了社会福利而不是分了权力的革命所引起的必然结果。政治和经济都被共产党头头们控制着，这个党是一个建立在崇拜统治集团和高层领导的官僚组织，它为了设法渡过困难而不惜把国家引上军事化经济的死胡同。衰退已经明显出现，多种蛊惑人心的反衰退突击性措施也不足以扭转这个趋势。作者认为，“只有创造的、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才能赋予革命以新的生命，赋予革命以真正的社会主义内容。古巴不需要发表更多的赞成革命民主化的声明，而是需要对这些原则切实付诸实施。这个岛国的统治者采取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采取了官僚主义的集体制道路，历史必将作出判断。”（纳尔逊·P. 巴尔德斯：《古巴——民主社会主义还是集体官僚主义？》，载《信使》杂志。Nelson P. Valdés, “Cuba—Socialismo democrático o burocratismo colectivista?”, in “Aportes”, Paris, no.23 Jan.1972, p.25—52）

450 在这一点上，我们只能推荐读者阅读象我一样在古巴革命初期和最近访问并研究过古巴的作者们所写的著述。这里特别应该提一下休伯曼和斯威齐的著作（《古巴革命剖析》）。“Cuba, Anatomy of a Revolu-

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60, 和《社会主义在古巴》。“Socialism in Cuba”同上出版社,1969年)以及勒内·迪蒙的著作:《古巴社会主义和发展》(René Dumont, “Cuba, socialisme et développement”,1964)和《古巴是社会主义吗?》(“Cuba est-elle socialiste?”1969。两书均由巴黎瑟尔出版社出版。两部著作题目的变化,本身就是意义很重大的)。我本人的观点在下述著作中得到阐述:《古巴革命》(“La Rivoluzione Cubana”, Dell Oglia, Milan, 1967)和《古巴真理的时刻》(“Cuba il momento della verità”, in “Terzo Mondo”, Milan, vol. III, no. 9, Sept.1970, pp.4—8)。前一著述主要涉及我1962年在古巴的经历,后一文章系根据1968年夏天我对古巴的一次访问写的。

我们在这里援引休伯曼和斯威齐著作中的一些段落。他们关于古巴的第一部著述始终不厌其烦地发表这样一些不加批判的、过于乐观的谈话,如“几乎无法想象比古巴革命有更好的成功前景的革命”(第185页),“古巴的卡斯特罗政府享有……百分之百的工农兵的支持”(第161页)但他们后来的著述则作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古巴的统治体制显然是一种官僚统治。权力集中在共产党手中,在党内则集中于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则集中于至高无上的领袖。结构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最高是领袖,其次是中央委员会,再其次是地区和地方的组织,最后是党员……历史表明,尽管社会主义运动中有着反对官僚统治的悠久传统,但在实践中,社会主义社会都采纳了官僚统治作为对付他们最初遇到的问题的最可行办法,这些问题总是非常巨大的。历史还表明,官僚统治一旦根深蒂固,就极为顽固地抗拒改变。在苏联,自从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牢固地建立了官僚统治以来,就从未出现过严重的挑战。毛泽东决心使中国不要重蹈苏联的覆辙,其结果是爆发了一场称为文化革命的两年多的全国性动乱。这一革命的长远后果究竟如何,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还不得而知……古巴的问题同二十年代苏联的问题以及同六十年代中国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但是看来今天在古巴确实正在蕴酿一场新的历史戏剧,其进程和结果不能不是全世界革命社会主义者所急切关注的”(第219—221页)。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是,这些作者怎么还能继续把所有的集体官僚制称为“社会主义的”虽然他们在脚注中援引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作为“对行使直接民主的一首赞歌和对官僚统治的含蓄谴责”,列宁认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关于国家理论的最重要著述之一”



(第 220 页)。

- 451 马尔库塞的晚期著作对此作了非常强有力的阐述，因此他在观点上是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三世界解放和发展的前提，必须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只有超级大国内部逐渐削弱，才能最终制止对落后国家进行镇压的财务和物质后盾。新左翼威胁着帝国主义的生命线；它们不仅是促进变革的物质因素，而且是推动变革的思想因素。古巴的革命和越共的活动证明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们具有可以抵制和遏制资本主义扩展的道德、人性、意志和信念。不单单是早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种强烈的团结抗敌，这种行动上的初级社会主义，为新左翼的激进主义思想提供了形式和内容；在这一意识形态方面，外界革命也成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内部反对力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榜样的力量和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力量，只有当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结构和团结力开始分崩离析时，才会开花结果。剥削锁链中最强大的一环必须砸碎。”(赫伯特·马尔库塞：《论解放》。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London, 1969, pp.81—82)。

## 参 考 书 目

读者如愿对本书一些主题作进一步的探索，可参考下列图书，现按作者姓名字母顺序列出。

[本书开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各种版本和文种的著作，凡有我国中译本者，参考书目中从略。——本书中译者注。]

### 文 集

- “Premières sociétés de classes et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 (Editions de la Nouvelle Critique, Paris, 1967), Special edition, no. 57—58 (Jan.—Apr. 1967). 《原始阶级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研究》。
-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ed. Roger Garaudy,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69. 《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罗歇·加罗迪编。
- “El modo de producción asiático”, ed. Roger Bartra, Ediciones Era, Mexico, 1969. 《亚细亚生产方式》罗歇·巴尔特拉编。
- “Sul modo di produzione asiatico”, ed. Danilo Giori, Angeli, Milan, 1972. 《论亚细亚生产方式》达尼洛·季奥里编。
- “Stato, popolo e nazione nelle culture extra-europee”, Comunità, Milan, 1965. 《非欧洲文化的国家、人民和民族》。
- “The Pattern of Chinese History: Cycles, Development or Stagnation?” ed. John Meskill, D. C. Heath & Co. Boston, 1965. 《中国历史的格局：循环、发展还是停滞》约翰·梅斯基尔编。
- “Ob aziyatskom sposobe proizvodstva”, Zakavkazskoe Otdelenie Obshchestva Istorikov Marksistov Prikomakadmii, Zakkniga, 1930. 《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共产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协会外高加索分会。
- “Diskussiya do Aziyatskom sposobe proizvodstva”, Kommunisticheskaya Akademiya, Leningrad, 1931. 《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共产主义研究院。

“Osnovi Marxisma-Leninisma”, Moscow, 1962. 《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 个人作者的著作

Abdel-Malek, Anouar, “Egypte, société militaire”,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2. 安努瓦尔·阿卜杜勒-马利克:《埃及 军人社会》。

Avineri, Shlomo, “Marx and Modernization”, in “Review of Politics” (Notre Dame, Indiana), vol. XXXI, no. 2 (Apr. 1969), pp. 172—188. 什洛莫·阿维内里:《马克思和现代化》载《政治评论》。

Balazs, Etienne, “La bureaucratie céleste: Recherches sur l'économie et la société de la Chine traditionnelle”, Gallimard, Paris, 1968. 埃蒂安·巴拉兹:《官僚化的天朝 对传统的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研究》。

Balazs, Etienn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 Yale Univ. Press, New Haven, Conn., 1964. 埃蒂安·巴拉兹:《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度 主题的变化》。

Carlo, Antonio, “La natura socio-economica dell' URSS”, in *Giovane Critica* (Rome), special edition, no. 26. (Spring 1971), pp. 2—83. 安东尼奥·卡洛:《苏联社会—经济的性质》载《青年批评者》。

Chesneaux, Jean, “L'Asia nella storia di domani”, Laterza, Bari, 1967. 让·谢诺:《未来历史中的亚洲》。

Chi, Chao-Ting,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 Control”, Allen & Unwin, London, 1936. 冀朝鼎:《从治水公共工程发展来看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地区》。

Collotti Pischel, Enrica, “Le origini ideologiche della rivoluzione cinese”, Einaudi, Turin, 1958. 恩里卡·科洛蒂·皮斯谢尔:《中国革命的思想根源》。

Collotti Pischel, Enrica, “Sul carattere dello sfruttamento coloniale e neocoloniale nei paesi agricoli ad alta intensità demografica”, in “Terzo Mondo” (Milan), vol. I, no. 1 (June 1968) pp. 45—47. 恩里卡·科洛蒂·皮斯凯尔:《在人口密度高的国家殖民与新殖民剥削的性质和特点》载《第三世界》。

Dhoquois, Guy, “Pour l'histoire”, Anthropos, Paris, 1971. 居伊·多夸:《历史问题》。

Dhoquois, Guy,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Paris, vol. XLI (July—Dec. 1966) pp. 83—

92. 居伊·多夸:《亚细亚生产方式》,载《国际社会学手册》。
- Djilas, Milovan, "The New Class", Praeger, New York, 1957. 米洛万·德热拉斯:《新阶级》。
- Eberhard, Wolfram, "Geschichte Chinas", Berne, 1948. 沃尔夫拉姆·埃贝哈德:《中国历史》。
- Frank, André G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Monthly Review" (New York), vol. VIII, no. 4, Sept. 1966.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载《每月评论》。
- Frank, André Gunder,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67.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
- Garaudy, Roger, "Le problème chinois", Seghers, Paris, 1967. 罗歇·加罗迪:《中国问题》。
- Garaudy, Roger, "Le grand tournant du socialisme", Gallimard, Paris, 1969. 罗歇·加罗迪:《社会主义的伟大转折点》。
- Garaudy, Roger, "Toute la vérité", Grasset, Paris, 1970. 罗歇·加罗迪:《全部真理》。
- Gernet, Jacques, "La Chine ancienn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64. 雅克·杰内特:《古代中国》。
- Godelier, Maurice, "Antropologia, storia, marxismo", Guanda, Parma, 1970. 莫里斯·戈德里埃:《人类学、历史、马克思主义》。
- Godelier, Maurice, preface to Marx, Engels, Lenin, "Sur les sociétés précapitalistes",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70. 莫里斯·戈德里埃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前资本主义社会》写的序。
- Gramsci, Antonio, "Quaderni dal Carcere" (1929—1935), Editori Riuniti, Rome, 1971.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
- Hegedüs, Andras, "L'analisi di Marx della burocrazia e la realtà socialista", in the collection "Marx Vivo", Mondadori, Milan, 1970, vol. II, pp. 220—241. 安德拉斯·海格杜斯:《马克思对官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的分析》载《充满活力的马克思》文集。
- 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1830—1831). 黑格尔:《哲学史讲议》。
- Hobsbawm, Eric, preface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Karl Marx, "Formen, die der 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 Vorbergehen", Lawren-

- ce & Wishart, London, 1964.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为马克思著《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英文版写的序。
- Huberman, Leo, and Sweezy, Paul M., "Socialism in Cuba",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69. 利奥·休伯曼和保罗·M·斯威齐:《社会主义在古巴》。
- Lacoste, Yves, "Géographie du sous-développement",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65. 伊韦·拉科斯特:《不发达地区的地理》。
- Lacoste, Yves, "Ibn Khaldoun naissance de l'histoire, passé du Tiers Monde", Maspero, Paris, 1969. 伊韦·拉科斯特:《伊文·堪敦 历史的开端 第三世界的往昔》。
- Leach, E. R., "Hydraulic Society in Ceylon", in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no. 15 (Apr. 1959) pp. 2—26. E. R. 利奇:《锡兰的水利社会》载《今昔》杂志。
- Lowe, Donald M., "The Function of China in Marx, Lenin and Mao",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6. 唐纳德·M·洛:《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中的中国之作用》。
- Lukács, György, "Critique de la bureaucratie socialiste", in "L'Homme et la Société" (Paris), no. 20 (Apr.—June 1971) pp. 3—12. 格奥尔格·卢卡奇:《对社会主义官僚统治之批评》载《人类与社会》杂志。
- Luxemburg, Rosa,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Cape, London, 1972. 罗莎·卢森堡:《政治著作选》。
- Maffi, Bruno, preface to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India, China, Russia", Il Saggiatore; Milan, 1960. pp. 11—24. 布鲁诺·马菲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印度中国和俄国》一书写序。
- Mandel, Ernest, "Traité d'économie marxiste", Juillard, Paris, 1962. 欧内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Mandel, Ernest, "La formation de la pensée économique de Karl Marx", Maspero, Paris, 1967. 欧内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之形成》。
- Mao Tse-tung, "Selected Works", ed. Bruno Shaw, Harper & Row, New York, 197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 Marcuse, Herbert, "Soviet Marxism", Columbia Univ. Press, New York, 1958. 赫伯特·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 Marcuse, Herbert, "Das Ende der Utopie", Maikowski, Berlin, 1967.

- 赫伯特·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结束》。
- Marcuse, Herbert, "An Essay on Liberation", Allen Lane/The Penguin Press, London, 1969. 赫伯特·马尔库塞：《论解放》。
- Mariategui, José Carlos, "Siete ensayos de interpretación de la realidad Peruana" (1924), Amauta, Lima, 1965.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七论秘鲁现实》。
- Melotti, Umberto, "Rivoluzione e società", La Culturale, Milan, 1965. 翁贝托·梅洛蒂：《革命与社会》。
- Melotti, Umberto, "Fame e sottosviluppo nel mondo", Centro Studi Terzo Mondo, Milan, 1965. 翁贝托·梅洛蒂：《世界的饥饿与不发达》。
- Melotti, Umberto, "Sociologia della fame: Dalla presa di coscienza del problema ad una nuova strategia per lo sviluppo economico", La Culturale, Milan, 1966. 翁贝托·梅洛蒂：《饥饿社会学 从经济发展的新战略认识问题》。
- Melotti, Umberto, "La rivoluzione cubana", Dall' Oglio, Milan, 1967: 翁贝托·梅洛蒂：《古巴革命》。
- Melotti, Umberto, "La cosiddetta 'grande rivoluzione culturale proletaria' in Cina", in "Rivista di Sociologia" (Rome), vol. V, no. 13 (May—Aug. 1967) pp. 101—140. 翁贝托·梅洛蒂：《所谓的中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载《社会学杂志》。
- Melotti, Umberto, "Per un concetto non etnocentrico dello sviluppo e lo sottosviluppo", in "Terzo Mondo" (Milan), vol. I, no. 1 (June 1968). 翁贝托·梅洛蒂：《关于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非种族优越感的概念》载《第三世界》。
- Melotti, Umberto, "Razzismo ed etnocentrismo nella cultura italiana", in "Terzo Mondo" (Milan), vol. I, no. 2 (Oct. 1968) pp. 29—68. 翁贝托·梅洛蒂：《意大利文化中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感》，载《第三世界》。
- Melotti, Umberto, "Sviluppi ed orientamenti della sociologia cubana a dieci anni dalla rivoluzione", in "Terzo Mondo" (Milan), vol. II, no. 5—6 (Dec., 1969) pp. 65—78. 翁贝托·梅洛蒂：《古巴革命十年社会学的发展和方针》载《第三世界》。
- Melotti, Umberto, "Modo di produzione asiatico e dispotismo orientale", in "Terzo Mondo" (Milan), vol. III, no. 9 (Sept. 1970) pp. 11

—28. 翁贝托·梅洛蒂：《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专制主义》载《第三世界》。

Melotti, Umberto, "Considerazioni sulla storia della Cina e della Russia alla luce del concetto marxiano di modo asiatico di produzione", in "Terzo Mondo" (Milan), vol. IV, no. 11 (Mar. 1971) pp. 7—32.

翁贝托·梅洛蒂：《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马克思主义概念来考虑中国和俄国历史》载《第三世界》。

Métraux Alfred, "Les Incas",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1. 阿尔弗雷德·梅特鲁：《印加人》。

Mills, Cecil Wright,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Univ Press, New York, 1959. 塞西尔·赖特·米尔斯：《社会学遐想》。

Montesquieu,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de,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孟德斯鸠：《法意》。

Moore, Barrington,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eacon Press, Boston, 1966. 小巴林顿·穆尔：《独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

Morgan, Lewis Henry, "Ancient Society" (1877). 刘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

Mumford, Lewis, "The City in History", Harcourt Brace & World, New York, 1961. 刘易斯·芒福德：《历史上的城市》。

Mumford, Lewis,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Secker & Warburg, London, 1967). 刘易斯·芒福德：《机器的神话》。

Myrdal, Gunnar, "Asian Drama: An E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Twentieth Century Fund, New York, 1968. 冈纳·缪达尔：《亚洲的戏剧 对国家贫困的探究》。

Needham, Joseph,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 :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Cambridge Univ. Press, London, 1954. 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 导论”。

Nurkse, Ragnar,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58. 拉格纳·纳克斯：《不发达国家中的资本形成问题》。

Paillet, Marc, "Marx contre Marx: La société techno-bureaucratique", Denoël, Paris, 1971. 马克·帕耶：《马克思对马克思：技术官僚社会》。

- Perlini, Tito, "Marcuse e il Terzo Mondo", in "Terzo Mondo" (Milan), vol. III, no. 10 (Dec. 1970), pp. 11—27. 蒂托·佩利尼：《马尔库塞与第三世界》载《第三世界》。
- Plekhanov, Georgy V.,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New York, 1969. 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
- Plekhanov, Georgy V.,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sociale de la Russie", Editions Bossard, Paris, 1926.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历史导言》。
- Plekhanov, Georgy V., "Œuvres philosophiques", Editions en Langues Etrangères, Moscow. 普列汉诺夫：《哲学论文集》。
- Reclus, Elisée,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Librairie Hachette, Paris, 1882, vol. VII: "L'Asie Orientale". 艾利塞·雷克吕：《新世界地理》载《东方的亚洲》。
- Riad, Hassan, "L'Égypte nassérienne", Editions de Minuit, Paris, 1940. 哈桑·利雅德：《纳赛尔的埃及》。
- Rizzi, Bruno, "Il collettivismo buroucratico", Galeati, Imola, 1967. 布鲁诺·里齐：《官僚主义的集体制》。
- Rodinson, Maxime, "L'Égypte nassérienne au miroir marxiste", in "Les Temps Modernes" (Paris), vol. XVIII, no. 203 (Apr. 1963), pp. 1859—1887. 马克西姆·罗丹松：《马克思主义反射镜中的纳赛尔的埃及》载《现代》杂志
- Rodinson, Maxime, "Islame et capitalisme",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6. 马克西姆·罗丹松：《伊斯兰与资本主义》。
- Sartre, Jean-Paul, "Le socialisme qui venait du froid", preface to Antonin Liehm, "Trois généra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0. 让-保罗·萨特：《冷酷的社会主义》为安托宁·利安的《三代人》写的序。
- Schmidt, Alfred, "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Frankfurt, 1962. 艾尔弗雷德·施密特：《马克思教导中的自然的观念》。
- Schmidt, Alfred, "Zum Verhältnis von Geschichte und Natur in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in the collection "Existentialismus und Marxismus",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1965. 艾尔弗雷德·施密特：《辩证唯物论中历史与自然的关系》载《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集。
- Sofri, Gianni, "Il modo di produzione asiatico: Storia di una controversia marxista", Einaudi, Turin, 1969. 基尼·索弗里：《亚细亚生产



- 方式：一部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历史》。
- Stalin, Joseph V.,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ittle Stalin Library No. 4,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41.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Stavenhagen, Rodolfo, "Les classes soci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agraires", *Anthropos*, Paris, 1969. 罗多尔福·斯塔文哈根：《农业社会中的各个社会阶级》。
- Suret-Canale, Jean, "Afrique noire occidentale et centrale, I, Géographie, Civilisation, Histoire",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8. 让·絮勒-卡纳尔：《西部和中部黑非洲, I. 地理、文明、历史》。
- Suret-Canale, Jean, "Les sociétés traditionnelles en Afrique tropicale et le concept d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La pensée" (Paris), no. 117 (Oct. 1964), pp. 21—42. 让·絮勒-卡纳尔：《热带非洲的传统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载《思想》杂志。
- Terray, Emmanuel, "Le marxisme devant les sociétés primitives", Maspero, Paris, 1969. 伊曼纽尔·特里：《原始社会以前的马克思主义》。
- Thorner, Daniel, "Marx on India and the Asian Mode of Production", in "Contribution to Indian Sociology" (London), vol. IX (Dec. 1966). 丹尼尔·索纳：《马克思论印度与亚洲生产方式》载《印度社会学文集》。
- Tökei, Ferenc,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Akadémiai Kiado*, Budapest, 1966. 法伦克·特凯：《论亚细亚生产方式》。
- Trotsky, Lev, "1905",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Moscow, 1922. 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
- Trotsky, Lev,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 Trotsky, Lev, "De la révolution" (1923—1936), Editions de Minuit, Paris, 1963. 托洛茨基：《论革命 1923—1936》。
- Varga, Evgenij, "Il testamento di Varga", ed. Roger Garaudy. 叶甫根尼·瓦尔加：《瓦尔加遗言》。
- Venturi, Franco, "Dispotismo orientale", in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vol. LXXII, part i (1960) pp. 117—126. 佛朗哥·万图里：《东方专制主义》载《意大利历史杂志》。
- Vidal, Naquet Pierre, "Karl Wittfogel et le concept d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Annales" (Paris) . vol. XIX, no. 3 (May—June

- 1964) pp. 531—549. 纳凯·皮埃尔·维达尔:《卡尔·威特福格尔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载《编年史》。
- Voltaire, François-Marie Arouet de, “Commentaires sur quelques principales maximes de l’Esprit des Lois”, in appendix to “Œuvres de Montesquieu”, Laquien, Paris, 1819. vol. VII. 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评〈法意〉一书中的主要格言》载《孟德斯鸠文集附录》。
- Weber, Max,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Tübingen, 1922. 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大全》。
- Weber, Max,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Mohr, Tübingen, 1922.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 Wilson, John A., “The Burden of Egypt”,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51. 约翰·A. 威尔逊:《埃及的负担》。
- Wittfogel, Karl A.,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Hirschfeld, Leipzig, 1931. 卡尔·威特福格尔:《中国的经济与社会》。
- Wittfogel, Karl A.,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Yale Univ. Press, New Haven, Conn., 1957. 卡尔·威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 关于绝对权力的比较研究》。
- Wittfogel, Karl A., “The Marxist View of Russian Society and Revolution”, in “World Politics”, vol. XII, no. 4 (July 1960) pp. 487—508. 卡尔·A. 威特福格尔:《对俄国社会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载《世界政治》。
- Wittfogel, Karl A., “The Marxist View of China” in “China Quarterly” (London), no. 11 (July—Sept. 1962) pp. 1—20; no. 12 (Oct. Dec. 1962) pp. 154—169. 卡尔·A. 威特福格尔:《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载《中国季刊》。

# 索 引

(以下页码均为原书页码 见本书各边码)

- Abdel-Kader , 阿卜杜勒·卡德尔 122
- Adrianamapoinimetina, King, 安德里  
亚纳马波伊尼梅蒂纳国王 68
- Africa, 非洲 159
-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117
- Anderson, Perry, 佩里·安德森 vij, X
- Arabia, 阿拉伯 16, 17
- Aron, Raymond, 雷蒙德·阿隆 11
- Asia, slavery in, 亚洲的奴隶制 64
- Asian commune, 亚洲的公社 46
- Asiatic city, 亚细亚式的城市 65
- Asiatic commune, 亚细亚式的公社 30,  
43
-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亚细亚生  
产方式 vij, viii, 3, 12, 14—16, 20,  
25, 48, 49, 64, 66 70, 74, 80, 95, 97,  
101—104, 112, 126, 136, 149, 154
- Asiatic society, 亚细亚社会 27, 63—69
- basic features of , 亚细亚社会的基本  
特点 54—58
- class structure of, 亚细亚社会的阶级  
结构 59—62
- concept of, 亚细亚社会的概念 77
- cultural traits , 亚细亚社会的文化特  
点 70—72
- in China, 中国的亚细亚式的社会 105  
—113
- origins of, 亚细亚社会的起源 46—49
- sources of concept of, 亚细亚社会概  
念的来源 50—53
- typologies of, 亚细亚社会的类型 73  
—76
- Assyria, 亚述 12
- Avineri, Shlomo, 什洛莫·阿维内里  
81
- Banu, Ion, 伊翁·巴努 72
- Barbarian invasions effect of, 蛮族入  
侵的影响 39
- Barbarians contribution of, 蛮族的贡  
献 44
- Batavia, 巴塔维亚 53
- Bernier, François, 弗朗斯瓦·贝尔尼  
埃 53 54
- Bilinear model, 双线发展模式 12
- Blagovechenski, L. M., 布拉戈维钦斯  
基 91
- Bordiga, Amadeo, 阿马地奥·鲍蒂加  
142
- Borgius, W., 鲍吉乌斯 58
- Bourgeois society , 资产阶级社会 62,  
97
- Bourgeoisie, 资产阶级 120
- English, 英国的资产阶级 116
- Bureaucracy, 官僚机构 61
- in Russia, 在俄国的官僚机构 141—  
151
- 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 官僚主义的  
集体制 141—151, 154
- principal feature of , 官僚主义集体  
制的主要特点 147
- typologies of, 官僚主义集体制的类型  
152—153

- Cambodia, 柬埔寨 75
- Campbell, George, 乔治·坎贝尔 53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18  
 in China, 中国的资本主义 117  
 in Russia, 俄国的资本主义 145  
 origins of, 资本主义的起源 96—100
- Capitalist society, 资本主义社会 5
- Carlo, Antonio, 安东尼奥·卡洛 147—150, 154
- Caste system, 种姓制度 60
- Ceylon, 锡兰 75, 78
- Chaldea, 迦勒底 12, 91
- Chao Siu-tchen, 邵循正 9
- Chesneaux, Jean, 让·谢诺 8, 14—16
- China, 中国 12, 16, 51, 60, 66, 74, 76, 80, 81, 91, 141, 158  
 ancient civilisation, 中国的古代文明 92  
 Asiatic society in, 中国的亚细亚社会 77, 105—113  
 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 中国的官僚主义的集体制 152  
 capitalist penetration, 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渗透 117  
 comparison with Russia, 中国同俄国的比较 82, 148, 149, 150, 157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69, 1966—1969 年中国的文化革命 10, 113, 157  
 development in, 中国的发展 124—127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143  
 famine and revolt, 中国的荒年和叛乱 71  
 historical phases, 中国的历史各阶段 9  
 opium, 中国的鸦片 123  
 revolutions, 中国的革命 108, 12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国的科学和技术 viii
- social system, 中国的社会制度 137
- sovereign's revenue, 中国君主的岁入 52
- stagnation, 中国的停滞 104
- City, Asiatic, 亚细亚城市 65
- Civil society, 市民社会 98, 99, 103
- Class structure, Asiatic, 亚细亚的阶级结构 59
- Classical commune, 古代公社 31, 34
- Classical society, 古代社会 27, 63—69
-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historical function of, 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 114—123  
 in India, 殖民主义在印度 114—116
- Communes,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of, 各种公社的特点 29—33
- Communism, 共产主义 18
- Cuba, 古巴 12, 141, 143  
 revolution in, 古巴革命 158
- Dahrendorf, Ralf, 拉尔夫·达伦多夫 81
- Despotic government, 专制主义政府 50
- Development, model of, 发展模式 8
- Dhoquois, Guy, 居伊·多夸 8, 11, 74, 75
- Durkheim, Emile, 埃米尔·德尔克海姆 75
- Dutch East Indies, 荷属东印度群岛 77
- Egypt, 埃及 12, 16, 52, 71, 73—75, 77, 91, 92, 104, 149—152
- Egyptian priesthood, 埃及的祭司 60
-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1, 6, 11, 25, 30, 36, 38, 40—45, 54, 57—59, 68, 82, 88—90, 98, 117, 122, 124, 129, 131

- 136, 138, 141, 144, 158  
England, 英国 96, 99, 114  
Etruscans 伊特利斯克人 77
- Feudal mode of production, 封建生  
产方式 67  
Feudal society, 封建社会 27, 67—69  
Feudalism, 封建主义 18, 27, 68, 79,  
81, 97  
in Russia, 俄国的封建主义 92  
origins of, 封建主义的起源 38—45  
Western 西方封建主义 80  
Forces of Production, 生产力 2  
France, 法国 81, 150  
Franks, Kingdom of the, 法兰克王国  
43
- Garaudy, Roger, 罗歇·加罗迪 8,  
18, 19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 111  
Gentile constitution, 氏族制度 42  
Germanic commune, 日耳曼公社 32,  
43  
Germany, 德国 80, 99  
Ghana, 加的 15  
Godelier, Maurice, 莫里斯·戈德利埃  
8, 14—16, 18, 74, 80  
Gramsci, Antonio, 安东尼奥·葛兰西  
99, 103  
Great Britain, 英国(大不列颠) 81
- Hegel, G. W. F., 黑格尔 2, 13, 48,  
50, 51, 58, 96, 98, 118, 119, 156  
Hindustan, 印度斯坦 53  
Historical development, 历史发展 2  
—7  
models of, 历史发展模式 8—21  
schema of, 历史发展图式 5  
Hobsbawm, Eric,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8, 21, 79
- Holland, 荷兰 99  
Hou Houa, 胡华 9  
Huberman, Leo, 利奥·休伯曼 8  
Hydraulic agriculture 水利化农业 73
- India, 印度 16, 51, 64, 75, 76, 81, 91,  
105  
ancient civilisation, 印度古代文明  
92  
Asiatic mode, 印度的亚细亚方式 77,  
149  
class society, 印度的阶级社会 80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在印度 114—  
116, 150  
development, 印度的发展 124—127  
opium, 印度的鸦片 123  
political and social fragmentation,  
印度的政治和社会崩离析 52  
primitive communism, 印度的原始共  
产主义 89  
village community 印度的村社 56,  
60
- Industry and trade, 工业和贸易 102  
Iran, 伊朗 150—152  
Ireland, 爱尔兰 123  
Irrigation, 灌溉 75  
importance of, 灌溉的重要性 55,  
67  
Italy, 意大利 99  
Ivan the Great, 伊凡大帝 84  
Ivan IV the Terrible, 伊凡四世(恐怖的  
伊凡) 84
- Japan, 日本 12, 21, 25, 51, 74, 79—81  
Java, 爪哇 77, 89  
Jones, Richard, 理查·琼斯 52  
Keynes, John M., 凯恩斯 104  
Klyuchevsky, V. O., 克留切夫斯基  
86

- Korea, 朝鲜 12, 150  
Kovalev, S. I., 科瓦列夫 9, 10  
Labour, division of 分工 66  
Labriola, Antonio,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58  
Land, relationship with, 土地关系 29  
Leach, E. R., 利奇 78  
Lenin, V. I., 列宁 91, 94, 134, 136, 137, 139—141, 143, 144, 146, 156, 158  
Leningrad debate, 1931, 1931年的列宁格勒辩论 9  
Leoney, Leonid, 里昂尼德·里昂涅夫 83  
Linguet, S.N.H., 兰盖 51  
Lowenthal, Richard, 理查德·洛温撒尔 80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 68, 150  
Mahdi, 马赫迪 122  
Mali 马里 15  
Malthus, Thomas R., 马尔萨斯 52  
Mandel, Ernest, 欧内斯特·曼德尔 8, 79  
Mao Tse-tung, 毛泽东 113, 153  
Marcuse, Herbert, 赫伯特·马尔库塞 155  
Mechanical-charismatic societies, 机械的神权社会 75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16, 75, 77  
Mexico, 墨西哥 77, 117  
Mikhailovsky, Nicholas 尼哥拉斯·米哈伊洛夫斯基 129  
Mill, J. S.,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52  
Mills, C. Wright, C. 赖特·米尔斯 74  
Mode of production, 生产方式 3, 5  
Mogul Empire 莫卧儿帝国 51, 53  
Mongol Empire 蒙古帝国 84  
Mongolia, 蒙古 150  
Mongols, 蒙古人 83, 111  
Montesquieu, 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de, 孟德斯鸠 13, 50, 156  
Morgan, Lewis Henry, 路易斯·亨利·摩根 4, 11  
Multilinear schema, 多线发展图式 25—27  
Muscovy 莫斯科 51, 83  
Neo-unilinearism 新单线发展论者 14, 63  
October Revolution, 十月革命 144  
Opium War, 鸦片战争 117, 122  
Organic-bureaucratic societies, 有机的官僚社会 75  
Oriental despotism, 东方专制制度 48  
Pastoral society, 游牧社会 28  
Permanent feudality 永久的封建性 75  
Persia, 波斯 12, 16, 51, 53, 74, 75, 77, 91  
Peru, 秘鲁 77  
Peter the Great, 彼得大帝 85, 92  
Plekhanov, Georgy V., 普列汉诺夫 12—14, 25, 58, 90—92, 136—138, 140  
Pomestiya, 领地制 84  
Portugal, 葡萄牙 99  
Primitive commune, 原始公社 28—33  
Private property, 私有财产 20, 36, 57, 66, 100  
Privileged classes, 特权阶级 61  
Production, 生产  
Asiatic mode of, 亚细亚生产方式 vii, viii, 3, 12, 14—16, 20, 25, 48, 49, 64, 66, 70, 74, 80, 96, 97, 112, 126, 136, 149, 154  
effects of,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影响 101—104

- feudal mode of, 封建生产方式 67
- forces of, 生产力 2
- mode of, 生产方式 3, 5
- para-Asiatic mode of, 准亚细亚生产方式 74
- pseudo Asiatic mode of, 伪亚细亚生产方式 74
- relations of, 生产关系 3, 4, 18
- sub-Asiatic mode of, 次亚细亚生产方式 74
- Proletarian revolution, 无产阶级革命 130
- Proletariat, British, 英国的无产阶级 132
- Proudhon, P. J., 蒲鲁东 118, 119
- Prussia, 普鲁士 81
- Pulleyblank E. G. 普利布兰克 103
- Raffles, Sir Thomas, 托马斯·拉弗尔爵士 53
-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生产关系 3, 4, 18
- Religion, 宗教 70
- Rent, forms of, 地租形式 63
- Revolution, 革命
  - Cultural, 文化革命 10, 113, 157
  - in China, 中国革命 108, 121
  - in Cuba, 古巴革命 158
  - in Russia, debate on, 关于俄国革命的辩论 128—140
  - October, 十月革命 144
  - of Wang Mang, 王莽改革 110
  - Soviet, 苏维埃革命 135, 136
- Rhineland, 莱茵区 99
- Rizzi, Bruno, 布鲁诺·里齐 142, 146 147, 149, 154
- Rodinson, Maxime, 罗丹松 8, 20, 21 35
- Roman administration, effect of, 罗马行政的影响 40
- Russia, 俄国 13, 125, 150, 154, 157
  - bureaucracy in, 俄国的官僚机构 141—151
  - 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 俄国的官僚主义的集体制 152
  - capitalism in, 俄国的资本主义 145
  -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俄国对中亚细亚的征服 117
  - feudalism in, 俄国的封建主义 92
  - Present society in, 俄国的现代社会 142
  - revolution in, debate on, 关于俄国革命的辩论 128—140
  - Semi-Asiatic society in, 俄国的半亚细亚社会 25, 82—95
  - socialism in, 俄国的社会主义 145
  - sub-Asiatic mode, 俄国的次亚细亚方式 74
- Schlesinger, Arthur, Jr., 小亚瑟·施莱辛格 11
- Schmidt, Alfred,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 8
- Scientific socialism 科学社会主义 124
- Serfdom, emergence of, 农奴制的出现 34—37
- Serfs, emancipation of, 农奴解放 87
- Shapiro, Michael, 迈克尔·夏庇若 11
- Slav Commune, 斯拉夫公社 30
- Slavery, 奴隶制 18, 27, 97, 118
  - dying-out of, 奴隶制的灭亡 41,
  - emergence of, 奴隶制的出现 34—37
  - in Asia, 亚洲的奴隶制 64
-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52, 53
- Social classes, 社会阶级 3
- Social trends, Present-day, 当今的社会趋势 156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18, 141
  - in Russia, 俄国的社会主义 145
  - scientific, 科学社会主义 124

- Socialist bureaucracy, 社会主义的官僚机构 145
- Socialist political superstructure, 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 141
- Society, 社会  
civil, 市民社会 98, 99, 103  
mechanical-charismatic, 机械的神权社会 75  
organic-bureaucratic, 有机的官僚社会 75
- Sombart, W., 佐姆巴特 58
- Songhai 松该王国 15
- Soviet Revolution, 苏联革命 135, 136
- Spain, 西班牙 77
-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140, 144
- States, types, 国家的类型 75
- Struve, Vasili, 瓦西里·司徒卢威 9, 10
- Sudan, 苏丹 122
- Sun Yet-sen, 孙逸仙(中山) 150
- Suret-Canale, Jean, 让·絮勒-卡纳尔 8, 14, 15
- Sweezy, Paul M., 保罗·斯威齐 8
- Switzerland, 瑞士 99
- Tanzania, 坦桑尼亚 12
- Tartary, 鞑靼 51, 77
- Thermidor, 热月党 143, 144
- Thorner, Daniel, 丹尼尔·索纳 14
- Tibet, 西藏 80
- Tkachov, Peter, 彼得·特卡乔夫 90
- Tökei, Ferenc, 费伦克·特凯 8, 14, 48, 49, 80
- Tönnies, Ferdinand, 费迪南德·特尼斯 72
- Trade and industry, 贸易和工业 102
- Trotsky, Lev, 列夫·托洛茨基 13, 92, 93, 135, 142—147, 154
- Tsarist despotism, 沙皇专制制度 88, 90
- Tsien Po-tsan, 翦伯赞 9
- Turkey, 土耳其 51, 53, 77
- United states, 美国 81, 117
- Varga, Evgenij, 叶甫根尼·瓦尔加 14
- Vico, Giambattista 吉姆巴蒂斯塔·维科 92
- Vietnam, 越南 12, 80, 150, 152
- Village communes, 村社 47
- Village community, 村社 56, 60, 130
- Warfare, 战争 35
-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75, 97
- West, traditions of, 西方的传统 156
- Western culture, 西方文化 72
- Western feudalism, 西方封建制度 80
- Wilks, Mark, 马克·威尔克斯 53
- Wittfogel, Karl A., 卡尔·A. 威特福格尔 8, 13, 14, 25, 61, 73, 74, 88, 103, 142, 156
- Zasulich, Vera, 维拉·查苏利奇 129, 132
- Zulu resistance to the English, 祖鲁人反抗英国 122



## 本书作者与编者简介

本书作者翁贝托·梅洛蒂是意大利布雷拉美术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并在国际政治学院讲授发展中国家社会学。他是《第三世界》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曾对许多亚、非、拉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日本、斯里兰卡、伊朗、埃及、巴西、墨西哥、智利和古巴进行过研究。文化革命期间他曾到我国访问。除本书外，他还著有《罢工的社会意义》、《革命与社会》、《饥饿的社会学》、《变化中的城市文化与社会活动》和《古巴革命》等。

本书英译本编者马尔科姆·考德威尔(1931—1978)是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五十年代末以来，他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讲授东方与东南亚经济史，1970年以后主编《当代亚洲》杂志，1975年曾任西德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客座教授，讲授社会学。

考德威尔的著作包括：《印度尼西亚》(1968年)、《不受束缚的思想》(1968年，与J.D.亨德森合著)、《东南亚战争中的柬埔寨》(1973年，与莱丹合著)和《印度尼西亚军事恐怖的十年》(1975年编辑)。